A7-4/12432/38

小城镇 大问题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

第一集

学 术 指 导 费孝通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编 写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小城镇　大问题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

（第一集）

学　术　指　导　费孝通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编写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4　字数 300,000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800 册

书号：3100·258　　定价：1.40 元

责任编辑　高　怀

目　录

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1）

小城镇　再探索……费孝通（41）

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费孝通（59）

社队工业的兴起与小城镇的繁荣

——沙洲县塘桥镇的调查…黄炳福　徐伟荣　邬大千（66）

丝绸之乡盛泽镇的形成和发展……居福田　吴大声（78）

发展工业在平望镇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陈　颐（96）

一个农村区域性商品流通中心的形成

和发展……张雨林　沈关宝（107）

交通运输和平望镇的发展

——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研究……居福田　吴大声（126）

修通公路前后

——吴江县铜罗镇的调查……蒙　晨（149）

对江南文化古镇——同里镇建设的初步研究

……朱通华（163）

小城镇的文化生活

——吴江县平望镇调查……沈　汉　唐仲勋（188）

太湖风景区四个旅游小城镇的分析研究

……吴大声　居福田（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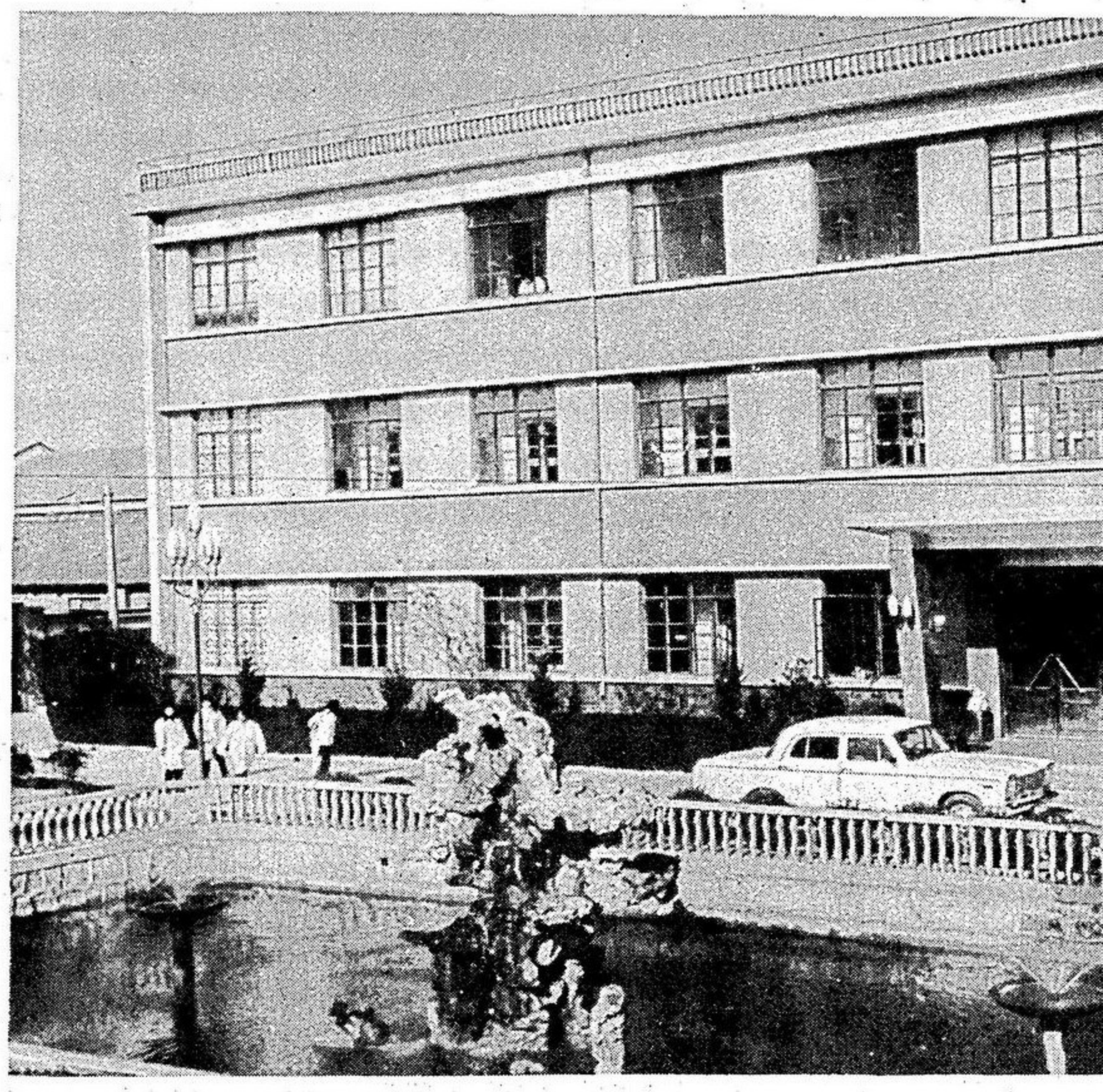
松陵镇与大、中城市经济联系初探
……徐大伟　蒙　晨　邹农俭（214）
从陶都丁蜀镇的现状看小城镇的建设……伍施彦（229）
从莘塔乡属镇的兴起探讨小城镇建设的合力
……甄为民　邹农俭（243）
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纽带作用
——江都县宜陵镇调查……吴　镕　吴德富　钱国耿（255）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
——吴江县四个行政村的调查……张雨林（266）
县属镇的“农民工”
——吴江县的调查……张雨林（286）
震泽镇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变化与更新……王　颖（297）
智力开发促进了福山乡镇的建设
……甄为民　唐仲勋　沈　汉（312）
弥补小城镇教育经费不足的一条途径
——吴江县中小学校办工业……李克世（328）
江苏省小城镇及常住人口的统计分析
……顾纪瑞　朱晓林（337）
震泽镇的人口构成……王晓义（347）
高淳县村镇布局研究
……金其铭　沈国明　董　新　陆玉麒（352）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邹农俭（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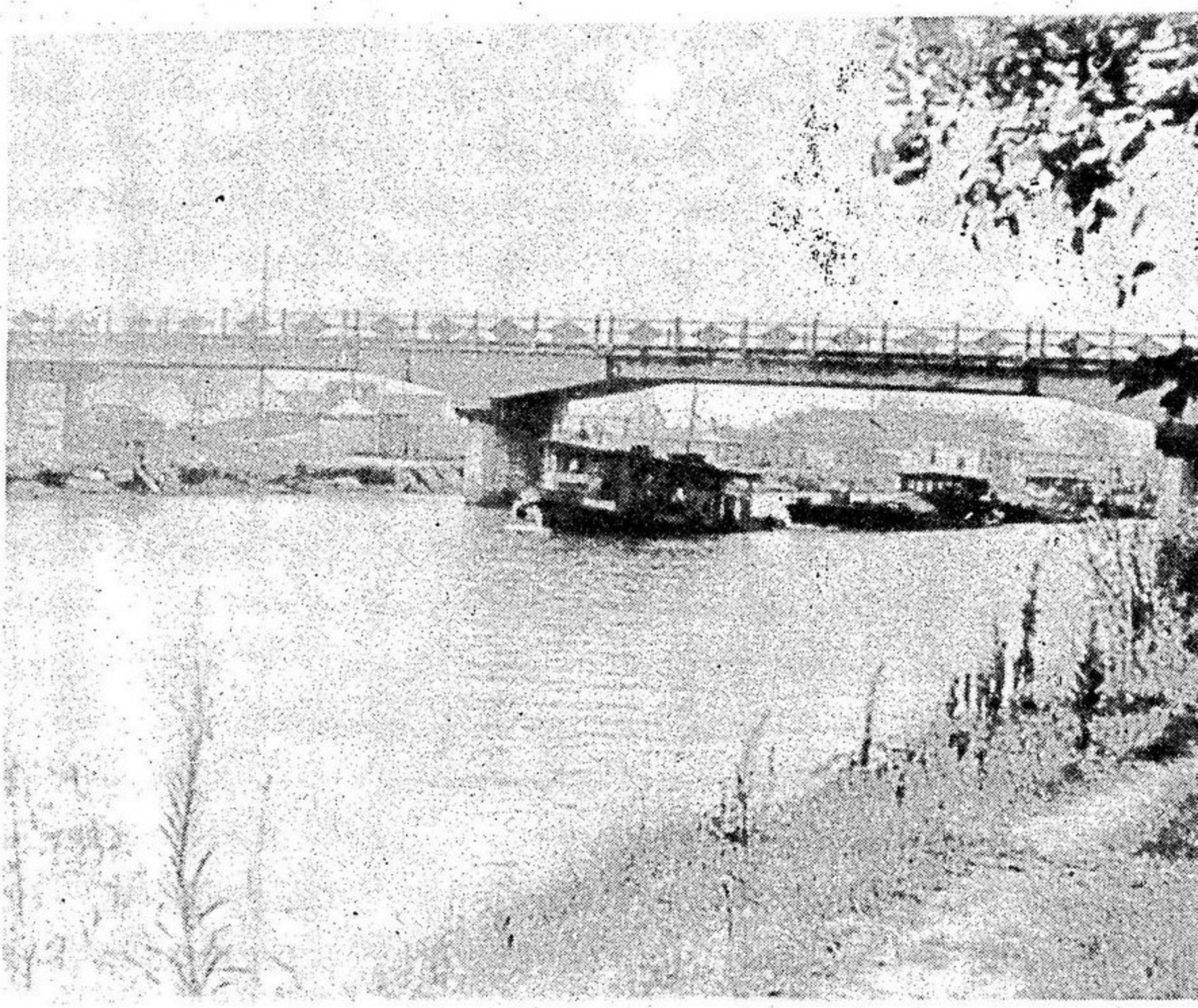
吴江县松陵镇的新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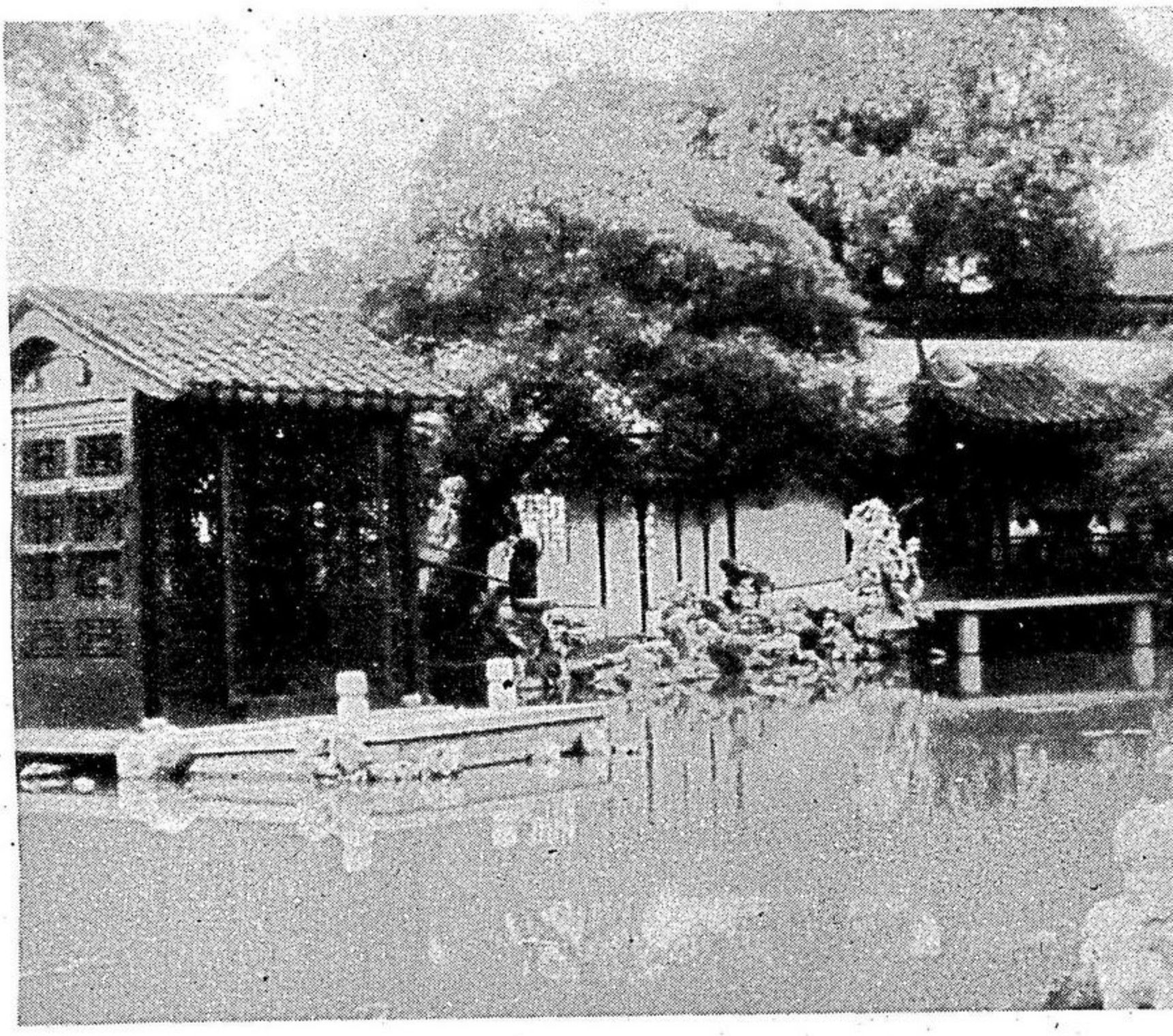
沙洲县塘桥镇新街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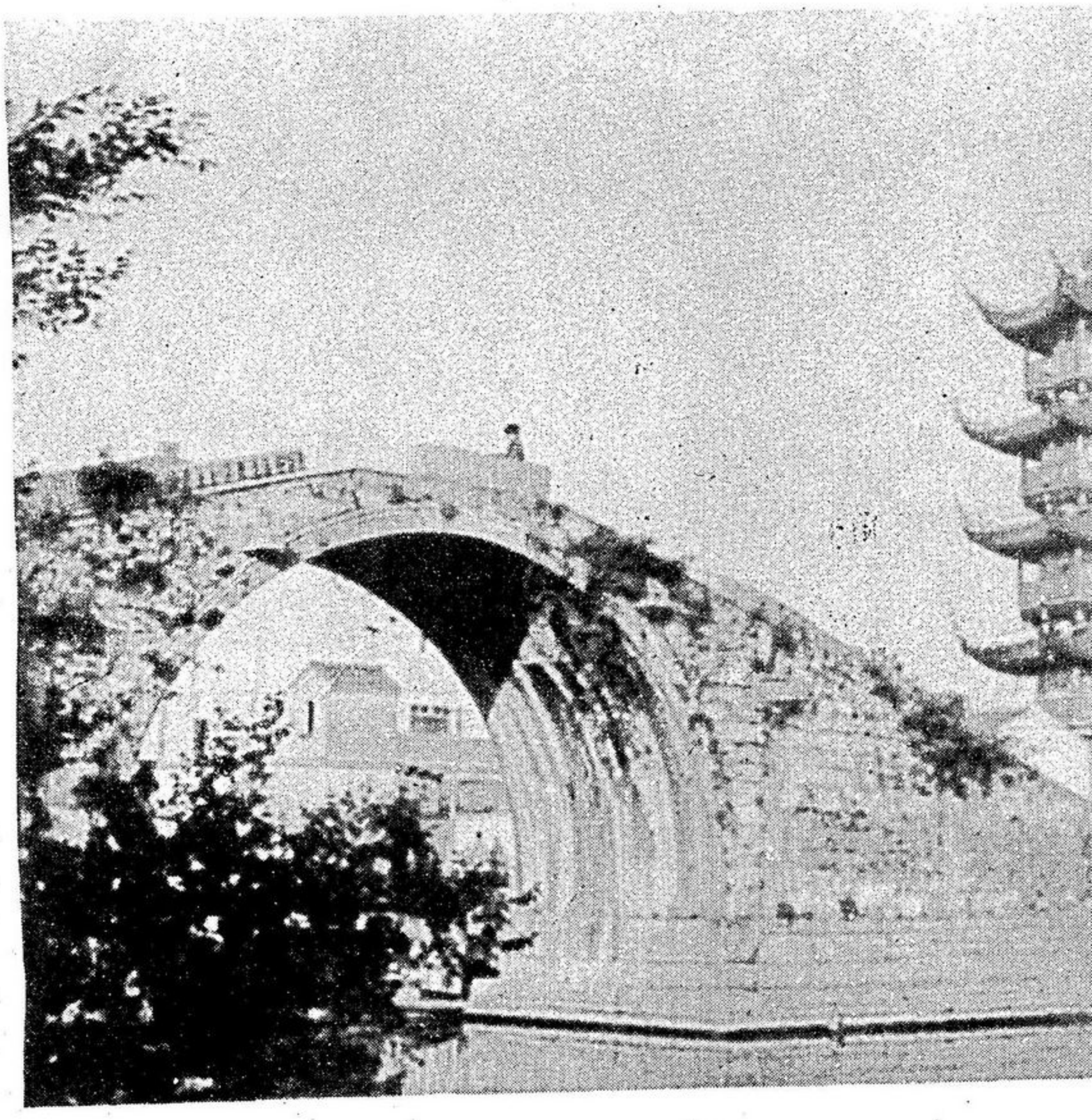
沙洲县塘桥镇的社办工厂——沙洲计算机



吴江县平望镇水上交通运输即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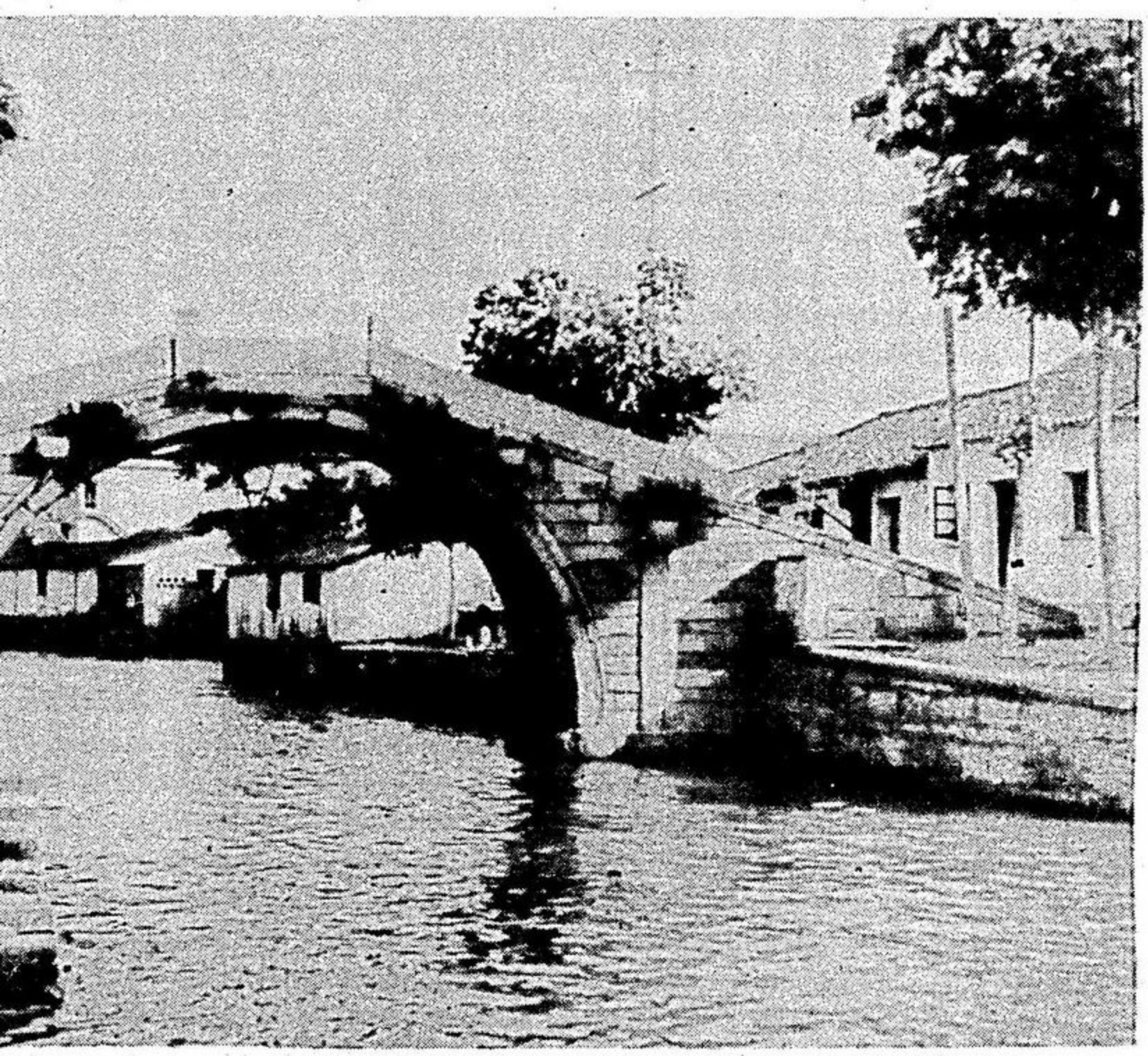
建于清朝的吴江县同里镇退思园



建于南宋初期的震泽镇慈云塔



吴江县黎里镇



于明代的吴江县同里镇普安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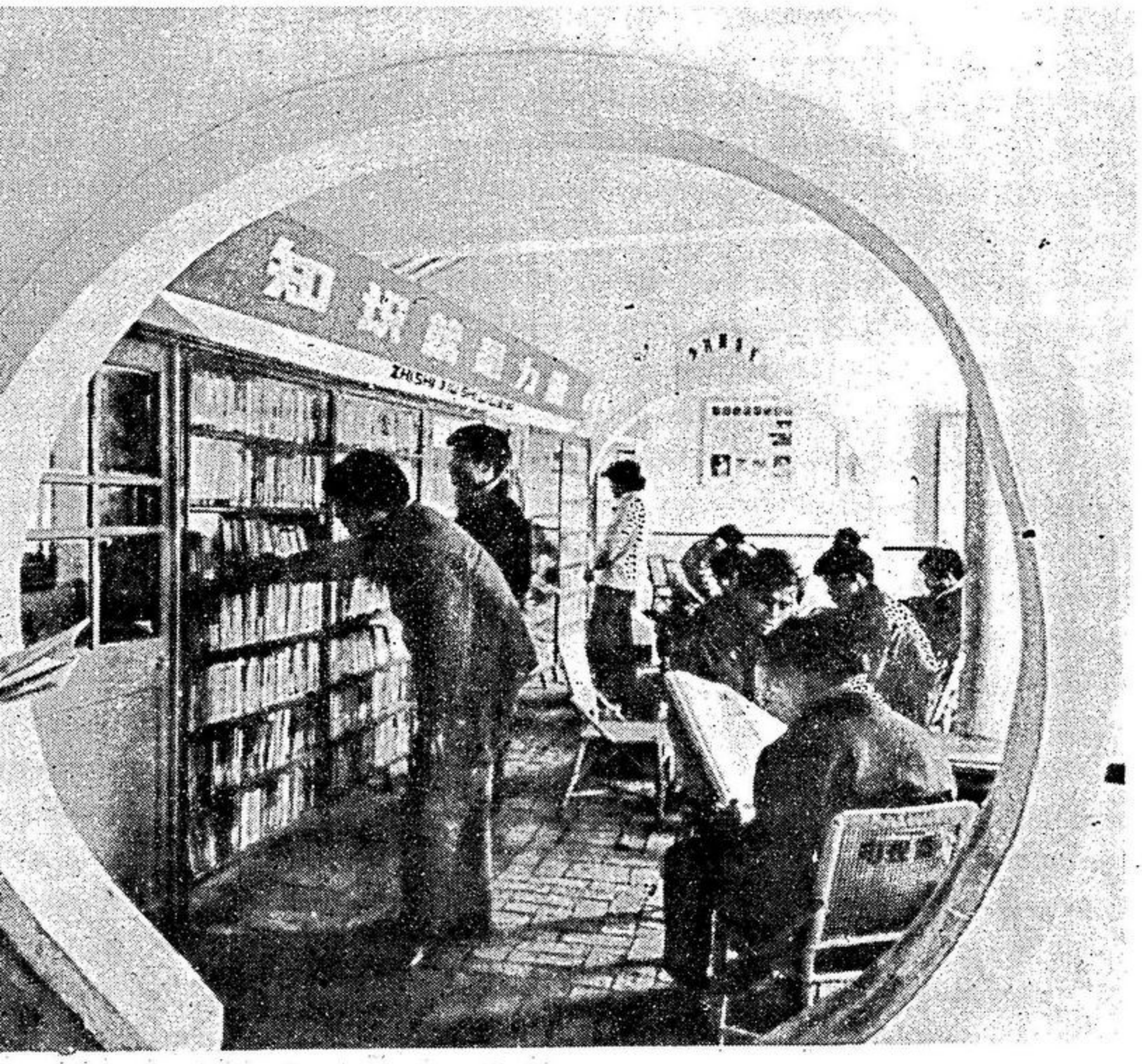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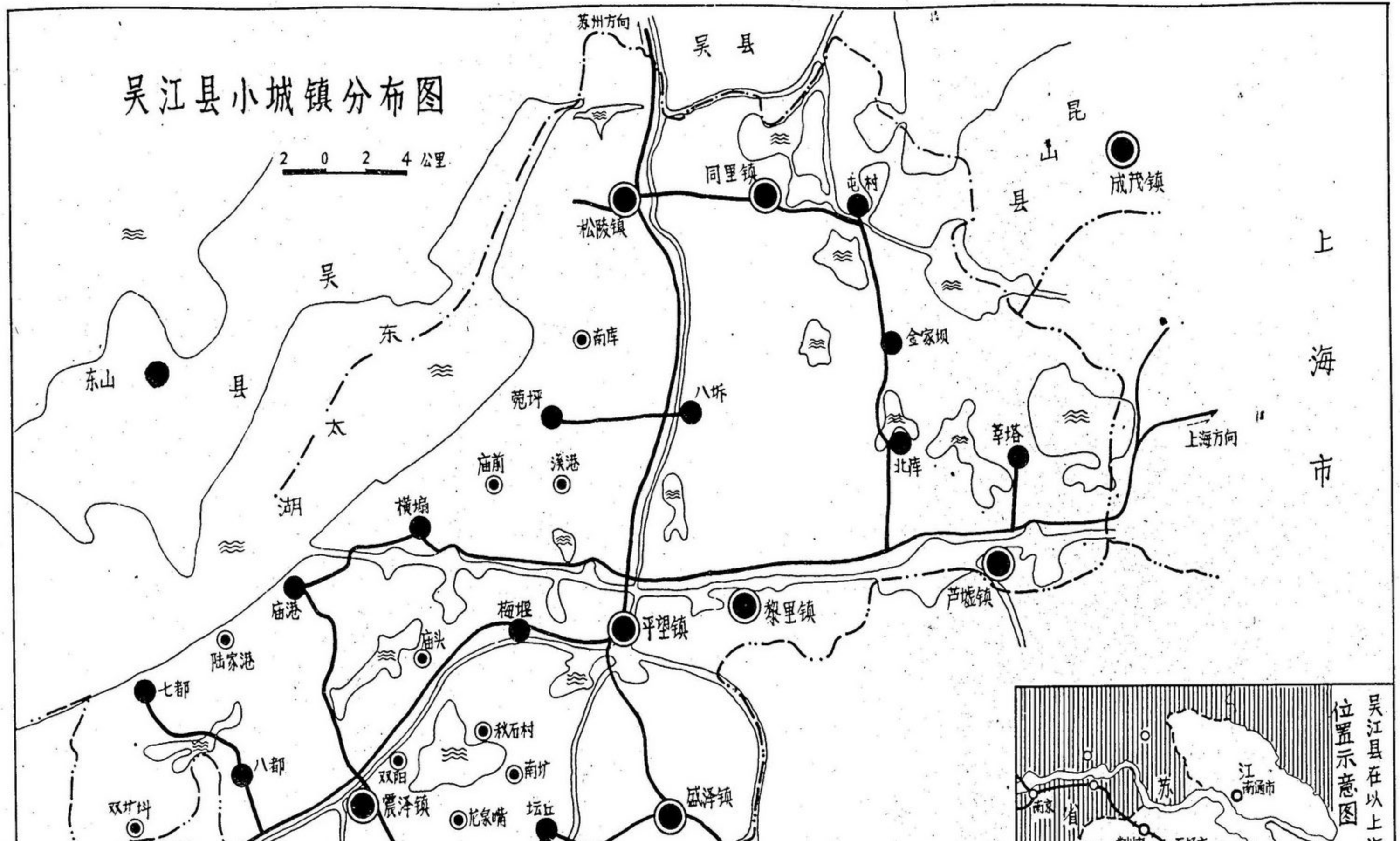
常熟县碧溪乡文化中心的科技指导站在



县妙桥乡欧桥大队农民文化宫



碧溪乡文化中心设的图书阅览室


吴江县小城镇分布图
2 0 2 4 公里
苏州方向
吴县
昆山县
上海市
上海方向
成茂镇
同里镇
屯村
松陵镇
吴
东
太
湖
东山
南库
金家坝
菀坪
八坼
庙前
溪港
北库
莘塔
横塘
庙港
梅堰
平望镇
黎里镇
芦墟镇
陆家港
庙头
七都
八都
双阳
秋石村
南圹
震泽镇
龙泉嘴
坛丘
盛泽镇
双圹圩
吴江县在以上
位置示意图
江
南通市
苏
省
南京

小城镇　大问题

费孝通

一

今年的春末夏初，我在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十来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探索。此后打算写一篇关于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的文章，来参加这次小城镇讨论会。然而一回到北京，时间由不得自己支配，这个打算便落了空。因此，这里只能依我的腹稿，谈谈我在吴江调查的感受以及由此联想到的一些问题，只是一个提供讨论的发言。

在说到正题以前，首先说说我对这次讨论会的四点希望，即希望通过讨论取得四个具体结果：一是出版一本研究论文集；二是订出一个今后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三是为今冬全国政协小城镇问题调查组作些准备工作，就是提出一些请他们来调查的问题；四是成立一个推动、协调、交流这个课题研究工作的学术性组织。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今年年初确定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不仅会议如期举行，而且还汇集了几十篇论文。万事开头难，时间只有半年，这样的结果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当珍惜已经获得的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将迈出的这第一步脚印留下来。

这些论文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们都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

本文系作者于1983年9月21日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由沈关宝同志整理，并经作者审阅订正。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是对头的。我国的社会科学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贯彻这里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达到最终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多少学了一些，许多同志也诚心诚意地想把事情办好；但是学习的理论常常不能和实际工作相结合，这就使得我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于具体问题的处理也就提不出实事求是的建议来，难免把以往的经验或是别国的东西硬套照搬，以致花了过多的学费，亏了本，走了不少弯路。

失误使人清醒。现在我们多少懂得了一点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选》里所阐明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实事求是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我们的小城镇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而注重实地调查，力求在对小城镇的实际考察中提高认识。可以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尝试。

以实践为根基的认识自然要具体、充实得多。尽管现有的文章还显得粗糙，分析不够全面，可是写在论文里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我们从概念里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只要我们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其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那么这些文章就成为现实小城镇面貌的素描。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人们还是要翻看，仍然具有价值。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

当然，人们的主观认识与事物的客观存在完全符合是不可能的。人们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而客观实际又是不断变动的，人们的认识也得跟着变动。反映不能及时，跟不上变化而固步自封，认识就会落后于实际。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

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向前走的。我们今天对于小城镇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如能发现它的肤浅和幼稚，那就证明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这不是很好么？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

为了留下历史的痕迹和认识的脚印，不使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这一点宝贵的知识流失，我希望江苏人民出版社能把这次讨论会的论文印成一本集子出版。我认为把知识流传开来，储存下去，应是出版社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在出版之前，还必须对文稿进行选择和修正，容许认识不足并不等于是说文章可以拙劣。会见情人前总得打扮一番，以自认为最能悦人的面貌见世。为此，我愿意承担一部分推荐论文的责任，出版一本小城镇研究论文选集，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第一个希望。

小城镇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是社会科学范围内国家"六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课题，而且它在"七五"规划中还将继续研究下去。现在我们在苏南所进行的研究只是这个课题的开始。为了使这项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大，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走，同时对下一年做出具体的计划，并对"七五"规划的远景做一些设想。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第二个希望。

进行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毛病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这一年所进行的小城镇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还很不够。到目前为止，课题组既没有对某一个小城镇作出全面深入的解剖，也没有越出吴江县的范围。这就好比是在显微镜下找到了一个细胞，但尚未看得清楚，更未顾及其他类似的细胞。胡耀邦同志视察西北回来，提出要种草种树开发大西北，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想过还有一个大西北可以开发的问题。可见中国之大，不允许我们做井底之蛙。即使以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江苏全省，对全国而言，它仍然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要提出江苏在全国、苏州在江苏、吴江在苏州，它

们所处的地位怎样这样的问题来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更不应以点概面。相反，应当指出认识的限度和吴江县小城镇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然而管中窥豹所见的毕竟是豹的一个部分。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我们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或许是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所谓塔尖是指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那么对不同地区今后的小城镇建设无疑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当然，我们在开始时必须十分警惕，决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而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

科学研究的进行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要使小城镇研究深入下去，必须订出一个具体计划。我们要把研究重点继续放在原先的调查点上，一方面对已经触及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要象调节照相机的焦距那样，使其有更清晰的映像；另一方面应检查前期研究中有哪些缺门，即有哪些问题还没有作调查，要在一个镇上开拓更多的调查项目。与此同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开辟新的调查点，以便于作比较分析，并制订必要的研究指标，为从调查点上的定性分析推向面上的定量分析作准备。

事实上，制定研究计划的过程就是明确研究目的和要求的过程。只有研究目的和要求明确了，计划才能订得具体可行。为此，我们这次会议作了新的尝试。与会者有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有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还特别邀请了在小城镇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江苏

的省、市、县三级政策研究机构的同志一起来参加讨论。针对同一个研究课题，进行如此广泛的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交流和协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愿我们能创立一条成功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学术的发展。

这种广泛的结合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能听到更多的不同见解，启迪自己的思想。所谓学术讨论，除发表自己的见解外，就是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我曾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主张我们要认真地看人家怎样看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二是使科学研究与实际要求挂起钩来。以往的理论脱离实际，除了个人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组织上的原因。由于科研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长期缺乏交流，造成知识分子与实际工作者背对着背。前者愿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但不知用武之地在哪里；后者希望以科学知识来指导工作，然而不了解所需知识在何方。现在两者都转过背来，面对着面。实际工作者向科研人员质疑、问难、提要求，使科研目的更明确，计划更合理，成果也更富有实际意义。科研人员向实际工作者介绍成果，提供建议，使实践按客观规律进行，工作具有科学基础。

我的第三点希望就是要对贯彻"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在前一段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知识，也就是要依据从科学研究取得正确反映实际的知识，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和建设工作之间必须建立起畅通的渠道，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能提到科研的项目里，经过科学研究反映出实际情况，再根据政策方针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由决策机关审核各种建议，联系有关情况，并考虑可行的时机作出实施的决定。这些决定通过行政机构的执行和群

众的实践，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一项决定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实践的验证，而且旧矛盾的解决又会引起新的矛盾，效果的估计和新问题的产生又将构成新的科研项目。这就是说，由科研、咨询、决策和实践构成一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循环系统，这四个环节环环紧扣，周而复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国的决策者是党的领导机构，通过决策体现党的领导。领导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上述建设工作循环系统的根本模式。由于现代化的日益深入，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决策过程更显得需要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的分析，所以提出干部要知识化，也就是要把决策过程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把科研和咨询作为这个循环系统中的必要环节，实质上就是体现党的群众路线。

把科研和咨询作为上述系统中的必要环节包涵着它们具有和其他有联系的环节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党的领导一向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求经过调查研究。毛主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各级领导都有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但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反面的教训，那就是在“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担负反映实际情况责任的研究机构被视作已定政策的辩护者，甚至看作是主管人员个人意志的吹鼓手，走向了科学的反面，“四人帮”的“内查外调”暴露了它的极端危害性。科学知识必须为政治服务。这里所说的服务绝对有别于“四人帮”时的“梁效”对其主子的“效忠”。科学研究要对客观事实负责，即实事求是。

但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难以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至于怎样

组织这类咨询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我建议不妨作一个试验，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有关专家对一定的事关重大的建设问题组成咨询小组。这个咨询小组应当联系群众，联系各个学科，发挥其综合性的特点，向党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以备党作决策时参考。

在党的领导依据建议、资料制定决策以后，由行政机构付诸实践。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客观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又给研究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进行。实践、科研、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科研项目。现在它已经吸引了多学科和多层次的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范围的扩展，将会有来自更多方面的同志参加进来。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加强各方的联系，进行组织和协调。所以，我的第四点希望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成立一个关于小城镇研究的学术性团体，把现有有志于此的同志组合起来。

由于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江苏，所以我建议请江苏的同志偏劳，出面来组织这一个团体。至于团体的名称、机构和任务等具体内容，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决定。

二

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记得1981年初我到天津开会，遇见当时在天津市委工作的李定同志，他告诉我，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云南视察，看到保山县板桥公社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于是就在同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

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可见中央领导早就看到了小城镇问题的意义，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可是，据说在传达了耀邦同志上述讲话以后的几个月中，并没有得到该市郊县的积极反应。可见在当时小城镇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许多同志还未认识到小城镇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还不理解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件事表明，在客观事物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并不那么轻而易举。认识过程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人们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直接感受，才能比较深入地认识新事物和新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赞同耀邦同志的上述提法。那是因为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

任何事物一旦产生了理论概括，便容易使人忽视事物内部之间的性质差异，只从总体概念上去接受这一事物。小城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笼统的概念出发，就会把所有的小城镇看成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而忽视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应当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这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下面我谈一谈在吴江县所看到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

第一种类型的一个镇叫震泽镇。1936年我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以后取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我的导师史禄国教授建议我先在国内作些实地调查后再出国。我听从他的意见，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由于自己的失误，负伤出山，回家乡休养。我的姊姊费达生送我到她正在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吴江开弦弓村小住。我就在这一个多月里调查了这个农村。记得有一天我去村里一家很小的店去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烟，只能一支支地零卖。店主说若要买整包的烟可去找航船带。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这个村子有三、四百户人家，一千多口人，是江南少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只有三、四个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规模小到连香烟也要分拆开来零卖。那时，这个村子里的农民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的日常用品从什么地方获得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店主所说的航船。

其实，航船就是普通手摇的有舱的小木船，只因为主要用于人的交通和货物的流通而得名。那时村子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竹篮托他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一一应接，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航船便离村出发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十二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店学徒们一涌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船老板自己便到茶馆落座喝茶。到下午，商店学徒们把装着物品的瓶、篮又送回船上，航船离镇返村。航船就这样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里要去镇上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船。奇怪的是托捎物品的和搭乘的人都不用付钱。追问船老板的生活来源，才知道，原来在春秋两季村内农户出售蚕丝和粮食都要通过航船卖到震泽镇上去，震泽镇上的丝行和米行在年终时就得给船老板一定的佣金，那些酱园和杂货店逢年逢节也要给船老板一定的报酬。所以船老板的收入是不少的。他们是农村货物流通的经纪人，是农村经济

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后来我也"免费"搭乘航船往来震泽，发现震泽镇的市河里停靠的航船有二、三百条，据说都是来自镇周围各村。震泽显然是附近这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

我在这里追述当年的观察，是想说明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

由此可见，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有具体的实际内容。在半个世纪前，震泽镇作为商品集散类型的小城镇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那时我是单枪匹马搞调查，研究工作不能不以村为界，没有能力进入镇的这一层次去。我只是在村子里遥望到了小城镇，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区的存在对于农村所发生的影响。此后，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小城镇作些调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出于我的预料，在1981年真的有机会实现了这个愿望。

第二种类型的一个镇是盛泽镇。盛泽镇现在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这个镇出口的真丝绸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十分之一，可见它是一个丝织工业的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

盛泽镇的历史发展较早，据说它在明末就有上万人口。那么这个镇发展较早的基础是什么？镇上聚居的人口又是以什么为业的呢？我记得小时候去盛泽时，看到有人站在织机上提花，觉得很新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再去盛泽时，就询问解放前丝织作坊的情况，有人告诉我，那时在镇上的作坊为数不多，且都是小规模的，最大的一家也只有二十部老式织机，但是绸庄、丝行和米行却不少，其中又以绸庄为最。既然镇本身织出的绸并不多，绸庄的绸又从何而来呢？这就使我看到了盛泽与震泽不同的特点。绸庄通过“绸领头”收购农村织绸户的绸匹。“绸领头”是织绸户和绸庄的中介人。他们发放贷款给织绸户，要织绸户按照绸庄需要的花色品种进行生产。“绸领头”将收购到的绸匹再分类售给绸庄。这样，一个绸庄通过“绸领头”的联系，就可以掌握几十、几百甚至成千的织绸户的生产。如果绸庄把如此众多的织机集中到镇上来办作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了。所以，盛泽与震泽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而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象盛泽镇那样早先是以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为主的经济中心，是很值得研究的。

家庭丝织手工业不仅是盛泽发展的基础，也是所谓天堂的苏杭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个传统基础对于我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仍然具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传统在民间已有近千年。如此悠久的历史使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一位外国朋友听我说到苏州姑娘纤巧灵活的手，便提出妇女的这种技能是否可以转向搞电子工业的问题。因为电子工业需要的正是精细准确的动作。外国人都注意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自己要是不研究、不利用，那就愧对祖先，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种类型的一个镇是我的出生地松陵镇。松陵在解放前后都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现在吴江县政府就设在松陵镇上。解放以来吴江县其他原有的小镇都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唯独松陵是

例外，它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比解放初有较大的增长。

松陵设县由来已久。封建时代地主统治阶级为防卫农民造反起义，筑起城墙和城门将城内外隔开，在城里连集市买卖也不准做，人们只得在大东门外的盛家厍做交易。城里主要是专政中心的衙门和城隍庙这阴阳两大权力机构，人活着时由县衙门管，衙门旁边是监狱和刑场；据说人死后由城隍庙管，有牛头马面、阴曹地府。城内的住户主要是地主大户和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小人物。这里的建筑也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弄堂狭小，两边是数丈高的风火墙，地主们住在里面，带有统治和防卫的特征，颇有点欧洲中世纪城堡的风格。

第四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同里镇。同里是我姐姐的出生地，我家在搬到松陵以前就住在那里。同里距运河边上的松陵只有六公里，距离白苏州到上海的水路要冲屯村镇五公里半。同里镇本身四面环水，似乎是一片藏于水泽中的岛屿。它的周围地区河塘交叉，漾湖衔接，是典型的湖沼水乡。解放前的同里不通公路，只靠摇小船进出。对于不熟悉水道的陌生人来说往往在水面上转悠半天也还会找不到进出的河道。正由于同里处于交通闭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水乡地貌，它就被地主阶级、封建官僚选中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窝。解放前，这个小镇上集居着大量的地主和退休官僚。据土改时统计，全镇2,000户人家中有500多户地主，占四分之一。地主阶级找到同里这个安全岛，修起了与苏州名园可以媲美的园林，现今正在修复的“退思园”只是其中之一。有名的评弹珍珠塔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个镇上。同里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为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已经成为文化重点保护区之一。

第五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平望镇。平望镇地处江浙之间，北通苏州，南通杭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屡遭兵燹。自古代的吴越之战，到近代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战场都是在平望一

带。日本侵华时，它又几乎被夷为平地。近年来，平望已成为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经过平望，沟通苏州和杭州。有公路东达上海、南通浙江、西联南京和安徽，成为吴江县内最大的交通枢纽。

平望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易遭战争攻击和破坏，因此在解放前曾经几度由兴而衰，一直未能稳固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发达，物资流畅，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使它常能衰而复兴。解放后，战争的威胁消除了。党的三中全会后，"左"的干扰被排除，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它争得了成为大城市工业扩散点的地位。据说，上海的一些工厂在扩散过程中，开始也找过铜罗等几个镇，但是最后还是在平望落脚。平望就这样一下子冒了出来，成为近来吴江各镇中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小城镇。

必须指出，上面列举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只是小城镇定性分析中分类工作的尝试。分类的对象只限于在吴江县初步走访过的镇，调查深入后，很可能还有应当提出的另一些类型，比如以渔业为主的社区，尽管人口较少，也可以因它的特点而成为一个类型。至于在吴江县之外全国各地的小城镇无疑还有许多各有特点的类型，比如以采矿为主的城镇等等。而且有些地方的商品流通还处于形成固定城镇的过程中，只有一些具有日中为市性质的集、墟、场、街等场所。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所以这里所提出的类型是既不完全也不齐备的。

还应说明，提出类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些城镇的特点，使我们对小城镇的概念不至于停在一般化的笼统概念上，而要注意到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但在突出特点的同时，自然不应当忽视小城镇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小城镇的共同性质，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它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的分类是以此共同性质为基础而就其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的。比如

松陵镇固然具有全县政治中心的特点，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经济、文化的中心。震泽镇固然是吴江县西南一片包括若干乡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同时也是乡一级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近年来已成为小型社队工业的中心。盛泽镇固然是当前地方丝绸工业的中心，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上述某镇具有某种特点，只是指它在小城镇所共有的许多职能中所表现的突出方面。

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注意到各个城镇有它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是由各镇的历史形成的，因此在建设这些城镇时不应当一般对待。比如前面说的同里镇，它原来是地主阶级和退休官僚聚居的地方。土改后，它原来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要建设这个镇，显然不能走平望的道路，因为它不在交通要道上；也不可能走盛泽的道路，因为它没有传统的工业。但是它却有幽美的园林，有水乡特色的建筑和河道。这是一个前人从经验中选择出来的退休养老的好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休养和游览的园林化城镇呢？加拿大有维多利亚城，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足以同它媲美的同里镇。这就是说以小城镇的特点来分类，对于我们确定小城镇发展的方向是有用处的。

三

吴江县的小城镇在解放后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线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以前是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时期，在此期间，小城镇逐步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小城镇有了转机，到了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呈现出发展、繁荣的景象。

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吴江小城镇的人口一直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与吴江县人口的迅速增长相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以盛泽镇为例，它还不是人口下降最多的镇，五十年代初就有22,000人。其后二十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近年才有转机，到1981年才达到26,000人。22,000的人口基数，以全国平均的自然增长率来计算，至今应该有四万余人口。所以，我一听到这些数字，就说其中"大有文章"。什么文章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在继续调查研究。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吴江最南端的铜罗镇的人口变化概况。铜罗在解放前叫严墓，镇的类型与震泽相似，以烧酒和肥猪出名。全镇1952年有2,475人，1962年有2,488人，1972年是1,900人①，1982年人口普查时城镇户口人数为2,007人，三十年来城镇人口下降19%。据初步调查，1951年土改时为了分得土地有60户老家在乡下的小店铺关了门，约150人回乡务农。同年还有一、二十名青年参军赴朝，其中只有个别人后来回镇。从1952年到1957年，特别是在1956年的"对私改造"期间，又有约200人离镇外出。这批人大多是做生意的业主和学徒，其中有文化的进入附近大、中城市的国营企业，有技术的则流入上海郊区和浙江的一些县城。据反映，当时他们觉得私人经营生意是一种剥削行为，连在私人店里当工人也不光彩，所以大家要另谋出路。1958年的大办农业和支援农业，以及1963～1964年的职工下放，镇上又减少了近五十户居民。除了上述的人口外流，还有青年学生考入大、中专学校，外省市招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也使镇上人口有所减少（其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大部分后来已回镇）。

象铜罗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小城镇也程度不同的发生过。人口下降是小城镇衰落的表现之一。那么小城镇衰落的原因何在？其后果又如何呢？

1957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去江村作过一次调查，即所谓"重访江村"。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传统家庭副业已

---

①1972年人口未统计，这个数字是由前后三年的人口数推算得来的。

经衰落。农民对我说：肚子可以吃饱了，就是手头没有现钱。由于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其后的近二十年只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长期没有恢复。直到七十年代初期，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才使情况有所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才开始走上繁荣。1981年我三访江村，老熟人不再发牢骚了。他们同我谈的都是卖兔毛有多少收入，以及要求我帮助社队工厂推销产品一类的话。当时农民不仅能吃上三顿干饭，而且手上也开始有钱买东西了。因为他们集体的和家庭的副业发展了，社队又办了工厂，农村里有东西能卖出来，换到钞票，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了。吃饱、穿暖、有钱花是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经济繁荣的具体内容。

把这两次在江村看到的情况与铜罗镇的人口变化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小城镇衰落的原因和后果。从农村方面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从小城镇方面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留不住居民，人口下降。总之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出发的“左”的政策，是造成小城镇衰落的根本原因。小城镇越衰落，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阻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商品经济水平愈低，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的衰落就愈益加剧。所以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是小城镇衰落的必然结果。当然，上述因果关系还有待于用客观事实有系统地全面加以检验。

下面我只谈一点有关商业渠道的问题。解放前，农村和城镇的商品除了食盐外全由私营的商人经营。解放后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村里所生产的粮食、油料、生猪、蚕茧等主要农副产品以及若干种生产资料都纳入了国营商业的流通渠道。各级行政部门都设

立粮食、副食品、进出口贸易等机构，县级成立公司，县以下设所或设站。这样的商业改革使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失去了与周围农村的主要联系。但1958年以前，小城镇的商业除了国营商业这一渠道，还有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联营合作商店以及个体户等多种渠道。自从公社化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不断受到打击，连农民提个篮子在镇上卖几只鸡蛋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联营的合作商业被“利用、限制和改造”，不能不向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靠拢，以致有的镇最后只剩下几家供应开水的茶馆和点心店。而原先由农民集资起家，属于集体性质的供销社则逐步国营化，变成全民所有制。最后，几乎一切商品都按行政区划上拨下调，在国营商业这一条渠道内流通。

商业渠道的统一国营化引起了小城镇的巨大变化。凡是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都有国营的流通渠道，在收购农副产品以及调拨分配农民所需物资上占绝对优势，这就使得作为全县行政领导和物资批转中心的县城松陵镇成了吴江小城镇普遍衰落的一个例外，它的城镇人口因机构增多、干部调入而一度相持不动，后来还略有上升。一些设置公社机构的小城镇在总的衰落趋势中借着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之力得到挣扎余地，而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受到被淘汰的压力就相当严重。在庙港公社的区域里，原先还有陆港、更缕港和罗港等几个小镇，解放前它们和庙港一样都是太湖东南岸边商业性的渔港。据说，陆港商业全盛时有五十户人家做生意，集镇规模虽不及庙港，但它的乡脚范围与庙港相仿，也有五、六华里地。更缕港则更小一些，只有近二十个“连家店”①。解放后，庙港镇先后设置区政府和公社机构；陆港、更缕港变成庙港下属的乡和大队，只有基层政权组织而无相应的一套行

①解放前农村小集镇的店铺中有一种前门开店，后屋住家属的叫做连家店。

政机构。从1956年开始，这两个小镇的商业逐步被庙港吞并，商业人员大都并入公社的商业机构。到文革后期，更缕港集镇完全被吃掉，人去集空，只留下冷落的石板街和残破的店铺面，退化为农村的居民点。陆港商业虽然也被蚕食去大部分，但它地处庙港与七都两个公社交接处，原属于陆港乡脚的村子离公社较远，主要是凭借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镇上留下了两个商业门市部和一家茶馆，三十几名商业人员在那里顽强地撑住着小集镇的地位。

从全县范围来看，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大多数被吞掉了，象陆港那样已吞未咽下的是极少数。这个吞并过程值得进一步记录下来加以分析。

用行政渠道来控制商品的流通，势必造成农民买难卖难的困境，而商业本身在经营上也容易滋长“官商”作风。据农民反映，收购农产品的部门要货时急如星火，不要时弃如敝帚。比如兔毛，去年由于某种原因价格大跌，养兔的农民叫苦连天，也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兔毛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小城镇和农村里原有众多的流通渠道已变成了单轨，适应不了这几年来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实际上已成了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

商业国营化的过程是在“化消费城为生产城”的政策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对消费和生产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没有搞清楚，以致我们对小城镇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在我国旧的传统思想中，消费不是一件好事情，它是指不事生产，靠着人家吃吃花花，实际就是指剥削享受。而在小农经济的眼光里，生产是指有实物收获的劳动，不包括商品的流通。这样我们一方面把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职能排斥在生产范围之外，归入消费中去，另一方面把地主官僚对农民和雇工的剥削，以及他们挥霍浪费的行为，看成所有小城镇唯一的基本性质。以后又进而把做生意、消费、剥削这些概念都划上等号。表现出来的是逐步限制、打击小城镇的个体和集体商业，这

就大大削弱了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然而城乡的工农业产品不能不流通，而流通总得有渠道。在集体、个体等贸易渠道全都被堵死的情况下，供销社非走向国营化不可，国营商业就不能不包揽一切。但是国营商业固然可以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流通包下来，却包不下小城镇上原有的经商劳动者，于是小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无以为业，纷纷找出路。其中最有办法的人挤入了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稍次的进入当地的国营企业；没有办法的也不让在镇上吃"闲饭"，一批批地被动员下放到农村。最后那些病残体弱等原因确无法下乡的人留了下来，依靠社会福利型的小手工业生产维持生活。这一过程，在铜罗镇的人口变化中看得很清楚。它表明在经济基础动摇以后，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也就干涸了。无以为业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农村两面泄放，小城镇本身日见萧条冷落。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情况：第一点是在这一时期小城镇衰落的总趋势中，吴江县也有新兴的例子。菀坪和金家坝这两个公社集镇是由村居民点上升形成的，它们都是设立新的公社行政机构产生的结果。第二点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吴江的县办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例如盛泽镇上的丝绸工业从作坊手工业到机器工业，一直到专业化的若干道工序配合的现代丝绸工业。但是这些县属工业在经济、管理等方面都隶属于县的工业部门，它与小城镇可以说没有多少实际联系。第三点是有少数小城镇的衰落是由于自然灾害、地理发生显著变化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如松陵西南五公里处的南厍，以前是吴江西北部地区出入太湖的主要港口镇，每天有三、四百条渔船和捞水草的农家船停靠南厍，商业兴旺。1949年太湖发大水，南厍的店铺被洪水席卷。公社化以后围湖造田，南厍失去濒临太湖的港口地位，再加上行政设置的变化，南厍集镇也就退化消失了。

四

由于看到小城镇周围农村生产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小城镇的衰落，在1981年又看到农民家庭副业的兴旺和听说那几年吴江小城镇建设也在繁荣起来的情况，我曾产生过一种错觉，以为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小城镇的复苏。后来经过实地调查，才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不能说是多种经营、商品流通的结果。

以与上海郊区接壤的莘塔公社集镇为例，在1975年以前，莘塔公社的农业经济路子越走越窄，农业只是种粮食，副业只是养猪。农民收入长期在人均150元上下徘徊。从公社镇来看，不用说新的基建，就连原有民用建筑的维修也缺乏资金来源。居民住宅日渐破败，危险房屋越来越多。镇区内两条宽只有三米的过街楼式的沿河小街狭小敝陋。自1975年以来，该镇面貌大变。现在已盖起了许多新的厂房、居民职工住宅和一座能容纳1,000多人的电影院，马路宽达18米的新街区颇有现代气派。这些基建的总投资共达356.8万元，其中有258.1万元来自莘塔13家社办工厂所上交给公社的利润，占总投资的72%以上。

莘塔的社办工厂原只有公社农具厂（现为油泵厂）一家，是在大跃进年代办起来的，其他的工厂都是在1975年前后创办的。据1982年资料，这些社办厂中，年总产值超过百万元的有油泵厂、灯泡厂和客车厂三家。若把全社的队办企业也统计在内，社队工业共有57个企业，务工社员2,098人，占全公社劳动力的17%。全年总产值1,026万元，利润66万元，其中上交给国家的所得税12万元。以务工社员工资和参加年终分配利润这两项计算，全公社20,000余人人均工业收入为49元，占年人均总收入的15%。

从农副工三业产值结构和分配结构来看，莘塔公社总产值中

农业占33%，副业占13%，工业为54%。在社员人均分配水平327元中，农业收入为190元，工业收入为49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是88元①。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莘塔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办社队工业以后，改变了农村一段时期"以粮为纲"单一经济的局面。社队工业的发展为镇的基本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增加了农民的年终收入，而且吸收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

从莘塔看到的基本情况在吴江县乃至整个苏南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各个公社在介绍社队工业的好处时，都集中在吸收劳力、增加收入和发展公社集镇建设这三个方面。为什么苏南地区的社队工业在七十年代能得以发展、遍地开花呢？对此不能不从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去作考察。

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可以加以概括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江浙一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已有悠久的历史，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口密度越大，人均耕地必然减少，所以在农业社会里，在一定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我们的祖先却闯出了一条路子，使人口稠密与经济发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男耕女织、相辅相成。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一直持续了几千年。我三十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工农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这就是农工相辅这一历史传统的本质。这个道理在现代人眼里看来很简单，可古人开出这条路子时的艰辛是今世无法想象的；而这条路子作为一个根基开出新的花来也是古人始所未料的。因此，依我看来，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的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

① 社员家庭副业是根据供销社收购系统的数据所作的测算。

多，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

在这几年的农村调查中，凡是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只要一谈到人口，都说有一股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当解放初期出生的那批人口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年龄时，农村就开始出现窝工现象。此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逐年上升，年工分量猛涨起来。而同期粮食产量的增长却越来越少，到1970年前后，平均亩产显示出已达到极限时的起伏波动。这时农村已不是一般的窝工，而是由于劳力的剩余，农民开始在那里抢工分了。我曾请一位县委书记算一笔帐，假定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现有的粮食产量不降低，全县可以有多少剩余劳动力？他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如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一股无法长期压抑下去的力量，一旦有了某种条件，它就会冲出来解放自己。正如当地同志所说的那样，办社队工业是"逼上梁山"，是将压力化为动力。

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办工业要有原料、劳力、资金设备、技术和产品市场。农村有足够的劳力，这是有利的条件。那么其他几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铜罗镇有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工厂可以说真正是白手起家的。1968年，一个城市青年插队到吴江的一个公社。这个青年的父

亲在化工厂工作，他打听到某一化工产品因为职工派性纠葛而濒于停产，而这一产品又是另一个企业的必需品。于是他就帮助这个公社与需要这一产品的企业挂上钩，这一企业把原料、技术、设备甚至一部分资金全都包了下来。就这样，农民便在几亩地上办起了化工厂。类似这家工厂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社队工厂的同志说，那时的办厂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

大中城市为什么要主动送下条件来让社队办厂呢？道理很简单，"文革"中城市里的大、中企业有不少在打派仗，搞停工闹革命，没有稳定的局面，自然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但社会生活不能没有商品。尤其是一些外贸产品的生产还得完成计划。而相比之下，农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稳定。于是城市里不能生产，就转移到乡下去。那么，由谁来牵线转移？从吴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做了一件自己不一定意识到其意义的事。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大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作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等到十年内乱结束，苏南的社队工业已渡过了最关键的初创时期，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在县属镇，由于镇、社体制分设，社队工业不能侵犯镇区，于是就傍着老镇，在外围形成一个社队工业区。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吴江县的七个县属镇内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工业：一种是县属工业（包括全民或集体），另一种是镇办工业。县属工业的发展较早，一般是在五十、六十年代开办的。它对保住小城镇一部分人口和为附近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是起

了作用的，而且近年来这部分工业也出现了新的飞跃。然而县属工业与它所在的镇之间没有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它只对国家和县交纳税收和上交利润。所谓镇办工业在1966年以前大都属于社会福利型的集体小手工业组织，实际上是残留在镇上的剩余劳力进行生产自救的组织。由于在“文化革命”期间，各级行政有需要自己找财源，“分灶吃饭”，灶灶要自己生火，镇这一级也得找各种门路办工厂。于是镇办工业就在集体手工业基础上与社队工业同时发展起来，现在也达到相当的规模。

“文化革命”的后期，从县、镇到公社、大队，各级都在那里积极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震泽中学是吴江有名的重点中学，出了人才。这份功劳部分要归到“六神丸”的瓶塞子上，这不是虚言。不搞校办工厂生产瓶塞，这个中学的校长就难以当家。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培养我们子弟的教育经费如此不足，要由学校自己办工业来弥补。我听了以后，总觉得心中有一股压抑。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从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1978年以前，吴江县解放三十年只铺了三公里的县级公路，十年铺一公里。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所以尽管当时条条框框还很多，但各级自有办法，各显神通争财源。社队工业如同鸭子戏水，下面已经动了起来。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开了捆住的手脚，社队工业和其他各种小工业就如雨后春笋一下子生长了起来，遂遂勃勃地向前发展。

由此看来，苏南这些年来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而集体商业的经济活动还没有真正活动起来。我们作科学研究，不能笼统地说什么小城镇繁荣发展了，而要看小城镇里繁荣发展的是什么东西，它的这种发展又给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带来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我想从上述的变化出发回到点与面的关系上，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

题，谈一谈对小城镇现有工业、商业、服务业的认识，来共同探讨怎样才能使小城镇真正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基本问题。

五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通过调整改革，大中城市的工业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对于社队工业有两种估计：一种看法是社队工业发展是钻了城市工业停滞的空子，所以城市工业的发展严重威胁社队工业的生存，前途并不乐观。另一种看法认为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不但不相克，而且是相辅相成，因此对社队工业的前途不必悲观。这两种估计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怎样认识、处理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发展中提出来的课题，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深入全面地作研究。

目前社队工业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起制约作用的是社队工业生产不稳定。我所见的不少工厂很多是二、三年换一块厂牌，一、二年转一个产品，人们叫它“开关厂”。这样做固然有作为新厂可以免税的奥秘在内，但根本上还是缺乏稳定性。

我们不能满足于市场调节稳定性差这种回答，而应当从社队工业的实践中，去解决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市场调节怎样能够达到企业稳步发展的问题。首先不能一般化地对待社队工业，而应当从具体事实出发去分析社队工业里不同的类型。下面先列举一些我们见到的不同类型的社队办厂。

吴江县社队工业里有不少是丝织厂。办丝织厂抓住了当地农村具有丝绸手工业传统的特点，而且它作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利润较高。照理说这种工厂是应该稳定的。然而绝大多数社队丝织厂的原料不是蚕丝，而是化学纤维。在七十年代，化纤产品是热门货，只要能生产，不愁无销路。但随着大城市化纤工业的发展

和人们对衣着需求的改变，这两年来吴江县社队丝织厂的产品市场离本地越来越远，采购员采取了你占城市我下乡，你在平原我上山的办法，一直把产品销往福建、安徽、青海等省。尽管如此，去年化纤织品降价，损失还是不小。

庙港有一家蔬菜加工厂是在1980年创办起来的，共有三十余名固定工人，生产各种酱菜，主要是小黄瓜和大头菜。这个厂的原料都是本公社农民自己种的，1982年它向全社收购蔬菜总值达110万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工厂本身年利润最高达15万元。它的产品有半成品和成品两类。半成品销往山西，成品除当地自销外还销上海、苏州和由外贸出口远销南洋各地。

平望现在有上海缝纫机三厂的一个分厂，它是1981年6月由上海缝纫机三厂和吴江县农机厂联合投资、共同筹建的。总厂与分厂两家联合生产蜜蜂牌家用缝纫机。分厂虽不是社队工厂，但它一方面为总厂提供一部分机头零件并组装整机；另一方面则和梅堰、震泽、金家坝的几家社办厂协作，为上海总厂及其本身生产机架铸件和台板。这几家社办厂的原材料由上海供应，产品归上海接受，按照总厂的计划组织生产。分厂的原材料也来自上海，技术由上海派人指导。分厂所获利润和超产部分，与总厂对半分成。

上面三种社队工厂有可能是吴江现有社队工业的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当地农村，只是利用当地劳力的工业。在目前社队工业技术水平还较低、在品种式样受到资金匮乏制约、商情信息基本上还靠当面碰头交流的条件下，这类社队工业忽起忽落不能稳定是必然的。第二类是原料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比较可靠的工业，这类工业实际上是当地农副产品的加工工业。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衔接起来，是社队工业中最稳定的一类。第三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第一类相同，并不是本地自产，但由大工厂供应，市场也是大工厂承包，它是城市大工业的扩散点，相

当于大工厂的一个附属车间，所以它只要能维持住与大工厂的关系也是相当稳定的。

从吴江全县来看，第一类工厂占绝大多数，第二类工厂是少数，第三类工厂只有几家。因而从总体来看，全县社队工厂还是处于不稳定阶段。

对社队工业作出上述分类，是为了说明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因此我认为应当把工业的重心转移到第二类上去，要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轻纺工业或手工业。这是基于我对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的认识。当然哪些原料适宜由社队工业去加工，它掌握主动权的比例应有多大等问题尚需进一步具体化。但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时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第一类工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送上门来的，而现在却要到处磕头找原料和市场。这说明它作为农村工业的先导任务已经完成。这类工业将来是否会有新的出路，那要看整个国家工业怎样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体系以后才能预测。第三类工业看来是有前途的。从世界范围看，大城市工业扩散是一个趋势。大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贵、工资高、污染严重等，已使它的工厂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已向郊区和附近农村扩散，现在甚至扩散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去了。这种工业扩散曾引起严重的污染扩散的后果。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这种恶果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我曾说过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社队工业也可以帮助更小集体工业的发展。最近我看到江都宜陵的一份调查报告，说那里的社队办的蜂乳加工厂，把装蜂乳的玻璃管、包装盒等零件分到各个生产队去

制造，使得这个公社的许多生产队都得到好处。这不是“小鱼帮了虾米”么？所以工业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要一层一层地扩散下去。但是大中企业不应当把污染也扩散给还不怎么懂得污染为害的农民，而是把就业机会和工业利润扩散出去，这样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经营管理以增加本身利润。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

工业要打破大而全，不仅是形式问题。工业规模越大，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外国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过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发展工业中解决广大农村中居民的生活问题，我们不应当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其次，要考虑到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必须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毋庸讳言，我们对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还缺乏经验，以致一些大的国营企业不能赚钱甚至长期亏损。现在有的社队工业想稍稍扩大点规模，结果他们自己说是“骑上了马背下不来”。因此我认为应当注意研究社队工业的规模和适应当前农民水平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实践培养出一大批能管理工业生产的基层干部，为我国工业进一步大发展创造人的条件。

社队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个队办工厂赔了钱，我问他们怎么办？回答是赔钱还得搞，这是因为工厂看来是赔了钱，但是生产队每一家都有人在厂里做工，挣得工资，所以不允许关厂，而宁可少拿一点工资。因而我想到这些社队工业有点象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家庭手工业是不计工资、只算收入的。所以从社队工业来说是赔了些钱，但如果把工人们的工资算进去，对全生产队的农民来说，还是增加了收入。赔钱还要办下去，体现了社队工业的坚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坚韧性来自于传统，来自于人多地少的现实。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在不稳定中还要坚持生存下去。

赔钱还要办，一家出一个工人，机会均等，凡此种种，看起

来都与现代工业的讲求效率、利润、择优挑选人员等经营原则相背离。要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这些现象自有它发生的社会原因。人多地少和工农相辅的基本情况不改变，这种现象也不易改变。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转变它的落后性为开创新工业服务。日本企业家引为自豪的所谓Z式管理，无非是利用传统的"我照顾你一辈子，你得终生为我服务"的从属关系作为经营管理中发挥劳动效率的有效方式，而我们农村中人际关系的传统要广泛深刻得多。当然其间良莠不齐，应该对它们加以分析和考察，作出区别，弄清哪些东西可以利用和利用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以虚无主义的态度看过去。要真正懂得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来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新的。

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成员。这批人数目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江苏全省的务工社员人数达到527万人，而全省城镇户口的劳动力总数只有606万人。换句话说，在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从事各种非农业工作的人数中，农民工与城镇户口的工人在数量上已相当接近。农民工挑着小城镇工业三分之一的担子，应当深入考察这批人走出村子到小城镇上做工的全过程，研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工作、思想感情。这是中国工业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情况。

在实地调查中，时时可以觉察到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驱

使那些基层干部不能不开动脑筋朝前赶。我也受到一些感染，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作深入研究的引子。我似乎感到自己盼了数十年之久的东西就在眼前，农村真正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然而自己对其中许多有着深刻历史的现象还未能透彻地理解，还需要继续观察。

江苏其他地区的条件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不是也走苏南社队工业的路子？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步子怎么走法？它从苏南的经验中能得到些什么？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在我心里盘算，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向这些方面开展。

吴江的社队工业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三中全会后的迅速发展也有五年了，其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现在应是加以回顾总结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对社队工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对社队工业中发生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

六

小城镇作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小城镇商品的流通环节和疏通商品的流通渠道。

商品的流通环节，是指商品从生产者那里出来到达消费者手上，中间所经历的步骤。比如某一工业产品由上海的工厂生产后运往苏州；苏州的商业部门将它分配给吴江县；吴江的商业机构再把它分拨到各公社；公社供销社又把它批发给集体商业，最后由门市部出售到农民手中。商品就是这样经历了五个非直接消费的部门一步步地转运给消费者农民。这每一次转手都是商品流通的环节。同样，农副业生产的商品也要经过若干环节作相反方向的流通。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目前的商品流通要经过哪几个环节，以及各个具体环节对于商品流通有什么作用。

让我们撇开大中城市，先取出从小城镇到农村这一段来作考察。从这一段商品流通环节的具体分析中，就可以看到小城镇之间还有大小不同、层次高低之别。

前述的类型分析表明，小城镇对农村的主要作用可以因类型不同有所偏重。然而即使是同类型的小城镇，对周围农村所发生的作用，也不是等量齐观的。例如同是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震泽的乡脚大，庙港的乡脚就要小得多。因此，由小城镇作用影响范围的大小，反映出一个有系统的高低不同的层次来。

城镇层次的划分，过去大多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然而，小城镇商业作用的层次分析，单以人口为指标是不够的。因为人口大体上相同的城镇在商品流通环节中所处的地位却可以不同。在目前我国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行政的因素特别重要，许多不同等级的行政性的商业机构决定了商品流通的环节。所以，我认为不妨首先从城镇的行政地位入手来观察商品流通的过程。

吴江县的小城镇依据行政地位，可以分为三层五级：第一层有县属镇，在吴江有人称为七大镇。这一层小城镇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镇和公社双重商业机构。县属镇又分两个级别，第一级是县城松陵，它有县、镇、社三重商业机构。第二级是震泽、盛泽、平望、同里、芦墟和黎里等六个非县城的县属镇。第二层是有公社商业机构的公社镇(或称为乡镇)，吴江的十六个公社镇也分为两个级别。第三级是商业人口接近于县属镇的八坼、铜罗和横扇，当地叫做三小镇，这三小镇除公社商业机构外，还有若干县属商业机构的派出部门，其管理范围越出本公社。第四级是设置有公社商业机构的庙港、七都、莘塔、金家坝等十三个镇。第三层是大队镇(或称村镇)，这一层镇在区域上都属某一大队范围，在行政上并不附设商业管理机构。它不同于有下伸店和双代店① 的大队中

① 业务属供销社系统的大队代购代销店叫做双代店。

心村，区别在于有商店、服务业和集市贸易的聚合和有经常性的商业管理人员。第三层不再分级，在吴江县共有如前面所说的陆港等十二个村镇①。

由此可见，商业流通的环节实际是以一层层的行政级别为依据的。那么商品是怎样在这些环节上运行的呢？实际情况要比工业品通过高层次到低层次再到农村，农副产品又反向运行的理论分析要复杂得多。

例如开弦弓村有一家下伸商店，这个店销售量最大的是火柴、糖果、香烟、酒、酱油、盐一类的商品。店里还有三只铝锅，据商店工作人员说铝锅已在货架上放了整整一年。难道是开弦弓村人不用铝锅？不是。农民说买一只锅子要用几年，总得挑个好的，但这里只有三只没法挑选。所以买铝锅之类的物品他们就要上震泽或庙港。村里的青年男女结婚时新房里所需要的一些用品还要到上海、苏州去买。开弦弓是一个村落，不是村镇，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农村里农民生活各种必需品是分别由不同层次的城镇供应的。这里就体现出了小城镇作为商业中心的层次来。一般情况下，农民生活中食用的如油、盐、酱、醋等一次性消费品基本上可以在村镇得到满足。村镇商业的门市部一般不到十个，销售范围大都是在一公里以内。农民生活中日常用品如热水瓶、脸盆等低档耐用的消费品，基本上是从乡镇或县属镇得到满足的。乡镇内同类商品一般都是独家经营的，花色品种与数量均较少，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十到五十个之间，销售范围在3公里左右。县属镇内同类商品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市部销售，花色品种与数量比乡镇多，选择余地增加，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五十到一百个之间，销售范围在5公里上下②。

---

(1) 据乡村建设局调查统计。

(2) 商业门市部数与销售范围都是吴江县各层小城镇的平均数。

小城镇的层次是层层包含的。这就是说高层次的小城镇的销售范围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小城镇及其销售范围，而且高层次的小城镇自身也具有属于低层次小城镇的销售范围。例如假定庙港、七都、八都等乡镇和这些公社的农村都到震泽来买铝锅，那么对铝锅这一商品来说，震泽镇铝锅的销售范围就包含了以震泽为中心的所有乡镇及乡镇的销售范围。但震泽不只是卖铝锅，它同时也卖油、盐、酱、醋，就这些商品的销售来说，震泽镇的范围与陆港这些村镇的范围相差无几，都限于附近约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商品的销售范围实际上就是吴江民间所说的“乡脚”。乡脚并不是以镇为中心的一个清晰的圆周，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乡脚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小城镇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决定于它们乡脚的大小。

小城镇层次分析应当深入到满足农民各种生活需要的功利评估。所谓功利评估，是指农民对买何种商品，花多少时间、付多少成本的计算和均衡。功利评估的原则是以最少时间、最低成本去取得最满意的商品。小城镇的商业层次应当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来布局。我不知道现在的商业部门有没有一本在哪个环节该储备什么样的商品和每种商品要储备多少的帐。如果没有这本帐，就会产生有些环节上应该具备的商品无货供应，而在另一些环节上不应该储备的商品又被囤积的不合理现象。例如我在广西大瑶山的新华书店买到一本《陆游年谱》，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在瑶山的书店里摆上这类书籍，恐怕是很少有机会被人赏识，难以遇上知音的。

流通环节的合理化是商品流通的必要条件，道理是显见的，但做到合理化却需要作细致的研究。

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是一件更大的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城镇上行政化的单轨渠道发生的问题，我们还不怎么清楚。我只是了解到集市贸易在吴江已经恢复起来，农民挑担上街，商贩

摆了摊子，到处很热闹。松陵镇还为这样的集市搭了个玻璃瓦棚，下雨天，买卖人群不致淋雨，做了一件好事。虽然在集市贸易中是有价格管理等许多问题存在，但我看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吴江县小城镇的集市贸易还只是停留在农民提上一篮鸡蛋在集市上等上半天的原始状态，而不是象北京市中关村一带那样，只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便从日中为市的个体经商变成一排排集体合作的商店。

听说供销社也正在进行改革，对此我得首先说明自己是外行，又没有进行实际调查，目前还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说几句。从客观形势看，现在要供销社重新回到合作性质上去恐怕不那么容易，要国营商业把已经经营的那些项目让出来恐怕也有难处。据说，前两年小镇上供销社和集体商业从体制上划清了。然而所谓的集体商业，其实还是批发商品给它出售的供销社附属机构。不客气一点说，那是换一把勺子去舀大锅里的汤。

那么，小城镇集体合作形式的流通渠道怎样才能建立、发展起来呢？前些时松陵镇的同志写信给我，要我帮助他们买一辆卡车，用它把凤尾菇运销到苏州市场上去。买汽车，我当然是毫无办法，但这封信使我受到了启发。1981年我把澳大利亚一位朋友送给我的平菇的菌种带回了家乡。1982年吴江县农技所和松陵镇的同志试种成功并作小规模推广，有同志还给它起了一个优雅的名字叫凤尾菇。经化验，这种蘑菇不仅食用价值高，而且体积大，产量高，每斤以七分钱的成本能卖得六、七角钱，它还能立体柱形栽培，适宜作为农村家庭副业。可是在农村里推销有困难，县城内的市场太小，而苏州和上海却很欢迎这种食品，于是运销的问题也就发生了。所以，他们要我设法买一辆卡车。这封信给我的第一个启发是新商品要走新的商业渠道。既然原有的商品走集体形式的流通渠道困难重重，新的商品或许就比较容易创出新的方式来。我们应当支持鼓励生产者自己组织起来作集体流通的新的尝

试，一切好的形式都是从尝试中出现的。我们要积极发展小城镇，就要从一切方面想各种方法去尝试新的发展。

由此我想到要进一步研究农村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凤尾菇产量大了，就想到自己要买汽车运销，那是商品产量的提高促使他们想到的。如果农村除社队工业外的商品生产还不足以满足附近几个小城镇居民的需要，那么手拎肩挑的集市贸易渠道就完全可以承担流通任务，自然不必也不会有更上一层楼的要求。然而1982年江村杀兔吃肉的事实又说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水平必须要有新的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流通渠道才能巩固和提高，如果一味把身子靠在洋人的背上过日子，人家动一动小拇指，我们就要跌筋斗。所以，我希望有同志能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现状出发，深入探讨小城镇商业流通渠道与农村商品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从这些事实又引出一个看法，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之所以没有社队工业的发展快，原因是受到原有商业渠道压抑的农村商品经济，对小城镇的冲击力还不够强，一旦这种冲击力强大起来，包揽式的流通渠道就非改革不可。而现在农村经济尚处于生产责任制的低级阶段，商品生产的程度还不够高。要突破当前的局面，还有待于多种经营专业责任制的发展。从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责任制到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是当前农村生产力继续提高的必由之路。从整个苏南地区来说，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形式已经在某些方面出现。所以，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客观的发展会带来的结果，以开辟新的流通渠道的尝试去自觉地适应、促进这一具有光明前途的发展。

七

小城镇怎样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对此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四访江村时，听说在影片“少林寺”上映前，浙江的南浔镇电影院先贴出上映这部新片的预告。震泽镇的电影院获悉这一消息后，赶紧抢先搞到这部片子赶在南浔之前放映。这部片子在当时吸引了周围四面八方的农民。他们摇着船、带着孩子来镇上看电影。《少林寺》放映一周，卖座率始终不衰，电影院收入一万元。农民上街看电影总得吃点面条、点心，还要往家捎回些东西。结果这七天内全镇商业的营业额增加了六万元。这件事在我看来是镇作为农村中心的生动例证。假如经常这样，震泽岂不就是一个农村的娱乐中心和商业中心了么！

这件事说明小城镇的服务业是蕴有巨大潜力的。不是农民没有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而是我们不懂得农民的需求，致使小城镇上的服务项目、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远跟不上客观的形势。

为农村妇女烫发，现在是小城镇的一个服务项目。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很少见到有姑娘烫发。到四访、五访时，烫发的女青年逐渐多了起来。今年六访时看到，不论是社队厂的青年女工或是在田里干活的姑娘，头发几乎都弯曲了起来，甚至连十二、三岁还在上学的女孩子也烫了发。据说她们大多数是到庙港和震泽的理发店里去烫发的，每次两元。每逢过年过节，理发店日夜开业。在这件事上，庙港和震泽已成为农村姑娘的服务中心，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测量这两个中心服务区域，即小城镇乡脚的一个指标。但是，农村姑娘烫头发的风气完全是自发的。我们对电视机的下乡引起了什么后果可以说很不清楚。这些都是看来是小事情，但意义却十分深远的问题，需要我们严肃地进行科学的研究。

再说小城镇上的茶馆，过去这是附近农村交流社会信息的中心，城里的、镇上的、村里的信息都在茶馆里汇集，并散播到附近农村里去。它是个民间相互咨询的服务场所，里面有社会新闻、有生产技术问题、有做媒等丰富的内容。现在民间的信息交流、咨

面服务是否还在茶馆进行，还是另有场所和其他途径？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副工综合发展新的情况下，农民到底有什么新的服务要求，怎样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

在文化方面，除了电影院对农民开放外，镇本身现在很少有什么文化设施。青年们一般不上茶馆，又几乎没有文娱、体育等活动，连找对象在镇上也没有谈话的场所。去年松陵镇修了一座小公园，除了供人憩息，还有一些石条凳可坐，使农村青年男女进城来可以有个谈恋爱的地方。听说还有人反对，说是有伤风化。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我看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地缘、业缘内婚现象。青年男女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不熟悉居住和工作范围以外的人，不得不在同村、同厂、同机关内部找对象，以致选择的圈子越兜越小。据说在一些交通闭塞的山村里低能儿越来越多，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的近缘婚姻带来的不良后果。所以，扩大青年的社交范围对于反对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对于改变近缘婚姻是有积极意义的。小城镇的文化中心作用不是一句空话，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是空洞的口号。真正的中心作用是要使农民到小城镇来能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农民的需要。也就是人与人要在这里碰头，物与物要在这里运转，信息要在这里交流。苏南、吴江这一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到底为农民做了多少事情，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想一想。

在教育方面，使我最痛心的事是江苏的文盲率要比全国的平均数高，吴江更是高中之高。按理说，一个地区经济水平是与文化程度成正比的，实际上现在反过来了。其中的规律性值得研究。可我想提一个倒过来的问题：为什么要识字？不识字又怎样？如果不识字照样生活，收入还比识字的高，那就发生了为什么要识字的问题了。

这次我在太湖边上的庙港渔村里散步，我问了几个年龄不同

的居民识字不识字，他们都对我摇摇头。年纪大的都是有经验的渔民，年轻的孩子们正跟着父兄们学打鱼。据说他们近年来的收入比农民高得多。我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才悟出他们不识字的道理来。这些都是多年甚至世代在太湖上捕捞的渔民，捕捞是搜集自然产物的生产方式，由来已久，说是原始经济也未始不可，这种生产方式需要有这地区自然地理的丰富知识。在太湖里打鱼就得充分掌握太湖的气候、风浪和鱼源，这是他们生活所依赖的知识。这些知识却并不靠文字来传递，而是口口相传并在实践里体验来的。要成为一个能靠捕鱼为业的太湖里的渔民，就必须从小跟着父兄在船上生活。试问他们为什么要在学校里花费多少年学会几千个方块字呢？年轻时进学校而不去跟父兄一起经风浪，到头来恐怕会在打鱼时被风浪淹死在水里。但是如果要提高渔业的生产力，改捕捞为饲养，就是用人工去经营鱼塘以提高产量，情况也就完全改变了。饲养员需要知道温度、湿度、水里含氧的成分等等所谓"科学知识"，要学习这些知识，不识字是办不到的。从太湖上的"浪里白条"变成鱼塘里的饲育员，是从原始采集阶段的生产方式发展成饲育阶段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从不需要文字到离不开文字的发展过程。如果现在庙港的渔民安于在太湖里乘风破浪地捕捞为业，那么我看文盲是扫不完的。我从太湖边上散步回来，对扫盲问题的认识似乎又深了一步。我们读社会发展史应当要用它来理解当前的实际问题：生产力不发展，教育普及不了。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当前农村的教育问题，也会看到目前农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仅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需要，也提供了普及教育的可能。怎样才能满足农民对教育的需要，那就有赖于我们提供怎样的教育内容了。因此怎样把小城镇建成农村的文化教育中心，对我们来说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八

我的发言应当结束了，在末尾我想附带提出一个名词问题。我素来不主张在名词上浪费笔墨的，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名副其实的必要。“小城镇”这个名词最近大家已经习惯了，是否还可以多考虑一下？用这个名词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是否妥当？我们的字典里对城、镇、集、墟、街、场、村等名词都有一定的释义，我不在这里再重复。但必须指出，当前各种社区需要划分出一条城和乡的界线，各层的社区用哪些名词来表达最为妥当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我们知道有不少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而停留在“日中为市”的定期赶集形式上。津浦铁路进入安徽境内就有很多车站至今保留着某某集的地名。这些集所起的作用，程度上虽有区别，性质上是和吴江所见到的许多“小城镇”相同的。把这些集称作“小城镇”总不免有点牵强。所以我想不如把在吴江所见到的“小城镇”和这些集归在一起而称它们作“集镇”。

当然“小城镇”应当归在城、乡的哪一边，还是一个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把它说成城乡的纽带，只说明了它的作用，而没有表明它是一个具体的社区。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但也可以考虑在城乡之间另立一格，称之为镇。麻烦的是汉字不习惯用单音节名词。镇字旁还得加个字，要加就不能再用城或乡，所以还是可以考虑称“集镇”。

还要提到的是群众语言中有传统的分层模式，那就是“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这种分层至今还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含有高低之别。而我们所提到的吴江县的“小城镇”中在群众语言中却包含了三个层次。作为吴江县行政中心的松陵镇的居民过去被称作“城里人”。松陵镇过去也确有城墙，解放后才拆除。其他的镇上的居民在群众语言里都不称“城里人”，而称“街上人”。但是象庙港一样的公社镇，过去并不是基层行政中心，只是沿太湖的港口之一，象一个较大的村子，所以它的居民够不上“街上人”，还是“乡下人”。有人看到在现在所谓“小城镇”里还存在着和群众语言相适应的层次，所以主张用“城镇”、“乡镇”、“村镇”来区别。“城镇”指松陵一样的大镇，即县属镇，“乡镇”指公社一级，也是体制改变后乡政府所在地的镇，其下则是“村镇”，这种意见值得考虑。我在这里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们的调查研究越深入，对我们用以识别事物的概念也会越来越细密，也会要求我们所用的名词更加确当切实。现在一般应用的名词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讨论。

今天我的讲话里还是用“小城镇”这个名词，因为我们的讨论会的名称就这样用的，不能因为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就加以改动。这也说明了这些概念和这些名词都有其社会的根源和作用，即使改动也要有个过程。我个人的意见也会改变，一门科学在初创时期总是这样的。

小城镇　再探索

费孝通

(一)

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还只是以一个农村为范围进行观察，但是这年年底四访江村时，我们就提出要“更上一层楼”，从农村升一级，去调查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集镇。我们曾访问了吴江县的一些集镇，发现这些集镇正在从衰落转向繁荣。除个别例外，在过去三十年里，绝大多数集镇普遍存在着人口外流，人数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新局面。这些集镇的册外人口大增，有些镇竟达居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所谓册外人口是指住在镇上而没有户口的人。我们看到这里问题很多，所以决定从1982年开始，把小城镇研究列为我们调查工作的重点。这个意见得到了江苏省委的支持，因为就在我们提出这个意见不久之前，江苏省委在常州举行过一个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小城镇的主张，真是“不谋而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就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组成了小城镇的调查研究组，开始这个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为了深入探索这个新的课题，我们采取了“解剖麻雀”的方法，把小城镇数量上号称“多子女”的吴江县作为解剖对象，并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十字提纲。我们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先是从上而下，向各级党政干部请教，初步了解从县到镇的

基本情况、有关的工作经验和已看到的问题。然后，按不同类别和层次，定点、定人、定题，课题组同志分别下乡作实地观察。去年秋季集合汇报，并邀请了中央有关部门及江苏省委政策研究人员、江苏省有关各市各县各镇领导干部，以及有关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一起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讨论。这就是1983年9月21日到27日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小城镇，大问题》的发言。课题组及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提交讨论的一些论文，经过修改提高已汇编成《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今年7月份可望出版。在这次会上成立了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

1983年全国政协组织了有北京和南京各方面专家参加的小城镇调查组，从11月11日到12月6日到江苏的常州、无锡、南通、苏州四市和部分县、镇参观访问，对江苏小城镇讨论会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进行“会诊”。调查结束后，在苏州总结，会上的发言正在整理，陆续将在《社会学通讯》上发表。我这篇《小城镇，再探索》就是以我在这次总结会上的发言为基础，整理而成。下面我只想把我个人在四市和部分县、镇访问中的体会作一简要的叙述。

(二)

农村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小城镇的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的五年中，广大农村落实了各项经济政策，全国农业生产，除了极个别地区，都有了普遍的和显著的提高。农民确实富裕起来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所调查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在近年农村经济发展上，在江苏省来说是站在前列的。而江苏省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上又是站在前列的。1982年江苏的先进记录是“两个超过500亿”，即粮食571亿斤，工业总产值502亿元。1983年再创的新记录是“六、七、八”，即粮食610亿

斤，财政收入72亿多元，工农业总产值824亿元。

在我们调查期间，1983年农村的各项指标尚未结算，省委农工部提供的资料：1982年江苏全省社员人均收入309元，比1978年增加154元，四年翻了一番；同年间粮、棉、油总产量年均增长率都在4%以上；主要副业项目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10%；乡镇工业（公社及生产大队两级所办企业）总产值四年也翻了一番，占农村工农业（生产队所办企业算作农业）总产值的42%，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我们调查所经过的地方，农民住宅已在更新，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长江北岸开始"草房改瓦房"，苏、锡、常开始"瓦房改楼房"。有些地方沿路可以看到装上阳台，阳台上摆满花卉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一幢接一幢地绵延几里。集镇上百货公司、电影院、文化宫、书场的新型建筑在宽阔的大道两边耸立，使旧上海的边缘市容相形见绌。有些生产大队开始兴建公共浴室。无锡县前洲乡的一位青年在他花费10,000元建起的三层楼的新居中掰着手指告诉我们：近几年，他和他那在队办纺织机械厂工作的妻子一起，每年收入约4,000元，除了全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可以积蓄2,500元到3,000元。这种人家在前洲乡一类的农村里是很普通的。江南鱼米之乡出现的"建屋热"是农民丰衣足食之后开始解决居住问题的反映。农民造房子有些地方已超出了居住的需要，部分是属于家庭副业的生产投资，还有部分是属于"实物储存"。农民从商品生产中获得的收入，一时已消费不了。江苏农村在1982年末的储蓄额达20亿元，在苏州市平均每个农民有78.9元存进银行。但是有理由相信留在农民口袋里的现金很可能超出此数，这部分余资按农民的传统心理，要变成不动产才放心，所以也构成了兴建房屋的一种动力。无论怎样，在这四市的农村中已出现的小康气象是十分动人的。

使这地区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这些年来江苏全省农副工三业各以不同的速度逐年增长，其中

农产品产量的增长率最低(约4%),乡镇工业(即社队工业)的产值增长幅度最大(约90%)。这意味着在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相对降低,而来自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我们调查的四个市中,以县为单位,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一半,特别是长江以南这三市的县一般都在70%以上。1983年这三市中有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各超过了2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只占10～20%。据1983年统计,江苏已有塘桥、乐余、前洲、玉祁、周庄、华士、黄巷等七个乡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这些乡的工业产值都占90%。农民富裕靠工业,已成了普遍的事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而在绝对数字上却相应地增长,速度也较工业不发达的乡村为快。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却出现了上述的那种基本上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迥然不同的新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经过了多年实践的检验,"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终于

被肯定为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三）

在吴江县的集镇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集镇的转衰为兴，是由于当时所谓社队工业即现在所说的乡镇工业的兴起。我们这次四市访问证实了这是这个地区共同的特点。

据反映，苏南地区的乡镇工业虽发生于七十年代的初、中期，但那时是"偷偷摸摸地搞"，一般说来工厂为数不多，规模也较小；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例如无锡县的前洲公社1970年仅有一个农机厂，12名工人，全公社的工业产值才150万元；到了1982年，工业产值达到7，388万元，增长了四十八倍，务工社员也增长到7，700余人。从无锡全市范围来看，1978年以来乡镇工业的产值和利润分别以年均23%和7%的速率递增。

这一情况的发生，如我过去已经指出的，只有从乡镇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中才能找到答案。苏南是一个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和积聚越来越密集的人口。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维持住该地区的"天堂"之富，这里很早就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手工业。"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夫妇之间的分工和合作，表明了农业与手工业在一个家庭内的有机结合。这就是苏南地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历史总结。

建国以后，苏南的农业由个体经济走上了集体经济的道路，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可是，由于人口的一度失控，人多地少的矛盾在这里越来越尖锐，七十年代初四市的人均耕田已经降到1亩上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村经济政策又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以粮为纲"变成了单一的粮食生产，破坏了这一地区工农相辅的传统结构。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力没有别的出路，不得不以成倍增长的成本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强化开发，那是

增产不增收的路子。据苏州市的测算，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纯农业的收入长期在人均100元上下徘徊。

我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里已经说过，江苏怎样在十年动乱中"逼上梁山"地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我也指出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据我们这次调查的四市来说，以劳均四亩耕地计算，农村里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剩余劳力，仅苏州市的五个县就有120万人，约占该市农村总劳力的50%。这些原来被"大锅饭"所吞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在自办的工厂里找到了从事生产的机会就成了农村里新增的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发现了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于是乡镇企业就遍地开花地在农村里生长了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办起来的工业，它不但不会损害作为自己基础的农副业，而且能在为国家财政收入作一定贡献的同时，主动地承担起支农、补农和养农的责任，形成了我在上节里所提出的我国工业化的新道路。

从江苏全省来看，1983年乡镇工业向国家纳税11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在1979年到1982年四年间，乡镇工业的利润中有20%以上用于购置农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办农村集体福利事业等，总额达14.5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全省农林、水利、气象的投资总额。与此同期，乡镇工业工资总额和返队利润累计有59.9亿元，其中1982年为17.9亿元，以全省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收入35元。苏州市的同志说："我们这里正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依靠以工补农这着棋，才稳定了务农社员的生产情绪，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1982年，全市五个县农村人均255元的集体分配收入中，来自乡镇工业的为130元。实质上，这是在弥补粮食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上，在国家宏观调节手段不足的情况下，

乡镇工业为国家分挑的一部分担子。这副担子非挑不可，因此，乡镇工业也非办不可。”上述数字表明了苏南的乡镇工业对农副业的巩固、发展和农村的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凡是工业办得好的地方，随着工业对农副业的补养成分越大，农副业的发展也就越迅速。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联系。

乡镇工业补贴农业并促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这种作用，在形式上类似于历史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乡镇工业是根植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农工相辅已不再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而是以集体经济的性质出现。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进步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民的富裕得到了保证。在调查中，四个市的干部和群众都提到这样三句话：“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面貌改。”意思是说，农副业过关，充其量是解决温饱问题和略有余款，只有办起乡村工业，才能使农村的繁荣具有坚实的基础。这是各级干部与农民的切身体会和自觉行动，是一种“与荣俱荣，与枯俱枯”的感情。苏州的一些同志说，要是回过头来，把转移到工业上去的几十万劳动力重新捆在一人一亩的土地上，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四）

乡镇工业不仅与农业之间有着历史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与大中城市的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连结。在旧中国，自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的上百年间，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就从这个商埠出发，沿着沪宁铁路把吸血管一直插到苏南的农村。首先被摧毁的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接着农业也独木难支；最后农民忍痛出卖土地，到上海去做工——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

道路，还要加上半殖民地的性质。

解放前，由于农村破产，被迫走入城市的农民在工厂里学会了现代技术。他们在当前乡镇工业发生和发展中成了一个积极因素。据无锡市反映，解放前上海的钣金工中有近一半是无锡人，形成了上海机械工业中的所谓“无锡帮”。这些工人原来就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中国的工人和西方国家不同，他们多半是只身进城，挣钱养活乡下的家口。这种“藕不断，丝还连”的状况至今还起着作用。我们走访了二十八家乡镇工厂，它们的创业都与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关，而其中大多数就是由有乡土关系的退休工人或干部牵线搭桥或提供技术力量而诞生的。但乡土关系只是乡镇工业得到促发和催化的条件，乡镇工业与大中城市日益密切的连结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生和加强的。

在常州湖塘镇，一家社办的柴油机厂正在为常州市内的国营厂生产配件。据说近年来由于那家国营厂的生产量供不应求，要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由于受到市内土地、资金、招工指标等许多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展开。于是就通过某种关系找到了湖塘的社办厂为他们生产配件，形成了“一条龙”工业体系。生产关键部件和承担总装任务的“龙头”设在市内，“龙尾”则摆在集镇或乡村。在无锡、苏州等地，看到有不少轻工产品，如液压标准件、各式服装等订上了上海的商标出厂，询问之下才知道当一些城市工业转向高精尖产品时，同样受到条件的限制而无力再承担市场仍有需求的老产品生产，于是将老产品连同技术一起转移到乡镇工业，这被称为“产品脱壳”。

“一条龙”和“产品脱壳”都是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相联系的形式。目前联系的形式很多，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种：（1）合资经营，产品或利润分成；（2）产品脱壳，部件扩散；（3）来料加工，保质保财（4）技术支援，协作收费；（5）支援资金，补偿归还；（6）技术转让或专利转让。这些归纳和分类是否详尽和

科学尚需研究，但可以说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经济体系的调整和发展，由于城市条件的限制，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联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全面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正在逐渐取代那种只是通过几个"关系户"作媒介的联系。

以所调查的四市来说，在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上海市联系的乡镇工业最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联系的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乡镇工业乃至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从无锡县的情况来看，在全县2,000多个乡镇企业中，与上海、无锡等大中城市工业、科研单位挂钩的已有709家，协作项目895个，其中与上海、无锡两市协作联合的居绝大多数。由此可见，乡镇工业是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城市工业是以乡镇工业为后方的。他们的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大。特别是在乡镇工业经过了1980年和1982年两次整顿以后，它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仅以沙洲县锦丰公社玻璃厂为例，它在上海跃华玻璃厂的支持下，已年产三十万标箱的民用玻璃，在华东地区属可数之列。据说，上海、无锡等市的工厂企业，向同他们挂了钩的乡镇企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心连心，不变心，一条心"。因此可以说，苏南的乡镇工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是乡镇工业离不开城市，城市工业也离不开乡镇工业，两者的密切连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

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当然，对这个系统内各部分之间联系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系统中各个部分的不同作用是明显的。从苏南地区的实际来看，这一区域经济系统已具雏形，各自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

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它意义的经济模式，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在常州市的金坛县和南通市的如皋县，可以明显感到它们已是上海经济区的边缘地带，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已具有许多不同于整个苏南地区模式的特点。

当前，乡镇工业面临着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其中普遍反映的有：（1）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缺乏计划渠道，乡镇工厂中有一部分变成了做做停停的"开关"厂，好几个县的负责干部在为煤炭、钢材而煞费苦心，千里奔波。（2）技术力量薄弱、人材缺少。（3）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劳动保护的条件较差。（4）担心在1984年取消低税率后，乡镇工业将会处于劣势。苏州市的同志提出：目前对乡镇工业的扶持还是迫切需要的。例如，在材料、能源的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方面，能纳入计划的应即直接纳入计划；在资金信贷上，可否给予低息优待；在税收政策上，是否可采用变通措施，在支农、补农款放在税前列支；每年分配一部分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到社队工厂工作，以加强其技术力量。对这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调查研究，才能提出切实可行和因地制宜的解决办法。

（五）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据无锡市的统计，全市乡镇工业和其他乡镇企业已经安排的劳力占农村总劳力的34%，其他三市的情况与无锡市大体相仿。这意味着在苏南地区，农村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已脱离了农业劳动。从全省范围来看，乡村工业的职工总数为400多万人，这一数字接近全省城镇户口的工业职工总数。与此同时，由于多年来集镇本身人口萎缩，县属和镇办的企事业发展也因人员缺乏而用各种方法招聘和使用相当数量的非正式职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据省劳动局统计，不包括外发加工部分，1982年全省城镇

企事业单位共录用了农村劳力99万人。这一方面使农村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一方面使这部分农民开始以新的劳动手段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相结合。于是，在江苏农村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特性质的劳动队伍。

各地对这支劳动队伍有许多称呼，例如农民工、务工社员、亦工亦农人员等等。叫法虽然不同，但意义却相同，那就是农工相兼。因此，兼业就是这批劳动者具有的独特性质。然而从实际上看，该地区的劳力剩余量是一个随着农时而变化的数字，农忙时剩余少些，农闲时则大量剩余。这就要求在剩余劳力转向工业的时候，应当保持他们在适当时间内能从事农业的弹性，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因此，兼业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在苏南农村，从人口与土地的总量上分析，就是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上说，劳动力剩余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因而剩余劳力向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业的转移是一种好现象，而且，这也是社会主义农村长远发展所需要的。现在县、乡干部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把农村看成可以无限制地吸收劳动力的观点，而全力以赴地为剩余劳力谋出路，开辟新的生产渠道，这是值得赞许的。

我们走访过的乡镇工厂往往是采取每家农户出一人的招工办法。这样做似乎不合择优原则，但是却有符合农村具体情况的一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样既可以保持农户在收入上的大致均衡，同时也是出于兼业的需要。每家抽出一个劳力务工，其余劳力在家务农，务工的上班时做工，下班回家后帮助干农活。武进县湖塘镇新光毛巾厂的女厂长就是这样的兼业者，她有效地管理着一个有1,800名工人（全部是兼业人员）的工厂，回家就务农。因此，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工业与农业以劳务搭配的形式，结合到每个家庭中去，家庭成为兼业户。四个市中，兼业户约占农户数的80%左右。在乡镇工业较发达的无锡、常熟、江阴、沙洲、武进等县的农村里，除了五保户等特殊农户，几乎都是兼业户。

当然，对于兼业者来说，由于受到用工制度、上下班时间、工种以及家庭劳力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他们的兼业程度很不相同。大致上看，主要有三种状况：（1）以农为主兼营工业。这主要是指从事外加工的部分。务工者将刺绣、编织等手工产品承接回家，每天闲空时做工。（2）亦工亦农。这部分人一般是在非常年性的乡镇企业或离家很近的乡镇工厂工作，他们或者是在下班后仍从事相当数量的农活，或者是在农忙期间歇工务农。（3）以工为主兼营农业。这部分务工者一般都在离家较远的县城或县属镇工作，他们吃、住在工厂内，只是每周末回家做做帮手。

上述不同的兼业，实际上反映了由农民逐步向工人转化的过程。随着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有条件越来越多地转入兼业队伍，兼工程度也越来越高。在调查中可以看到，在从事工业生产方面，这批兼业劳动者中的绝大部分与城镇工人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他们同样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承担着约占办在镇上的工业三分之一的生产任务；他们与有集镇户口的工人做着同样的工作，而且以能吃苦耐劳而受到称赞，许多人已经成为工厂中不可缺少的生产骨干，有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职称的“技术员”、“工程师”和称职的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无疑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一批新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新一代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兼业者的户口在农村，吃粮靠农业。在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上，他们与城镇工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例如同工不同酬、劳保条件差、不能参加工会组织等等。对此，各地干部认为，粮油、户口关系的不变，不能成为否认以工为主的兼业者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理由，他们要求工会组织接纳他们这批“与农村连着脐带”的新工人，并适当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经济待遇。这确实是由苏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兼业劳动队伍的形成，不仅影响到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整个苏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很高，然而分布极不合理。多

年来存在着两种相反方面的人口流动：一种是涌向大中城市的自然流向；另一种是将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政策流向。这两种流向，导致大中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那些处于大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县城和集镇人口却普遍相对下降，形成了人口的两头粗、中间细的葫芦状分布，人口级差增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镇、社、队四级工业大多数是以原有的县城及集镇为基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力到这些小城镇上来工作，这就导致小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变化。以江阴县青阳镇为例，该镇总人口解放初期为5,500人，1960年为5,885人，这十年仅增长7%。从七十年代起，乡镇工业开始吸收农村劳力到镇上从事工业生产。到1982年底，全镇聚居人口为15,366人，其中兼业劳动者为5,114人，占总人口的33%。再以武进县为例，六十三个小城镇现有聚居人口2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万人，占28%；兼业劳动人口10万人，占40%。青阳镇与武进县这种兼业者的比例在苏南地区只是一般水平。因此，在苏南地区，户籍人口数不能真正反映县城和集镇的人口规模。这些兼业者，绝大多数仍住宿在农村，每天在镇村之间作钟摆式的流动。县城和集镇就是以这种形式，控制农村剩余劳力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从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从而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

在调查中还发现，近年来这些地区开始用劳务输出的方式，将本地丰富的劳力、技能与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挂上了钩。仅南通市的农村集体建筑工程队就有13万人，现正在黑龙江、内蒙、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施工。这些建筑队以质量高、进度快而受到建筑单位的欢迎。工人们既不带家属也不讲究生活条件，往往是一年的任务十个月就完成，然后回家帮助做农活，过年后再次外出。无锡、南通、常州等市县在劳务输出的同时，还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与边疆地区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

如下两种人口流向，开创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不合理分布的新路：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被称为“离乡不背井”。在江苏全省，前者已达400多万人，后者也约有100万人。由此看来，“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

（六）

从历史上看，我们所调查的这四个市的集镇都具有商品流通的功能，而且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商业型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农村经济的单一化，由于商品流通趋向国营化、封闭式的单渠道，集镇上的商业萧条下来，集镇本身也就日渐衰落。七十年代乡镇工业的发生，特别是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集镇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工业原料的采购和成品的销售，急切要求流通渠道的支持。随着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村经济已从自给和半自给生产逐步走上商品生产的道路。过去那种狭隘的单轨流动渠道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在这些压力下，集镇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有所改变。从目前情况看来，流通渠道还需要大力疏通，否则将成为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据反映，现在集镇商业一般都具有国营、集体、个体三种经济成分，有国营公司、供销社、集体商业、乡镇工厂门市部、多种经营服务公司、个体户、集市贸易等七、八条渠道。其中集市贸易（包括农副产品的长途贩运）的发展最为显著。据省供销社反映，1978年的集市贸易成交额为8.1亿元，只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1982年达到22.2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3%。各地都反映，虽然一再地扩大集市场地并搭棚改善贸易条件，但仍然满足不了集市规模增长的需要。上市时间也由早市、定期集变为全日市，天天

集。集市贸易的活跃，既是农村多种经营兴旺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原有国营和集体商业渠道有不相适应的成分。如南通市海安县，去年饲养鸡680万只，国营商业部门无力承担全部的收购、储运任务，于是从事贩运活鸡的人逾万。据说，他们大多是用一辆自行车装着几十只活鸡到南京、上海去出售，人称"百万雄鸡下江南"。

这里，引出了目前在商品流通中的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开辟着眼于国内市场的、与生产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新的集体运销渠道的问题。吴江县农民家庭多年来以饲养长毛兔著名。去年兔毛大幅度降价发生了农民杀兔吃肉的事情。如今鸡与兔相比要幸运得多，因为它们毕竟运过长江，成为城里人的佳肴。兔毛是依靠国营渠道统一收购出口到国外市场，而鸡是由个体或联户的贩运者销向国内市场。这就是说如果不从打开国内市场着眼，如果商业收购部门与生产者之间脱节，那么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就不可能保持稳定，也根本谈不上有大的发展，而只能维持在农贸市场热热闹闹的水平上。由此看来，现有的国营商业必须多向国内广大消费者着眼，并将自身的利益和生产者的利益真正连在一起，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改革。看来，要促进商品流通似乎应当首先着重开辟由生产者联合组成的新的集体运销渠道。

第二个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配合问题。乡镇工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与计划供应的比例，与它的发展越来越不相协调。不少同志反映，过去集镇所承担的城乡物资交流作用，只是将农副产品运往城市，把城市工业品供应给农村。而现在的集镇，已成为城乡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在商品交换的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从城市运到集镇并通过它输向农村的，不仅是为数更多的日用工业品，而且有大量的供应乡镇工业的原料、燃料和各类机械设备。从集镇运往城市的，也不限于农副产品，更多的是以轻纺和机械产品为主的各类工业品。这一新的变化，提出了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重点上要有计划地加以分工的问题。但

是目前乡镇工业除了自己争取到的与城市工业挂钩的间接计划外，原材料和燃料的70%以上要从市场调节获取。农副产品的粮、油、茧、猪、禽、蛋、皮、毛、骨、花、果、茶等十二大类的品种都由商业部门收购运往城市，其中大部分用作城市工业的原料。在计划与市场的供应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乡镇工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确是困难重重。因此他们提出，希望在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有所分工的基础上，考虑国营企业让出一些品种或一定数量的、适宜于乡镇工业生产的农副产品，作为乡镇工业的计划部分；同时，对于其他的原材料与燃料也作适量的计划供应。

（七）

由过去商业型的集镇，转变为今天工商结合、城乡结合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对集镇本身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是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在调查的十八座小城镇中，可以明显看出，九个乡镇的新建筑数量都超过非县城的县属镇，而县属镇的规模都大于乡镇，产生这一逆结果的原因是县属镇的建设缺乏资金。虽然国家和江苏省都明确规定：工商税收附加、公用事业费附加和房地产税返还这三项费用要用于集镇建设，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以苏州市为例，全市三项费用共200多万元，县属镇有18个，平均每个镇仅摊到11万元。而且这些费用大部分用于县城的建设，其他县属镇得到的只有数万元。不少县属镇的干部反映，这些钱连危险房屋的维修都不够，根本谈不上搞其他建设。县属镇不但与设在镇上的乡政府是平级，而且对在镇上的全民企业和县属大集体企业也是看得见、管不着。据一些县属镇干部反映，以往他们在整顿街容修路铺桥时还可以向全民或县属集体企业集些资，但现在往往得到“不准乱摊派”的回答。他们认为这是对有关文件的一种曲解。他们说：集镇应当加以建

设，建设必须要有资金，而集镇建设的资金不能依赖国家财政，只有靠集体集资的方式。因此，有权利者应当尽义务。凡是在集镇上的企业单位，按照不同的受益程度，规定集资的比例，是一条可行的解决建设资金缺乏的途径，它符合“人民城镇人民建”的原则。

其次是集镇的建设规划。对这个问题调查组内的建筑学家在实地观察以后认为：现在的小城镇建设存在着缺乏整体性、各自为政、见缝插针等等缺点，必须加以纠正。他们还提出了以建成农村发展中心的建设方向以及区分类型和层次、找出微差、合理功能布局、综合利用土地、体现地方风貌和时代气息等建设原则。

我们建议由江苏省建设厅牵头，并由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南京工学院建工系协助，在一两个小城镇（比如吴江县黎里镇、无锡县东绛镇）对建设规划进行具体的设计试点工作。

在集镇的经济发展、商业流通和建设布局中，有不少问题都涉及到集镇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这个地区集镇的行政管理体制现状是：在县城里有县政府、镇政府、乡政府（或区政府）的多重垂直和多重并列机构，在非县城的县属镇上有镇政府、区政府（或乡政府）的双重并立机构，在重点乡镇上有区、乡双重垂直机构，在一般乡镇上有乡政府，在自然形成的小市集或新兴的大队工业点上一般没有设立行政机构。

上述各层次的县城和集镇中，体制上矛盾最突出的是非县城的县属镇（即建制镇）。在这些镇上，由于几套行政机构的并立，将城乡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加以分割，影响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的情况下，这种镇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看来应该进一步加以改革。据吴江县黎里镇实行镇乡合并、镇管村的试点表明，这样的体制改革加强了镇乡的经济结合，有利于城镇建设的统一规划，打破了庄园式的封闭体系，还能统筹安排农村劳力和统筹解决城镇居民的生活设施。但由于原先的经济实力是公社比镇要强得多的情况，镇乡合并以后，就势必提取一部分

原来由社队所办工业的利润用于集镇建设，对农村一头的好处不明显。对此，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行政管理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强块块的领导，逐步改变条块分割的现状。目前在集镇上的县办企业名义上是条块双重领导，实际上只承认条条而无视块块，以致造成政府办工厂、工厂办社会的现象。对此如何解决为好，也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为使一些具有特殊资源或旅游价值的集镇发展得更快一些，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在行政体制上应采取改革措施。例如宜兴县的丁蜀镇，是一个与江西景德镇齐名的陶都，现实际聚居人口已达七万人，但由于它只是一个相当于公社一级的县属镇，在镇上又是丁蜀镇、丁蜀区、周墅乡三重并列体制，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象这样在国内乃至世界有影响的陶都，可以考虑升格为县级市，由无锡市直辖管理。考虑到宜兴县的实际情况，可以由市属镇给予财政补贴。

• • •

在苏、锡、常、通四市调查近一个月，同志们越来越感到小城镇确实提出了一个大问题。研究这个课题，对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调查组的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这次携手合作表示满意，对江苏省和有关市领导机关的支持深表感谢。我们意识到这次调查由于时间的短促，只是走马看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很不够，有不少问题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而且这次调查的是江苏境内长江两岸的集镇，还没有去看正在大步前进、潜力很大的苏北地区。我们从这次调查中所探索到的一些事实和观点还是具有局限性的。因此，对江苏小城镇的调查并不能结束，过去的调查只是第一阶段的摸索。为了全面地认识江苏全省小城镇的面貌，以便与上述地区的经济模式作比较，我们已迈开双脚，越过长江、淮河，正在对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四市的小城镇进行考察。我们希望我们的探索能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开展。

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

费孝通

从1981年底到1982年初，我曾到江苏省吴江县探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分校、南开大学在吴江开弦弓村(学名"江村")进行工作的社会学调查组；趁此机会，我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访问了几个公社和集镇，分别与各级干部座谈，了解到当前农村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现就农村社队工业问题，择要报告如下：

1．吴江县是传统的"鱼米之乡"，属农业高产区，但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约1.3亩)，农民历来依靠副业、手工业补充家庭收入，生活水平高于全国农民平均生活水平一倍左右。解放后，在单纯发展农业时期，人均收入在100元上下，多年徘徊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年来，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1980年，苏州地区农村人均收入达230元。1981年，苏州地区受灾严重，但人均收入继续上升。1981年，吴江县震泽公社人均收入比1980年增加15%，原因是落实了多种经营方针后，农村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在苏州地区农、副、工总产值中，1980年工业占67%(吴江占55%)。凡是发展了社队工业的地方，穷队已变为富队。各县都有一批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上的大队。抓好社队工业已成为当前农村社队干部的中心问题。

本文系作者在1981年底到1982年中旬在苏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后所写的报告。当时的社队办工业业企，已自1984年3月起，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改名为乡镇企业。

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制约，即使在全国粮食高产区农业收成还是起伏很大的。丰收的1979年，震泽公社农业总产值达到850万元；而受灾严重的1981年，农业总产值只有220万元(近六年平均约600万元)。如果不发展社队工业，1981年人均收入将大大减少。今后要继续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但潜力有限，目前已发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要稳定农村经济并使之继续繁荣，改变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副业和工业的比重是必要的。

2．社队工业最初是在十年动乱时期自发成长的。当时大城市的工业遭到破坏，生产停顿，不少老师傅下乡，与社队农民结合，利用本地积压的原料，适应市场需求，开办各种小型工厂。由于给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受到欢迎，社队工业就日益发展起来。其后，大城市工厂恢复了生产，但不影响农村小型工厂继续存在。因为部分工业和某些工业中的某些部分由社队经营较为有利，小型工厂就在农村站住了脚。农村建厂用地容易解决，剩余劳动力多，工资低，小型工厂易于管理，社员由务农变为务工——这些都是发展社队工业的有利条件。实践证明，有些小型工厂不仅生产成本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可以超过大型工厂，开弦弓村的丝厂是个实例。有些大工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也乐于把一些部件、零件的制造任务扩散给社队工厂，上海的一家缝纫机厂委托震泽翻砂厂制造机架就是实例。这些事例说明，确有一些工业是可以和适宜在农村立足的。

3．社队工业的发展，正在缩短城乡差距，缓和城市人口压力。我们看到人均收入超过500元的社队，农民在衣、食、住等方面均不低于城市居民，而且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已有力量举办集体福利事业，例如修筑乡村道路、资助社员建房、实行老年社员退休制度、实行免费医疗制度、奖励儿童上学、提高五保户的生活待遇等，使农民心向集体，农村的社会主义基础得到巩固。这几年，邻近上海的地方已出现人口由城市返回农村的苗头，不断

在农村找对象的姑娘也在改变态度。

农村经济结构变化，一大批原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转移到农村工业战线上来，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劳动者。人们称他们为"务工农民"。他们住在农村里，平时在社队工厂做工，农忙时在田间做农活，工余时间照顾家庭副业。他们的家庭成员农工都有，构成了农工结合的生活单位。这种农工结合体对工农业发展都有利。一方面提供了农村工业化初期需要的廉价劳动力，降低工业成本；另一方面吸收了农村中多余的劳动力，使农业便于机械化。

从我国宏观的经济结构来看，这种农工结合体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式：根据各种工业的特点，分别安排在城、镇、乡，构成一个脉脉相通，以大扶小，以小辅大的工业网。凡是适宜于小型工厂生产的产品，尽可能安排给他们生产。这样安排，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基本阵地。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决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那样会导致农民因破产而被迫流入城市的后果。我国现有的大城市已感人口过多，不能再膨胀了。要改变我国人口的农工比例，势必使农民在原地转变为工人，上述务工农民这种结合体正是中国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可行的模式。

4．社队工业在发展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由于社队工业是自发产生的，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至今还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原料、能源等都要在市场经济中解决，因而当城市大工厂恢复生产并不断扩建时，社队工业在原料和能源上首先陷入困境，产生了集体与国家的矛盾。这个矛盾没有得到正确处理之前，成了不正之风的温床。为了取得原料和能源，社队企业的负责人或供销人员千方百计地"走后门"，"搞关系"。社队工业产品的销路一般要自行解决，许多农村干部不熟悉工业行情，搞供销工作是外行，于是受骗上当者有之，因盲目生产导致产品滞销者有之，工厂时开时关者有之。总之，社队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但潜

伏着停工待料、滞销停产、亏本倒闭的危险。所以，不少社队干部说："为了社队富裕，不能不办工业，上了马就下不了马，在马背上可真颠簸得苦。"

5．我认为社队工业当前出现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解决的，不能因为它发生一些问题，就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

要解决当前社队工业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哪些工业适宜由社队企业经营。不应当一口认定"小型不如大型，集体不如全民"，而应从人口不宜过度集中，城乡差距必须缩小的前提下，考虑工业生产的合理布局。

实践证明，有不少种类的工业产品是可以扩散给社队企业生产的，而它们也各有各的问题需要我们具体分析：

第一类是农副产品加工工业。这一类社队工业企业容易产生与城市国营工厂争原料的问题。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做工业原料用的农副产品，可以在国家征购或收购定额中划出一部分给社队留成，由社队协商分配，也可以规定征购或收购定额之外的部分归社队支配，征收定额定下来以后，规定若干年内不变。这样既可使社队企业心中有数，不致盲目发展，又可刺激原料生产。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城市国营企业盲目扩建，产生"与社队企业争原料"的问题。国家要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建立技术推广机构和产品检验制度，提高产品质量；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提供市场情报，定期召开内销产品交易会，建立产销合同制度，开前门，堵后门，以消除社队工业生产的盲目性，并消灭不正之风。同时，还要发掘和扩大新原料，比如苏南近年来发展了养兔副业，兔毛产量日增，可试办小型毛纺厂，潜力很大；加强食品工业的研究，改进冷藏运输，使苏南水鲜菜蔬能大量供应国内外市场。

第二类可以发展的社队工业是城市大工厂下放的部件、零件的加工工业。这实际上是城市国营企业生产的延续，原料、技术、

销售都已在国家计划之内。由于社队工业由社队自己投资，加上生产成本较低，所以这样做对大厂是有利无害的。但是，不少大厂还习惯于搞大而全，又囿于职工眼前利益，怕影响奖金发放，因而对把部件、零件下放给社队企业制造不乐意。其次，大小工厂之间碰不上头，挂不上钩，中间还需要有一个"红娘"。过去，大多是由退休回乡的老年工人牵线，渠道狭小，所以这类社队企业还多限于大城市的附近。要建立以大带小、以小辅大的城、镇、乡三级一线的工业网，还必须由国家全面规划，协助挂钩。

除了上述两类社队企业外，目前可以发展的社队企业还有：具有传统基础的手工艺，如刺绣、编织等；家具制造业；建筑业；修理服务业等等。这些行业，有的牵涉到原材料供应和销售市场问题，应当研究解决。

6．社队工业的能源是当前的着点所在。苏南产煤少，社队工业的能源要全部由国家供应看来是有困难的，所以应当大力开辟当地自给的能源。据了解，苏南泥炭分布很广，农民已用来代替柴火烧饭，但火力不强，还不能用于工业。如果科研机关能够解决集燃方法，对苏南能源供应将大有帮助。目前有些社队已经利用沼气发电，但不普遍，而且由于缺乏经常的技术指导和修理服务，大多未能坚持下去。我还没有听说苏南有利用太阳能的社队。泥炭、沼气、太阳能都是值得进行研究和推广的能源。在这里应当提倡综合利用多种能源，积少成多，聚零为整，接力加热的办法，尽可能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在开辟和推广能源上，单靠社队分别进行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统筹解决了。

7．苏南社队工业的发展，相应地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变化。从1974年以来，人口增长率没有超过10‰，1979年已经降到3‰以下，这两年略有回升。江村原有以溺婴控制人口的传统，现已改用现代节育方法，计划生育阻力较小。这几年出生男女比例已进入常态，改变了男多女少的状态。生育意愿一般是想生两胎，一

胎化工作不易做。但社队工厂已婚女工多数表示愿意生一胎，集镇上的双职工家庭育龄夫妇也是如此。农村人口流动不大，江村人口迁入迁出率都在1%以下。婚姻关系趋于村内找对象。参军未返的人约占参军人数的10%。外流人口大多数是不迁户口在外找工做的人。近年来，农村生活改善，青年愿意留在村里的人数增加。生活提高后，农民主要的要求是盖房子，添家具。江村（中等偏低）多数是旧屋扩建，在250户中，一年扩建50间（造价是1,000元一间）；金星二队（上等）已经盖楼房，两层楼6间房；农创大队（特等），已由大队补贴统一建造楼房，每幢两层24间，两年内全部建好。一般是在子女结婚前盖房，包括在结婚费用里。一般新房设备价值2,000元左右。精简节约办喜事的号召在农村里见效不大。丧事已通行火葬，但骨灰要埋在自己原有的土地里。这几年，农村里在赡养老人和婆媳关系上的纠纷有所增加，表明家庭关系正在变化。在一个堂屋里两代分炊，不在一起吃饭的并非个别现象。宗教迷信已经减少，原有寺庙已废，各家"灶君"已撤销，但市镇里烧香拜佛的还有。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还不少。青年业余生活单调贫乏，文化程度低，兴趣狭隘。一年之中大队放映不了几场电影，又无有组织的文娱活动。电视因经常停电，吸引力不大。农村治安还好，但已出现流氓犯罪问题。青年与老年之间的距离在扩大，在妇女装束上就很显著，老年妇女衣服还是传统式样，中年妇女手巾扎头，青年姑娘，特别是社队工厂的女工多数已烫发，带手表，衣服式样和城镇女青年的衣服式样差不多。应当指出，目前社队工厂劳动条件很差，劳动时间过长，往往每天劳动10小时，不注意劳动保护。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改善的。

8．总之，发展社队工业是繁荣农村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特别在苏南这样的地区是如此。它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轨道上是可以解决的。它发展下去很可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模式。

我对这一新生事物接触不多，认识不深，上述的情况、问题和我的一些意见是不够全面的。我认为，社队工业在发展过程中给农村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带来的变化，正在形成的城、镇、乡一条脉络的工业网，和新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模式等都值得进一步实地调查研究。这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所提出的需要各有关学科综合研究的课题。深切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能考虑将这个课题列入今后优先研究项目，组织力量协力攻关。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社队工业的兴起与小城镇的繁荣

——沙洲县塘桥镇的调查

黄炳福　徐伟荣　邬大千

沙洲县塘桥乡的塘桥镇，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而很快繁荣起来的。这个在历史上几经兴衰的古老集镇，如今正在四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正在成为改变全乡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

一、塘桥镇的历史演变说明，小城镇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据《塘桥志》记载，塘桥集镇形成于元朝末年。因这里地处粮、棉产区交界，水陆交通便利，附近的粮农和棉农或手提肩挑，或扁舟一叶，常来此地交换各自的农副产品，这便形成了所谓"日中为市"的农村集镇。至清代末年，又因盛产优质土布，"商贾云集，日进斗金"，进而成为四乡贸易的中心。其时全镇居民约有五、六百人。后来几经战火、几经盛衰，到解放初期约有各类店铺100多家，居民1,000多人。解放后，塘桥镇一度再次繁荣起来；然而，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工作上的失误，在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缓慢，集镇建设停滞不前。尤其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单一农业经济时期，市镇居民大批下乡，为数不多的几家商店每逢农忙季节也时常打烊支农，小城镇经济出现过萎缩的趋势。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农村社队工业的兴起，才给这座小城镇带来一

线生机；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相继落实，社队工业进而得到迅速发展，塘桥镇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构成塘桥镇的一南一北、一老一新两条街道，就集中地反映了塘桥的历史和现状，也标志着塘桥镇的建设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边的一条老街，东西全长600米，宽不满2米，两旁是低矮密集的居民住宅，在新街开辟之前，这里还拥塞着茶肆酒家、南北杂货、五金竹木、香烛酱园等店铺和作坊。在中间一段约100米的街面上，还明显地留下了大跃进时期的痕迹。当时在全面跃进声中，公社的同志以良好的愿望，想在市镇建设方面也来一个跃进，但由于缺乏物质基础，结果是旧的拆了不少，新的建得不多，路面是拓宽了一些，两旁也建起了几家门面较为开阔的饭馆和商店，但整个建筑面积却比原来减少了1,000多个平方米，在居民住宅问题上反而欠下了一笔债，真所谓"割短尾巴拌短饭"了。总之，同许多农村集镇一样，那时的塘桥给人以破旧不堪的感觉。但较之解放以前，这里已有不少进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桥梁年久失修，街头堆满垃圾，疫病流行等状况，已有较大的改变。特别是以铁、木、竹和小五金为主的手工业，以粮、棉、油、酒为主的加工业，以及供销合作商业等都有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交通运输和文教卫生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塘桥公社，基本上还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作为全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塘桥镇，在经济上占主要地位的也还只是商业、服务业，以及为数不多的手工业。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集镇建设也只能是修修补补，无力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造。

北面的一条新街，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以崭新的风貌和气势，与南面的老街形成鲜明的对照。新街全长1,300米左右。东段是计算机存贮器厂、胶木电器厂、塑料厂等社队工

业组成的工厂区；西段建有粮管所和水泥厂等单位；中段闹市区是一条宽12米、长400米的柏油路。街道两旁的梧桐婆娑成荫，一幢幢二至四层新的建筑物鳞次栉比。这里有乡的机关大院、工业公司门市部；有百货大楼、食品大楼、旅馆；有文化中心大楼、新华书店；还有医院、邮电所等。显然，这里已经成为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新街道的开辟，市房建筑面积由原来的不到3万平方米，一下发展到13万平方米，市镇规模也扩大了四倍多。而给塘桥镇带来蓬勃生机的正是社队工业的发展。在这四、五年中，且不算社队工厂自建厂房的投资，单是新建这一条街，开挖一条河，建造十七座桥，举办文化中心，以及支持学校、医院建设，增添市镇卫生设施等直接用于市镇建设的资金，就达160多万元，这都是用社队工业税后利润来进行建设的。此外，年产1.5万吨的水泥厂、年产1.8万吨的石灰厂和年产3,000万块砖瓦的砖瓦厂，也为小集镇建设提供了主要的建筑材料。很明显，要不是社队工业给塘桥自身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单靠农业内部的积累是办不成这样一番事业的。

塘桥镇的历史演变过程告诉我们，小城镇的繁荣和发展，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塘桥这个乡，从解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三十年中，农副工累计总产值仅一亿五千万元，而在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中，却达到了三亿二千多万元。因此，较大规模的集镇建设只能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中，而不可能在此之前。

二、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塘桥镇在性质、功能、人口结构以至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塘桥镇的繁荣，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社队工业的发展全面

带动了小城镇的建设。而塘桥乡的社队工业所以发展得比较快，比较好，这又是有它的特定条件的。塘桥乡与江南水乡的许多地方一样，人多地少；所不同的是，处于水乡而水面也很少。全乡人均占有耕地只8分，水面仅5厘，农村劳力过剩。这个曾经是全省、全国著名的三麦高产单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均分配水平却一直在百元上下徘徊。这里开发农村自然资源的门路虽然比较狭窄，但是发展社队工业的有利条件却很多。塘桥紧靠交通干线，濒临长江渡口，水陆交通发达，能工巧匠很多，与附近的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因此，当他们一旦看清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之后，社队工业也就应运而生了。塘桥的社队工业起步于七十年代中期，发展于1978年以后，由开始的一、二家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综合性工厂，发展到现在的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包括建材、电子、机械、化工等96家工厂，其中社办厂24家，队办厂72家。1983年工业产值9,200多万元，占农副工业总产值的90%；实现利润986万元；上交国家税金670多万元，占全乡各项税收总额的70%左右。

社队工业的兴起，给塘桥镇带来了一派繁荣景象，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前面所说的新街、新房、新厂、新店、新的文化设施和环境设施等等，这固然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再作深入一步的剖析，则更使我们认识到，社队工业的兴起，给小城镇带来的变化，比这些还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第一个变化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使塘桥的以商业、服务业、手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变成以工业为主体的工商并茂的经济结构，由乡村型的小集镇，变成了工业型的小城镇。塘桥是随着农业生产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农副产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而逐步形成的农村集镇，在它长期的发展变化中，也一直限于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这些行业，集镇的经济活动和城

乡的经济交流，主要体现在每年数百万元的商业营业额上。自从社队工业在这个集镇上安营扎寨以来，就在数年之间成为一个较为强大的经济实体了。如今，在24个社办厂中就有21个厂建在这里，此外，还有十几个队办厂建在镇上。过去农民上镇，大多是来出售农副产品和购买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闲来也只是喝杯茶、听回书而已；现在，更多的则是来社队厂从事工业生产劳动的。镇上的不少部门，如银行、供销商业、邮电交通、财政税务等，其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有很大变化，它们为发展社队工业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里，昔日农村集镇那种特有的安静、单调的生活节奏，已为繁华、充实、紧张而又生机勃勃的新兴工业城镇所取代。

第二个变化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使塘桥这个小城镇冲破了原来的行政建制和经济区划的框架，在城乡交流中的活动范围和内容，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都有新的扩充和发展。同许许多多的农村小城镇一样，过去的塘桥镇，在发挥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方面，主要是通过自己这个渠道，把城市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农村，又把农村的粮、棉、油、猪和其他农副产品不断运往城市，因此，它所联系的城市也只限于就近的几个，近则常熟，远则上海，还有远于常熟、近于上海的苏州、无锡。可今天的情形不一样了。从城市运来塘桥的，不仅是工业品，而更多的则是供应社队工业的原料和燃料；从塘桥运往城市的，也不仅是农副产品，而更多的已是以轻纺产品为主的各类工业品了。由于社队工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同城市的联系，也势必要冲破原来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而从近处向远处“辐射”，从少数几个城市向更多的城市“辐射”。现在，大庆、唐山、乌鲁木齐等大中城市都有他们固定的门市部；北京的西单商场有他们的代销专柜；单胶木电器厂一家就同全国各省市的36个二级站和40多家灯具厂、店建立了固定的销售业务联系。由于他们的产品价格公道，质量

又好，很受消费者欢迎。上海市通过合同形式，每年为他们包销30万件针织品、10万把门锁以及灯具等各类工业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先概念上的那种城乡联结的范围和商品交换的内容，在塘桥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意义更为重大、更为深远的一个变化是，随着社队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城乡之间的交流已由物质产品的交换，发展到科学技术上的联结；城市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村，农村从城市引进科学技术。在塘桥乡的24个社办厂中，已经有11个厂与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大型厂矿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技术协作关系。例如计算机存贮器厂，聘请了清华大学、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国防科委七〇六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数学、电工、物理研究所等14个单位的18位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和工程师为技术顾问，他们大多是国内电子计算机方面的专家。这些顾问从技术、业务、信息等各个方面进行具体指导，并通过来厂上技术课等途径，就地培养了一批土专家。技术下乡，已经结出丰硕成果。该厂自行设计研制的半导体存贮器，得到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存贮小组的肯定和赞扬。我们去该厂参观时，正巧常州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们在那里实习。据厂里的同志告诉我们，到他们厂学习和实习过的专业学校，还有好几家呢。化纤纺织厂走的也是这条路子。他们先从无锡国棉二厂聘请了48个已经退休的各级管理干部、前后纺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来厂进行为期二年的传帮带；而后又从上海、无锡等地的大专院校请来了专家教授，为职工业余学校讲课，这样就很快收到成效。目前这个厂生产的化纤产品已达到苏州市同行业的水平，它的纯维纶纱已纳入国家生产计划。

我们从塘桥以社队工业带头、开道，实行城乡技术协作的实践中，可以展望到城乡技术交流的广阔前景。我们的大中城市，应该在城乡交流、城乡协作中，发挥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用现代工业交通业、现代商业服务业、现代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

把千千万万个小城镇武装起来。这样，也只有这样，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才能成为改变广大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

第三个变化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塘桥镇就地消化了农村大批剩余劳力，加快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的历史进程，并把本来要涌向大中城市的人流吸引到小城镇来。塘桥镇在解放初期就有居民1,000多人，以后逐年递增，到五十年代末达到最高峰，为2,400多人，接下来却是逐年下降，到七十年代初又回升到解放初期的水平。塘桥镇人口的变化，形成这种奇异的波状函数曲线，是由于小城镇在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甚至渐趋萎缩所致。多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不是上山下乡，便是到外地就业，镇上剩下的多半是在商业服务单位的老职工和在家被抚养的人口。小城镇人口的缩减和素质的下降又反作用于小城镇经济，使它更趋萎缩。

社队工业的兴起和不断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本来不应当出现的局面。现在，塘桥的社队工业职工总数已达8,700多人，占全乡劳动力总数的60%，其中有4,400多人就在塘桥镇上的社队工厂工作。他们成了没有城镇户口的城镇人，家在农村而工作、劳动在城镇。这实质上是狭义农业向广义农业的转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而实现这种转化的过程，也便是小城镇日益繁荣的过程。这里还应当提及的是，社队工业在吸收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还吸引和留住了一批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目前，在社办厂中，已有本镇居民420人，占市镇居民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样，就避免了小城镇人口的外流，减轻了县城和县属镇的压力。

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很不平衡。大中城市的人口不断膨胀，农村劳力过剩，而小城镇人口却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形成两头大、中间细的葫芦形。这种局面怎么改变？到本世纪末起码还有2亿人多出来，这新增加的2亿人又往哪里放？这里就有一个合理的

人口流向问题亟待解决。以往我们采用的是“堵”和“塞”的行政手段，把农村劳动力捆住在土地上，把城市人口往乡下放，实践证明，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葫芦”愈长愈大。塘桥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解决人口的流向上，看来象塘桥镇那样，通过发展小城镇经济，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力，留住小城镇的居民人口；同时提倡大中城市到小城镇上来办分厂、分店、分校，逐步把大中城市的人口吸引和转移一部分到小城镇上来，是使整个人口流向和人口结构渐趋合理、平衡的一个积极办法。

第四个变化是，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和小城镇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塘桥已不再是一个农业高产量、分配低水平的乡了。1983年人均集体分配已达344元。十年时间翻了二番多，比1978年也提高了一倍半。家庭副业收入也成倍增长，特别是农民通过为社队工业做外发工的收入相当可观，其中单缝合尼龙衫一项每年就达140多万元，人均收入在60元上下。社队工业职工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浮动工资制以后，平均年收入700多元，已接近中等城市工厂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随着小城镇经济的繁荣，全镇还出现了130多户个体户，他们的月收入一般也达一、二百元。近年来这里的农民大多住进了新房，有600多户新建了楼房。日用消费品也逐步向高档发展。现在家家都有电风扇，每10户就有一台电视机。以往人们习惯穿着的格子土布衣服已基本绝迹，代之而流行的是轻薄型的化纤服饰。许多农村妇女已经不愿再为绱鞋纳底花费时间，而转向购买商品布鞋、塑料凉鞋、各类皮鞋。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有很大提高。他们对农村中巡回放映的露天电影已很少兴趣，镇上一家一千多座位的影剧院和两个书场，除农忙季节外，几乎天天满座；文化站里除参加各类体育文娱活动者外，每天还有上百人在那里阅读各种图书。这一切标志着塘桥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在向大中城市的居民靠拢。

总之，社队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这些变化，促使塘桥镇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开始闯出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在实现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从塘桥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小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乡村型的小集镇向工业型的小城镇的转化，正在明显地缩小着城乡之间的差别；相当一批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正在缩小着工农之间的差别；大中城市先进科学技术下乡，“洋”专家带出“土”技术员，这又为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另辟了一条新蹊。我们理解，中央关于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示，其战略意义也在这里。

三、塘桥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今天的塘桥镇，正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但也遇到了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我们想这些问题与塘桥相同类型的那些小城镇，也可能会遇到或者是已经遇到了的。

（一）关于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物资和技术装备，为社员增加了较大幅度的分配收入，也为农村全面建设和兴办福利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它同农业生产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粮食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况下，苏州市广大农村正是依靠以工补农这着棋，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但如果我们不很好运用社队企业利润这个经济杠杆，通过集体经济内部的微观调节，解决好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带来的农副工三业人员收入上的差距，这又有可能走向另一面，构成对农业生产的一种冲击。在塘桥乡是注意了这个问题的。在他们那里也曾出现过相当一批农民不愿种田的情况。全乡6,400多户农户中，曾有2,000农户要求不包或少包农田，而愿意增加承包土地的仅77户。离农的目的，多数是要求进厂务工。这里历来具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有一部分农户因“心不在

田"而把这种传统丢了。针对这一情况，今年乡党委再一次提高"以工补农"的标准，每个务农社员直接从社队工业利润中得到的好处，由去年的140元左右增加到180元，以进一步缩小同务工社员在收入上的差距。实质上，这是在弥补粮食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上，在国家宏观调节手段不足的情况下，社队工业为国家分挑的一部分担子。这样做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小城镇建设也不无意义。因为同单一的农业经济不能使小城镇繁荣一样，如果发展了社队工业而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小城镇同样也繁荣不起来。大凡社队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都可能遇上这个问题，这是需要正视和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改善副食品供应的问题

随着塘桥镇的日益繁荣与人口的急剧膨胀，对副食品的需求量比原来增加了2倍以上，特别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各类菜蔬，已到了供求关系严重失调的地步。目前农贸市场上的鱼鲜菜蔬绝大部分竟不是来自当地的农村，而是从常熟、苏州，以至上海等地倒贩而来，因而价格特别昂贵。我们于1983年8月摸了一下市场行情，毛豆、茭白、豆腐、茄子、丝瓜、小青菜和长豇豆等，平均价格要比就近的几个大中城市高出20%以上。鱼虾等水产品更是奇货可居，漫天要价，多数人不敢问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镇规模扩大到今天这种程度，却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蔬菜生产基地。镇上有24家规模较大的单位食堂，蔬菜供应都没有稳定的来源。看来小城镇伸手向大中城市要菜吃的状况必须改变，小城镇居民日常生活费用高于就近大中城市的情况也应当解决。不然的话，小城镇就会因之失去吸引力，镇上的人口可能再次外流；大中城市的人们也会望而生畏，不可能出现象我们大家所希望的，有朝一日大中城市人口向小城镇转移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塘桥拟着手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蔬菜基地，将种植计划落实到农户，市镇大单位与蔬菜专业户直接挂钩，签订合

同，并与“以工补粮”一样，用社队工业的利润实行“以工补菜”，增加菜农的收入，调动菜农的积极性。此外，他们还发动各厂利用一部分隙地种菜种树，提出了“要把工厂变成果园、花园、菜园”的口号，自力更生解决吃菜问题。这种想法也是好的，但有条件这样做的只有7家厂子，其余的都没有空地或者空地很少。

（三）关于节约用地的问题

节省每一寸土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在“寸金田地”的江南农村来说尤其重要。但发展社队工业和建设小城镇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土地的占用。塘桥乡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队两级建厂和开河筑路等共占用土地450亩，约占全乡耕地总面积的2％，其中市镇范围的扩大约占用250亩。现在大规模的占用耕地的势头已基本过去，但仍不可掉以轻心。塘桥在其发展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与其他小城镇同样的一种情况，即限于财力和拆迁居民住房要价过高，所以也采取留老街、建新街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多占用了一些土地。对此，乡党委已经搞了一个市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准备有计划地改造旧街道，分期分批地拆平房、建楼房，在逐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再挤出一部分土地来用于市镇的其他建设。

（四）关于对小城镇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问题

乡一级领导的工作重点历来是面向农村的，今后也还应当放在农村这头。但象塘桥这样新兴的工业镇来说，加强对市镇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已显得十分迫切。塘桥乡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党支部集中在镇上。集市贸易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兴旺起来。据1983年8月13日清晨3时至7时的调查：进镇的有8,243人，1,051辆自行车，在200米长的农贸市场上，有各种摊贩503个，4小时的成交额达14,000多元。在这样的新情况面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经济管理工作，以至社会治安及市场管理等等工作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了。这些工作由谁来管？怎么个管法？也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塘桥乡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按目前的市镇规模来看，象过去那样单靠有职无权的居民委员会来管理是根本不适应了。他们的想法，要尽快建立市镇党总支或市镇管理委员会，并且一定要选派具有实干精神的明白人当家，委以重任，授予实权，在乡党委和乡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抓好和管好市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协调好市镇各单位之间的关系，使塘桥这个新兴的工业镇健康发展，继续繁荣。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

丝绸之乡盛泽镇的形成和发展

居福田　吴大声

丝绸之乡盛泽，是一个由农村手工业产品集散中心发展起来的工业小城镇。它位于江苏省吴江县的南端，与浙江省嘉兴县王江泾镇毗邻，北距苏州48公里，南距杭州118公里，西南距湖州68公里。明清之际，盛泽与苏州、杭州、湖州齐名，号称我国“四大绸都”。现在，盛泽则是江苏省丝绸工业的一个基地，是我国出口真丝绸的主要产地之一。

盛泽，原名“青草滩”。三国时为吴国司马盛斌的结寨之地，称盛寨。南宋时，因盛寨周围多湖荡，改名盛泽，亦称盛湖。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在盛泽建镇制，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县丞署移驻盛泽，正式设盛泽镇。盛泽是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5)形成集市到现在，已有56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到社会主义工业的演变过程。

一、农村手工业产品集散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一)家庭手工业的兴起

据《吴江县志》记载，盛泽丝绸生产是从明熙宣年间(1425～1434)开始的。起初，盛泽本地人不熟悉丝织技艺，“往往雇郡人(苏州人)织挽(织绸)”。盛泽本地人不断向苏州人学习丝织技艺，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土人(盛泽本地人)亦有精其

业者”。随着丝织技艺的相互传授，“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今盛泽乡跃进村)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盛泽四乡农民的织绸，逐步由副业转为正业，出现了一批以织绸为主、但还没有最后脱离农业的家庭手工业户。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5)盛泽已有一百多户人家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开始“以绸绫为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表明盛泽织绸已经成为一种商品生产。丝绸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使盛泽及其附近农村由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逐步过渡，同时也加速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的进程。

(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

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盛泽附近农村丝绸商品生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专门从事丝绸商品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户随之增多。“治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①。这说明织绸手工业户对于商品经济的依赖性。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富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到明代后期，盛泽一带“佣织者”已达数千人。“雇工织挽”的大量出现，表明一些富裕织绸手工业主，已开始转变为手工业工场主。明冯梦龙的小说里，描写盛泽一个名叫施复的手工业者的发迹经过，很能说明问题。施复本是一个“家中开张织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织夫络的”小机户，但由于他织绸技艺高超，所织之绸“光彩润泽”，绸商“都增价竞买”。几年间，他家就增了三、四张绸机，颇为富裕。不久，“由于蚕丝利息比往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几张绸机”，正好隔壁邻居办蚕事不利，无法继续经营，于是施复买下邻居家的两间小房“铺设机床”。以后继续“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主要作工场用)，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了几家小厮(雇工)，把个家业收拾得十

①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

分完美。”① 施复的发家史，可以说是盛泽丝织业从家庭手工业发展为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缩影。就当时盛泽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来看，这种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是可能的。但是，由于当时投资于丝绸生产，不如做丝绸交易获利多，富裕户投资丝绸生产的并不多。所以，直到清末，盛泽的丝绸工场始终未占优势，而家庭织绸却一直保持经久不衰的局面。

（三）农村手工业产品集散中心的形成

盛泽形成市集约在明嘉靖年间。“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② 后来，随着丝绸商品生产和交换规模的扩大，盛泽人口不断增加。据《吴江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1662～1722）盛泽镇已有10,000余户。在增加的人口中，尤以从浙江省绍兴迁来的人为多。他们大多从事丝绸的炼、染、踹等劳动。绍兴是浙江丝绸产地之一，印染业也较发达。盛泽的丝绸业有了绍兴人带来的炼、染、踹技术，完善了丝绸生产工艺，丝织品日臻完美，在国内外丝绸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这时，盛泽精工细织的“绸绫罗纱绢不一其名，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重或轻，各有定式”，③ 花样新、品种多，吸引外地很多商人来此竞相购买。市场的扩大，又促进盛泽四乡丝绸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盛泽成了这一地区的丝绸集散中心。当时，盛泽丝绸生产和交换的兴旺景象，正如盛泽诗人周灿所描绘的：

“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
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
逐利民如鹜，多金贾自尊。
人家勉机杼，织作彻晨昏。④

（1）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八。

（2）同治《盛湖志》卷一。

（3）（4）同治《盛湖志》。

明末清初，随着丝绸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丝行绸行、绸庄应运而生。当时盛泽镇上的庄面一弄、二弄、十字弄和潴湘弄，设满了丝行、绸行、绸庄，占了盛泽镇十六条街的四条半街。据清末民初的统计，盛泽镇有丝行五十多家，绸庄、绸行七、八十家，丝绸交易的规模是很大的。丝绸业的兴盛，带动了丝织机具行业的发展。清乾隆年间（1736～1795），镇上已有专门从事机具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户，专做织机和梭、筘、筬、纡等纺器配件，形成丝绸织造、炼染、整理和机具制造等一整套生产能力。这一切，标志着盛泽镇已经成为丝绸手工业产品集散的中心。

(四)农村手工业产品集散中心的特点

说盛泽镇是丝绸手工业产品集散中心，是由于盛泽镇本身当时并不是丝绸手工业工场和家庭手工业户的集中地。上面说到，清康熙时，盛泽已是有万户人家的大镇，但是专门从事织绸、炼染生产的机户不过300户，而当时盛泽周围半径25华里内的农村地区，却有织绸机户6,000多户。盛泽镇上的绸产量，不到四乡绸产量总额的5％。各地绸商在盛泽收购的丝绸，大多数来源于盛泽周围的农村。但是，为农村丝绸生产服务的生产、供销、织机具的修造和运输等行业，却多数集中在盛泽镇。盛泽又是航船停泊的港口，每天有四、五百只来自盛泽周围二、三十里农村的航船在盛泽停泊，他们为农村机户运输生丝和绸匹。镇上的丝行、绸行、绸庄是盛泽镇沟通外埠和周围农村丝绸产销的纽带，而航船又是沟通盛泽镇与四乡机户的桥梁。

由于盛泽附近农村所产蚕丝不够本地机户生产所需，机户所用蚕丝多数来自嘉兴、湖州一带。丝行的业务是从嘉兴、湖州等地采购蚕丝运到盛泽，供应给四乡机户。绸庄在盛泽镇设立固定的购销点，直接进行丝织品的购销业务。绸行则收购绸庄罗致之货运往外埠。当时我国许多重要商埠，都有盛泽绸行的分行。绸庄又是通过“绸领头”收购机户的绸匹，自己并不直接向机户收

购。“绸领头”是丝绸产品交换发达的产物，是丝绸生产者和绸庄的中介人。他们代农村机户把绸匹售给绸庄，收取佣金，进行中间剥削。起初，“绸领头”到镇附近的村坊机户家中取绸，代机户拿到绸庄去销售。后来，随着绸匹增多，业务扩大，“绸领头”就不再到村坊机户家中取绸，而由农村机户将绸交给航船带给“绸领头”，再售给绸庄。机户买丝，也委托航船向丝行代购。航船的老大俗称“船家长”，一个庄上的船家长尤如庄上的“供销科长”兼“运输科长”。“绸领头”在丝绸产品交换过程中，还起着一定程度的调节生产的作用。当时丝绸生产完全受市场支配，机户散居四乡，听不到市场信息，生产有很大的盲目性。绸庄所需不同花色品种的绸匹，往往一时不易购到。“绸领头”熟悉市场行情，根据绸庄所需，各自笼络一批农村机户，发放贷款，约期收购，机户按“绸领头”所要的花色品种和规格进行生产。“绸领头”将收购到的绸匹再分类售给有关绸庄。“绸领头”在沟通丝绸产销渠道方面，是起了中介作用的。

综上所述，盛泽镇作为手工业产品集散中心的主要职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产前产后为周围农村丝绸手工业者生产丝绸商品服务，并通过市场调节，支配丝绸生产，发挥沟通产销的纽带作用。当然，这里说的在产前产后服务，是以商业企业家们营利为目的的，只是在客观上沟通了产销关系，使丝绸产销渠道畅通，对盛泽丝绸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五）盛泽丝绸手工业经久不衰的原因

丝绸的生产和交换是盛泽镇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太湖流域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中，它所以能经久不衰，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盛泽地处江浙之间，与丝绸业发达的苏州、杭州、绍兴、湖州、嘉兴等地相距不远。这些地方的丝织、炼染技术，对盛泽丝绸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影响很大。如上所述，盛泽人丝织技术是苏州

工匠传授的，炼、染、踹的工艺是绍兴移民带来的。

2. 太湖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水质好，适宜栽桑养蚕。江浙交界处两侧的震泽、南浔、双林、濮院等地盛产蚕丝的地方，为盛泽丝绸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3. 盛泽附近农村，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占有，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受严重剥削，一年收入无几，难以维持生活。而织一匹绸却可得到相当于五斗米的代价。因此，盛泽四乡农民轻耕种而重织绸，无力购机自织的人，就到镇上当雇工，给别人织绸。这就为镇上丝绸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4. 清初，盛泽丝绸手工业已基本实现专业化。丝绸生产的络、并、拈、整经、卷纬、织造、炼白、染色、整理等几道工序的生产，早在一些家庭中分工进行。同时，盛泽还有专门从事丝织机具修造的家庭手工业。丝绸手工业实现专业化，有利于传授技术，提高工效。

5. 盛泽地处水网地区，河流纵横交叉，交通较为便利，有利于外地商人来做丝绸交易。商业的兴旺扩大了丝绸市场，促进了丝绸商品生产的发展。丝织业与商业象一对孪生兄弟，互相促进，兴衰与共。

6. 盛泽的丝绸商品生产，是由农村不断向市镇发展的。历来封建官僚对盛泽农村丝织业的管理较松弛，盛泽丝织业也没有受到象苏州丝织业那样固有的行会制度束缚，这些都有利于盛泽丝绸手工业的发展。

总起来一句话，盛泽丝绸业的发展得惠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的最佳结合。

二、从农村手工业中心到工业城镇

(一)丝绸工业的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1920～1921年的经济危机，经过复苏，经济已转向新的高涨。随着国际国内市场对丝绸需要量的增加，盛泽丝绸产品供不应求。盛泽丝绸业的几个企业家受上海、苏州等城市绸厂用电机织绸扩大生产的影响，也开设工厂，用电机织绸。1929年，美丽绸厂首先试验用柴油引擎发电带动两台铁木织机运转成功，产量提高，影响很大。1930年，苏州电灯厂向盛泽镇供电，丝绸业企业家王鸣泉在盛泽开设民生、大中华、华记、新记四片绸厂，共有织机146台，用电机带动织绸。接着，郎梅春办的郎琴记绸厂也用电机织绸。不久，上海的几家绸厂也相继迁来盛泽。这几家绸厂的老板都是从经商开始（经营绸行），积累资本，再来经营工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一般发展规律。他们先在上海试办小型绸厂，等到初具规模，便陆续迁回盛泽。因为在盛泽办绸厂比在上海有利，一是有织绸技术基础，二是劳动力价格低，三是雇工方便，四是接近原料产地。到1936年，盛泽各绸厂合计有电机1,360台，职工908人。受绸厂用电机织绸的影响，盛泽镇一小部分家庭手工业户也改用电机织绸。但因受用电限制（每天只供电两小时），大多数家庭手工业户仍用木机手工织绸。

电机的引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可以说是盛泽丝绸业的一次“产业革命”。首先，阶级构成起了变化，盛泽产生了第一代丝织产业工人和民族资本家。其次，完成了家庭手工业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过渡。原先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没有象样的厂房，又无固定的工人（大多数是兼织、轮织，或是商夜织），织机简陋，工效低。改用电机生产以后，产量增加，品种增多，质量提高，产品畅销。

（二）抗日战争前后盛泽丝绸业的凋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造丝向我国倾销，价格低廉，盛泽真丝织品销路开始出现不景气现象。绸厂为了维持生产，

扩大销路，改用人造丝为主要原料织线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占领江浙一带以后，于1938年成立“华中蚕丝公司”，对中国蚕丝业实行全面控制，将江浙一带所产优质蚕丝全部运往日本，并大肆砍伐江浙一带的桑林，致使盛泽市场出现土丝价高，而绸价低的反常现象。同时，日寇拆毁了盛泽一些绸厂的厂房，将电厂马达搬走，又破坏苏嘉公路，封锁江南运河，断绝丝绸对外贸易的联系，盛泽各绸厂被迫停闭，仅剩下一部分家庭织绸手工业户，用少量土丝维持生产。

在日寇摧残下，盛泽丝绸业一蹶不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些绸厂就将丝织改为棉织。1947年，盛泽各绸厂以织绢纹呢(棉织品)为主，后又改织其他棉织品。这期间，官僚资本又控制了盛泽丝织业，他们操纵市场，使盛泽织绸的小机户不断破产。到1949年解放前夕，盛泽所有的绸厂全部改织棉布，丝绸业几乎陷入绝境。

(三)解放后盛泽丝绸业的恢复和发展生产

1949年，盛泽解放后，丝绸业如枯木逢春，迅速恢复了生产。解放初，全镇共有工厂、作坊和家庭手工业户126家，电动织机450台，丝织和棉织从业人员840人。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人民银行发放贷款，国营花纱布公司和蚕丝公司委托加工，使盛泽丝绸生产迅速得到恢复。此后数年，盛泽镇丝(棉)织业生产有了发展。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盛泽镇共有丝(棉)织厂68家，个体手工业户74户，丝(棉)织从业人员1,641人。

1956年对私改造后，盛泽原有的丝(棉)织厂以及家庭电机织绸(布)户合并成立了6个布厂。国家在1956年和1957年给盛泽纺织工业投资1,319,690元，进行设备更新和厂房改造，使生产有了较大发展。1957年全镇纺织工业总产值已达到787.9万元，比解放初增加12倍多。

为了适应逐步恢复丝绸生产的需要，1957年将6个布厂改组

为新生、新华、新联丝织厂。1958年又将镇上的一些个体木机织绸户组织起来，建立新民丝织厂。从1957年到1969年，主要生产人造丝织品和人造丝为主要原料的交织品，如富春纺等；1970年以后才部分生产真丝织品，如电力纺、美丽绸等。1975年起，逐步增加真丝织品的生产。在这期间，织造设备也进行了更新和改造，织机全部改为新式铁木机，并采用自动换梭设备。

从1957年到1975年，盛泽丝绸生产虽有发展，但发展还较缓慢，主要原因是：原有设备陈旧，缺乏生产外销丝绸产品的能力。同时，国内人民购买力提高速度不快，丝绸内销市场有限，盛泽丝绸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本身生产能力和市场有限需求的制约。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盛泽丝绸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了调整方针，盛泽丝绸工业以发展外销真丝绸为主，大力进行织造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以及丝绸产品的设计、试样和印染、整理设备的配套。四年来，先后将陈旧的铁木机全部改为自动全铁机，用进口钢材自制了络、并、拈、整经、浸烘、染色等关键设备900多台套。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宽幅绸、提花绸的需要，又改造了狭机、素机，自制了加宽丝织机和提花机，使阔机和提花机分别占到织机总数的50%和37%，初步实现织机的狭、中宽、特宽的系列配套。为了使厂房保温保湿，确保真丝织品质量，翻建和改建了101,880平方米的厂房，安装了恒温恒湿的空调装置。同时，建立了丝绸研究所、丝绸品种设计中心和丝绸试样厂，重视智力开发和技术培训，加强了科研、设计、试样队伍的建设，和新花色、新品种的研究、设计、试样工作。经过上述一系列工作，盛泽镇已经基本上形成织、染、纺机、纺器制造配套成龙完整的丝绸工业体系，建成以出口真丝绸为拳头产品的专业生产线，使丝绸生产特别是真丝织品的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2年，盛泽丝绸产品总产值达到

22,290万元(不包括镇、社办丝织厂产值),比1978年增长一倍。丝绸产量达到3,931.4万公尺，比 1978 年增长一倍，其中出口丝绸和真丝绉类产品产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一倍和五倍。丝绸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社会正品率达到97.47%。在 1982 年全国丝绸实物评比会中，01、02、07炼白双绉和07染色双绉获得全国第一。

(五)盛泽丝绸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1978年以来，盛泽丝绸工业发展速度所以很快，除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指引，国际丝绸市场需求量增大，有利于真丝绸的生产发展外，还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1. 大城市的支援。盛泽邻近苏州、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盛泽丝绸业各厂经常派人到这些大城市向同行学习生产技术、设备改造、企业管理经验，解决生产和工作中的难题。例如，盛泽华生纺机厂生产的一种丝织机，是现在盛泽各丝织厂的主要设备，就是在上海第一丝绸机械厂的具体帮助下试制成功的。又如，盛泽吴江印染厂阳离子染色，牢度不够，他们到上海第一绸缎印染厂学习了阳离子变性处理的经验，改进了工艺，提高了染色牢度。再如，盛泽新华丝织厂学习了杭州福华丝织厂的原料定型工艺，提高了真丝绸的产品质量。

2. 传统丝织基础和丝织技艺好。盛泽的丝绸工业，是在传统的丝织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丝织技术基础好。镇上绝大多数人家都有丝织工人，其中很多人家几代都以织绸为业，是丝绸世家。我们用随机抽样法，从盛泽镇16条街道8,490户居民中，调查了283户（占全镇居民户三十分之一）家庭成员的职业。家中有人在丝绸行业工作的有268户，占94.7%，其中有 83 户全家成年人都在丝绸行业工作，占31%。这268户中，只有一代人在丝绸行业工作的101户，占 37.69%；有两代人在丝绸行业工作的 152 户，占56.71%；有三代人在丝绸行业工作的15户，占5.6%。许多丝织工人出身于丝绸世家，从小就向父母学到一手织绸的传统

技艺，谙熟丝织前后各道工序，加上自己织绸精益求精，使素织花织件件皆精。盛泽五百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织绸技艺，千家万户，世代相传，已经相沿成俗，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盛泽的这种传统织绸技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近两年进厂的一千多个年轻的丝织女工，多数出身于丝绸世家，她们进厂不到三个月，就能掌握操作技术，独立工作。据测定，她们掌握操作技术的速度，比不是丝绸世家出身的女工快四、五倍。

3．工业部门和外贸部门协作好。外贸部门为了使丝织厂的生产能力适应外销需要，主动在资金上、更新设备的材料上给盛泽丝绸工业部门以帮助，为盛泽丝绸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盛泽丝绸工业部门也竭尽全力做到生产上服从外贸需要，确保外销真丝绸的生产任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因此，在国际丝绸市场出现不景气的情况下，1982年盛泽外销丝绸仍比1981年增长二成多。

（六）盛泽镇丝绸工业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盛泽镇是江苏省的丝绸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外销真丝绸的主要产地之一。盛泽镇现有的丝织机，占江苏全省丝织机总数的16.7%；丝绸业职工数占江苏全省丝绸业职工总数的15.5%。1982年，盛泽的丝绸工业产值（不包括镇、社办丝织厂产值）占江苏全省丝绸工业产值的16%，占苏州市（包括所辖吴江、吴县的丝织厂产值在内）丝绸工业产值的32.2%。1982年，盛泽丝绸出口量占江苏省的46.8%，真丝绸出口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其中外销纺类丝织品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外销真丝绸销售到五十二个国家和地区。1982年，盛泽丝绸出口换汇额占苏州市丝绸出口换汇额的34.3%。

其次，盛泽镇是吴江县丝绸工业的中心。吴江县除了盛泽镇的丝绸工业外，还有社、队办的丝织厂223个，其中社办丝织厂33个，队办丝织厂190个。这些小型丝织厂散布在全县各个乡、镇，

共有丝织机4,500台。1982年共计产丝绸3,000万公尺，其中真丝绸占35%。这些社、队办的丝织厂是1975年以后在盛泽镇的五家县属丝织厂的一手扶持下先后办起来的。从提供设备、安装机器、设计产品、培训技术力量，到帮助打开产品销路，都由五家县属丝织厂分工包干到底。为了帮助全县社队办丝织厂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盛泽镇五家县属丝织厂各派一名有经验的技工组成丝织技术服务队，轮流到各社、队办的丝织厂进行技术指导。这项工作，已坚持三年之久。盛泽丝绸试样厂成为丝绸品种设计中心，专门为社、队办的丝织厂设计适销对路的新品种。

再次，盛泽镇丝绸工业上缴了大量税利，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从1979年到1982年的四年中，设在盛泽镇的五家县属丝织厂和一家印染厂累计上缴税利 5,840 万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总和的1.8倍，其中1982年上缴税利1,553.3万元，占同年苏州市丝绸工业上缴税利总额(包括所辖的吴县,吴江县各丝织厂上缴的税利在内)的19.1%。

最后，盛泽镇丝绸工业的发展，为待业青年就业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拓宽了门路。从1978年到1982年，仅设在盛泽镇的县属丝绸工业系统的十二家工厂，就吸收了 3,200 多个待业青年就业，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1,709人进厂做计划内临时工，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大有作用。

(七)以丝绸工业为主的工业小城镇的形成

盛泽镇从1929年出现第一台电机以来，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解放后，又几经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丝绸工业的大发展，更使该镇的性质和功能起了很大变化，已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小城镇。表现为：

1. 在经济结构中，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很大,其中丝绸工业产值占大多数。

1982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合计27,928.05万元,其中工业总

项　　目	单位	1949年	1978年	1982年	1982年比1949年增加%	1982年比1978年增加%
生活在镇区的总人口	人	24,632	25,388	33,133	34.5	30.5
(1)户口在城镇的人口	人	24,632	21,510	26,179	6.3	21.7
其中：农业人口	人		1,123	1,123		
(2)户口不在城镇的人口	人		3,878	6,954		79.3
其中：农民工			780	3,094		296.7

人口的45%。如果加上原为盛泽镇在册人口中的农业人口，现为土地工（因征用土地而被有关工厂吸收为长期雇用的非正式工）1,050人，则农民工总数为4,144人，占镇区常住人口的12.5%，占全镇职工总数的23.1%，相当于全镇在册职工总数(13,802人)的30%。农民工的大量产生，反映了盛泽镇工业发展很快，以及在册人口中劳动力的不足，也反映出农业人口正在向非农业人口转化。

6. 盛泽镇镇区人口密度大，工业用地占建成区面积的三分之一。

盛泽镇镇区面积2.58平方公里，按常住人口计算，镇区人口密度12,842/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75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占三分之一。

7. 城镇建设已有一定基础。经过解放后三十多年的建设，盛泽的城镇建设已有一定基础。镇区现有居民住宅面积226,076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6.3平方米。有自来水厂1个，每日供水5,000吨，全镇70%的居民能饮用自来水，另有工厂自备深井16座，供水能力每日16,000吨，能解决工业用水和部分居民生活用水。有变电所1座，能保证工业用电和居民照明用电需要。镇区电话已实行自动化。镇上有汽车站1个、轮埠2个，汽车、轮

船均直接通往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等城市。镇上有电影院、书场、文化站、电视差转台、广播站各1个，小学5所、中学2所。

三、盛泽镇继续前进中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现在的盛泽镇，工厂林立，人烟稠密，已达饱和状态。象这样的工业小城镇，今后应怎样发展呢？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丝绸生产来说，今后应从外延转向内涵发展，向深度加工方向发展。主要是：

1．发展丝绸印染。目前，盛泽外销的真丝绸，以炼白绸为主。如1982年出口的真丝绸中，炼白绸占到93%。因此，要增加印染厂的投资，引进现代化丝绸印染设备，提高印染技术水平，增加出口印染绸的生产。同时，要加强花样和新品种的设计能力，在花样和品种上不断创新，提高竞争能力。

2．发展外销真丝绸复制品的生产。如加工丝绸服装、鞋帽、被面、枕套、工艺美术品等。生产丝绸复制品，不仅可以使丝织品成倍的增值，还可以通过印花、绣花、剪裁、缝合，消除丝绸疵点，提高产品质量。此外，还可以扩大生产门路，扩大劳动就业面，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力。

3．适应当前国内外市场真丝绸向提花绸、阔幅绸方向发展的需要，继续改造和更新织机，增加新的配套设备，增加提花绸和阔幅绸等新品种、新花样的设计与生产。

要向上述方向发展，就要抓紧解决以下几个关键性的措施：

第一，积极培训技术力量。丝绸行业，是技术性强并带有工艺性质的行业，它面对的是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必需有一定数量的技术力量，才能不断增加新品种、新花样，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目前盛泽包括丝织、印染、纺机、纺器等在内的丝

绸工业系统，其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低于上海、杭州、苏州等大城市。上海为3.5%，杭州为3.6%，苏州为2.2%，盛泽仅占0.94%。在现有的118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职称的95人，占80.5%；无职称的23人，占19.5%。前面说过，盛泽丝织工人有传统的技艺，这是盛泽丝织业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传统技艺只有和现代工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相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盛泽丝织系统已选送一批符合高校招生录取条件的高中毕业生，委托苏州丝绸工学院定向培养。这是解决技术力量不足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培训渠道单一，周期长，人数少，不能满足今后丝织业发展的要求。今后应当着眼于在本地培训技术力量，要加强和充实设在盛泽的吴江丝绸研究所，征聘外地的丝绸工程技术人员到该所工作或讲学，通过研究所为各厂培训技术人才。为此，这个已挂牌三年但尚未经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吴江丝绸研究所应当争取省、市有关部门认可，并将试样厂划归丝绸研究所做实验工厂，作为培养人才、试制新产品、新品种的基地。同时，要下决心办好开办不久的盛泽丝绸职业中学，并加速筹建丝绸职工中专。在培养人才和智力投资上，要舍得下本钱。我们认为，这对提高盛泽丝绸竞争能力是重要的一步棋。

第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盛泽镇已不存在劳动就业困难的问题，严重的问题倒是有事没人干。据统计，盛泽镇在今后十年内，达到劳动年龄的女性劳动力，平均每年为167人，这连补充每年女职工退休和自然减员的缺额也不够，当然，更谈不上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增加的女性劳动力了。由于丝织厂实行三班制，名曰轻工，其实是重活。外地属城镇户口的待业女青年，一般不愿离家到盛泽来当丝织工人，招工有困难。为了弥补女劳动力的不足，近几年各厂都使用了不少年轻的女农民工。但年轻女农民工存在流动性大，结婚后有的要自动离厂回乡，有的有家庭拖累等种种问题，不利于安心钻研技术，提高生产本领。这

个问题必须从盛泽这一工业小城镇的实际出发，从调整劳动政策，（如吸收固定的农民工），调整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入手，来解决劳力资源的问题。

（二）从城镇建设来说，首先需要解决城镇建设和公共福利设施等方面已严重影响和制约生产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主要有：

1．道路狭窄，交通拥挤。盛泽镇区多数道路平均宽度只有3.5米，上下班时，大街小巷，人群摩肩接踵，拥挤不堪。到新民丝织厂、华生纺机厂等厂去必须经过的南新街、北新街，也只有4米宽，汽车驶过时，行人只好贴着墙壁走路，因而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2．镇区下水道淤塞，影响居民生活。盛泽镇的下水道还是明清时代建的，后因填河筑路，建厂造屋，下水道水系被破坏，出水口被堵塞，加上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淤塞不通。每遇大雨，镇区有的地方积水盈尺。1983年，从6月到10月，镇区因下水道不通，共泛滥7次，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

3．镇区内居民住房仍较紧张。现在，除几家大厂新建了一批职工住宅，职工住房有所改善外，居民中目前尚有710户无房户和230户住房困难户，比起吴江其他大镇来，问题较为突出。

4．医疗卫生设施较差。盛泽是一个有居民3万多人的大镇，有近2万职工，每年为国家提供利润以千万元计，但镇上只有一所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盛泽乡的卫生院。各大厂也无医务所。职工看病难问题较大，妇幼保健工作更被忽视。镇上或县里每次开人代会，代表们对此都提意见，但始终没有解决。

5．商业服务业网点太少，不能适应镇上居民尤其是镇郊的工厂工人生活需要。1957年，盛泽有商业网点688个，六十年代初，以小并大，减为336个。现全镇仅有109个商业服务网点，集中在镇中心的几条街道上。这对有200多条街道里弄的盛泽来说，实在不相适应。另外，由于蔬菜地为工厂扩建的厂房占用，蔬菜等副食品供应数量少，价格贵，群众意见较大。

有一位建筑学家曾将一个城镇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比作核桃肉，将城镇建设比作核桃的外壳。核桃壳和桃肉应协调发展，桃壳长得很好，但桃肉萎缩了，固然不好；反之，也有桃肉饱满而桃壳被挤破了的情况，同样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盛泽面临的正是瘦小的桃壳里长得很饱满的桃肉的状况。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牵涉到领导体制、行政区划、建设资金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盛泽是县属镇，不是一级财政单位，没有财政收入。县属工商企业的税利，均按系统上交给国家和县里主管部门。城镇建设只靠县里每年下拨给镇的少数城建费用，还有镇办企业的税后少量利润提成。这两笔钱，连维修现有道路都不够。桃壳与桃肉的关系，始终失调。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可否考虑从盛泽的特点出发，在行政体制上享受类似县级特区的待遇，对征收的三项附加费等的使用，有自主权。象这类小城镇，可否考虑在政策上允许从企业利润中提取适当比例用于市政设施的配套建设费，同时，通过提倡公益劳动，多方集资等办法，来解决某些公共性的建设项目，如办医院、修下水道等等，以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二，解决镇、乡分设的矛盾。现盛泽镇已到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面，没有一点发展余地，走出镇区，便是盛泽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镇乡合并，由镇管村；二是从盛泽乡划几个村归盛泽镇，在合理使用节约使用土地的原则下，将建设新居民区与改造老街结合起来，解决住房拥挤，道路狭窄、蔬菜地少等问题。

第三，采取多种方法，如合营、联营等等，吸引附近农民到镇上来开店，经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也可以提倡有条件的工厂，在工厂生活区附近开设为职工服务的商店。通过这些途径，解决目前国营商业系统和供销商业系统想要增设网点，但缺少营业用房和资金的困难。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发展工业在平望镇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　颐

小城镇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各种因素之间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在江苏省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些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因素是工业的迅速发展。“无工不富”，吴江县平望镇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一、平望镇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平望镇是吴江县的一个县属镇，也是平望乡政府的驻地。平望乡的一些社办企业也设在平望镇上。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平望镇有在册人口9,353人，如果加上常住镇上的农村户口的人数，合计有14,000多人。

平望镇的工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由传统手工业发展起来、经过更新改造而建立的工厂；(2)县里在平望新建的工厂；(3)镇办工厂和社办工厂。这几类工厂都对平望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共同构成了平望镇工业的发展史。因此，我们考察平望镇的工业，就应当包括这三类工厂。

解放前，平望镇工业基础薄弱。1949年平望镇解放时，只有五家米厂、一家油厂、五爿酒坊和铁、木、竹等手工业。

平望镇工业的发展，是解放以后的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末。据1955年12月统计，当

时平望的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共有39个行业,138家,从业人员469人,绝大多数是家庭作坊,除米厂使用柴油机外,都是手工操作或简单的机械操作。

其后,在合作化运动中,个体的家庭手工业作坊组织成集体经营的木业、铁业、竹伞栲栳、弹花制绳、钮扣、白铁、缝纫、皮革八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县里在平望镇开办了农机厂,1956年,又办了面粉厂。虽然有这些变化,但直到六十年代后期,平望镇的工业仍然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属于为农业生产和当地人民生活服务的传统手工业。今天看来,这种传统手工业正是平望镇工业发展的起点。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平望镇的工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机器操作为主的现代工业的创办阶段(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后期)。

首先是传统手工业内部完成了自我更新和改造。六十年代末,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靠手工生产的简单的、低级的产品面临着市场日益缩小的趋势。如弹花制绳社后来成为棉纺厂,只能生产粗布,市场很小;白铁社生产的白铁桶,销路不畅;钮扣社的传统产品贝壳钮扣受到新兴的有机玻璃钮扣的挑战,败下阵来;竹柳社因为毛竹紧张,柳条不足,加之油布伞逐渐被阳伞代替,生产一落千丈;木业社以生产木制农具为主,由于木犁、水车等落后的农具逐步被淘汰,只剩下粪桶一项尚有销路。这种形势迫使手工业合作社转产,不能死守老传统,必须转向现代工业。于是从1970年起,到1975年止,一批由手工业转变为现代工业的工厂在平望镇出现。

厂名的更换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平望地区手工业时代的结束,机器工业时代的开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传统手工业中的一部分消失了(如竹器、柳器、雨伞等);一部分转移到后来的农村队办工业中去(制鞋、弹花、制绳等);一部分保留了下来,

平望镇手工业发展沿革情况

合作社名称	建社年份	转厂年份	现在厂名
木业社	1954	1973	先锋农具厂
铁业社	1956	1974	铁制农具厂
竹伞栲栳社	1956	1973	吴江灯头厂
弹花制绳社	1956	1974	吴江玻璃钢厂
钮扣社	1956	1970	合成化工厂
白铁社	1958	1975	汽车配件厂
缝纫社	1958	1973	平望服装厂
皮革社	1956	1970	吴江县皮革二厂

但其生产方式由手工改为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具等)；或者产品由低级变为高级(皮革、钮扣等)，实现了内部的改造和更新。这批工厂后来属县办集体企业。

在这一阶段，县里于1969年在平望开办了化肥厂，1973年开办了平望食品厂，连同在此之前开办的县农机厂、面粉厂、水泥制品厂，在平望镇形成了一批县办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批企业在促进平望工业的发展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是平望工业的骨干力量。

1969年9月，原有的几个街办小厂合并成为日用制品厂，这是平望镇镇办工业的开始。镇办企业是由镇政府自筹资金开办的，由镇政府领导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办厂时的指导思想是解决镇上的闲散劳力和残废人员就业，属社会福利工厂性质。镇办厂在七十年代初很不稳定，波动较大，直到1977年以后才站稳脚跟，有了迅速发展，成为向镇政府上缴利润支援市政建设的主要力量。

这一阶段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社办工业的出现。平望

公社在1960年镇社合并时期曾办了一个第一米厂，工人都是从镇上国营企业中抽来的。后来镇社分开，第一米厂属公社，一直保留到今天。因此，第一家真正的社办企业应当是1970年开办的第二米厂。接着在1975年以前先后办起了土窑厂、菌种厂、农机修配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看到兄弟地区社队工业大发展的可喜形势，这个公社的领导深深认识到，社队办工业，不仅是解决公社用钱的问题，而是以工养农，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大好事。因而1975年以后，陆续办起了塑料厂、染料化工厂、水泥制品厂、兔毛加工厂、木制农家具厂、丝织厂、酒厂等。

在前两个阶段中，平望地区的工业完成了传统手工业的更新改造和新企业的创业过程。从1978年开始，随着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出现，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社办、镇办工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扶持，平望工业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同1955年相比，1982年平望工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综合起来有五方面：

1.各方面办工业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了县办国营企业、县办集体企业、镇办企业、社办企业和局、场、蔬菜队办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局面，并且出现了同上海大工业联营的崭新形式(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

2.有了一支有相当数量、一定质量的工人队伍。1982年底，平望共有各种类型的工厂44个，职工5,525人，其中固定职工3,164人，城镇户口临时工94人，农民工2,267人。

3.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为机器生产方式所代替。

4.产值、利润有了巨大的增长。1982年仅县办企业、镇办企业就完成产值5,179.89万元，为1954年的208倍；实现利润400.28万元；工资数为270.47万元。

5.1982年，平望各类工业企业生产了包括缝纫机整机、机床、农机配件、化肥、玻璃钢制品、化纤织品等一百多种产品，工业门类

有机械、化学、轻工、纺织、粮食加工、食品、建材、水泥制品、仪表、医药等十大类。这标志着平望的工业已经由为本地区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服务，开始了为城市工业提供设备、原料，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的新阶段。

由于工业的发展，今天的平望已不再仅仅是交通枢纽和农副产品集镇，而已成为一个工商业并举的新型城镇了。

二、平望镇工业发展的内部要求和外部条件

平望镇工业所以能阔步前进，是有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要求的。

1.周围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平望镇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吴江县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之称。解放以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纠正了"左"的错误，吴江县的渔业和养蚕、养猪、养兔等家庭副业也和农业一样发达。丰富的农副产品，加上平望镇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使平望成为吴江县内的一个农副产品集散地，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的出现就是很自然的了。解放以来先后办起的农副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有：县办面粉厂、食品厂、皮革二厂、水产养殖厂冷库，社办米厂、兔毛加工厂、生物制约厂等。

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促使支农工业发展。解放以来，一批现代化的支农工业出现在平望镇上。平望的第一家现代工业就是吴江县农机厂。其后又办起了县化肥厂、先锋农具厂、铁制农具厂、水泥制品厂、社办农机修配厂、木制农家具厂等。

吴江县农村机械化程度较高，使大批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工业的发展，城镇规模的扩

大又使四郊农田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在自然增长。根据可查资料，1971年平望乡耕地面积66,075亩，人口39,944人，劳动力23,431人，人均耕地1.65亩；1982年耕地面积65,157亩，人口41,783人，劳动力27,404人，人均耕地1.56亩。据推算，五年以后，劳力将达30,000人以上，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尖锐，日益增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求出路，这样大批农民工转移到了镇里，镇社办的企业将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2.城镇人口就业的压力，是平望镇工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平望的工业还处于传统手工业时期，不能有效地吸收城镇人口就业。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的平望镇就业情况的资料是1963年的统计。当时平望镇在册人口6,289人，除去各业就业人数和中小学生人数，无业居民有1,951人（男573人，女1,378人），其中26～55岁1,027人。这就是说，1963年平望镇无业人员至少有1,027人，占全镇总人数的15.9%，可见当时就业问题的严重。1960年至1963年第一次大规模下放城镇居民1,710人，1968年至1970年又第二次下放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1,355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采取的措施。而当七十年代后期，平望镇工业发展以后，城镇居民就业就有可靠的门路。七十年代后期，插队知识青年和下放居民陆续回到镇上，这时平望镇正在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回镇的插队知识青年和下放居民以及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都很快得到就业，从1977年到1982年，平望镇各类工厂共增加职工1,296人。到1982年底，全镇除少数挑选工作不服从分配的待业青年外，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都已就业，连能够从事简单劳动的残废人和精神病人，也被镇劳动服务公司的丝织厂招收进去，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3.筹集城镇建设资金，有力地刺激镇办工业的发展。

小城镇要做到经济建设和市政建设同步发展，资金是一个大问题，过去平望镇市政建设资金完全靠县城建局拨款。下拨资金多

就多搞，少就少搞，专款专用，没有就不搞。平望镇委、镇政府的办公经费和教育、卫生各项事业经费也由县里下拨，实行经费包干。

由于县拨款数目太少，使平望镇市政建设难以进行，历次城建规划往往落空，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镇领导从社办企业中得到启发，积极兴办镇办企业，到1982年底，共计办了12个镇办工厂。

平望镇发展工业还有三个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

首先，平望镇交通十分便利：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太浦河横穿东西，青（浦）平（望）公路由此发端，东接上海，苏（州）嘉（兴）、苏（州）湖（州）公路在此汇合，北达苏州，西至湖州，南连嘉兴。真可谓水陆并举，四通八达。工业原料、燃料易于运进，产品便于运出。

其次，平望地处吴江县心腹地带，本县的农副产品原料易于集中，这对发展粮食加工和食品工业非常有利。

更重要的是，平望离上海、苏州等大城市很近，乘车当天可以来回，经济联系十分密切。近年来，上海、苏州等城市由于发展规模受到限制，一些工业需要向外扩散，而平望这样的小城镇就是这类工业扩散的理想地点。设在平望的吴江县农机厂，七十年代生产机床。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这个拥有600多人的平望第二大厂被迫转产轻工产品，但生产任务不足，面临停产的危险。当时的苏州地区领导机关要该厂转产缝纫机，但县、厂领导都怕成本大，批量小，质量过不了关，要亏本，因而信心不足。当县领导去上海缝纫机三厂寻求技术上的帮助时，正值上海缝纫机三厂因想发展苦于缺少地皮，需要在上海附近找一个扩散地点，以便扩大生产。于是上海缝纫机公司的领导亲自到平望考察，对吴江县农机厂的场地、厂房、工人素质均感满意，终于达成协议，双方实行联营。吴江县农机厂改名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生产缝纫机整机和部分零件。产品用上缝三厂"蜜蜂牌"商标。双方协议：总投资70万元，吴江县占55.6%，上海占44.4%，产供销由

上海包下来，利润对半分成。上海派12名老师傅做现场技术指导，使产品质量同上海总厂的一样。1982年，该厂生产出缝纫机整机2万多台，赢利35万元，经济效益较好，这是大中城市工业在小城镇扩散成功的一例。

除了联营形式外，大城市工业在平望扩散的另一种形式是“挂钩”，即大中城市同平望镇的工厂建立一种固定的协作关系，由大城市提供原材料、技术，交平望的工厂进行加工，产品全部或大部卖给大城市的工厂。前苏州农药厂地方小、进行扩建有困难，该厂就让平望乡社办化工厂替他们生产乐果、1605的中间体。苏州农药厂派一名老家在平望的技术员驻厂进行技术指导，双方建立起良好的协作关系。后来苏州农药厂并入苏州化工厂，仍帮助平望乡社办化工厂同苏州染料厂挂上钩，生产染料中间体，并且继续供应化工原料。

大城市工业在平望的扩散最普遍的还是采用“扶植”的方式，即一些不宜在大中城市生产的产品，由大城市提供原材料和技术，扶植平望的工厂生产。这里供和销都没有如前两种形式所具备的较固定的渠道和市场，不过从宏观上看，也是一种扩散。玻璃钢制品是一种有前途的新兴工业，但需要较大的生产场地，上海地皮紧张，生产受到限制。通过熟人的介绍，化工部上海设备设计技术中心站决定让吴江玻璃钢厂生产玻璃钢凉水塔，使该厂成为全国第一家生产玻璃钢冷却塔的工厂。自从1974年以来，化工部上海设备设计技术中心站一直承担吴江玻璃钢厂的设计工作，扶植这个厂成为一个能生产从100吨以下到500吨的一个系列的冷却塔的专业化工厂。1983年9月，化工部批准该厂成为玻璃钢冷却塔的定点厂。由于该厂冷却塔的噪音只有55分贝，低于部颁65分贝的标准，国家科委发函全国，推荐该厂产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平望工业发展，是适应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具备着许多有利条件，因而有其必然性和

合理性。

三、发展工业给平望镇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

工业在平望镇发展起来，就不仅改变了平望镇的经济结构，改变了这个千年古镇的性质和职能，而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进步，促进了平望镇的发展和繁荣。

1.大大地增加了平望镇的人口。

人口的不断增多是小城镇发展的第一个标志。但是人口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就业问题的出现。不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人口就不能增加，小城镇就不能发展。1949年，平望镇只有4,050人，1982年人口普查，在册人口9,353人，比1949年同期增加了1.31倍；而其中工业从业人员则由1953年的359人（根据趋势推算，1949年的工业从业人员更少），增加为1982年的3,164人（固定工、在册人口），增加了7.80倍。若以常住人口计算，1982年平望镇常住人口14,833人，比1949年增加2.6倍，而1982年包括社办厂工人和农民工在内，平望镇各类工厂共有工人5,525人，比1953年增加14.39倍。在这两种计算中，工人增加的速度均大大超过人口增加的速度。可见，发展工业是有效地安排城镇人口就业，从而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主要途径。

2.促进了城乡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

工业发展改变了平望镇的职业结构。原来，在平望镇的职业结构中，商业从业人员占的比重最大，现在则是工业企业职工占的比重最大。1953年，有商业从业人员1,139人，占当时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65.1%。1982年，有商业从业人员1,351人，虽然比1953年增加了212人，但只占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20.9%。而三十年来，工业企业职工由1953年的359人增加到3,164人，增加了7.8倍，占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则由20.5%上升为49.2%，职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化的趋向。

工业发展还使农村职业结构也发生有意义的变化。1982年平望乡共有劳动力27,104人，其中务农的16,498人，非农业劳动力10,906人。在非农业劳动力中，有务工人员4,701人，占43.2%。它显示出在农村职业结构的变化中，出现了一种"离土不离乡"的务工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趋向。

工业发展还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平望镇的流动，从而改变了平望地区城乡社会结构。从历史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趋向。但是解放初期平望镇工业不发达，虽然有一些手工业作坊，但是，容纳量有限，破产的农民想到镇上谋个职业，那是很难很难的。七十年代末，工业发展了，镇上劳动力资源感到不足，农民工开始多起来。1982年平望镇国营、集体企业招用的各种农民工1,217人。此外，设在镇区内的平望乡社办厂还有888个务工社员。

3.改善了平望镇的家庭关系，妇女、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有提高。

解放初期，平望镇妇女就业的很少，大部分在家做家务、带小孩，或出去当奶妈、帮人。直到1963年，26～55岁妇女中无业人数仍在700人以上。这就使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工业发展后，1982年县办、镇办厂中女工达1,215人，占劳动年龄组（18～55岁）女性的49.7%。妇女男子同工同酬，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都随之改善。平望镇七个街道的居委会干部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现在婆媳关系明显好转的主要原因是妇女参加了工作，有了收入。由于妇女普遍参加工作，平望镇出现了大批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都出门工作，下班后共同忙家务，尽管分工不同，但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劳动却是被普遍接受了。

随着工业的发展，平望镇享受退休待遇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据1982年9月统计，平望镇有退休人员710人，占平望镇60岁以上

男性、55岁以上女性总数1,038人的68.4%，其中退休工人379人，过去赡养老人往往成为影响家庭中两代人关系及年轻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近半数老年人自己按月拿退休金，生活上有了保证，这样，在家庭中，为赡养老人而引起纠纷的事，大为减少。

4.改善了平望镇居民生活。

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现在平望镇在册人口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人是工人，平均每户1.2个工人。充分就业带来收入稳定，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据1983年3月抽样测算，平望镇人均收入每月32.5元。现在平望镇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有了电视机。看电视已成为人们享受精神文化生活、了解国内外大事，学习更为先进的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途径。关于平望镇居民文化生活情况，已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各工厂兴建的职工宿舍楼，已成片地出现在平望镇公路两边。据统计，各工厂共建职工住宅30,338平方米，646户工人住进厂里兴建的宿舍，占全镇总户数2,772户的23%。按照现代城市住宅标准设计的住宅群，整齐、舒适、卫生，与旧镇区低矮、破旧、设备差的老式居民住宅，形成鲜明对比，人们深深感到这是兴办工业所结出来的幸福之果。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小城镇的工业，从宏观上看，为分散大中城市人口压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提供了一个容量很大的“蓄水池”，是改变城乡人口结构，实现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平望镇这样的小城镇的发展看，发展工业是增加小城镇人口，促进小城镇繁荣的主要动力，是改变小城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催化剂。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城镇的兴衰主要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今天，没有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小城镇的繁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一个农村区域性商品流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张雨林　沈关宝

在历史上，“镇”作为地方的名称，除了指军政官员和衙门的所在地（如唐朝的方镇，明朝的镇抚司等）外，就是指“商业繁盛之处”①。“集”则是“市场之通称”②。众多的小城镇，或称集镇，就是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作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我国广大农村正在经历着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的过程，流通渠道正在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加以疏理。在这个进程中，小城镇的地位如何？发展前景怎样？如何布局才比较适合商品流通的需要？这次我们通过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的调查，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

吴江县北靠苏州，南与浙江杭嘉湖地区接壤。这一带地方，是长江三角洲上富庶的水网地区之一，早在唐、宋朝代，丝织业已居全国首位，且年有稻米外运。明代以后，又成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手工棉织业和丝织业都很发达。明朝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就是从苏州附近的浏河镇出发的，从此沟通了明朝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关系。明代吴江商人沈秀（沈万三）号称“富甲天下”，据《苏州府志》记载：“相传由通番而

①②均见《中华大字典》。

得”，意即他是在与国外通商中发了大财。由于商品生产和内外贸易的发达，不仅使苏州一度成为江南的第一大城市，而且在苏州周围也出现了许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我们所调查的吴江县震泽镇，就是其中之一。

距苏州市约60公里的震泽镇，位于吴江县的西南片，在镇周围直径约10公里的范围内，农副业生产的情况大致相同，密如蛛网的小河小港把它们联成一个小的经济区域。贯穿境内的頔（音荻）塘河汇入纵贯吴江县的京杭大运河，使这里的货物顺畅输往南北各地，震泽镇因而成为这一带的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我们在考察震泽镇的历史时看到这样的记载：这里在“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至清乾隆年间，这里“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①，说明震泽镇就是从明代以后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这一带的农副产品，以稻米和蚕丝为主。蚕桑生产以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为最盛期，年产干茧20,000担（每担100市斤），以后主要由于日本生丝和“人造丝”的竞争，蚕桑生产日渐萎缩，至1937年，年产量下降到5,000担。日寇占领江浙一带以后，首先炸毁了在1929年创办的、当时震泽镇上唯一的机器工业——震丰缫丝厂，并切断我海外贸易，这时，丝价一落千丈，农民不得不忍痛毁桑种粮，至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年产干茧仅2,000担，只相当于最盛时期的十分之一。战后虽有些恢复，但进展不大。

与农村蚕桑生产相对应，震泽镇有五、六种与蚕桑直接有关的商业和手工业。如丝行、经坊以及专营丝下脚料的收购商、用茧衣作原料的丝棉手工业、桑干柴行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丝行和经坊。按照习惯的称谓，农民在家里缫出的丝叫“土丝”或“乡丝”，以有别于用机器缫出的“厂丝”。震泽镇上有大小20多家收购土丝

---

①《震泽县志》（清乾隆十一年编撰）。

的乡丝行。乡丝行收购土丝以后，大部分转手卖到镇上的经坊，小部分卖给绸厂和绸庄。经坊将购进的土丝发放给四乡农户并丝成经，农户把加工好的经交回经坊，领取一定的“工缴费”（即加工费）。经坊再将经发给上海的货栈，经过洋行、买办出口。经坊的这种经营方式，是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式。二十年代丝经行业最盛时，市河里丝船塞江，镇上“经箱”云集，据有人粗略估算，仅四乡农民每年做经所得的加工费就有50～100万光洋。以后丝经减少，市面日益萧条，但丝经行业仍然是市场贸易的主干。

其次是稻米。镇上有一系列的商业和手工业行业与稻米贸易有关。如米行、糟坊、酱园等。解放以前，不算那些为数很多的米摊头，比较象样的米行就有十几家，其中兼营碾米的有 6 家。收成好的年头，最大的一家米行每天碾出的大米达1,300担。米行兴盛，糟坊也跟着兴旺起来。据酿酒业的老人回忆，丰收年景，震泽镇及其附近每天（指冬季）有四、五万斤粮食用来酿酒。米行、糟坊还带动了一大批商业、服务性行业。米行的砻糠、细糠，糟坊的酒糟，都是镇上批量很大的流转商品。

通过丝、经、米等农副产品和几千种工业、手工业品的流通，上海、苏州等城市的资本家与镇上的大小老板们以及乡村里的农民发生了经济联系。在三者之间，还有它的中间环节，大致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是航船。航船将乡村的农副产品运到镇上，又将镇上的工业、手工业品带回农村。航船老板既是农民的商务代理人，又是镇上商业的经纪人。第二层是坐庄、跑街先生和其他辅助人员。坐庄是常驻上海、苏州等地的本地生意人，他们用写“号信”的办法每天将行情传达到震泽；跑街先生是带着城市的行情到镇上来收购农副产品和推销工业产品的掮客。他们的活动使城乡之间形成一个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经济网络。经过这个网络，农民做的丝、经飘洋过海，而洋货也就充斥于震泽了。农

民需要这个网络，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洋老板、土老板们需要这个网络，是为了从中进行剥削。米行老板们不满足于资本主义剥削，青黄不接的时候还用“周转米”、“周斗米”、“买青苗”等形式，向农民发放高利贷。“周转米”的利息是二至五分，“周斗米”则是借一担还两担，剥削量极重。

层层剥削使得农村凋敝。解放前的几年，国统区又恶性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震泽镇原有的两家私人银行和钱庄相继倒闭，经坊、米行以及其他行业的大老板们也抽走资金从事投机活动。市场交易以大米作为计价的尺度，有的甚至以米易物，市不成市，经济萧条到了极点。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沉重打击了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至1950年，物价已基本稳定。同年，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开通了蚕丝的海外市场。政府大力提倡发展蚕桑、粮食和其他农副业生产。1951年8月吴江县召开土产会议，进一步发展城乡贸易。震泽镇的市场有了初步恢复。1950年12月，进行了第一次工商登记，登记汇总的情况如下页表1：

表1所列数字反映了解放前后一段时期震泽商业的大体面貌。

二

全国解放以后，流通领域立即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变革的实质在于：逐步切断资本家与农民的经济联系，代之以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农民的经济联系。

如前所述，在解放以前，丝经主要是通过上海的买办资本对外出口的。人民解放战争扫掉了“洋行”，切断了买办资本与农村的联系，代之而兴的是国家成立的“中国丝绸公司”，公司委托震泽区供销社收购蚕茧，到苏州、无锡加工。原来的丝经行业资本

表1　　震泽镇私营工商业情况汇总表　　1952.5

行业类别	户数			从业人数	资金总额（旧币万元）	行业数	主要行业名称
	独资	合伙	总计				
总　计	560	101	661	1,997	714,196		
手工业	14	14	28	224	220,526	4	碾米、酿造、纺经(注)、织布
小手工业	146	1	147	266	22,193	22	竹、木、石、铁、铜、锡、弹花等
商　业	258	73	331	1,146	444,259	33	米、丝、毛皮及其他各业
饮食业	95	4	99	196	13,526	5	茶馆、面馆、菜馆
服务业	42	3	45	121	12,907	8	洗染、理发、旅馆、浴室、书场
交通运输	5	6	11	24	785	1	轮船码头

注：①本表所列为有证座商，不包括摊贩。
②"经坊"汇总到手工业一类，实际上带有商业性质。

逐步向上海、苏州或本镇的其他行业转移。震泽镇原来最大的一家经行名叫"隆昌震"的，转移到苏州办了一家丝织厂；最小的一家经行名叫"陆记"的，在本镇办了一个印刷厂；更多的丝经资本转移到了上海、苏州经营其他行业。根据现有统计资料，震泽镇的私营丝经行业，到1954年已经全部没有了。

米行资本与地主经济关系密切，一些米行老板本身就是地主而兼营工商业的。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时，对镇上地主兼营的米行，进行了改造。政府通过"工商联"帮助一些较小的米店组成"粮米联营处"，维持市场供销，大量的购销则由"中国粮油公司"委托供销社以及自行设点办理。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按照政策，

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私商仍可以经营“代理店”。但是在震泽镇，竟然没有一家私商愿意接受代理业务。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全部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经营，私人资本完全退出了粮食市场。

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商业的性质进一步发生了根本变化。震泽镇对私改造后的情况是：公私合营企业68家，合作商店139家，手工业社103家，个体户22家，合计332家。改革是必要和成功的，但由于当时合并过多，带来了商店规模偏大、网点收缩过度的缺点。那时的商业网点与1951年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

在改革的过程中，商业的经济成分和城乡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商业人员有所减少，营业额比1949年刚解放时增长两倍，与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1952年相比，基本上保持稳定，只略有起伏。详见下页表2。

对私改造之后，商业本该出现繁荣景象，但由于不久就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都出现了重大曲折。1958年仓促地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取消了镇的编制，镇的商业机构，除国营批发机构以外都划归公社供销部管理，与周围其他公社的商业处于同等地位，减弱了镇作为区域流通中心的作用。接着进一步合并商业机构，把小商贩也并入合作商店。1959年再次合并，网点进一步缩减；至1961年，全镇只有商业网点106个，比1956年又减少了一半。在“大跃进”中，还组织大批商业人员弃商务工，供销社保存的当时的汇报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批人员参加炼钢”，“在很短时间内商办79个厂”，“百货合营商店生产纱罩1,734打，供应农村大兵团作战”，“烟纸油酱等10个单位办小肥皂厂”，“抽出92人到商外办厂”等等。这样减少网点，削减人员，商业自然无法振兴。1961年开始调整商业体制，原有的合作商店规模过大的，适当划小核算单位，增设网点。1962年镇与公社分开，重新建立了县属镇的编制。此后不久，镇上设立了国营

表 2　　单位：人，元（币改前金额折成币改后金额计算）

年份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商业饮食服务业全年平均人数	1,489	1,751	1,821	1,825	1,667	1,514	1,489	1,550	1,162
总营业额	2,997,329	6,373,950	6,579,828	8,730,906	9,063,285	8,552,634	7,308,785	6,812,474	6,501,093
%	100	212.7	219.5	291.3	302.4	285.6	243.8	227.3	216.9

百货等商店，形成了国营、供销社和合作商店三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商业体制。

比商业网点合并过多的影响更为长远的是流通渠道的单一化。“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商品全面紧俏，加上战争年代供给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流通渠道按行政体制设置，而不是按商品流通规律设置的现象。商业单位进货，只有上级公司一个头，别处进不了货，只好有啥进啥；农副产品销售，只有固定的收购点，别处不收。这使得流通领域发生了严重的阻塞。如本文第一节所说的，解放前流通领域存在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消，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那时在商品流通中形成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符合商品流转规律的流通渠道，却不应简单地处置，而应该加以改造和利用，在改造它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吸收它灵活合理的东西。过去，在一段时间内过于简单地处置这些问题，造成了我们工作的失误。后来对此虽曾作过一些小的调整，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

三

当前的商业改革，是在上面简述过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放宽了对资金、技术和劳力流动的政策，寇泽镇及周围农村的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疏通流通渠道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办在镇上的县属、镇属工业企业和周围公社的社队企业发展很快。寇泽镇现有工业企业24个，其中1979年以后投产的11个，约占企业总数的一半。这些工业的产值，1983年为5,506.85万元，比1978年的3,032.4万元增长81.6%。周围公社的社队企

业发展得更快。以紧贴震泽镇的震泽公社为例，1982年社队企业产值为2,626万元，比1978年的178万元增长4.5倍；1982年的利润为280.6万元，比1978年的利润111万元增长1.5倍。在1983年，以上几类工业都有新的发展。

（二）周围农村主要的商品性生产的产量、产值都有较大增长，震泽公社的情况如下表3：

表3

年　份	1978	1982	增长%
粮食和大豆	5,127.74(万斤)	5872.48（万斤）	14.5%
蚕　茧	4,708.72（担）	8,434.48（担）	79%
油　料	190.12（万斤）	409.89（万斤）	116%
生产队出售产品收入	400（万元）（注）	801.78（万元）	100%

注：生产队出售产品收入为1982年与1979年的比较。生产队出售产品的增长速度，大体上体现了农副业中商品性生产的发展速度。

再生产的过程，包括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生产是决定流通的，而流通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商品性生产的蓬勃发展，使得流通领域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对流通领域实行改革，纠正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发生的流通堵塞的状况，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在震泽，这方面的改革措施，有些是在党的政策引导下自觉实行的，有些是在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逼"出来的，上"引"下"逼"，使震泽镇的商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1. 多种经济形式的兴起。其中，除了原有的国营、供销社和集体商业都有新发展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经济形式：

(1) 公社商业。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公社商业还被当作"资本主义"受到批判的时候，由于社队工业的存在，又由于社

队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都没有纳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渠道，需要自找门路采购和推销，加上一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计划供应不足，也需要自行采购，因此，公社商业实际上已在冲破上述阻力而发展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条渠道进一步打开。党提倡农工商综合经营，因而加快了公社商业的发展速度。贾镇的震泽公社在1981年正式成立了“工业经理部”，1982年成立了“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各个社队办厂的购销业务更加活跃。如震泽公社的服装厂、针织厂，除经过县社队企业局“经理部”在安徽等地设点推销产品以外，还自行在苏州、湖州和震泽镇等地设摊销售。近年来，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国营商店也开始直接向他们进货。上海南京路的南洋衬衫商店就销售过震泽针织厂的产品。这个好的苗头，说明社队企业的产品已开始进入国营商业的流通渠道。

1983年是公社商业有较大发展的一年。公社的工业经理部在震泽镇正式开设了零售商店，销售社队企业产品和烟酒、糖果、糕点等副食品。公社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办了孵坊和蔬菜加工厂，收购种蛋、蔬菜，向专业户和重点户提供苗禽，直接向外地推销皮蛋、酱菜，并远销到吉林。公社商业正方兴未艾，来势很猛。

(2) 集市贸易。除公社商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以外，发展最快的还要数集市贸易。1978年，震泽镇集市贸易的成交额还只有144,800元，仅占全镇商品零售总额的1.5%，到了1982年，集市贸易的成交额已上升到3,790,391元，增长25倍之多，已占全镇商品零售总额的17%，成了全镇流通领域中的一条重要的补充渠道。上市商品的种类也今非昔比。1978年以前只有少量的蔬菜和水产品，现在则有粮食、油料、肉禽蛋、水产、蔬菜、水果等食用的农副产品；扁担、竹柄、毛竹、种子等生产资料；服装、针织品等工业品以及其他日用杂品。这就是说，集市贸易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农副产品小量交易的范围，向着包容更多商品的小商品市场转化。

到这里来买东西的，除了本镇居民和附近的农民以外，还有一些来自二、三十里以外的农村和集镇的小贩、来自上海、湖州、嘉兴等城市的商贩、过往的旅客和司机。在平时，上市的日平均约有1,000～2,000人次，逢各种节日时，日平均可达4,000～5,000人次。人流拥挤，摩肩擦背，连自行车都很难通过。为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投资28,000元，正在兴建面积1,035平方米塑料棚覆盖的交易场所，以便使集市贸易的条件进一步改善。

(3) 个体商户。商业、以及手工业、服务业的个体户，在对私改造时合并过多，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这本来是一个缺点，"大跃进"中又再次发展了本应纠正的东西，再一次地搞了合并，"文革"时期更不用说了，有些个体商户被当作闲散劳力，下放农村。到1972年，全镇只剩下个体商户40户，个体手工业和修理业28户，个体饮食服务业13户，合计81户。这样少的个体户，还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除，全部吸收到集体工商企业里去。至此，个体商业作为一条重要的补充渠道，被完全堵死了。新的个体商户是在近几年中发展起来的。虽然，个体户的发展遇到"左"的思想阻力较大，但它还是作为一种补充形式而发展着。1982年，镇上有证个体户43户，震泽镇和震泽公社合计204户个体户中，商业89户，手工业和修理业26户，饮食服务业34户，运输业48户。据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1982年个体商户营业额211,700元，占全镇商业零售额的1%。

这样，在流通领域，就形成了以国营和供销社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的结构，商业网点也随之增多。详见以下表4，表5，表6三表。

表6　　震泽镇、乡商业网点和从业人员变化表

年份	网点数	从业人员	备　　注
1978	130	1,114	
1982	308	1,555	整个集市贸易算一个网点，上市人数未计

表 4：

震泽镇商品总销售额比重分析表

单位：元

年度	国营商业		供销社		镇乡(震泽乡)集体商业		震泽公社商业		集市贸易		镇乡(震泽乡)个体商贩		合计
	金额	占销售总额的%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1978	33740520	76.6	7693010	17.5	2450964	5.6	0	0	144883	0.3	0	0	44029377
1982	53193925	69.5	11147614	14.6	7303621	9.5	927766	1.2	3790391	4.9	211700	0.3	76557017
82比79±%	+57.6	-7.1	+44.9	-2.9	+193	+3.9	/	+1.2	+2500	+4.6	/	+0.3	+73.9

注：①镇乡集体商业包括国营和供销社归口管理的合作商店、镇办商业、校办商业和镇上工厂开设的小卖部。

②工厂（包括社队企业）自行销售产品的金额均未计入。

③总销售额包括批发和零售。

表5　　震泽镇、乡商品零售额比重分析表　　单位：元

年度	国营商业		供销社		镇乡集体商业		震泽公社商业		集市贸易		镇乡个体商贩		合计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金额	占%	
1978	3895565	40.7	3089000	32.2	2450964	25.6	0	0	144883	1.5	0	0	9580412
1982	5545818	24.9	4474000	20.1	7303621	32.8	927766	4.2	3790391	17	211700	1	22253296
82比78±%	+42.4	−15.8	+44.8	−12.1	+198	+7.2	／	+4.2	+2500	+15.5	／	+1	+132.3

注：①本表说明同上表。

②在分析了商品销售总额之后，再来分析商品零售额，是因为在零售市场上。多种经济成分表现得更为明显。

2．增加渠道，减少环节，使商品流通开始活跃起来。渠道单一化、严重阻塞商品流通的现象，近年来逐步有所改变。现在的进货渠道主要有三条：(1)向上级批发站采购；(2)不经上级批发站，直接向附近大、中城市采购，少数商品也直接向远方城市采购；(3)不经过批发部门，直接向产地和工厂采购。销售渠道也开始灵活起来，既销当地，也向临近地区推销。许多农副产品，收购后直接供应城市零售商店和菜市场。搞得最活的是蔬菜、果品经营。现在已经完全放开手脚，自主地在全国范围内向产区选购商品。山东烟台的苹果，河南林县的柿饼，内蒙包头的葵花籽，浙江平湖的西瓜，都运到了震泽。这些商品除了在本地销售以外，还转批到临近市镇，如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震泽本地出产的蔬菜、酱菜、青熏豆等产品，以前，震泽的蔬果商店只和上海的两个菜场有业务联系，现在，上海已有24个菜场、1个酱场、1个奶牛场、4个其他商店经销震泽的产品。百货的经营也比较灵活。震泽距上海仅118公里，群众的消费心理都喜爱上海货。前些年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上海百货来不了，消费者很有意见。近年来，限制逐步放宽，除少数紧俏商品，如沪产三五牌台钟、胶鞋等，仍按计划经过省、县批发机构分配调拨外，其他都可以按照需要自行向上海选购。各零售商店还向其他城市选购商品，例如，广州出产的折叠伞，从批发系统来的每把售价11元，而益民综合商店直接从广州进货，每把售价9.70元。此外，零售和批发商店还和工厂挂钩，选购工厂完成计划外的产品。

在疏通流通渠道的过程中，1983年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县里几个批发公司，适应商品生产和城乡贸易的新形势，经上级公司批准，让设在震泽镇的几个批发站，享受县公司(三级站)的待遇，可以不经过县公司，直接到本省设在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徐州等地的二级站进货。这样做，减少了一个流通环节，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据震泽镇百货批发站估算，

商品流通速度可以加快一个星期到半个月，运输搬运费全年可节省2万元，还可以减少商品损耗。例如，从徐州采购洗衣粉，原来经过县三级站时，破碎率高达5—6%，现在震泽批发站直接向徐州采购，破碎率只有1%。另据人民银行震泽办事处统计，疏通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之后，100元销售额占用的流动资金和花费的流通费用均有所减少，商业利润则相应增加。详见下表7：

表7　　流通领域经济效益变化表

单位	资金占用率		流通费用率		销售利润率		资金利润率		备注
	1982年	1983年	1982年	1983年	1982年	1983年	1982年	1983年	
百货批发	23.14	16.93	2.92	2.71	2.68	3.78	11.59	22.36	
蔬果批发	9.92	6.37	5.05	3.30	3.69	3.64	63.90	86.39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批发	17.14	13.32	2.70	2.64	5.62	3.63	33.51	27.27	
医药批发	19.58	17.91	4.38	3.96	1.76	2.06	11.52	13.76	
烟糖批发	13.60	8.15	1.99	1.41	3.14	1.87	21.95	22.92	

注：①本表所列数字均为1982年和1983年前11个月的同期对比数字；

②资金占用率、流通费用率、销售利润率，指100元销售额占用的流动资金、花费的流通费用和获得的商业利润；资金利润率指100元流动资金获得的商业利润；

③本表明显地反映了占用资金和花费的流通费用减少和利润增加的趋势。个别不符合这一趋势的项目，是流通渠道以外的因素造成的，这里不一一作出解释。

3. 商品流通的过程，正由简单的购进销出，向着包括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在内的综合服务发展。现在，这种综合服务，主要是由设在镇上的公社经济联合会组织的。经联会所属的多种经营服务公司正在大力推行这项工作。这个公司新近办起的哺坊，收购种蛋，孵育和供应苗禽，对重点养禽户

进行技术指导，同时收购鸭蛋，加工成皮蛋向外地推销。这个公司还与农业合作社协商，初步落实了1984年种植大头菜和瓜类的计划，拟由公司所办的蔬菜加工厂和供销社的土副站共同收购大头菜进行加工，并与上海、苏州、嘉兴等地联系，订下了销售瓜类5万担的产销合同。这种综合服务业务，正在向国营、供销社等其他商业系统发展。

与历史作比较，震泽的商业活动无论是它的内容、性质和活力，都是旧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与当前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商品流通网络还不够健全。因此，这里应当提出如何建立小城镇的流通网络，自觉地适应和促进农村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四

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是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在流通领域，就是要用最少的流通费用，最短的流通时间，使生产者实现其产品的价值，使消费者得到应有的使用价值。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就要有一个合理的流通网络。这里所说的流通网络，包括商品流转的渠道，信息集中和传播的渠道和手段，必要的设施如交通、仓库，交换的场所等等。在农村，上面说的这些内容，除了交通道路、邮电线路以外，主要集中在小城镇里。因此，大大小小彼此密切联系的小城镇，就成了农村流通网络的主要之点。

陈云同志讲了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工业品从大城市到乡村不是直接下去的，而是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从中等城市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再到初级市场。"(1) 陈云同志讲的就是流通网络。当

(1)《陈云文稿选编》第155页。

然，陈云同志是就全国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在距大中城市不远的地区，大中城市自然直接面对初级市场，而不必再经过小城市。农副产品进城的路子正好与此相反，即从农村到初级市场，再到大中小城市。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农村初级市场应该怎样布局才是合理的？震泽镇商品流通的历史和当前体制改革的趋势告诉我们，合理的渠道，一不是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各个初级市场都要经过一个中心（例如县城），由一个中心面对大中小城市；二不是所有初级市场平行并列，都直接面对城市。而是按照经济区域和交通等条件，形成若干个流通中心。它们联系着周围的初级市场，同时与大中小城市发生密切的联系。例如震泽镇，它就联系着周围七个乡（公社）的小集镇。在吴江全县，人们的意见，应有四个这样的区域性流通中心，一是位于全县中心地带的平望镇，一是地处北部地区的松陵镇，还有东南片的庐墟镇和西南片的震泽镇。主要由这四个区域性的流通中心与城市发生联系。这样布局，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较高。

为什么应该这样？

如果一个县只有一个中心，即一个口子与大中城市发生联系，那就会象过去那样，所有工业品都按照行政系统经过县城“三级站”调拨、分配，发生流通阻滞和效益低下的现象。联系吴江县的情况谈这个问题，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上海的工业品，经过离上海较远的县城松陵，流转到距上海较近的平望、庐墟，或者流转到距离虽然相差不多但可直达运输的震泽，自然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费用。苏州的商品运到震泽等地，虽然必须经过松陵，但却没有必要中途“下车”。此外，县“三级站”也很难照顾到全县各地不同的需求，如果只有这一个中心，就很难避免需要和供应脱节的现象，物资部分货物盈仓，需要者却得不到对路的货物，同样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降低经济效益。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每一个乡（公社）的供销部门都直接面对

城市，那么，由于乡(公社)的范围太小，流通资金不足，流通设备不够，而且每次进货批量过小，勉强从城市进货，效益同样不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震泽周围几个公社的供销部门，宁愿根据当地需要到震泽采购，而一般不直接到苏州、上海。他们需要的小批量商品，只要打个电话，震泽镇的批发部门就通过来往船只给他们发去了。这对他们是最经济的办法。

人们在商品流通的实践中选择的方案，就是象震泽镇这样，在一定范围的经济区内，在地位比较适中，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形成区域性的流通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有若干个乡(公社)的中心，公社是合作经济的实体，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因此一个公社必然形成一个以至几个流通和综合服务的中心。公社以下又有村(农业合作社)的流通和综合服务的中心。这样，在一个经济区域里，就形成了一个层次有序的网络。现在看来，这样的网络是比较符合农村商品流通的需要的。

就多数的情况来说，农村区域性的流通中心与农村区域性的工业中心是一致的。农村工业的适当集中，可以节省能源、交通、仓库、给水、排污方面的投资。农村工业的聚集之处，一般是那些流通方便的地方。同时，由于务工人口的相对集中和工业原材料、废品的大量周转，又势必促进商品流通的发展。流通有一个层次有序的网络，工业生产力也有不同的层次，从手工业、简单的加工业到比较象样的机器工业，它们的分布大体上与不同层次的流通网络相配合。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文化教育和其他服务事业的发展，使不同层次的工商业中心逐步成为农村不同层次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不是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自发的市场经济。从这点出发，联系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应该提出：在农村，对商品流通进行计划指导的基点应该放在哪里？过去是按行政体制放在县一级，而现在，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大量的流

通活动集中在农村区域性的流通中心。这就产生了矛盾，象震泽镇商业部门的同志反映的那样，在这样的商业体制下，“看得到的(镇政府和镇的商业机构)，管不着(无权管理)；管得着的(县工商行政部门)，又看不到”，不利于对市场的管理。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似乎可以考虑，以农村区域性流通中心作为对农村市场进行管理的基点，加强它的协调管理机构，而以县作为计划综合平衡和余缺调剂的单位，这涉及农村商业体制的改革，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震泽镇作为农村区域性流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加强，而当前流通领域的各种设施(包括运输条件、仓库设备、搬运的组织和设备等)与它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例如，这里的汽车站只是一个一般的农村车站，没有“零担货房”，不办理商品托运的手续，外地托运来的商品，都要到相距16公里的平望车站提取；上海——湖州的轮船也不在这里装卸货物。此外，仓容小，贮藏设备落后，这些都限制了震泽镇作为农村区域性流通中心的作用的发挥。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这是我们对震泽镇进行初步考察之后得到的体会。

一九八四年一月

交通运输和平望镇的发展

—— 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研究

居福田　吴大声

将小城镇分类，就其所起作用和性质的相似性，考察它们职能结构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探索不同类型小城镇的建设模式，研究它们各自形成的条件和发展的规律；也有助于贯彻"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实地考察吴江县各个镇的职能结构的特点，该县七个县属镇，可以划分为行政中心、丝绸工业基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交通枢纽、文化古镇等五种类型。本文通过对吴江县平望镇的调查，剖析这一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的职能结构和发展变化的特点，并试图对这一类型小城镇的形成条件和发展规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平望镇交通枢纽的形成

吴江县平望镇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腹部，位于苏州、嘉兴、湖州三角地带的吴江县中部。它北距苏州39公里，东南距嘉兴32公里，西南距湖州59公里，东距上海99公里。它是苏嘉公路和沪宣公路（从上海经湖州至安徽宣城）的交接点，又是京杭大运河与太浦河（联结太湖和黄浦江的运河）的交汇处。穿越平望镇的两条省际公路分别与通向吴江县内7个镇、23个乡的13条公路联结，形成了吴江县内以平望镇为中心的公路网。流经平望镇的太

浦河、京杭大运河及其在平望以南的三条分支航道，分别与县内11条航道联结，形成了以平望镇为中心的航道网。平望镇的这一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使它不仅成为吴江县水陆交通的中心，而且成为联结江、浙、皖、沪三省一市的交通枢纽。

平望从一个荒僻的原始村落发展成为现代交通枢纽，经历了大约近两千年的历史。它的形成和发展，盛衰与兴败，都和它处于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平望有历史记载始于西汉建平年间(公元前6～前3年)，但当时它只不过是一个"居民鲜少"的村落，发展成为小集镇，是在隋唐期间开辟了途经平望、纵贯江南水乡的江南运河以及修筑了由苏州至嘉兴的驿道之后。据《平望志》记载：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在平望建立了水马驿站，后又"置驿亭于堤旁，居民稍集，往来始有憩宿之所"。此后，平望才逐渐发展成为小集镇。

由于平望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平时易兴，战时易毁，已几经兴毁。平望设镇建制是在北宋熙宁年间（距今九百多年)。当时，平望已是"万商云集，物资充溢"的集镇。南宋建炎年间，平望是"三辅要冲"，"以重臣镇之"。"元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有平江路，筑城于平望下塘"，后被常遇春"毁其城为镇"。明初，天下太平，平望"百货凑集，如小邑然"。弘治年间前后，平望成为农产品集散地，"千艘百舸，远近毕集"。明嘉靖年间，平望遭受倭寇袭击，商业衰落。清雍正年间，平望又重新繁荣，"物产毕陈，商贾辐辏"。咸丰庚申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平望镇受到毁坏。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平望多次受到兵灾。公元1933～1936年间，苏嘉公路与平(望)南(浔)公路先后筑成通车，南北交通更加方便，平望镇一度又兴旺起来，市场繁荣，据国民党《吴江县政》记载：1935年，平望就有1,093户，5,262人。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平望被日寇烧毁大半。抗日胜利以后，平望又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骚扰破坏，市镇冷落萧条。

解放前夕，人口下降至4,100人，解放后才逐渐复苏。

解放前，平望镇虽然地处交通要冲，但它仅仅是一个有一条运河和两条过境公路的集镇，还没有形成交通枢纽。平望镇成为交通枢纽，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最后形成的。1961～1964年，吴江县开通了太浦河，既沟通了上海、江苏、浙江之间的航道干线，又沟通了吴江县内许多航道支线，使平望成为县内航道网的中心。1965～1966年，吴江县又和上海市共同兴筑了青(浦)平(望)公路，使它和从平望通向湖州的公路相接，再向西连接安徽宣城，从而缩短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之间的运输距离，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年多来，吴江县大力兴筑县内公路，先后筑成县道（三、四级公路）九条，加上原有的夏家斗到八都的一条公路，通车里程达79.12公里，这十条县道与三条公路干线联结，初步形成了县内公路网。至此，平望镇才成为吴江县水陆交通中心，成为联结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水陆交通枢纽。

平望镇水陆交通枢纽的特点是：

（一）水陆交通有省际、县内、片内(平望镇周围的三个乡)三个层次的线路。

（二）过境车船流量大。汽车：据统计，平均每天有2,000辆次。每天以24小时计算，不到一分钟即有一辆过境车辆。船队：平均每天经过平望的有300个队次。

（三）货运中转量大。货运的中转量约占全县货运量的30%以上。从外地运到吴江县的石油、木材、毛竹、棉花、棉布、食糖、盐等大宗物资，先全部运到平望，然后再转运各乡、镇。从外地运到吴江县的煤炭、化肥、农药、杂品、百货等物资，也是大部分先运到平望，然后转运各地。

（四）客运量大。每天从平望车站始发的汽车有55班次，途

经平望在平望车站停靠上客下客的有119班次，合计为174个班次。每天营运时间12小时，平均每4分多钟即有一辆客车进出。日平均客运量2,700人次，日最大客运量达6,100人次。年客运量985,500人次，占全县年客运量的83.7%。此外，还有通上海、杭州、嘉兴、湖州、苏州等地的轮船16个班次，日客运量300人次。

平望镇职能结构发展变化的特点

随着平望镇逐步形成为交通枢纽，它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结构也起了显著的变化。它已从那种与农村地区性自给半自给经济基本相适应的，以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为主的集镇，逐步发展成为以农村为基础，和大城市有密切联系的，以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的工业商业并举的城镇。

一、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一) 平望镇工业的特点

1. 县里利用平望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运输方便的条件，将运输量大的工厂设在平望。如化肥厂、水泥制品厂、房屋建筑构件厂等工厂，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量都较大，年运输量合计13.5万吨。这几家厂的厂址，都设在平望镇面临河道的公路旁边。

2. 平望镇的现代工业，是在平望和上海市之间有了直通航道和直达公路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1969年以前，平望镇的工业以手工业为主，主要生产小农具和生活用品。全镇有木业、铁业、竹伞、弹花、制绳、纽扣、白铁、皮革、缝纫等八个手工业合作社和农机厂、面粉厂等两个小型工厂。从1949年到1968年的这二十年内，平望镇工业生产发展很缓慢。但1964年太浦河通航，紧接着1967年青平公路通车，加强了平望和上海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平望镇现代工业的发展。在1969～1975年这六年内，除了

新建化肥厂、房屋建筑构件厂等全民所有制工厂外，原有的八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也先后转产，扩大改组为玻璃钢厂、合成化工厂、灯头厂、汽车配件厂、皮革二厂、服装厂、先锋农具厂、铁制农具厂等县属集体所有制工厂，生产为城市工业配套的产品和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高档日用品和服装等。在这期间，还发展了镇办工业和社办工业，先后办了八个镇办工厂和十二个社办工厂。以上各类工厂的产值1982年已达5,736.77万元。全镇1982年工业总产值比1969年增加542.28%。

3．平望镇的工厂企业和上海市的关系较为密切，无论在产供销和市场信息、技术援助等方面，都得到上海市的支持。在上述各方面的互相联系和合作的方式有如下八种：

（1）联营：吴江农机厂和上海缝纫机三厂从1981年起联营，吴江农机厂改名为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吴江农机厂投资55.6%，上海缝纫机三厂投资44.4%，利润对半分，产、供、销全部纳入上海计划渠道。

（2）设计产品：如上海化工设计院为平望吴江玻璃钢厂设计产品，并提供图纸，进行技术援助。

（3）加工半成品：平望镇丝织厂生产的化纤布，由上海织袜厂印染。

（4）接受订货：平望新跃玻璃钢厂接受上海儿童用品商店订货，为北京儿童活动中心生产玻璃钢游泳池等。

（5）生产配件：平望一些工厂为上海一些工厂生产配套产品。

（6）提供原料：平望镇丝织厂的原料（涤纶丝），全部由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提供。

（7）包销：平望皮革二厂生产的高档羊皮夹克衫由上海皮毛服装商店包销。

（8）经销：平望合成化工厂生产的有机玻璃纽扣，由上海大

三组加商店经销。平望乡酒厂生产的加饭酒，由上海改装后，进入上海市区销售。

（二）平望镇商业的特点

1．商品批发量大。随着平望镇逐渐形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吴江县有关部门在平望镇陆续建立了许多商品中转仓库。平望镇现有13个仓库，其中8个是县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的商品中转仓库。中转仓库之多，是全县各大镇无法相比的。从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等省市运到吴江县的大宗物资和主要商品都先运到平望，然后转运各地。据统计，1982年，平望镇各个批发站所经营的石油、煤炭、木材、水泥、玻璃、毛竹、化肥、农药、棉花、棉布、烟、糖、盐、果品、杂品等二十类大宗物资和商品的批发金额达16,738.21万元。占全县同类物资、商品批发总金额的31.45％。商品批发量居全县各大镇的第一位。

2．社会商品零售额与批发量比较，相对地较少。1982年，平望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84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29%，低于震泽镇（震泽镇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县11.03%）。平望镇社会商品零售额较小的主要原因是：

(1) 乡脚腹地小。平望镇的乡脚腹地只有平望、梅堰、横扇三个乡。而震泽是吴江县西南片之首镇，在它的周围有震泽、南麻、铜罗、青云、桃源、七都、八都、庙港等八个乡作为它的“乡脚”。

(2) 购买力外流。平望交通发达，到上海很方便，每天有9班汽车，3个小时就到。这里的人眼睛向东看，受上海的影响较大，群众的消费心理喜欢上海货，习惯到上海买东西。当地群众生活所需的床上用品、衣料、服装、高级糖果、香烟和电视机、收录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电扇等耐用消费品，购自上海的，占相当比重。我们抽样调查了250个已婚青年购买结婚用品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类别	购货人数合计	购货地点和人数								
		地点	人数	%	地点	人数	%	地点	人数	%
床上用品	250	上海	125	50	平望	93	37.2	其他城镇	32	12.8
衣料、服装	250	上海	128	51.2	平望	85	34	其他城镇	37	14.8
耐用消费品	179	上海	111	62	平望	32	17.9	其他城镇	36	20.1
糖果、烟酒	250	上海	125	50	平望	111	44.4	其他城镇	14	5.6

从表中可以看出，到上海购买各类结婚用品的人，均占总数的50%以上。在平望购买各类结婚用品的人，所占比重却较小。这说明平望镇有很大一部分购买力外流了。但正因为平望是个交通城镇，流动人口较多，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有很大一部分商品又是被外地人买去的。有流出，也有流进，所以它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仍能居全县七大镇的第二位。

3．集市贸易成交额大。1982年，平望镇集市贸易成交总额达439.2万元，占全县集市贸易成交总额的21.29%，居全县七大镇的首位。参加集市贸易的人包括下列三种对象：（1）来自镇周围各乡的农民，平均每天上市人数约有4,500人，摊点约400个；（2）来自平望镇郊八个大队的农村有证商贩29人；（3）来自外省、市、县的行商。据1982年12月1日到1983年2月28日三个月的统计，从外地到平望的行商，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黑龙江等13个省、市的88个县（市）（其中：江苏31个县（市）、浙江24个县、上海9个县、安徽11个县、其他省13个县）。上市的商品有粮食、油料、肉、禽、蛋、水产品、蔬菜、饲料、苗猪、苗禽、茶叶、果品、南

北货、农业生产资料、杂品、针织品、日用工业产品、废旧品等18类，其中苗猪来自昆山县和吴县东山等地，成交额约占集市成交总额的50%。在上市的商品中，据分析，销给本镇居民和平望乡农民的，水产品约占50%，苗猪约占20%，苗禽约占50%，蔬菜、果品、猪肉、家禽的绝大部分；其余的均为外地商贩或过往旅客购去。其中水产品、蛋品等多为商贩贩运去上海市。不少商贩用"轻骑"作运输工具，从事贩运活动。苗猪多数贩往南通、如皋、海安、盐城、建湖、泰兴和浙江省的金华、东阳等地。平望镇集市贸易上市商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来自外省、市、县的商贩之多，范围之广，说明了平望镇的集市贸易，已经超越了一般集镇的农村地区性的集市贸易界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平望镇和外省、市、县经济上的联系程度，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平望镇作为联结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水陆交通枢纽的功能。

（三）平望运输业的特点

1. 货运从以短距离小批量为主，转变为长途运输大宗物资。1969年以前，平望镇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从外地运进的原材料不多，产品以在本县本地销售为主，货运主要是县内小批量物资的短距离运输。1970年以后，平望镇发展了现代工业，用煤量急增。工业用煤从每年1,500吨左右增加到每年10万吨以上。同时，如上所述，县里有关部门先后在平望镇建了八个商品物资中转仓库，运至吴江的大批物资要经平望中转。因此，平望镇货物吞吐量大幅度增长。从1963年的12万吨上升到1982年的90万吨，增加了6.5倍。货物中转量从解放初期的5,000吨，上升到1982年的37万吨，增加了73倍。与此相适应，运输部门的货运，就从以短距离小批量为主，转变为长途运输大宗物资。例如，原来以经营县内货运为主的平望运输社，从1970年以来，它的机动船队常年往返于平望和上海之间，从平望运大米、建材等大宗物资往上海，

从上海运煤炭、石油、化肥等大宗物资回平望。1982年的货运量比1970年以前增加50%，货运周转量比1970年前增加一倍多，运距从70公里增加到115公里。

2．附近农村运输力量大发展，弥补了平望镇上运输力量的不足。197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频繁，货运量急增，平望镇的运输力量也有了发展。1970年以后，平望运输社和航船社全部改用机动船队运货，淘汰了木帆船。现在这两个运输单位，合计有机动船18艘/610马力，拖驳68艘/2,418.9吨。平望镇装卸社1972年以后，也全部改用机械装卸，装卸量从1972年的30万吨，增加到1982年的43.72万吨，增加45.73%。然而，这三个单位的职工人数都没有增加，装卸社1971年有职工114人，1982年仍是114人。运输社1973年有职工301人，1982年257人，反而减少了44人。平望镇缺少船运工人和装卸工，招工没有人肯干，一些待业青年不愿当水手和装卸工。尽管用机动船队运输和用机械装卸，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货运量和吞吐量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货物运输和装卸力量仍显得很不足。但近几年来，农村运输力量异军突起，有了很大发展。1979年以来，平望乡搞农副工运综合经营，发展了运输业。现该乡有机动船124艘，其中货运机动船95艘/1,140马力，拖驳275艘/2,100吨，从事运输的劳动力有1,100人，以在县内短距离运输粮食、化肥、建材为主，有时也到上海和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运货。1982年货运量总计为24万吨，略少于平望两个运输社的货运量之和。同时，平望乡还组织了装卸服务站，有专业装卸工110人，仅比平望镇装卸社少4人。他们用杠棒和绳索作工具搞装卸，主要为镇上各工厂企业装卸小批量物资和体积大的笨重物资。装卸任务大时，就请常到镇上做杂工的农民一起干。这批杂工，约有2,000人左右，都是平望镇郊周围八个大队的农民，镇上有装卸任务或其他杂活就到镇上干，没有任

务就在家种田，一般每人每月有三、四天时间在镇上从事装卸劳动。1982年，平望乡装卸服务站和常在镇上做杂工的农民工，共计装卸各类物资16万吨，比平望镇装卸社的装卸量还多2万多吨。平望乡发展运输和装卸队伍，不仅弥补了平望镇货物运输和装卸力量的不足，而且也为农村开辟了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门路。工农兼搞运输表明，小城镇及其附近农村从事运输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3. 零星物资由习惯以水运为主，逐渐改用汽车运输。现在，平望镇工厂企业单位共有各种型号的自备载重汽车36辆（总吨位129吨），装运本单位的原材料和产品。其好处是：（1）能及时运回本厂所需的原材料，保证正常生产；（2）能及时把产品运到订货单位或经销单位，以守信用。同时，也能加速资金周转。

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一）职业结构的变化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平望镇的职业结构，也从原来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其他职业从业人员占比重很小）基本上是单一性的职业结构，变成现在具有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教卫生事业等多种职业结构。平望镇职业结构的变化见下页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1953年，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占65.1%，工业从业人员，当时主要是手工业者，仅占20.5%，其他职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很小。这反映出当时的平望镇是一个以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为主的集镇。到1982年，工业从业人员已占49%，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占11%。商业服务业人员虽比1953年增加了212人，但占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却只有20.9%。这反映出平望镇的性质和职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成为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为主的新型小城镇。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表1：　　平望镇职业结构变化表

职业类别	1953		1957		1963		1982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从业人员总数	1750	100	2008	100	2916	100	6438	100
工　　业	359	20.5	451	22.5	735	25.2	3164	49.2
交通运输	25	1.5	180	9	548	18.8	709	11
商业服务业	1139	65.1	998	49.7	873	30	1351	20.9
机关行政	90	5.1	119	5.9	161	5.5	177	2.7
文　　教	46	2.6	65	3.2	68	2.3	184	2.9
卫　　生	54	3.1	83	4.1	81	2.8	323	5
渔　　业	37	2.1	112	5.6	450	15.4	132	2.1
建　　筑							97	1.5
其　　他							301	4.7
备　　注	从业人员中，不包括农民工。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适应的。平望镇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是这样：

1．人口机械增长大于自然增长。平望镇1949年人口总数为4,100人，1957年增至6,046人，增加47.46%。但从1957年到1970年，人口增加很少，这十三年中净增人口只有24人。主要原因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忽视小城镇的作用，对小城镇采取限制、削弱的政策，大批人口下放农村，或流向大、中城市，直到1970年以后，人口才又增长较多。这十二年中人口变动情况如下表2：

表2： 平望镇1970年～1981年人口变动情况统计表

年份	年末人口总数	人口自然变动				人口机械变动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人	自然增长率‰	迁入	迁出	机械增长人	机械增长率‰
1970	6070								
1971	6141	73	41	32	5.21	268	229	39	6.09
1972	6402	55	54	1	0.16	515	255	260	40.61
1973	6720	52	50	2	0.29	505	189	316	47.02
1974	6792	55	44	11	1.61	144	83	61	8.98
1975	6755	54	49	5	0.74	291	232	-41	-6.06
1976	7225	69	50	19	2.63	657	206	451	62.42
1977	7281	73	43	30	4.12	187	161	26	3.57
1978	7410	79	55	24	3.24	222	117	105	14.17
1979	8449	66	50	16	1.90	1396	373	1023	121.07
1980	8821	102	51	51	5.78	550	229	321	36.4
1981	9131	144	66	78	8.54	480	248	232	25.41

从上表可以看出，1970年至1981年，平望镇人口机械增长大于自然增长。这十二年内人口净增3,061人，其中自然增长占8.79%，机械增长占91.21%，人口机械增长多的原因是：

(1)1970年以来，平望镇工业发展很快，全民所有制和县属集体所有制的15个工厂在全县范围内招工，从外地迁入一部分人口。据统计，这些工厂先后从外镇外乡招收职工834人，加上国家先后分配来的中专以上毕业生57人，平望镇的县属工厂共计增加从外地来的职工891人，占31.9%。

（2）1970年以来，随着平望镇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先后有一部分职工从外地调到平望镇工作。这一部分调进来的职工和随同他们迁来的家属子女在内，合计533人，占19.1%。

（3）1970年以前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在1976年到1979年期间，先后回到镇上安排工作的有1,363人，占49%。

2．平望镇常住人口中，非在册人口比重较大。据1982年统计，平望镇在册人口9,353人，非在册人口5,480人。镇上常住人口14,833人（全镇常住人口＝在册人口＋非在册人口）。非在册人口占全镇常住人口36.94%，居吴江县七大镇之首。非在册人口的情况是这样：

农民工　2,595人　占47.35%

在建成区内的社办工业中的务工社员　888人　占16.2%

常住镇上的非城镇户口的职工家属　772人　占14.09%

非城镇户口的渔业大队渔民　625人　占11.41%

毗邻镇郊的农村插花户人口　410人　占7.48%

镇外学生住校和其他住镇人口　190人　占3.47%

全民和县属集体企业中的农民工（包括土地工、计划内临时工、计划外临时工），是不吃商品粮的工人，社办工厂中务工社员是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民，这两方面的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民工，两者合计3,483人，占非在册人口的63.55%，占全镇常住人口总数的23.43%，相当于全镇在册人口职工总数（6,438人）的54.1%，占全镇劳动人口总数的35.1%。在平望镇常住人口中有这么多的农民工，这反映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平望镇及其周围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趋向的日益明显，说明平望镇正在向着工农结合和镇乡结合的方向发展。

3．在平望镇的在册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较大，被抚养人口占的比重较小。在册人口中，劳动人口占68.83%，被抚养

人口占31.17%。劳动人口比重大，是一般新兴工业城镇的显著特点。平望镇由于生产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均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自1964年以来，先后有3,522人就业，使全镇职工人数由1963年的2,916人，增加到1982年的6,438人，增加54.7%。尤其是近三、四年来，增加幅度大、速度快。尽管如此，平望镇仍缺乏劳动力，以致还需要雇用大量的农民工。现在，平望镇除了极少数的待业青年因挑选职业，不服从安排，尚未就业外，所有到了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均已就业。

4.在人口构成中，基本人口所占比重较大。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平望镇人口构成情况是：

类　　别	人　口　数	占在册人口%
基本人口	4,197	44.87
服务人口	2,241	23.96
被抚养人口	2,915	31.17
合　计	9,353	100

在人口构成① 中，平望镇基本人口占的比重较大，是与该镇交通枢纽的特点分不开的。由于平望镇是吴江县水陆交通中心，为全县或全县大部分地区服务的企事业机构和公用设施很多。除了工业、建筑、对外交通运输、批发商业、水产养殖、水产科研、物资、商品中转等行业的机构外，许多公用设施也是为全县服务的，

①人口构成包括基本人口、服务人口、被抚养人口。基本人口是指不属于为本市（镇）服务的工业、基建、对外交通运输、非市（镇）属机关、旅游业、科研机关的职工和高等院校师生员工等人口；服务人口是指为本市（镇）服务的行政机关、工商业、文教卫生、市政、公用事业单位的职工等人口；被抚养人口，是指没有参加社会劳动，依靠家庭赡养的人口。

例如变电所的四条输出线路向县内东、西、南三大片五个镇十七个乡供电。平望地区医院服务范围也是五个镇十七个乡。消防队、火化场、加油站等单位都为全县服务。而为本镇服务的机构，只有镇党政机关、影剧院、中小学（高中还招收横塘、梅堰、平望等三个乡学生）、幼儿园、托儿所、房管所、环卫所、自来水厂和一些零售商店。因此，在平望镇人口构成中，基本人口所占比重较大，而服务人口所占比重则较小。

5．流动人口多。平望镇流动人口平均每天约有7,500人左右。流动人口包括：

（1）参加集市贸易的人，每天约4,500人左右。

（2）过境旅客。在平望上下车、船的旅客平均每天约有3,000人左右。

（3）在旅社、招待所的住宿的旅客。据平望镇5个旅社和招待所统计，共有床位近700张，在吴江除县城所在地外，没有一个集镇有这样多的床位。从1983年的1月至5月5个月内，上述旅社和招待所共有住宿旅客45,462人，平均每天有303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据统计，除西藏、青海、云南、广西、宁夏5个省（自治区）外，其余24个省、市、自治区，均有人曾在平望住宿，涉及286个市、县（其中江苏省8个市、41个县）。他们到平望镇来的事由有：①路过；②联系业务、推销产品、调运和采购物资；③做小买卖；④检修、安装锅炉、机电设备；⑤行医、卖艺；⑥看病；⑦探亲访友；⑧开会、学习。1983年1～5月，苏州市和吴江县先后在平望镇召开全市、全县性会议（或举办培训班）共71次，参加会议（或受培训）的人员合计5,736人次，平均每个会议80人。

（三）家庭结构的变化

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平望镇共有家庭2,690户，其中核心家庭2,122户，占78.9%。

核心家庭占多数，表明平望镇家庭结构在向城市化方向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主要表现在：

（1）工业、交通运输等企事业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现在全镇劳动年龄的妇女几乎都参加了工作。已婚妇女工作以后，有了固定工资收入，改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依赖地位。一般年轻夫妇的工资收入，基本上能够维持本人及其子女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可能从大家庭中分离出来，成立小家庭。

（2）年老职工退休制度的实行，解决了大多数家庭中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多数年轻夫妇不需要负担家庭中老年人的生活费用。据1982年9月18日平望镇工会统计，全镇已退休的老年职工有968人，其中退休后居住在本镇的710人，占全镇被抚养老龄人口1,014人的70.01%。这些退休职工不需要其子女赡养，这也为小家庭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变化

1. 平望镇已建立了文化活动中心，但由于没有建好镇四周农村的乡道，因此目前还不能充分发挥县属镇文化中心的作用。平望镇的这些文化设施，也是最近三、四年来增设的。现有影剧院、书场、文化站、图书室、文娱活动室、灯光球场各一个，设备较齐全。镇上除文化站定期举办文艺节目表演、球赛、书画和摄影作品展览等文化活动外，群众经常性的文化活动以看电影、戏剧为主。1982年演戏92场，观众62,974人次，上座率64.1%；放电影925场，观众802,414人次，上座率81.3%。在电影、戏剧观众中，平望镇居民约占70%，平望乡农民约占30%。因乡村交通不便，离镇较远的农民一般都难以参加镇上的文化活动。

2. 平望镇小学和初中教育已经普及，12周岁以下儿童入学率达99%，绝大多数小学毕业生都能上初中。但现有教育设施，还不能适应平望镇形成交通枢纽后各种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今年

以来，吴江县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利用平望镇水陆交通方便、水域广阔等有利条件，在平望镇培训有关业务的技术人员。县交通局在平望镇连续办了八期机动船驾驶员短训班。县水产局在平望镇先后办了四期水产技术员培训班。今年秋季又在平望镇开办一所水产学校，培养农村水产技术员。今后平望镇有可能发展为全县水产技术教育中心和运输技术人员培训中心。

3．由于平望镇水陆交通方便，县里在平望镇设立地区医院和中医院。平望地区医院住院病员以外镇外乡的为主，而且多半是危急病人。据1982年第四季度统计，共有住院病员1,055人，其中平望镇和平望乡的339人，占32.13%，其他镇、乡的716人，占67.87%。这些病员来自全县5个镇17个乡。中医院原为平望卫生院，因该院院长医道好，全县各镇、乡都常有病员到该院就医，县里就将该院改为中医院，面向全县服务。

（五）城镇建设的发展变化

1．建筑面积大幅度增加，但居住用房仍然偏紧。解放前，平望镇屡遭战争破坏，房屋建筑毁坏很多，在0.6平方公里的镇区内只有建筑面积33,500平方米。解放后，经过三十四年建设，共增加建筑面积296,859平方米，增加了786%。现有建筑总面积330,359平方米，其中工作、业务、生产用建筑面积193,479平方米，居住建筑面积136,880平方米。但实际居住面积只有66,592平方米，按常住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4.49平方米，低于县内其他各大镇，居住房屋偏紧。

2．改善了镇区生活设施，但在给水排水方面仍有困难。最近三、四年来，平望镇的几条主要街道都铺了水泥路面，疏通镇区原有的下水道，建了一座容量二百吨的自来水厂，镇区生活设施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缺乏建设资金，新建区下水道没有配套，碰到下大雨，地势低的建筑物底层进水，无法居住。自来水厂供水量少，还不能满足镇区内全部居民饮用自来水的需要。

从平望镇看交通枢纽型小城镇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上面，我们剖析了平望镇这一交通枢纽型城镇的职能结构的特点，它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对这类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更好地建设并发挥这类小城镇的作用等等，作一些粗浅的分析，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什么是平望这个交通枢纽型城镇的发展条件和规律

我们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

1.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交通建设，是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的客观条件，但不是地理位置好，就能自然成为交通枢纽的。平望镇之成为交通枢纽，首先因为它地处苏、嘉、湖三角地带的中间和在京杭大运河畔。其次是由于解放后开通了太浦河与修筑了沪宣公路，从而成为两条公路干线和两条主航道的交汇处，形成上海联结杭、嘉、湖和皖南的公路与水运交通枢纽。这说明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交通建设，才能形成交通枢纽。马克思在《奥地利的海外贸易》一文中曾论述到交通建设对改变一个城市的地位作用的重大关系。他说，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原来与亚洲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等相邻的威尼斯，将失去其优越性，好象在地理上改变了位置，为的里雅斯特所取代。从的里雅斯特到维也纳的铁路连同从威利到佩斯的支线的建成，将引起奥地利贸易的全盘变革。从这场变革获益最大的中心城市莫过于的里雅斯特。① 这说明：地理位置的优越是第一位的，但交通建设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变，对城镇或兴或衰的影响至关重大。平望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一系列交通建设的结果。其交通建设

---

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92～95页。

的发展规律是由点(一个原始村落)发展成为线（水陆驿道和过境公路),最后形成网(省、市、县、乡四级公路配套和联系)。由这四通八达的水道发展到四通八达的公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2．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的发展,也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它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综合经营发展分不开的。吴江县在解放以来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 30 年间，只修了3公里的公路，平均10年修路1公里，这和当时农村商品生产不发达，可供交换的农副产品不多，城乡经济联系不紧密分不开的。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局面根本改观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频繁，城乡经济网络的建设，促使该县加快了公路建设，四年内修公路70多公里，从而加速使平望镇成为全县的水路交通枢纽，使该镇不仅成为上海等大城市工业扩散的基点，而且发挥着联结城乡、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作用。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平望镇每年的货物吞吐量只有十余万吨，而到1982年，已达到90万吨，为1963年的6.5倍。这还没有把附近农村私人运输的大批建筑材料包括在内。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平望镇在吴江县内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加重要。

3．交通枢纽的小城镇往往是平时易兴,战时易毁。一般交通枢纽的小城镇，在军事上，必然是军事要冲，战略要地，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平望地处江南运河中段，运河到平望后分三支流向杭、嘉、湖地区。南宋时,便是京城杭州的北方门户,从那时以来，屡经战火，数兴数衰，时起时落，对此，上面已经作了具体描绘。认识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的这一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平望镇目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用地紧张、住房偏紧、城镇面貌陈旧的历史原因。

平时易兴，往往首先从商业、集市贸易开始，呈现出市场活跃、经济繁荣的局面。这是因为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的位置优越，具有商品容易集散，商业吸引范围广阔的有利条件。三大改造后由于"左"的经济政策的干扰，把小城镇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前哨阵地"，把民间经营的正当商业、商品、店面，一扫而光，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平望与其他小城镇一样，冷冷清清，失去了生机。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政策的开放、商品生产的发展，平望迅速出现繁荣的景象。集市贸易成交额占全县七大镇之首便是明证，这同它那种交通四通八达，处于苏、沪、嘉、湖的中心位置是分不开的。

这种平时兴，战时衰的特点，是交通枢纽型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特有的规律。但平时兴，实践证明也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指导下，才有可靠的保证。

二、怎样看待交通枢纽型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

有人说，凡是小城镇，都是联结城乡的纽带，都承担着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居民生活资料下乡的任务，组织和收购农副产品进城的任务，都起着城乡物资交流的桥梁作用，这是不错的，可以说是一切小城镇共有的职能和作用。然而交通枢纽型小城镇不仅承担着本地区城乡物资交流的任务，还担负着本县其他乡、镇以至外地物资中转的任务，流通物资数量大，范围广。以平望为例，县内二十类大宗物资的三分之一，在这里中转，外省外市外县的许多物资由这里通过。这类小城镇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其作用特别明显。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这类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它们的枢纽作用，又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对一定区域内的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个沟通城乡的中间环节一旦失灵，影响将是十分广泛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平望镇的水陆交通堵塞三天，影响所及，除吴江本县外，将波及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安徽等数个省、市的许多市、县，一些部门

或单位的生产、生活，甚至可能发生重大问题。这种地位和作用，当然不是一般非交通枢纽的小城镇所可以比拟的。交通枢纽型小城镇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于此可见。

除此以外，这类城镇还利用其方便的交通条件，发挥其特有的职能和作用。从平望镇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方面：

1．吴江县利用平望发达的交通条件，把它建成货运量特大的支农工业（如化肥厂、水泥制品厂等）基地。

2．方便的交通条件，还使平望成为一定区域内的商品集散地和集市贸易中心。这个贸易中心对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成为农村信息中心。由于南来北往的舟车便利，传递信息较快，对发展农村工副业生产起着极为有益的作用。从平望目前情况看，还应加强对信息工作的组织，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中心。

4．利用目前的交通网络，已初步建立起运输、流通、卫生等网络。但文化教育网络、科学技术网络，由于乡道不发达，还没有形成，使得平望这样的交通枢纽型小城镇，在提高农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方面，建设精神文明方面，未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5．初步成为吴江县有关部门培训干部、专业人员、技工等的培训中心。

应当指出，小城镇是一个总的概念，小城镇的类型、层次和规模、性质和职能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中，依据各个小城镇的类型、性质和职能，扬长避短，发挥它主要职能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各个城镇自身的建设，带动小城镇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城乡的“四化”建设的发展。

三、平望这个交通枢纽型小城镇应当如何发展

如上面所分析的，平望镇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地理位置优越。据报道，目前有关部门计划开辟一条从上海至安徽芜湖的芜

申运河。这条运河的东段就是利用现在流经平望的太浦河，它的西段经过宜兴、溧阳、高淳等县，直至安徽芜湖。这一计划如能实现，从淮南运往上海、浙江的煤，甚至包括江西、湖北、四川等省经长江运往上海、浙江的各种物资，都可以经由芜申运河直接进入上海，运浙江的物资则可经平望转道江南运河入浙江。人们知道，在我国东部数省水网密布地区，运输大宗物资是以水运为主，一旦芜申运河的开辟成为现实，那么来自长江沿岸数省的船队，东来西去，南来北往，将昼夜不息地驶经平望，呈现出更加繁忙的景象。

根据平望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今后的发展，可以着重抓以下六个方面：

1. 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建立由省道、县道、乡道构成的多层次的公路网。目前平望有连接外省、外市、外县和本县其他镇、乡的省道和县道，但没有连接平望乡四周农村的乡道。我们认为，作为交通枢纽型的小城镇，其道路和航道应当是多层次的，大、中、小配套的。省道、县道通汽车，乡道在目前条件下，以能通自行车和板车较为适当。平望如能把伸向农村的乡道建起来，无论对于活跃四周农村经济、发展商品交换，组织和推广科学技术下乡，使农民享受"城市文明"，以及促进小城镇繁荣兴旺，使城乡日益接近，都有深远的影响。

2. 从上海经济区这个宏观角度出发，鉴于上海土地紧张，仓储压力大，平望离上海水陆均不超过百里，可考虑将平望建设为上海市某些工商部门联结杭嘉湖地区、皖南、江西等省区的物资仓储和中转的基地。

3. 与上述建设相适应，继续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并加强停车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要发展商业和饮食、服务业。

4. 承担大中城市扩散的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项目，如船舶修理厂、运输机械厂、汽车修配厂等。

5．利用当地农业和水产资源，发展食品加工工业和饲料工业。

6．建设成吴江县农村各种技术人才（包括农业、水产、蚕桑、运输等）的培训中心。

一九八三年九月

修通公路前后

——吴江县铜罗镇的调查

蒙　晨

铜罗镇是吴江县西南片的一个乡属集镇，镇区面积0.36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5,246人，其中城镇户口居民2,019人。

吴江县的西南片是插入相邻的浙江省的一块狭长地带，在铜罗镇的四周有许多小城镇，它的北面是吴江县震泽镇，东北面是吴江县的盛泽镇，东南面是浙江省嘉兴市的新塍镇，南面是浙江省桐乡县的乌镇，西北面是浙江省湖州市的南浔镇。铜罗镇是吴江县西南片的经济中心之一，乡脚范围涉及铜罗、青云、南麻、桃源四个乡以及浙江省的一部分乡村。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铜罗镇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流域，在上海经济区之内。铜罗镇距离上海150公里，距离苏州125公里，距离湖州60公里，距离嘉兴50公里。铜罗镇在经济上不仅与其周围的小城镇关系密切，而且与上述的大、中城市也有直接联系。

目前，铜罗镇连接上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及周围农村的交通纽带是五条河流和一条1981年10月建成的公路。公路的修通，使铜罗镇的对外运输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2年铜罗镇的货运量和客运量的增长情况如下页表。

此外，浙江省嘉兴市的公路已经修到铜罗乡边境上的思古桥，距离铜罗镇仅3公里；浙江省桐乡县的公路也修到了乌镇。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两条公路一旦接通铜罗镇，它将会成为一个新的交通枢纽，货运量和客运量将会有更大的增长，公路对铜罗镇的

年份 / 类别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货运量（吨）	4,700	9,300	9,500	20,000
客运量(人次)	108,000	122,000	146,400	279,000

影响也会更大。

一、铜罗镇的特点及其交通条件的变化

铜罗镇是一个由自然村发展而成的以商业为主的农村集镇。据《乾隆震泽县志》记载：铜罗曾经称为严墓，“在十七都，去县治西南八十里，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始称为市，今居民日增，贸易亦盛矣。”时至民国年间，正式在此设镇，并设区政府，辖区为现在的铜罗、坛丘、南麻、青云、桃源五个乡，为这一片的经济、政治中心。据镇上老人回忆，解放前夕，铜罗镇有居民3,000余人，镇上有酒馆十几家、茶馆十几家、中药铺七家、西药店三家、当铺三家、私人诊所六家，还有十几个书场和一个戏场，其他各式店铺沿街相接，鳞次栉比，共一百多家，不少铺店晚上还营业。每天到这里来赶集、做生意、做生活以及娱乐、消遣的人络绎不绝。

铜罗之所以在历史上形成一个商业集镇，除了经济、人口等因素之外，其交通条件也起了很大作用。

吴江县的西南片是低田地区，田面高程约为3.2米至3.5米之间，土壤粘性重、潜在肥力高，一年三熟，可种桑、种菜的旱地在耕地面积中占的比例较大，如铜罗乡的旱地与水田之比为1:4，这要比吴江县东北部的莘塔乡的1:36要高九倍；此外，还有一定比例的经济水面。因此，西南片是吴江县的粮食高产区和粮桑副

茂、多种经营发达的地方，粮食商品率比较高，物产比较丰
商品交换比较发达。据铜罗的老人回忆，解放前铜罗80%以
地主都兼为工商业者，大部分的农民在种地之外，都以不同
式兼营副业、商业、运输业和小手工业；西亭村和兴务村的
以上的男劳动力都是常年以从事运输和经商谋生。

丰富的物产，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为一个商业集镇
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吴江县的西南片有大小村庄近百
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经济、人口等条件下，只有铜罗村能发
集镇呢？在这里，它的交通条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铜罗
浦、严墓塘、大德塘、旁皮港、白寺港、紫荇港五条河在此经过
汇。如此优越的水路交通条件，既便于货物的集散，又便于
来往，而且还能直接与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进行经济往
这就是铜罗镇的形成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解放后，铜罗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镇上建起了粮库、供
和食品中心站，对外运输量有所增长。但是，水路的交通条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基本上还是适应其经济发展状况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解放后水路的交通条件有所发展。在客运方
在原来的嘉兴至南浔一个轮班(经过铜罗)的基础上，又开了
由铜罗至上海和一个由铜罗至苏州的轮班；在货运方面，从
58年以来，逐渐用机动船代替手摇船，到1969年，全乡拥有各
船只620艘，吨位3,237吨，其中机动船为60艘，吨位为407吨，分
占船只总数的9.7%和吨位总数的12.6%。

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年间商品生产发展不快。其一是长期受
"左"的影响，许多传统的工、商、副业被取消，农村的家庭副
受到限制，镇上小商贩被取缔，到了1974年，铜罗镇成了"无商
镇"；其二是社队企业规模不大。到1969年，铜罗镇的社队工业
有一个缫丝厂、一个金属制品厂和四个粮食、饲料加工厂，固
资产约5万元，年产值约10万元，职工不到200人。除缫丝厂的

原料和产品的运量较大外，其他厂的运量都是很小的。

但是，从七十年代的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

1．兴办了大批社队工厂。到1980年底，工厂发展到80个，有轻工、纺织、机械、化工、建材、粮食加工、饲料加工、酿造、服装等行业。职工人数增加到1,206人，比1969年增加6倍；产值增加到608.33万元，比1969年增加60倍。

马克思曾经指出，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包括“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减。”① 对于主要靠市场来调节生产的社队企业，尤其是这样。在铜罗的社队企业向外寻求新的原料、市场、技术和信息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因为不通公路而受到阻碍的情况：有的工厂由于急需的原料和零配件运输不及时而停工待料；有的工厂由于联系和运输不便而争取不到大、中城市的来料加工，等等。1976年，上海缝纫机三厂在一些原籍在铜罗的老工人的推荐下，准备把一些铸件给铜罗通用机械厂加工，由于运输和联系不方便，一直没有定下来。这说明，光靠水路的交通条件，已经不能适应社队企业的发展。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多种经营发展起来。传统的经营项目如养蚕桑、养猪、养羊、养蜂、种茶、做豆腐都恢复和发展了，供销社收购的鲜活农副产品总金额，从1971年的98.09万元增加到1980年的171.08万元，增加74.4%。在此期间，还发展了树苗、花卉的生产，运销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1980年销售金额达30万元，成为铜罗一项新的副业。在商品生产发展较快的情况下，光靠水路运输鲜活农副产品和树苗、花卉，不仅损耗大、易变质、成活率下降等问题突出，而且出现了产销脱节、买难卖难的情况。这样，反过来又影响了这些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40页。

鉴于上述情况，县交通局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于1981年6月修了一条由铜罗到震泽的公路，与平(望)湖(州)公路接通。同年10月又修了一条连接青云、桃源两个乡的公路。有了水陆交通之便，小小铜罗，如添鸟翼，从此展翅高飞了。

二、公路修通对铜罗镇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我们先从客运方面看公路修通以后铜罗镇所起的变化。

1. 客运量明显增加。客运量从1980年的12万人次增加到1982年的近28万人次。客运量的结构也起了变化：水路客运从原来的一年12万人次下降到6万人次，公路客运从无到有，1982年为21.9万人次，大大超过水路的年客运量。公路客运比水路客运便利表现在：第一，客车班次多，每天有18班客车，为客轮班次的6倍；第二，省时间，以往上海去为例，客车只需3.5小时，客轮要18小时；第三，运量大，客车日客运量要比客轮多3倍。

2. 促进了农贸市场的繁荣。交通便利，来往人多，给铜罗农贸市场带来繁荣。

修通公路前后铜罗农贸市场情况比较表

项目 / 年份	上市人数（人次）	上市品种（种）	外来商贩（人次）	成交额（万元）
1981 年	112,100	209	5,230	116.67
1982 年	135,600	294	8,630	224.37
增长比例	21%	41%	60%	52%

根据铜罗工商所的同志介绍，外地来的商贩有60～70%是乘

（损耗大）。而用汽车运输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正因为这样，公路修通后，对外运输实行两条腿走路，使鲜活农副产品和树苗花卉的外销外运有了保证。这不仅满足了大中城市的需要，而且促进了本地多种经营的发展，帮助农民很快富起来。树苗花卉的种植已经开始由香樟、水杉等经济林木向雪松、龙柏、玉兰等名贵观赏花木的方向发展；蔬菜的种植品种也增加了，如青蚕豆，过去很少人种，现在也发展起来了，仅1983年第一季度供销社就收购1,000多担。兴务村原来是全乡最穷的村，1978年时，每日工分值不到2角钱，有近一半的农户超支，从1979年开始大量种植树苗花卉以来，至1982年一跃成为全乡最富的村。这一年，全村仅树苗花卉一项就收入35万元，平均每户1,282元，平均每人299元，收入最高的户达万余元。

公路的建成，不仅对农产品进城有利，而且对城市的商品下乡也有好处。铜罗供销社的商品纯销售额1981年为376万元，1982年增至410.61万元，增长9.2%，其中与公路直接有关的五金产品如轮胎圈、钢丝、轴承、自行车等的销售量增长较大。自行车1981年只卖了92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地人买走的，1982年卖了256辆，1983年仅第一季度就卖了80辆。修通公路以后，自行车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交通工具。

三、公路的发展给铜罗镇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铜罗镇所处的地区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城镇密度大。据城乡部的资料，按现行建制计算，全国平均约45平方公里即有一个城镇。如果把近年来发展起来但还没有设镇建制的小城镇计算在内，城镇密度还要高一些。二是人口密度大。以铜罗为例，城镇人口密度为144.5人／公顷，农村人均耕地0.98亩，属于人多地少地区。这两个特点给小城镇的建设带来城镇建设费用紧张和用地紧张等问

题。在这样的地区里，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具体道路怎么走？铜罗镇在通公路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

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铜罗镇这几年增加了1,000多名亦工亦农的流动人口，他们家居周围农村，最远的要走1.5～2小时，一遇雨天，田间小道泥泞难行深以为苦。为了解决他们上下班不方便的问题，曾经打算在镇上给他们盖宿舍，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和地皮紧张等原因，只盖了一幢三层楼的公社干部宿舍，其余的都搁了下来。后来，修通了公路，不少社队企业的工人买了自行车，骑车上下班，到路程最远的后练村半小时也就够了。这就使人们悟出一个道理：只要整修乡道与公路相接，购买自行车，就能解决工人上下班的问题。现在，旺家、严东、后村、富乡等几个村都整修乡道，并使之与公路相接。他们认为这样做，有下列几个好处：

1. 有利于充分利用剩余劳动时间。铜罗的社办工厂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而当地农民习惯的劳动时间是一天10小时以上，因此，这些亦工亦农的社办企业职工在8小时外，至少还有2～3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按照1,000人来计算，整个铜罗乡一天就有3,000小时，一年就有100万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如果交通不方便，这些剩余劳动时间将大部分浪费在路上；如果把社办企业的职工集中在镇上住，这些剩余劳动时间也无法利用。反之，通了公路后，发展自行车交通，让职工们早出晚归，就可以把这些剩余劳动时间用于农业和副业生产上，既促进了农副业的生产，又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这在农业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尤其需要这样做。

2. 有利于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铜罗乡总人口为55,998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2,948人，12岁以下的小孩有5,579人，两项相加占总人口的33%；铜罗乡总户数为6,335户，平均每户为4.1人；另外，据抽样调查，铜罗乡的农户里，三代户占80%左右，四代户占6%左右。这些情况表明，铜罗乡的农户大部分都有赡老抚小的双重任务，由此

如果说，铜罗镇历史上的货物运输只是靠水路这一条"腿"的话，那么，公路修通后就变成水陆并举的两条"腿"了。两条腿当然比一条腿走得快。从城乡的物资交流总额来看，1981年为589.31万元，1982年为777.72万元，增加32%。其中又以鲜活农副产品和树苗花卉的外运量的增长比例为大，生猪和蔬菜分别由1981年的11,696头和9.8万担增加至1982年的18,188头和15.4万担，各自增长55.5%和57.2%；树苗花卉由1981年的价值80万元增加至1982年的180万元，增长225%。这些都与公路的修通有密切的关系。

铜罗乡是多种经营发达的地方。除有23,399亩的水田外，还有5,603.9亩的旱地和3,944.6亩的经济水面，每年可产相当数量的鲜活农副产品，仅蔬菜一项就可产30万担以上。这是大城市经常需要的东西。但是，以前由于不通公路，外运困难，影响了农副产品的收购和生产。通了公路后，鲜活农副产品的外调和收购出现了空前的好形势。比如，以前由于水路外运生猪途中损耗太大(100斤猪到上海要掉膘30斤左右)，生猪很少往上海调；1981年6月公路通车开始往上海调，1982年共调1,059头。再如，原来用船外运蔬菜，为保证损耗率不超过5%，要求气温在摄氏10度以下才能运输，所以，4～10月份是不收购蔬菜的；通公路后，便改为全年度收购，1982年7～8月的"双抢"大忙期间，仅冬瓜就收购4万担，用汽车运往上海和江阴一带，这是往年所没有的。自从1982年以来，铜罗的生猪和活禽的外调已全部改为汽车运输，蔬菜的外调也有60～70%用汽车运输，出现了购销两旺的局面。

树苗花卉的外运也是如此。销售树苗花卉是铜罗乡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全乡新兴的最大一个副业项目，如果销不出去，不仅占地耗肥，而且影响树苗的生长、更新，更不用说影响农民的资金周转和经济收入了。通公路以前，花木的销售难往往是难在外面的人进来看样品难、定货难、对外运输难，就是用船运到大、中城市港口，还得换汽车运进市区，很不方便。修通公路以后，情

况大为改观。

用汽车运输鲜活农副产品和树苗花卉，比起用船只运输至少有下列优点：

(1)时间短，消耗少。鲜活农副产品要求以最短的时间到达市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使用价值，从而保证其价值的实现，试比较车和船运输鲜活农副产品到上海的损耗情况：

项目 / 运输	生猪	蔬菜
船	30%	5%
车	15～18%	2～3%

根据铜罗食品中心站的同志介绍，1982年用车向外调生猪，仅减少途中损耗一项，就比1981年多获毛利17万元。

(2)机动灵活，运输费用省。一般说来，运输“死货”，船的运输费用比汽车省，但是，运输鲜活产品就不一定。因为水运费用低的原因之一在于其起运批量大，一般要40吨一批起运才合算，而鲜活产品保存期短，不一定能等到凑齐批量，这样，小批量货物水运费用就高了。运输船只不能直接进入市区，必须在指定的码头卸货，再用汽车转运，这样，中间增加一次装卸，运输费用自然增加很多。据江苏省食品公司估算，每一个等级的生猪调拨价，用车运要比用船运省0.10元；而且汽车运输的批量可大可小，一次完成，在来回的途中还能捎带其他东西，不用放空车，确实比船方便。

(3)适应性强，全天运输。用船运输有几个限制：六级以上大风不能行驶，浪大不能行驶(怕小船颠簸)，气温太高也不能运输

坐汽车或者骑自行车和轻骑车来的，大中城市到此采购农副产品的人几乎100%是乘坐汽车来的；增加的上市品种，除一部分是本地恢复和发展的商品外，有相当的部分如竹笋、水果、茶叶及饲料等来自浙江和苏北。

农贸市场的繁荣，是朝着有利于铜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的。我们可以从铜罗镇修通公路前后农副产品价格变化的情况看出这一点。铜罗修通公路后，降价的产品主要有两种：一是从浙江省运来的产品，如米糖、芝麻、黄豆、竹笋等；二是本地专业户、兼业户的产品，如猪肉、羊肉、苗猪、鸭等。涨价的产品，主要是大、中城市需要量很大的鸡蛋、鱼、虾等，有时鲜鱼上市近万斤，竟一购而空。当然，影响农副产品价格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在同样的交通条件下，在不同的时间里，物价也会有所不同。但是，铜罗集市上的物价在修通公路前后有如此明显的变化，除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外，交通条件变化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铜罗集市物价的变化，不仅使本地农民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会进一步刺激商品生产，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3．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公路的修通引起了铜罗镇商业结构的变化。从行业结构来看，服务性的商业部门有了一定的发展，原来的旅社只有40个床位，后来发展到80个床位，另外，还盖了一幢三层楼的工办招待所，有80个床位；个体小商贩也从1981年的32户发展到1982年的92户，其中饮食和食品的摊贩就有50户。从区位结构上看，原来以市河为中心的集市由南向北移动了300多米，靠近了公路，在公路边上还盖起一幢三层楼的食品中心店。所有这些，都是受到公路修通的影响的。

4．加快了接受城市文明的过程。列宁曾经指出，在交通运输技术非常发达的条件下，“要让全体居民共同享用几世纪来在少数中心城市积累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① 事实确实如此。未通公路

①《列宁全集》第5卷，第132页。

前，铜罗镇很难请到大、中城市的技术人员来帮助发展社队企业。通了公路后，来往方便了，各工厂纷纷到大、中城市请来师傅和顾问，解决生产技术上的难题。铜罗化工厂1982年因产品不对路停了产，几乎倒闭，从1983年起，他们分别到上海、苏州的有关工厂、公司和常州化工学院等处请来工程师、技术工人和老师50多人，多次进行会诊，提出几个方案进行选择，最后终于转产新产品，恢复了生产。1981年成立的铜罗文艺剧团，聘请了尹桂芳等6位上海越剧名角作老师。在公路修通前，只能请老师们到交通方便的平望镇给剧团同志作个别辅导，而无法使整个剧团得到老师们的指教。通公路后，老师们就可直接来到铜罗镇教戏、上课，1982年先后来了十二人次。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铜罗剧团艺术上提高很快，不到两年时间，便成了全县有名的剧团之一，1982年获江苏省先进文艺团体奖。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大、中城市文明传播的加快，对铜罗的影响并不止一个方面，而是多方面的，它涉及到铜罗镇的经济、文化等领域。这些影响主要又是依借频繁来往的流动人口为媒介的。据1983年5月份统计，这个月在铜罗招待所住宿的旅客共有496人，其中采购员、推销员202人；来学习缫丝、纺织、酿酒等技术的工人、技术员15人；到此帮助解决生产上、技术上、经营上问题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88人；到此进行体制改革试点的干部30人；到此进行法制宣传的6人；来此辅导文艺队伍的4人；到此从事各类调查的17人；到此检查工作和开各种专业会议的90人；到此从事其他活动的44人。他们来自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河南、青海等八个省、市的许多大、中城市和县城。从上述情况中我们看到，铜罗镇以公路为纽带，把它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使之与外界，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社会联系大大加强，从而使它能够直接利用大、中城市的文明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下面，我们再简略地从货运方面看看公路对铜罗镇的影响。

而来的家务事比较多。如果社办企业的职工集中在镇上住，一星期或一个月才回家一趟，那么家务事就几乎全部落在家里的劳动力身上，加重家里人的负担，这样会引起一些家庭矛盾；此外，一个家庭分开两处开支，费用要比在一处增加，这也容易造成家庭矛盾。而职工们早出晚归，在家里住，不仅能使上述矛盾较好地解决，而且还能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3．有利于节省土地和资金，把钢用到刀刃上。目前铜罗镇的住镇人口的人均占地面积为102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8平方米。根据这些情况，如果把1,000多名职工都迁到镇上居住的话，要占用耕地152亩；如果给1,000多名职工盖宿舍，按每平方建筑造价为120元计，就要耗资96万元，加上为之配套的其他设施，花费还更大。下面我们把造公路和造宿舍的费用比较一下：

项目 \ 花费类别	占耕地	耗资
修公路	113亩	6.5万元
盖宿舍	153亩	96万元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看到，发展农村公路和自行车交通，让社队企业的工人早出晚归，确实有利于解决土地紧张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钱用到小城镇建设更急需的地方去。

既然公路的发展可以使社办工厂的职工不到镇上来住，那么与此相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发展农村工业，建设小城镇是否非得把农村的工厂都集中到镇上不可呢？在铜罗通公路前，全乡16个社办工厂有12个建在镇上，这除了历史的原因外，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水路交通比较方便，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和管理比较方便，通

公路之后，从铜罗乡的社队企业的状况和交通条件来看，把工厂建在镇上不一定有利，而是要根据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把该设在镇上的工厂设在镇上，不该设在镇上的工厂就设在它应该设的地方去，这样才是有利的。

首先，在交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厂设在镇上不一定经济效益就高。通公路前，铜罗乡的16个社办工厂中，有4个是设在离镇较远的溢溪塘及其他的河流边上，但是，这4个厂的利润从1979年以来却一直占铜罗社办工厂总利润的60%左右；此外，还有64个队办工厂，都不设在镇上，而是设在本村附近的水路方便的地点，1980年这些工厂的利润达30万元。

其次，在公路发展的情况下，把工厂设在镇上不一定交通条件就算最好。目前，公路不仅接通铜罗镇，而且穿过和接近铜罗乡的9个村庄的大片田野；如果浙江省乌镇和思古桥的公路再延伸过来，铜罗乡的17个村将全部通汽车，这就为工厂按交通的最佳位置设点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现在，那些远离集镇的工厂没有一个要求迁到镇上来，而是采取整修乡道与公路相通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交通条件。1983年申请自己集资或筹资办化工、五金、商标、纸袋、粮饲等工厂的7户农民，除1户家住镇边外，其余6户都不准备把厂设在镇上，正选择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点建厂。

再次，有的工厂设在镇上，不一定对城镇建设有好处。在集镇主导风向上的铜罗酒厂烟囱虽已作除尘处理，但酒糟气味仍然较大，铜罗化工厂因严重污染河水，1982年引起附近80户居民的联名上告，结果，上级主管部门责成化工厂给每户居民赔偿200元作为打水井的补助。在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样的工厂不如迁到农村合适的地方，还更便于管理。

上述的情况告诉我们，公路的发展，造成了生产区域与生活区域的合理分散，造成了社队工业生产力的合理分布，这当然有助于减轻小城镇建设的地皮压力和资金压力。但是，“分”只是事物

的一个方面；事物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合”。这里的“合”，指的是公路的发展又使得某些社会活动相对的集中，要求集中物力、财力去搞好小城镇这些方面的建设。

第一个表现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公路建成后，铜罗镇的商业贸易比以前更趋繁荣兴旺，常年日上市流动人口近万人，使茶馆、饭店、点心店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而现在的茶馆只有4座，座位314个；饭店、点心店座位430个，远未达到解放初期的水平；虽然近两年来发展了一些个体户服务点，但仍不能满足需要。这使得赶集的顾客特别是周围农村的农民感到很大不便，如何加快发展商业服务设施，是铜罗镇当前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表现是公路的发展使铜罗乡的文化活动的集中程度大为提高。由于交通方便，四周农民到镇上的时间缩短，加上新电影来得快，文艺剧团和体育团体来得多，通公路后，到镇上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增多了，影剧院、书场和图书室的使用率提高了。据统计，铜罗影剧院1981年放电影600余场，观众达4.5万人次；1982年放电影增至720余场，观众增至5.6万人次，电影观众大部分是四周的农民。但是，铜罗镇的文化设施却远不能适应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目前镇上没有一个篮球场，没有一个娱乐活动室。影剧院是1958年建的，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如何改善这方面的条件，以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是铜罗镇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路交通，既促进了铜罗镇的繁荣，又对铜罗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设一个以小城镇为支点，以农村为基础，以公路和水路交通为网络，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这么一个城乡结合的新型社区。

一九八三年九月

对江南文化古镇——同里镇建设的初步研究

朱通华

一、同里镇的历史形成及其特点

吴江县同里镇，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它位于吴江县东北部，属太湖水网平原区中的湖荡平原，地势低平。外由四湖（同里湖、九里湖、叶泽湖、南星湖。四十年前镇外还有一个庞山湖，早被围垦）层层包围，内被“川”字形的河道及其支流纵横分割，这就是《同里志》所描绘的那样：“泽浸环市”，“街巷逶迤”，“诸湖环绕于外，一镇包涵于中”。虽然它同吴江县城松陵镇的距离只有6公里，同苏州市的距离只有24公里，但从宋朝正式建镇到1982年底的整整十个世纪中，只通舟楫不通车。这样的地理环境，在旧社会的“小乱进城，大乱下乡”的动乱年代里，同里镇较少兵燹之虞，遂成为既宜富绅避乱安居，亦利各业劳动人民谋生的好地方，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镇2,021户，地主成分的就有506户，占四分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同里镇的特点是：

1. 同里镇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镇。宋代在现址正式建镇，设“巡检司署”。同里读书人多，科第亦盛，从北宋淳化3年到清朝嘉庆十五年间，曾出状元1人，进士38人，举人80人。明清两朝出仕者甚多，志称“多名家盛族”，“儒绅大夫彬彬辈出”。元末有倪云林、顾阿瑛，明代有姚广孝、董其昌、计成，清代有沈

德潜、陈祖范，近代有杨（杨千里）、柳（柳亚子）、松（金松岑）、柏（陈柏如，即陈去病）等著名文人学者①，在同里寓居或授徒，他们的“功业声光，为时所重”。许多官宦和文人学士告老还乡后，就兴土木、建宅院，“园池亭榭，声伎歌舞，冠绝一时”。这使今天的同里镇，还是深宅大院鳞次栉比，隔河相峙。据了解，明清两代

①倪云林（1301—1374），名瓒，字云林，元代书画家。无锡人，家豪富，元末社会动荡，往来太湖、泖河一带。擅山水，初宗董源，后参荆浩、关同法，创用“折带皴”写山石。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合称“元四家”。

顾阿瑛，名德辉，元昆山人。少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四方文人学士咸至其家。授会稽教谕，不就。张士诚据吴，欲强以官，乃去隐嘉兴一带，有玉山璞稿、草亭倡和诸集。

姚广孝（1335—1418），明苏州长洲（今吴县）人。十四岁出家为僧。洪武中从燕王（即成祖）到北平，为心腹谋士。成祖即位，复姓，赐名广孝，授太子少师，曾参与纂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等。

董其昌（1555—1636），明书画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擅画山水，说过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计成（1582—？），明建筑学家，吴江同里人。工诗文，爱绘画，著有《园冶》一书，为我国古代园林艺术专著，学术价值很高。

沈德潜（1673—1769），清诗人，江苏长洲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礼部侍郎。

杨千里（？—1979），名天骥，近代诗人、书法家，吴江同里人。

柳亚子（1887—1958），吴江县北库大胜村人。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人民诗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1909年，与陈去病等一起创立“南社”。

金松岑（1874—1947），吴江同里人。1903年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一起宣传资产阶级革命。著名小说《孽海花》的前几回是他写的，并同曾朴共同商定全书六十回的题目。

陈柏如（1874—1933），即陈去病，近代诗人，吴江同里人。“南社”创始人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后任东南大学教授等职。其诗颇多悲愤国事之作。

的建筑，占全镇建筑的三分之一强。

值得一提的是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的退思园，系当时的凤(阳)颍(州)六(合)泗(洲)兵备道任兰生所建。园名“退思”，是因为此园正在兴建之际，任兰生已被参劾而革职，表示其“退则思过”之意。退思园分两部分，占地九亩八分(略大于苏州的网师园)。前部为住宅，建有轿厅、茶厅、正厅，然后是内宅。内宅为十上十下的走马楼，颇为堂皇。后部为园林，贴水而建。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称该园“于江南园林中独辟蹊径，具贴水园之特例，”十年内乱中被占为工厂，受到破坏，现已修复，为江南家庭园林保留了一个典型佳品。

?. 同里镇又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它有着别具一格的镇区布局。已建成的镇区面积约0.6平方公里，在市河分割的七只圩头上筑成。东西走河，南北架桥。镇区布局以河道为骨架，一切建筑围绕着水、依傍着水，环水设市，依水成街，沿水建屋，傍水成园，巧妙而自然地把河、桥、街、路、屋、园联结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全镇现存宋、元、明、清时所建的各式拱形石桥20余座。静静的河水，整齐的石驳岸，高踞着古色古香的石桥。在一排排临水而建的白墙青瓦的民房前面，已经成荫的合欢树郁郁葱葱。“柳桥通水市，荷港入湖田”，“一线晴光通越水，半帆寒影带吴歌”，在这里，可以饱览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那一派江南水乡的动人景观。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同里镇同样带来了一场浩劫，文物和许多景点被严重破坏。但从全貌来说，同里镇的水乡古镇特色，依然是相当鲜明、比较完整而令人神往的。

二、纽带作用的过去和现在

小城镇是城乡的结合部。它具有把城市和农村联结在一起的

农村和广大农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在同里还没有开展起来。同里镇的教育是很有基础的。现在有完全中学一所，初、高中共14个班级，在校学生598名。初中主要面向同里镇招生，农村学生只占27.6%，这是因为周围各乡一般都办有初级中学，学生可就近入学。高中的招生范围包括同里镇、同里乡、屯村乡及金家坝乡的部分行政村，农村学生占72%。通过中学的培养，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许多人成为农村各项事业的骨干。据同里乡统计，现任乡、村两级299名干部中，从同里中学毕业的共81人，占27%。有些人考取了大学，1978年以来升大学的共25名，其中农村学生21名。

上面，我们简单地叙述同里镇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是为了说明：

第一，同里镇与许多小城镇一样，许多年来，包括解放以来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个从兴盛——衰落——新生——再衰落——再兴盛的过程，同时也将经历一个从少功能的镇——多功能的镇——多功能而有特色的镇的发展过程。

第二，同里镇与其他小城镇一样，是稳定和流动的集合体，它是城乡之间三条“流”（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闸门。所谓物流，可以用“购、销、集、散、运”这五个字来概括。所谓人流，就是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如过去读书人的出仕、致仕、寓居，现在农民的孩子进城上大学，都是以小城镇为跳板或立脚点的。现在城里的干部、文化人、技术员到农村工作，大部分也是在小城镇安家落户的；许多工业产品扩点生产，也是利用小城镇为基点，来集聚农村的劳动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政治信息、商业信息、社会信息，乃至青年人的穿着，姑娘的发式，也是通过小城镇在起媒介作用。这许许多多的交往所形成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是经过小城镇这个“闸门”，这就是纽带作用的具体形式。三条“流”通过交通和通讯的网络，把农村和城市联结成为一个不断运动着

的整体。

集镇对周围农村，有着经济的、自然的凝聚力。外国有的学者把城市称为Agglomeration（凝聚力、粘结剂），其实，这对农村集镇来说，才更为贴切。

三、群众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同里

一个小城镇的兴衰存亡，是同它周围的农村、农业、农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它同大、中城市不同的地方。农业兴，农村富，农民喜爱（试注以同里方言，为：出脚方便，有买头，有看头，有听头，有吃头），则小城镇存，小城镇兴；反之，则小城镇衰，小城镇亡。

现在小城镇面临的新情况，是要适应农业在向现代化和生产结构合理化的发展过程中而出现的两个转化，即：狭义农业向广义农业转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从而实现小城镇本身的两个转化，即：从少功能积极向多功能转化，从封闭性逐步向开放性转化。前一个转化，是指不仅要改变有些小城镇只是具有商业性、流通性的单一功能，而且要改变只是具有生产性的单一功能，真正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后一个转化，是指在“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指导下，某些具体规定要开口子，把小城镇建设放到国民经济的全局中，放到市管县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局中，使“积极发展”这四个字落到实处，使前面讲到的三个“流”（人流、物流、信息流），流动得更活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同里镇也是这样，应该从少功能积极向多功能转化，从封闭性逐步向开放性转化，这是普遍性。同里还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就是要从本镇的现有基础和具体条件出发，保留江南水乡和文化古镇这个特色。如果这一特色不被重视而被取消，那么，同里镇

业生产配件和原料。主要有石棉厂、晶体管厂、淀粉厂、化工厂、丝织厂、光学仪器厂和求精机械厂的一部分，这部分产值共796万元，占27.7%。(4)日用工业品。主要有锁厂、服装厂、皮鞋厂等，由县百货公司收购外销，这部分工业产值为138万元，占4.8%。

以上四个大类，(1)(2)两类的工业产值为1,439万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50.1%；(3)(4)两类的工业产值为934万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32.5%。这说明，同里镇的工业主要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好的方面；另一方面，也说明同里的工业发展不快，实力是很有限的。

同所有社队企业所起的作用一样，同里的镇、社工业吸收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现在在社办工业和建筑站务工的劳动力共1,119人，加上在县、镇工业做工的，共1,516人，占同里乡农业剩余劳力的30%左右，这个比例是不高的。

商业、服务业在对私改造以后，由于受“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为地合并过多。1957年时，全镇还有109个门市部，128个(摆摊、提篮、托盘)商贩。到1965年时，门市部只有71个，减少35%；摊贩只有47个，减少73%。十年动乱时期，取缔了个体商贩。商品流通形式、流通渠道的单一，加上“官”办商业的不良作风，大大减弱了对农民的吸引力，同里镇的商业、服务业萎靡不振了。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农村商品经济受到了破坏。虽然附近农村的粮食产量有所上升，但多种经营、家庭副业几乎被砍光，集市贸易被作为“资本主义黑市场”，严加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里地区广大农村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发挥，家庭副业、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社队工业蓬勃兴起，这些，都为同里镇的兴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中，同里镇商业部门的零售额从956.7万元猛增到1,534.8万元；利润从21.5万

元增长到57万元，翻了一番半还多。同里镇作为这一块地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它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纽带作用正在复苏和增强。

这种复苏，反映在农贸市场上，是最为明显的。1983年6月，我们连续用三个早晨去观光同里的农贸市场。一条里把长的街道，两边摆满了摊子，鸡飞鱼跃，瓜菜满筐。数了一数，蔬菜类有蕃茄、黄瓜、脆瓜、丝瓜、茭白、绿豆芽等20多个品种，水产类有鲤鱼、鲫鱼、甲鱼、虾子、鳝鱼等14个品种，禽蛋类有近10个品种，豆制品类也有近10个品种，还有各式卤菜、杨梅、桃李等水果。品种是多样的，东西是新鲜的，价格是公道的。由于实行了商业承包责任制，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商店不仅早早开门，还到这条"早市"的长龙中摆起了摊点。如食品站设在集市贸易中心的肉摊就有三处，分部位供应，任挑任选，一分行情一分货。上午可以吃到的早点，有大饼、油条、汤包、大肉包子、生煎馒头、汤团、粢饭糕、烧卖、麦芽饼、闵饼、粽子、馄饨、梅花糕、各色面条等20多种，随到随吃，热气腾腾。我们深感在小城镇上过日子，这方面比城市要实惠得多，方便得多。

同里镇在教育、文化、科学方面的纽带作用，比较而言，是薄弱的，既落后于苏南的一些新兴城镇（如沙洲县的一些乡镇），也与同里素有的文化古镇的盛名不副。这和同里周围农村乡道不发达有很大关系。同里有800个座位的影剧院一座，正在重建；400个座位的书场一座。1982年共映演电影、评弹、戏剧413场，观众21.3万人次，其中农民11.2万人次。据调查，同里公社的农民上镇看戏看电影和听书的，全年平均每人只有4.5次（沙洲县是57次），就是说，在镇上过的文化生活是三个月一次。镇上的文化站有60平方米的群众活动场所一处，辟为图书室、阅览室、茶室兼奕棋室，实际上是斗室而已。文化站每月经费18元，实在可怜得很，难以满足群众的文化要求。这个文化站，属镇上管的，同周围的

纽带作用，使它在城乡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

同里镇尽管是个文化古镇，它的出现、形成和发展，主要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结果。

从历史过程来看同里镇的纽带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作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性、消费性集镇，是同里镇较早的面貌。

同里开发很早。据从镇北2公里的九里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表明，至少在四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在生息、耕作。唐宋时代的同里镇，是在现今九里湖的地方。后来村子下陷为湖，集镇遂南移今地。对这一饶有意味的历史地理变迁，同里镇上的一位学者王稼冬先生写过一篇《江苏吴江同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报告》，专门进行了探讨。

据《同里志》记载，同里在宋代时，"民物丰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具。"到了明代，同里镇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明初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室宇丛密，街巷迤逶，市物沸腾，可仿州郡。故局务税额逾于县市。"很显然，这个时候的商业活动，已经远远不只是农民间的交换，而是有大批商人和小商贩在同里这个码头上活动，通过物资的交流，将农村与城市联结起来。同里产的大米，在江南一带很出名，解放前上海《新闻日报》上的经济行情版每天都刊登同里的大米价格。据老人回忆，同里镇最多时有大小米行、米店72家。同里每年向上海输出的白粳达40万石，籼米达20万石。粮食收获季节，每天从四乡载着糙米和稻谷等到镇上来的农船在100条以上，把一条市河塞得满满的。

同里地区的广大农村和丰富的农产品，带动了同里镇上的商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也带动了生活服务业和制造修理业，使同里镇日益繁荣起来，其消费性的特征则非常鲜明。解放以前，同里镇有"两多"：茶馆多、菜馆多。沿河一条500公尺的长街，茶馆有14家。这些茶馆、菜馆，是农民上街休憩的场所，是镇上人谈

生意经的场所，也是交流信息的场所。

2. 同里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它后来在漫长的旧社会发展成为既是这一带的政治中心，又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化古镇。

同里人做京官和在外地做地方官的不少，他们把江南的传统文化带出去；告老还乡后，又将外地的文化带进来。此外，还有不少外地名流来此做官、寓居、执教，交流文化。在小东溪桥上，至今还嵌着一副石刻对联："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记录着当时同里人的读书之风。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化，加上江南水乡的绮丽风光，熏陶了同里人的爱美情趣，养成了种花养花的爱好。同里的劳动人民还用自己的双手，将整个同里构筑成一座水上大"园林"。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劳动创造的文化并不为劳动人民所占有，而主要为镇上的剥削寄生阶级所享受。

3. 同里向多功能城镇的方向发展，是解放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化。

解放三十多年来，同里镇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主要是寄生性的、消费性的集镇，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工业基础，商业、建筑业、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业、教育卫生事业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多功能的集镇。二是传统的文化特色，前些年不是有所发展，而是有所削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受到重视，目前正在注意恢复之中。

现在同里镇的工业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 农副产品加工。主要是油厂、米厂。它们将粮站收购来的原粮和油料就地加工为成品粮油，加工区包括同里乡及屯村、金家坝、湖滨、八坼、菀坪等乡，1982年共加工大米9,130吨，农副产品加工产值共998万元，占全镇工业产值2,872万元的36.3%。(2)农机具和农用物资生产。主要有农机厂（求精机械厂）、电机厂、同里公社农机厂、公社砖瓦厂。这部分工业产值共441万元，占15.3%。(3)为大工

也就没有了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没有不同的认识和意见的。

有的曾经认为同里镇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特色，因而应该象有的镇那样，填河拆桥，扩街铺路，大拆大建，另起炉灶。这些年拆的不多，建的不多，是“保守”了。

也有的曾经认为同里镇过去的一切都是值得保留的，凡是被变动过了的都应该恢复，似乎同里镇就是现实中的桃源佳境。因而，对同里镇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缺乏新鲜的时代感和积极的态度。

据我们了解，同里人民是不赞成这两种意见的。他们说：“我们同里人同样是向往现代化的，希望同里镇也能早日从生产建设到日常生活都出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面貌”。他们还认为：“同里镇应该按照文化古镇的要求来进行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筑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江南水乡的典型。而不要象有的镇那样搞得面目全非，使将来的子孙再来回忆故土时，会找不到痕迹，这是一件多么遗憾、多么对不起前人的事！”这些意见是中肯的、正确的。

在省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同里镇于1982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吴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与同里镇的同志一起，对同里的总体规划，做了大量工作。吴江县人大常委会还为此通过了原则批准的决议。

象同里镇这样一种类型的小城镇，及早制订一个总体建设规划是非常必要的，有规划与没有规划大不一样。“书记调动，规划重弄”，“随心所欲、大拆乱建”，会给江南水乡型的小城镇带来莫大的损害。有了规划，立一个法，有可能避免重演这类痛心的历史教训。而且，集镇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各样的基层部门分属许多条条管辖，条条又各有各的打算。如果没有统一规划，镇区一条街就会搞得鸡零狗碎，不可收拾。一纸规划，其作用是

统一条块的矛盾，集中条块的力量。据我们这次在同里的了解和研究，同里镇总体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有以下三个问题特别要注意，即：目标问题，实施步骤问题，两个“转化”问题。

1. 关于目标，这是一个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

城镇的性质，对城镇发展的方向具有质的规定性，对城镇的规模也具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有鉴于此，对同里镇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否可以这样提法：在现有基础上，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把同里镇建设成为一个既保持原有江南水乡风貌，又有社会主义“四化”新气象的文化古镇。

什么叫原有的江南水乡风貌？这是说：就整体而言，镇外有水，镇内也有水；就镇区而言，河、桥、街、路、岸、树、建筑物要通盘考虑，保持环水、依水、沿水、傍水的特色。同里这样“诸湖环绕于外”的江南集镇，如果在镇内见不到水，或者见到的是一潭死水，还有什么意思？当然，还不止是有几条小河，要有整齐的石驳岸和水河桥，要有格调相称的石桥和道路相配合，这才是江南水乡。这个要求对同里镇来说，并非苛求，并不是要大力重建，现有基础是相当好的，稍加注意和维护就可以做到。

为什么要提社会主义“四化”的新气象？这是与实现同里镇本身的两个“转化”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古镇的建设，要以经济繁荣为基础。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许多问题不得解决，规划就可能落空。市、县的有关部门要帮助同里再办一点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没有污染或少污染的工业，使镇上的青年充分就业并更多地安排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使群众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这里所说的“新气象”，不仅要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公用设施有新的起色，而且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有新的起色，特别在教育、文化方面，同里镇还要作更多的努力。

同里作为江南水乡的一个文化古镇，有退思园等几个著名景点，有几座值得一看的明清建筑物，有同里湖、叶泽湖的美丽景

色，有新鲜可口的菜肴点心，而且同上海、苏州那么邻近，现在就有条件开放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它以水乡、古朴的特点，对国内外旅游者都具有吸引力。但是我们认为，它主要应该面向国内旅游者(不是主要面向国外旅游者)，按照这个要求来考虑建设和管理，才符合同里镇本身的现有条件。

2．关于实施步骤和办法。从县到镇到群众，都赞成采取"量力而行，分期分批"的步骤。这次在同里与县城建局的同志交换意见，认为采取"三、两、三"的步骤是可行的。

"三"，就是对同里的建筑物和风景点，划分为三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是指镇区内的八处主要景点，如退思园、环翠山庄、陈去病故居、几座宋明清代的石桥等，是只准维修，不准乱动的。二级保护区，是指同里镇建成区(约0.6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三级保护区，是指包括镇区以外几个主要景点和直到同里湖、叶泽湖、南星湖边的保护范围。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保护要求和修复时间都有所不同。这就区分了一般和重点的关系，解决了需要和可能的矛盾。

"两"，就是把建设文化古镇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完成，1986年以前为一段，2000年以前为一段。远期目标要做到：布局合理，功能明确，生产发展，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市容整洁，设施配套，居住舒适，水乡古镇得到保护，风景旅游初具规模。近期目标的要求是：布局逐步调整，住房紧张状况逐步缓和，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供水普及率得到提高，绿化面积有所扩大。在保持江南水乡古镇的前提下，主街路面和市容有所改观，新辟住宅区初具规模，重点景点逐步修复。

第二个"三"，就是要调动三个积极性：一是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如城乡建设部、社会学研究所、省城建厅、省文管会等。他们角度站得高，了解情况全面，在智力和资金上也有力量支持。二是县有关部门的积极性，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

想说"羊身上要出羊毛"。吴江县几个重点镇的建设，同里镇总体规划的实现，经济布局的合理调整和发展，主要是靠县里各个部门的力量。三是同里镇全民的积极性，包括现在外地工作的同里人士对家乡的关心和各种形式的支援。

3，关于两个"转化"。同里镇应该积极从少功能的镇转化为多功能的镇，逐步从半封闭式的镇转化为开放式的镇，这是一种客观要求。它反映了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农民对国家的要求的一部分。反映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完善的要求的一部分。它是同里镇9,000人民，包括同里乡的35,000人民，包括历史上同里镇的整个服务范围是15万人民所希望的。

对待这种客观要求，是积极促其实现，还是听其自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但是，正确的态度来自正确的认识，这涉及到对小城镇的作用如何认识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个认识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要研究，即"多功能"和"开放性"的含义。我们认为，现在的同里镇，作为同里乡、屯村乡以及其他有关乡(约100平方公里范围)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实际上还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向多功能转化，就要更多地发挥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功能，同四乡形成网络，起指导作用。健全和发挥这些方面的功能，有利于建镇总目标的实现。沙洲县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他们树立起"大文化"的观念（适应新农村的新特点，教育、文化、科普、卫生、体育五业俱兴，不是只抓看戏、看电影的文化工作），以乡镇、村镇为阵地，培养了一支建设精神文明的队伍，抓住了一批各具特点的文化"单项冠军"起典型示范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物质生产，达到了"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致富之路越来越广"的目的。

向多功能的镇转化，不是抹杀和取消不同类型的镇的特色，更不是制造"功能紊乱"。象同里这样的镇，既然以文化古镇为建镇总

目标，那末，向多功能转化，正是围绕着建镇总目标，为建镇总目标服务的。所以，从少功能镇——多功能镇——有特色的多功能镇，正是符合辩证法的客观发展规律。

要求同里镇从半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化，主要是指人流、物流、信息流这三股"流"。过去流动得还不够活、不够快的现象要改变。这三股"流"，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应该是重点解决的问题。这一股"人流"，又可以带动和影响"物流"和"信息流"。现在同里的镇办、社办企业，只能容纳同里乡30%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劳动力流动余地不大的例子。同里中学偌大一个完全中学，没有一个受过高等师范教育或专业培养的音乐教师和美术教师。据我们所知，专门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师的师范学院的音乐系和美术系，却在为毕业生分配不出去而担忧；同时，镇上确有一些颇有音乐、美术基础的青年，又正在为深造无门而苦恼。这三个如此矛盾的情况一齐摆在这里，真使人不解其症结所在！

同里镇有14家工厂（地方国营厂3个，大集体厂5个，镇办厂6个），据对41名厂级干部作一粗略分析，也可见人才的流动是多么的必要。现列表如下：

同里镇厂级干部年龄状况

年龄构成	人数	占%
35岁以下	6	14.6
35岁～45岁	14	34.1
45岁～55岁	17	41.5
55岁以上	4	9.8

文化程度	小　学	10	24.4
	初　中	22	53.7
	高　中	5	12.2
	中　专	1	2.4
	大　专	1	2.4
与本厂专业的因缘	部队转业的	9	22.5
	“文革”中随意调动而进厂的	14	35
	五匠改行的	11	27.5
	受过专业训练的	6	15

从所列数字可以看出：（1）年龄偏大。（2）文化程度 偏低。(3)专业知识缺乏。这一状况，主要是历史的因素造成的，不是本人的责任。但是，这一状况不能不对同里工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指出这个情况，是为了说明向人才流动实行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四、建设文化古镇的矛盾何在

建设小城镇要遇到许多矛盾，建设一个文化古镇要遇到更为复杂的矛盾。

比如：积极发展工业与保护水乡风貌就是一个矛盾。建设小城镇，不可能依赖国家投资，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来积累资金。因此，积极发展工业、手工业、加工业、服务性行业，开辟各种生财、聚财之道，是迫切的事情。但是，根据同里镇的建镇总目标，不能“抓在篮里就是菜”，不能不计

一切利弊，无视任何后果。乱来一气的破坏当然要不得，那种建设性的破坏也要不得。现在同里镇上办了一个石棉厂，工业污染不轻。如果污染重的工厂再增加那么几个，把水源污染了，后果将不堪设想。象同里这样的江南水乡和文化古镇，还是要下决心保护好可贵的水源（湖、河）和一切值得保护的建筑物（包括古石桥等）。破坏容易建设难，把一个文化古镇保护好，并且建设得更美丽、更健康，是对吴江县、对江苏省，也是对国家的一个贡献。办厂要尽可能办那些没有污染或污染小而可以治理的厂，多办那些可以就地取材的加工工业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械工业。镇、乡应该联合起来开发水面，联合起来发展传统手工业和食品工业，联合起来经营建筑业以及其他的“劳务出口”。

又如：保护明清建筑与改善居住条件，方便交通运输与保护古桥石路，是建设同里镇将要遇到的另外两个矛盾。全镇居民住宅面积为11.2万平方米，37%是明清两代的建筑。在这些建筑物中，多为粉墙青瓦石库门的深宅大院，黑压压地连成一片，有40余处还保存得较为完整。其中有些故居，如南社创始人之一、辛亥革命爱国志士陈去病的故居，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主革命的老战士王绍鏊的故居；还有明代的孚寄堂、卧云庵①，清代的务本堂②；还有《孽海花》前几回的作者金松岑的故居，虽然已很破旧，也有略加修复、予以保留的价值。全镇还有建于宋、元、明、清各代的石桥，现存20余座，造型极美。很显然，对这些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物必须精心维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里镇可以

---

①孚寄堂，清代建筑。据《同里志》记载，此堂系明万历年间南京道监察御史陈王道的旧居。其后人建“侍御坊”，即评弹《珍珠塔》中的陈家牌楼，已毁。但对此说，有不同看法。

卧云庵，明代建筑。相传始建于唐，现存的正殿为明万历年间重建，

②务本堂，清代中期建筑，为同里士绅叶永亿住宅。现保存完好，有两个堂楼、五个厅（轿厅、茶厅、正厅、船厅、花厅）。

原封不动。这么多成片的深宅大院，通风采光很差，不通自来水；家家几只马桶，既不卫生又不方便；楼房极少，占地很多。这些都需要逐步改变，否则不能满足人民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所以，这里重要的是掌握一个"度"：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物，必须严格地精心地保护；没有保留价值的，不影响全镇统一格局的，可以有计划地变动。至于哪些有保留价值，哪些没有保留价值，全镇的统一格局应该划定多大的范围等问题，只要尊重专业人员和群众的意见，是不难统一的。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总体建设规划，但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加强其权威性。看来有必要在适当时候，举行一次有省、市的城建、文管、旅游部门和建筑、园林等有关的专家参加的论证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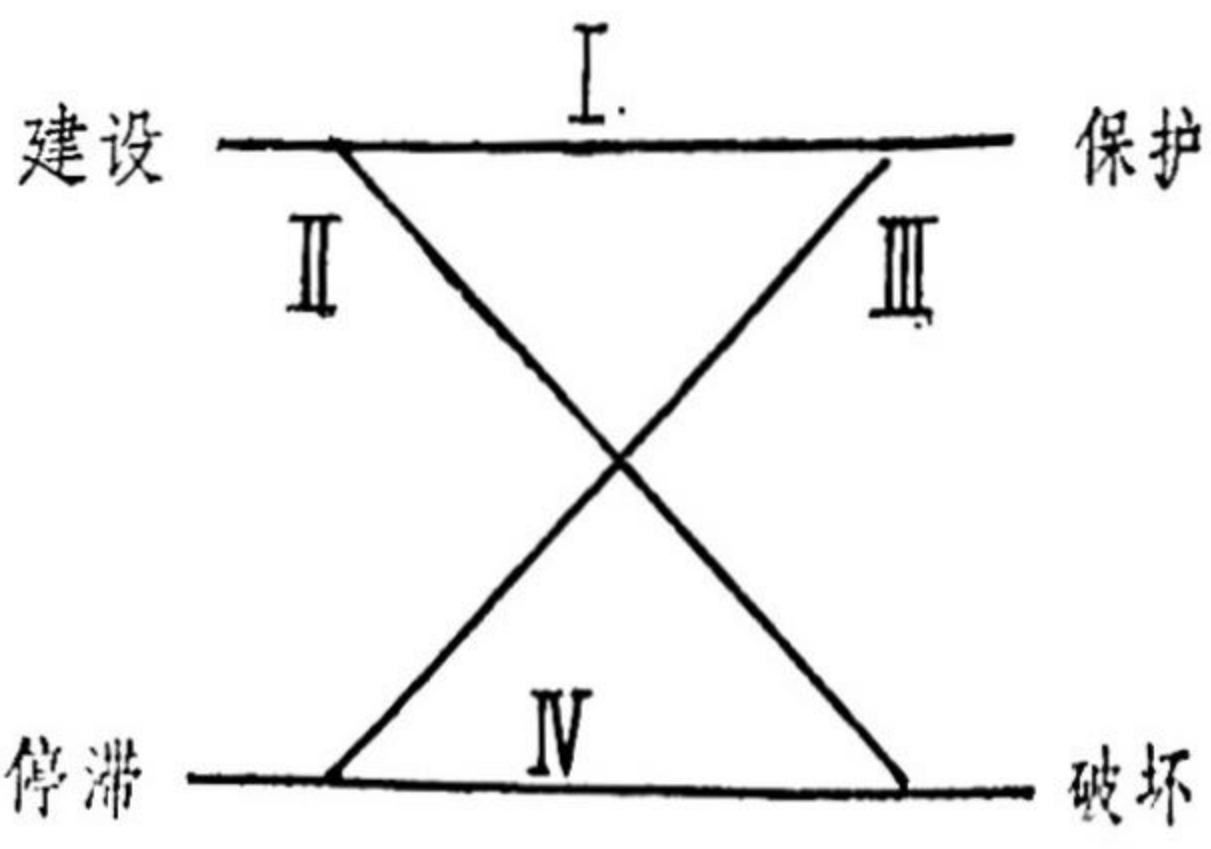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如果同里镇在发展工业生产与保持水乡面貌、维护明清建筑与改善居住条件、方便交通运输与保护古桥石路等几个问题上摆正关系，积极而慎重地处理，做到既把经济搞得繁荣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又使同里镇保持着文化古镇的特色，那末，这里就是一块相当迷人的宝地。不仅同里人民会更加喜爱它，而且对城市的工人、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恩格斯说过，多数人喜欢乡村，故城市肯定将会逐渐缩小。离开城市居住的趋向将难以控制，因为有70%以上的人喜欢住在有阳光、有青枝绿叶的环境和安静的地方。在同里这样的小城镇，有着比阳光和青枝绿叶更美的东西。同里镇现有居民9,000人，我们冒叫一句，再摆上10,000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全国把20,000个城镇和乡镇建设得对城市居民都具有吸引力，其意义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城市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可以下来帮助建设小城镇。这一出一进，这一股人才的流动，于国有利，于城有利，于乡镇有利，于民有利。

上述几个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

的关系问题。上面，我们是就同里讲同里，是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从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少人认为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是矛盾的。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全面地看，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以“矛盾”两个字可以完全说得清楚。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没有经济建设，就没有历史文物。同里镇内河流纵横，沿河的石驳岸峭然壁立，与缓缓的流水刚柔相济，动静相处，恰到好处。在今天，这是一处美好景观。而在古代，就是一项宏伟建设，它有效地保护了河岸和河床，又便利了船只的航泊。这一建设，反映了同里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清代有人填词赞同里市场之繁荣，词曰：“台榭高低临水际，人如蚁，雨挥珠汗云连袂”。没有这样繁荣的经济，不会出现这样的建设，也就不会有如此壮观的遗迹。这就是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在根本上的一致性。

如果我们站在时间坐标的一个点上，也就是从当前来看，则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可以存在四种关系，示意如下：



我们以同里为例来说明这四种关系。谁都承认，同里的古貌保存得好，这是事实，有那清清河水为证，有那亭亭石桥为证，更有那一片明清建筑为证。同里的古貌为什么保存得好，撇开地理

环境等因素不论，从经济建设的大观点来看，这是现代经济建设发展缓慢的表现，即图中关系之Ⅲ。这是一种停滞不前的表现，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表现。同里八十年代才通汽车，靠传统的水运显然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要求。历史上同里的繁荣，靠的是商业和服务业的发达。解放以后，占居民四分之一的地主丧失了剥削者的地位，围绕他们而存在的许多消费行业衰落了。又由于我们实行了以行政区为主的商业体制，同里农副产品集散和商业服务的半径大为缩小，仅剩下同里乡，约占原联系区域的五分之一。五十年代，同里开始发展工业，至1982年，工业产值2,872万元，利润193万元，其中镇属厂利润只有50多万元，镇政府可以从中提取7万元左右，这是城镇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显然是杯水车薪。近几年尚且如此，以前的二、三十年更可想而知了。

经济建设发展迟缓，无力建设，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使古建筑幸免于难，这毕竟是消极的。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其作用就要由保存转化为破坏，即由关系之Ⅱ转化为Ⅳ。因为建筑物年久失修，最终可能沦为废墟。这个转变在同里正在或已经出现。镇上仅存的一座茶楼岌岌可危，仍在营业。不少深宅大院，虽主体、大局尚存，但小园荒芜，楼阁失修，门楼倒塌，木雕剥蚀，败落之象，随处可见。镇房管所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管的房产有40%是险房，1983年的维修费只有35,000元，无济于事。而这些险房里至今仍住着居民。显然，如任其下去，再过几十年，同里的古貌就不见得这样完整了。在此关键之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物部门将同里列为省级保护单位，这对于扭转颓势，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建设不发展，文物也得不到真正有效的保护，这已为同里的事实所证明。那么，可不可以利用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成果，即通过国家拨款的办法来保护古镇呢？同里镇是整个社会的财富，由国家资助搞好保护工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必须

存到：（1）国家的财力比较紧张，全国经济都处在发展之中，建设的投资量大，不可能有太多的钱用于文物保护。（2）同里作为文物，不同于一个园林，一座寺庙，它是一座城镇，是一个活的机体，不但要保存旧貌，还要有新的生命力。因此，同里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该办的工厂要办，该发展的事业要发展。

发展经济建设，也可能有两种结果。最近几年，不少同志呼吁要制止建设性破坏，即关系之Ⅱ。这个问题在同里也存在。例如，著名的退思园在"文革"中被占为工厂，搞得面目全非。举全镇之力填了镇中心的两条市河，为此挖去了两个大土丘。同里本为水乡，"平畴绕郭无崇岗"，"坡坨报数仞高"的坟山，便被推崇为同里一景了（长山岚翠），而今挖去坡岗，河网添埂，一劳而两伤，干了一件大煞风景的事。

在四种关系中，唯一可取的是Ⅰ，即将建设与保护统一起来，在建设中求保护，在保护中搞建设。在同里来说，就是上面说到的划分三级保护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在同里怎样体现建设与保护相一致的原则？我们认为，就同里的情况而论，应当做到八个字：宜居，宜游，存古，求新。

先说宜居。同里的建设与保护首先应当考虑人的需要，要尊重本地居民和周围农民的意愿。同里的现状与人民对现代化生活的渴望是相距较远的，特别是居住条件差。新住宅只有30个单元，占整个住宅面积的3%，绝大部分居民住在通风、采光很差的旧建筑里。这些建筑多为明清时士绅人家的深宅大院，当时的设计只是考虑少数主子的需要，而现在一个宅院住几户、十几户人家，结构自然很不合理，加上时代的进步，这种不合理就更突出了。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同里需要新建一批住宅，翻修一批住宅，腾出一批住宅，需要改进自来水、下水道等公共设施，还需要建设一批科教、文化娱乐设施。

再说宜游。同里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水乡古镇之一。它又临

近上海、苏州，有着较高的旅游价值。现存的大量古代住宅，又是研究我国古建筑的珍贵资料。因此，同里应当成为一个保留其固有特色而能够吸引国内外旅游者的胜地。

为了做到居者舒适，游者惬意，在市政建设上就要做到存古、求新。存古，就是要从总体上保存古老的面貌，有重点地保存一些古代建筑，给游人以古意。求新，就是要有新气象，要有现代化生活所需要的各项设施，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有的同志一谈到古镇，就好象同"新"字可以不沾边，这种思想方法是片面的。问题是要把"古"与"新"很好地协调起来，在同里镇上做到古而不衰，新而不俗。那末，对存古和求新的追求就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怎样使新旧协调，在建筑方面，我国古代园林设计中的美学思想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启发。例如：

隔："隔"是园林艺术中"借"的活用、反用。明代同里出了一位著名建筑艺术家计成，他在论述如何处理园内园外景物关系时说："俗者屏之，佳者收之"，适宜的外景可以借景，而不适宜的外景则应摒弃，即隔开。我国古代在市中建园，往往就是用"屏"的办法，保持了园内景观的独立性。我们可以将此法推而广之，用于城镇建设。就同里论，可以利用河流、绿化等为过渡地带，使新建的住宅或工厂与古镇拉开一定的距离，取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既保持了古镇的完整与独立，又不妨碍新兴居民区、工厂区的出现和发展。古镇区必须建的一些现代化设施，也可以用筑高墙、植乔木的办法加以掩映。

和："和"者，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也。新的建筑应力求使其外在风格与古建筑相协调，在设计上，楼层不可过高，古镇区以两层为宜，镇外亦不宜超过四层。楼面应用中式屋顶，黑瓦、起脊，还可略施飞檐，再将山墙涂为白色或黑色。这样，可以取得与古建筑相似的色调与外观。新的建筑，并不要求完全拟古，内部应是现代化的，外部也只求风格协调。事实上，古建筑也是在历史

中发展变化的。明代风格之简朴，清代风格之繁琐，以及辛亥革命以后中式建筑的某些部分的西化，在同里都可以见到，这些不同年代的建筑混杂一片，并没有影响古镇的风貌。我们应当善于继承，大胆创新，在同里留下既有民族气派、又有时代特色的建筑。要取得"和"的效果，除建筑风格外，市镇格局也是关键。要使总体布局保持一致，在同里，就是要保持沿水成市的传统，让河流起到一个沟联、协调的作用。

建设同里镇的主要矛盾，同现在许多小城镇面临的问题一样，可能是班子和体制问题。有一位同志向我们讲了他对建设小城镇的看法，他是用苏南人常用的谐音表达法来说的。他说，要把小城镇建设好，要解决五个"子"：一是位置，即对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二是班子，即为小城镇配备什么样的干部；三是体制；四是谱子，即小城镇建设要不要有个总体规划，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五是票子，即建设资金问题。有些问题，前面已作讨论，这里着重讨论一下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有关城镇的级别、劳动人事、机构设置、条块关系等方面的，可称之为政制；一类是有关资金来源、经费使用等方面的，可称之为财制。现在看来，小城镇的政制和财制问题，是大可研究的。

首先是把小城镇和城镇工作摆在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江苏全省2,077个集镇中，为什么乡镇和乡以下集镇占97%？有种种原因，但这是一个问题。这说明相当一部分的集镇级别很低，由乡领导，这样就使干部配备、发展生产等方面都受影响。但有的县往往愿意这么办，不愿意把许多有条件的乡属镇升格为县属镇，这是因为有难言之隐。这就是财制影响了政制，是个体制问题。

城镇工作的位置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1954年的时候，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县的工作有过一次重点转移，加强了对城镇工作的领导，把城镇工作摆到了重要的位置。后来，因

为"大跃进"的后果和其他因素，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党大办农业，"以粮为纲"，动员几千万工人和大量城镇人口下乡，最强的干部都派到农业战线上去（当时是必要的），刚刚开始加强的城镇工作又被削弱。待农业开始好转，各方面刚喘过气来，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什么都谈不上了。这又说明：一方面，城镇繁荣和城镇工作与农业的状况真正是血肉相连；另一方面，城镇工作确是多少年来一直没有顾上，现在到了亟待加强的时候了。

其次是城镇工作中遇到的条块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政制"问题。"开封府难当"，镇官也难当，其难之一就是要处理与县属各部门、各企业的关系。县粮食局要在同里镇的富观桥堍盖两幢职工宿舍，但是按照镇的总体规划，这里不是建设居民新村的地方。一个要建，一个不让建，顶了几个月，还是建了，这是"块"顶不过"条"的例子。县工业部门要向镇上的一家工厂派一名干部，镇上坚决不同意，条条只好让步，等了几个月，这是"条"顶不过"块"的例子。县邮电局要扩建同里镇上的邮电所，镇里认为房子应该退后两公尺，几经商讨，邮电部门同意了镇上的意见，这是条块商量办事、协商一致的例子。我们认为，条块之间发生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处理的原则只能是大局为重，商量办事，决不能是以上压下、以"条"压"块"或以"块"压"条"。但有一条，就是对已经定下来的总体规划，谁都应该尊重，这就是大局和长远利益。否则，就是没有原则，就是搞"关系"，是不足取的。

再次是镇与乡的关系问题。同里镇与屯村、金家坝、周庄、车坊、郭巷等乡有个镇、乡关系问题。这主要是经济联系，以及在思想、道德、文化、科普、风俗等方面所起的影响。我国东汉时有这么一首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用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① 这说明，城市（包括城镇）对

①《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59年版。

农村的影响，从古到今，历来皆然。上海对苏州、上海对同里、同里对方圆10公里范围的四乡的影响，好的、坏的、穿的、用的，不胫而走，其快如风。所以，同里镇与屯村、金家坝、周庄、车坊、郭巷等乡，虽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应该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中心示范作用。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同里镇与同里乡的关系问题。他们不同于同里镇与其他乡的关系。他们是一块土地上的两家，是一匹马上的两个汉子。他们之间，不是经济上的一般联系，而是与荣与枯的关系；不是政治上、文化教育上、道德风俗上一般的相互影响，而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问题。但是，现在由于行政体制的关系，是地地道道的两家，河水不犯井水，客气有余而协作不够。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里，行政体制所产生的力量是很厉害的。我们就要利用这种力量来促进生产和建设，使它成为一种"合力"，而不是"分力"或"牵制力"。所以，从长远说，镇与乡的关系从体制上予以考虑和合理解决，是势在必行的。

最后还有个财制问题，这是体制问题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现在同里镇的财源共有三条，1982年收入为103,800元，列表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水电费、工商税、房金三项附加（由县返回70%）	28,650
镇办企业利润提成	71,000
向县属企业集资	4,150
合　　计	103,800

同里镇手里就是这么一点财力，要用来修马路和下水道、修桥梁和石驳岸、修厕所等，还要用来补助中、小学修建教室，补助文化站等七七八八的开支。从同里镇的财源看，一是窄，二是少，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慢，另一原因是财制上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怎样才能打开出路，广开财源，合理财制，促进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关于小城镇的体制问题，由于数据不足，材料不够，有些情况又正在发展，需要看一看和进一步调查研究，这次论述的只能这么多，还很不成熟。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日

（参与这次同里镇调查的，还有李继平、费伟康同志。邵军同志对本文有的章节的内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小城镇的文化生活

——吴江县平望镇调查

沈 汉　唐仲勋

小城镇文化生活怎样？有些什么特点？它与附近农村的关系如何？我们就这些问题，在平望镇进行了一些调查。

平望镇是吴江县属七大镇之一，地处县的中部，是一个水陆两便、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平望乡的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也设在镇上。在行政体制上，镇、乡是分设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社区。镇上的部分文化设施，是与乡的干部群众共享的。作为城乡结合部的镇，在文化生活上，它既受大中城市的影响，同时，它又转而影响附近的农村。

平望镇现在有些什么文化设施可供镇上人民或镇乡人民共享的呢？

据1983年上半年统计：

单　位	数量	服务范围	核定座位	每天正常活动人次	用地面积（平方米）
影剧院	1	平望镇、乡	1,068	2,600	2,300
书　场	1	平望镇、乡	200	100	120
文化站	1	平望镇			18
书　店	1	平望镇、乡		300	154
灯光球场	1	平望镇			884.8

为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镇工会和文化站还合办一个图书室，藏书5,000余册。有些单位和工厂也办了图书室，藏书共52,000余册。镇上厂办俱乐部有17个，均配有专职干部。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化肥厂、水泥制品厂、皮革厂等都设有篮球场。化肥厂有职工篮球队、乒乓球队和棋队的组织，经常开展比赛活动。

我们讲文化是把教育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在内的，平望镇的中学也招收部分农村学生。

平望镇现有教育设施据1983年上半年数统计：

教育单位	教职工人数			班级数	学生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总计	其中				
		教师	行政人员			
平望中学	63	49	14	18	909	12,673
镇中心小学	42	35	7	15	590	3,869
河西街小学	22	19	3	7	273	4,0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群众性的学科学、学文化的热潮正在平望兴起。1983年初，这个镇有12人成为电视大学毕业生，接着又有18名职工考取电大经济管理系。镇工会和文化站配合，恢复和发展了职工业余学校，设有专职干部1名，每年聘请兼职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其办学情况如下：

年度	合计人数	文化班人数						专业班人数					
		电大	电中	高中	初中	高小	扫盲	机械	财会	统计	电焊	美术	摄影
1979	98	32					30						
1980	120	20	48					22			30		
1981	141	16	28	14				19				18	46
1982	229	12	30	62	42			24				19	40
1983	256		17	36	88	17		17	45	36			

以上介绍的是镇上的公共文化设施，这只是反映了城镇居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职工们劳动一天，回到家中，还有各自的家庭文化生活。特别是电视机大量进入小家庭后，人们经过一次性投资，全家人每天可以安逸地坐在家中看电影、听说唱。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还要作详细介绍，这里暂不多说。

当然，无论是公共文化设施的举办，还是家庭文化用具的配置，都与城镇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查中，有两个数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平望镇就业人口已占在册人口的 68.83 %，由于充分就业，平均两个职工供养一个人。二是据1983年 3 月份抽样测算，平望镇每个居民平均月收入为 32.57 元。居民收入的增加，既是人们辛勤劳动促使经济繁荣得到的幸福之果，同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物质生活改善了，还要进一步丰富精神生活。我们在与平望镇干部群众接触中，从退休职工到青少年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的迫切的要求，就是镇上应该开辟一个公园，让他们有一个散步、游玩、交流思想感情、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

平望镇居民的文化生活，虽然好于附近农村，但是，他们和大中城市比，显然又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这里，我们认为有研

究其特点，探索其发展规律的必要。下面剖析的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初步体会。

一、平望镇居民文化生活受城市文化传播的影响较大，居民家庭现代化设备迅速增多，家庭和个人文化生活内容渐趋丰富和健康。

平望镇邻近上海、苏州、杭州等大、中城市，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易受城市文化传播的影响。最近几年来，大城市人民看电视、听音乐、摄影、养花、集邮等文化活动盛行，对平望镇居民影响较大。

为了充实家庭文化生活，平望镇居民首先致力于家用现代文化设备的购置。据1983年10月统计，在全镇七条街道2,563户中（全镇在册家庭户共有2,764户，这里未将居住在企事业单位内部的201户统计在内），已有电视机920台（其中直接购自上海、苏州的占65.5%），收录机200台（其中直接购自上海、苏州的占69%）。电视机普及率为35.9%，平均不到3户人家就有1台。收录机普及率为7.8%，平均13户人家有一台。据调查，绝大多数的家用电视机、收录机是1979～1983年购买的。在此期间，购买电视机883台，占96%；购买收录机199台，占99.5%。这充分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望镇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电视机的迅速普及，收录机为众多家庭购置，是因为这些现代文化设备适合家庭文化生活的需要。电视不仅传递信息快，使人们能够迅速了解到国内外重要新闻，而且电视节目以图像、音响配合语言文字进行报道或表演，易被人们接受。人们看了丰富多样的电视节目，可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和兴趣范围。人们在家中选看适合自己兴趣和爱好的电视节目，自由方便。收录机可供人们反复欣赏自己喜听的音乐，也是帮助人们学习科学文化和外语的一种工具，因此它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

摄影、美术、书法艺术活动，近几年逐渐在镇上的青年中开展。镇文化站和工会适应一部分青年的要求，于1981年和1982年先后举办两期摄影、美术学习班，有77名青年学会了摄影、印相和放大技术。通过这批人，把摄影和美术两门艺术传授给更多的青年，以致镇上两家照相馆被迫关闭了一家。

近两年来，人们以多种形式外出旅游，除部分青年新婚旅游和工厂组织的旅游活动外，有几个青年结伴出游的，有中年夫妻带儿女全家出游的，也有退休职工到外地访亲探友顺道旅游的。平望人出游的地点是上海、杭州、瑶林、绍兴、无锡、宜兴、海宁　时间一至三、四天不等。可喜的是，有些农民也参加旅游活动，1982年，到海宁观潮的游客中，就有不少是农民。吴江旅游社在平望设站，为镇上居民出外旅游提供方便，成为镇上的一个新兴服务行业。

这几年，家庭养花之风盛行。这里的居民受到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的亲友影响，又从报刊电视屏上看到养花经验的介绍，养花兴趣越来越浓。家庭养花的品种也从一般的品种向名贵品种发展。酒酱厂职工张再良订了多种有关养花的刊物，钻研养花技艺，他还从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等地引进西洋杜鹃花59个品种、东洋杜鹃花20多个品种，成为镇上有名的"杜鹃花"之家。平望镇家庭养花之风之所以盛行，还有以下几个因素：（1）近几年，镇区北部、西部新建了许多新式楼房，一部分居民住房条件有了改善，装点新居，美化环境成了这一部分居民的自觉行动；（2）一批老年职工退休后，晚年生活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心情舒畅，他们植树养花，怡情养性，以此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3）实行计划生育以后，青年夫妇的家务负担减轻，每天紧张工作之余，养养花，能够产生调剂身心、赏心悦目的作用；（4）镇上没有公园，绿化覆盖面小，人们在庭院中养花，借以享受一些自然界美的赐予。由于家庭养花兴起，卖花的商业活动也应运而生。镇上有十

多户人家经营花草生意，苏州、绍兴等地也有花农来此出售花卉。为了满足群众需要，1982年平望镇投资3万元办了一个约3亩地的苗圃，向居民出售花苗和盆花。

集邮活动已在中、青年男子中开展。有人把自己的业务和爱好结合起来，按专业集邮。银行职员杜家鑫的“储蓄”专题邮集、医院李国兴的“医疗卫生”专题邮集、房管所张志远的“房屋建筑”专题邮集，都参加了1983年苏州市集邮协会举办的集邮展览。镇上有31人和邮局建立了预订新邮票的关系，他们都长期订阅《集邮》杂志。通过集邮活动，他们丰富了知识，增强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

青少年模仿性强，大城市流行什么游艺活动，他们也跟着学。前几年，打康乐球、玩汽枪、溜旱冰都时兴过一阵子，现在想玩电子游戏，总希望文娱活动不断花样翻新。

二、平望镇是周围农村的文化中心，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活跃农民文化生活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镇上许多工人和干部的家都在农村，有的小家庭在镇上，老家在乡下。平望镇现有农民工2,595人；在平望乡社办工厂（设在镇区内的）务工的社员888人，两者合计3,483人。他们白天在镇上做工，晚上回农村住宿。他们是城乡文化交流的直接沟通者。

平望镇影剧院是镇郊农民常去的文化娱乐场所。据影剧院同志长期观察，每天中午的一场电影，观众以镇郊农民为主；晚场电影的观众，除本镇居民和过往旅客外，也有镇郊的农民。农村妇女上街，往往扶老携幼，办完事情，全家看一场电影，尽兴而归。

镇上的书场兼茶座，是老农上街喜欢去的地方，边听书，边喝茶，一举两得，其乐无穷。茶馆是农民上街歇脚和交流信息的场所，平望镇四家茶馆的老茶客多是镇郊的农民。他们边喝茶，边谈论农村中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镇上的新华书店是向农村输送精神食粮的渠道之一。1982年营业额为14.3万元。其中对梅堰、横塘两个乡销售图书6.1万元，占42.6%；平望镇和平望乡8.2万元，占57.4%。对农村销售的图书主要有教科书、农技书、连环画、历书、年画、少儿版的《红楼梦》、《三国演义》，通俗本《水浒》等，零售杂志如《文化生活》、《青年一代》、《服装裁剪》等，往往供不应求。

镇上的邮局向农村发行报刊，是输送精神食粮的又一条渠道。根据邮局报刊订单统计，除了在镇上的社队办企业和集体单位外，1983年平望乡农民个人订报纸32种，179份，其中，科技报纸6种，51份；有关文化教育的报纸4种，42份；有关体育卫生的4种，7份。刊物共订51种，95份，其中：科技刊物18种51份，文教刊物8种，11份，文娱刊物10种，11份。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个人订阅的报刊以科技报刊为数最多，如《浙江科技报》38份，《无线电》23份；其次为文化教育的报刊，如《中学生学习》12份，《中国少年报》24份。从这里可以看到，农民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要求日益迫切，并重视和关心到对子女的教育。

平望镇的教育事业对农村是开放的。平望中学1983年上半年共有在校学生909人，其中农村学生476人，占53%。从1979年到1983年，全校初中毕业生914名，其中农村学生413名；高中毕业生568名，其中农村学生349名。考取大专学校的59名应届毕业生中，农村学生39名，占66%，考取中专的42名应届毕业生中，农村学生34名，占81%，均多于镇上的学生。

目前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平望乡有两个电影放映队轮流到各大队放映，一般两个月放三次，下雨不放，停电也不放。由于放映队用的是16毫米的小机子，片子又较陈旧，不能满足近郊农民的要求。平望镇的“乡脚”小，除沿苏嘉公路、沪宁公路的8个村外，其余20多个村交通不便，对镇上的一切文化设施无法享受。据1983年3月份统计，平望乡31个村总共只有电

视机68台，平均每个村只有2～3台。电视机未普及的原因，不是农民买不起，而是供电不正常；没有差转台，图像模糊；电视机坏了，修理困难。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社员随着收入的增加，要求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要求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农村对小城镇进一步发挥文化中心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平望镇居民的文化生活既有自己传统的爱好，又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江南一带地方戏曲，音调委婉动听，成为这一带居民的传统爱好。解放以前，平望镇有一家“梅园”剧场，主要演出文明戏（滩簧）或绍兴戏（越剧）。解放以后三十多年来，越剧、锡剧、沪剧三大剧种一直受到这一带镇乡人民的喜爱，吴音越调，通过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传遍小镇街巷。这里居民普遍喜欢收看上海和浙江电视台，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个台安排的越剧和沪剧节目较多。这些剧种的戏曲片在平望男女老少中，特别是中老年妇女中有着广泛的市场。越剧《红楼梦》影片第一次于1978年11月在平望镇放映，五天内放了32场，观众空前踊跃；1981年又复映8场，1,068个座位的影剧院，8场观众11,144人，盛况始终不衰。1979年7月，6天放映了36场越剧片《碧玉簪》，也是场场满座。

苏州评弹说、表、逗、唱，生动细腻，也深受平望镇居民的欢迎。省曲艺团、上海评弹团在五十年代都曾来此演出，反映极为强烈。六十年代初，评弹艺术进行改革，上海青年评弹团来镇演出现代剧目《十五斤油》，每场观众连加座达600多人。十年动乱期间，只能演唱由现代京剧改编的那几个书目，但是观众仍然耐着性听下去，无非是出于对乡土之音的酷爱罢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评弹艺术恢复了传统节目，同时也涌现出大量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演唱节目，听众非常踊跃。近年来，上海市和浙江省广播电台的“空中书场”办得很活跃，每天几档评弹节目

已成为广大居民特别是退休职工的必听内容。但是，镇上的书场营业情况并不太好，现在每天日夜两场的听众只有100多人，而且多为那些除了评弹别无所好的老头儿。主要原因是：(1)"空中书场"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听众的要求；(2)青年人对评弹不大感兴趣；(3)长篇评书天天连讲，老听客考虑到要每天花钱买票(每次票价壹角伍分，泡茶壹角)，不如在家看电视，听收音机了；(4)县以上曲艺团较好的评弹演员极少来此演唱，而多数听众欣赏水平提高了，来此演唱的书目和演员总吸引不了听众。

看电影在人们文化生活中仍然占重要地位。平望镇居民爱看场面热闹、故事性强的影片。武打片和古装故事片的放映，在镇上引起广泛的兴趣。镇上的人喜欢谈论1982年8月《少林寺》放映的盛况。这部影片在7天内放映了52场，观众达52,435人，营业额达9,816.50元，占全年110部影片收入的9.6%。《杜十娘》、《白蛇传》每次放映，都是场场满座。但获得文化部优秀电影奖的《邻居》，在平望放映时上座率只有34%，获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奖的《城南旧事》，上座率只有40%。两相对比，颇发人深思。看来，城镇观众的欣赏水平还有个提高的问题，电影部门也有一个改进工作的问题。有了好的影片，要善于向群众作宣传。

在调查中，我们既发现平望镇居民有着传统爱好，同时，也发现他们不断增添新的爱好。这个镇的广大中青年喜欢看电视节目中的各种球赛，就是一例。每次转播我国女排比赛的实况，连许多老年人也被吸引到电视机前，聚精会神观看。中央电视台的《体育之窗》和上海电视台的《体育大看台》，成为这里的青年们最爱看的节目之一。1983年，在全县职工篮球比赛中，平望镇代表队，三场都打输了，他们对"花了300元，输了三场球"很不满意，要求经常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再有，就是学科学、学文化，也日益成为平望镇居民文化生活的新内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平望镇在册人口为

8,612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占1.9%，高中文化程度占14.6%，初中文化程度占33.9%，小学文化程度占34.8%，文盲半文盲占14.8%。很显然，这个镇居民平均文化水平是不高的。因此，那些通俗易懂，风趣有味和有实用价值的书报杂志，最受欢迎。据新华书店同志说，他们主要以销售通俗读物为主，连环画拥有大量读者，科技读物也是畅销的。邮局同志也告诉我们，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镇上个人订阅的报刊数量日益增多。如《报刊文摘》，1982年初个人订129份，1983年初上升为460份；《新民晚报》1982年初个人订11份，1983年陡增至348份。有关辅导性的学习刊物，订阅份数也明显增加，《中学生学习》1982年末只订了5份，1983年初增至71份；从1983年开始，镇上新增订《中学生数理化》62份，《作文通讯》84份，《作文》64份。浙江出版的通俗文艺刊物《山海经》，内容生动，趣味性强，每期售销量达1,500份。群众自己拿钱购买书报杂志，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学习热情的高涨。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应该引起新闻出版部门的关心。

综上所述，小城镇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它的发展既受大中城市的影响，又以农村为基础，离不开广大农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小城镇的文化生活向城市化方向发展，文化设施逐步增多，文化生活较前丰富。现在城市的文化生活状况比小城镇好，小城镇又比农村好。只有更多地关心农村文化生活的发展，努力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文化中心，才能逐步缩小这种差别。目前苏州市许多县正在进行的文明小城镇建设，在集镇兴办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平望镇地理、交通条件好，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小城镇。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人口的增长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和教育科技的设施也要相应增加；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文化生活也要不断丰富。因此，在小城镇建设中，必须要

两个文明一起抓，既要重视抓好物质文明的建设，又要重视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镇文化中心要重视镇乡人民传统的兴趣爱好和实际需要，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让广大镇乡人民都能享受丰富多采、高尚健康、振奋精神的文化生活。

一九八三年十月

太湖风景区四个旅游小城镇的分析研究

吴大声　居福田

太湖风景区是我国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这个以山水组合见胜的自然湖泊大风景区内，现已决定开发建设的有十三个景区。吴县的东山、光福、角直和吴江县的同里，就是这十三个景区中的四个。坐落在这四个景区内的东山镇、光福镇、角直镇和同里镇，它们既是各自景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景区的依托点。从性质上讲，它们都是建设中的旅游小城镇。

探讨风景旅游小城镇建设中的特点、问题及其发展规律，是小城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我们通过对这四个旅游小城镇的比较分析，就这类小城镇的建设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四个风景旅游小城镇的比较分析

这四个镇，虽然同是太湖地区的旅游镇，其中三个还在同一个县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的不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一)地理环境的异同

东山、光福、角直、同里都位于苏州市的周围。东山和光福在苏州城西南，它们分别在太湖东侧的两个半岛上，境内有山、有水、有平原。东山镇距苏州城40公里，有公路直达苏州；光福镇距苏州28公里，苏太公路旁镇而过，浒(墅关)光(福)运河横贯东西，水陆交通都较便利。角直镇和同里镇在苏州城东南，都是太湖水

网平原区的湖荡平原，两个镇都为湖荡、河港所环绕。角直镇距苏州城25公里，有苏角公路直达；同里镇距苏州城22公里，有公路经吴江通苏州。角直和同里都有航道通苏州，这两个镇还能东经水面开阔、一望无际的元荡等湖荡，与上海市正在建设"大观园"的淀山湖连成一片。从同里至淀山湖，水路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航程。

（二）资源丰富的文物古迹

这四个镇，又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镇。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居民在这里生活。太湖周围是古吴越文化发源地，在东山、光福、角直一带，留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在姑苏筑城建吴都，东山、光福为吴王游猎采食之地，东山的武山，光福的虎山，相传为吴王养虎处。东山一名胥母山，相传伍子胥曾迎母于此。吴越交战，攻伐进退，水军屡经太湖，东山、光福为吴国前沿阵地。东山翠峰上的"望越台"，相传为吴王所筑；杨湾里的"演武墩"，为吴国操练水军之地。吴王阖闾在征越途中，曾在角直镇南吴宫村营造行宫，后来他的儿子吴王夫差又在角直镇西郊甫里塘北岸建筑梧桐园。东山、光福山青水秀，风景如画，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游历吟咏题诗作画的地方，留下诗画、碑刻等历史文化遗迹很多。角直、同里地处水乡泽国，古时交通闭塞，是失意的达官贵人和退隐落魄的名人雅士投居之地。同里是有名的出状元、进士、举人的地方。他们早年出外做官，晚年"衣锦荣归"，便在镇上建造深宅大院、亭台楼阁，供自己享乐。因此，同里镇留下的古建筑甚多，人文资源相当丰富，是一个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好地方。

（三）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东山景区和光福景区都是三面环湖的半岛，层峦迭翠，花果满山，湖中有山，山外有湖。湖光山色，风景佳绝。景区内，古建筑、古桥、古墓、古庙、古树、名泉、石雕、砖雕很多。东山

镇和光福镇的镇内景点与镇外景点，联成一线，相互映衬，相辅相成。

角直景区与同里景区，都以水乡文化古镇为主体。镇内河流纵横，自成水网，河街水巷，因水成市，因水成园，巧妙地把水、桥、路、古建筑、古典园林、名胜古迹联系在一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成一体，构成优美的水乡景观。角直镇和同里镇布局格调大致相似，但同里镇保存较完好，河街水巷民居房屋整齐；角直镇古建筑拆毁较多，给人以某种衰败的感觉。

(四)风景资源存毁的区别

这四个镇原有的风景资源，都比较丰富。但由于作为旅游区建设的时间有迟有早，原有的旅游条件和保护措施不同，加上十年动乱中的破坏程度不同，因此，风景资源的存毁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从而带来建设上难度的不同。其风景资源的存毁情况见下表：

表1：　　四个镇景点存毁统计

镇别	原有景点					已开辟的新景点	准备开辟的新景点
	原有	现存	已毁	严重损坏难以修复	损坏较重可以修复		
东山镇	10	3	7			5	6
光福镇	10	4		1	5		1
角直镇	11	1	3	5	2		1
同里镇	16	1	13	1	1		2

网平原区的湖荡平原，两个镇都为湖荡、河港所环绕。角直镇距苏州城25公里，有苏角公路直达；同里镇距苏州城22公里，有公路经吴江通苏州。角直和同里都有航道通苏州，这两个镇还能东经水面开阔、一望无际的元荡等湖荡，与上海市正在建设"大观园"的淀山湖连成一片。从同里至淀山湖，水路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航程。

（二）资源丰富的文物古迹

这四个镇，又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镇。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居民在这里生活。太湖周围是古吴越文化发源地，在东山、光福、角直一带，留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在姑苏筑城建吴都，东山、光福为吴王游猎采食之地，东山的武山，光福的虎山，相传为吴王养虎处。东山一名胥母山，相传伍子胥曾迎母于此。吴越交战，攻伐进退，水军屡经太湖，东山、光福为吴国前沿阵地。东山翠峰上的"望越台"，相传为吴王所筑；杨湾里的"演武墩"，为吴国操练水军之地。吴王阖闾在征越途中，曾在角直镇南吴宫村营造行宫，后来他的儿子吴王夫差又在角直镇西郊甫里塘北岸建筑梧桐园。东山、光福山青水秀，风景如画，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游历吟咏题诗作画的地方，留下诗画、碑刻等历史文化遗迹很多。角直、同里地处水乡泽国，古时交通闭塞，是失意的达官贵人和退隐落魄的名人雅士蛰居之地。同里是有名的出状元、进士、举人的地方。他们早年出外做官，晚年"衣锦荣归"，便在镇上建造深宅大院、亭台楼阁，供自己享乐。因此，同里镇留下的古建筑甚多，人文资源相当丰富，是一个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好地方。

（三）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东山景区和光福景区都是三面环湖的半岛，层峦迭翠，花果满山，湖中有山，山外有湖。湖光山色，风景佳绝。景区内，古建筑、古桥、古墓、古庙、古树、名泉、石雕、砖雕很多。东山

镇和光福镇的镇内景点与镇外景点，联成一线，相互映衬，相辅相成。

角直景区与同里景区，都以水乡文化古镇为主体。镇内河流纵横，自成水网，河街水巷，因水成市，因水成园，巧妙地把水、桥、路、古建筑、古典园林、名胜古迹联系在一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成一体，构成优美的水乡景观。角直镇和同里镇布局格调大致相似，但同里镇保存较完好，河街水巷民居房屋整齐；角直镇古建筑拆毁较多，给人以某种衰败的感觉。

(四)风景资源存毁的区别

这四个镇原有的风景资源，都比较丰富。但由于作为旅游区建设的时间有迟有早，原有的旅游条件和保护措施不同，加上十年动乱中的破坏程度不同，因此，风景资源的存毁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从而带来建设上难度的不同。其风景资源的存毁情况见下表：

表1：　　四个镇景点存毁统计

镇别	原有景点					已开辟的新景点	准备开辟的新景点
	原有	现存	已毁	严重损坏难以修复	损坏较重可以修复		
东山镇	10	3	7			5	6
光福镇	10	4		1	5		1
角直镇	11	1	3	5	2		1
同里镇	16	1	13	1	1		2

表2：　　四个镇园林、名胜、古迹存毁统计

镇别	园林				名胜古迹											
	古典园林		现代园林		古寺庙		古塔		古桥		古墓		古树		名泉	
	原有	现存	原有	现存	原有	现存	原有	现存	原有	现存	原有	现存	原有	现存	原有	现存
东山镇	17	0	1	1	17	2			2	2	7	7	很多	8	16	4
光福镇	1	1			5	3	1	1					7	5		
角直镇	1	0			1	1			72	35	2	2				
同里镇	1	1							65	30						

从上列表中可以看出，东山、光福现存的和可以修复的风景点、名胜、古迹较多，旅游资源仍较丰富。角直、同里现存的和可以修复的风景点、名胜、古迹较少，但这两个水乡古镇保留下来的明清古建筑、古桥特多，同里镇明清建筑较为完整的有四十多处，角直镇现存的明清建筑也有二十多处，特别是这两个古镇人文资源较多，有待进一步挖掘。这种人文资源，无疑也是一种无价的精神文化资源，同样也是一种经济财富。

（五）发展旅游业的差别

这四个镇目前旅游业的开展情况，也有较大差别。大体情况是：东山游客较多，旅游设施较好。现东山每天有游客六百多人次，春秋游览季节和杨梅、枇杷、桔子等花果上市时，游客每天可达三千多人次。每天除了有二十二班客运汽车满载旅客、游客到东山外，平均每天还有各种游览车辆八十辆次载游客来东山游览。镇上有饭店六开，两家旅社，床位二百五十张，为旅客、游客食宿提供方便。镇上有旅游服务组一个，游览客车一辆，导游四人。游客可乘游览客车沿环山公路到一些风景点观看湖光山色和名胜、

古迹。外地来东山旅游的游览专车，也可以请东山旅游服务组的导游为游客服务。光福游客也不少，平时每天约有四百多人次，每年二月间，梅花盛开季节，慕名去邓尉观梅的游客每天有五、六千人，高峰时达万余人。镇上有饭店三爿、旅社两家，二百多个床位。由于目前可供游览的景点不多，旅游设施少，游客都当天返回苏州，很少有在光福镇住宿过夜的。角直镇保圣寺唐塑罗汉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从外地到角直保圣寺看罗汉的游客平均每天有八十多人次。同里镇现尚未开放，目前只有极少数零星游客。角直镇和同里镇除了有几家小饭店可供游客吃饭外，目前缺少其他旅游设施。总之，旅游业在发展中，并有待于开发。

(六)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的不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迟有早，也由于交通条件改变的有先有后等原因，目前这四个镇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别。东山镇和光福镇，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就修通了公路，社办工业起步早，加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花果、水产、农副产品资源较多，经济基础较好。角直镇和同里镇，过去只有水路，交通不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修通了公路。社办工业办得迟，资源也较少，经济基础较差。四个镇的人口和经济概况如表 3：

表3：　1982年四个镇人口和经济概况表

项目 / 镇别	人口			工业总产值		商业服务业营业额（万元）
	常住人口（人）	在册非农业人口（人）	在册非农业人口占常住人口%	总产值（万元）	按在册非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元）	
东山镇	7,594	5,383	70.88	3,882	7,211	2,108
光福镇	7,773	4,893	62.94	3,229	6,599	1,229
角直镇	12,109	5,239	43.26	1,372	2,569	2,628
同里镇	9,773	6,847	70.06	2,637	3,851	1,141

这里，想附带说明两点：一是角直镇和光福镇常住人口较多，前者因为包括昆山县南港乡一部分常住角直镇的人口在内，后者包括光福乡光福大队的全部农业人口，均住在光福镇上。二是角直镇商业服务业营业额多，是因为该镇乡脚大，它是周围九个乡的中心镇。东山镇虽然乡脚小，只有东山一个乡，但外来东山旅游的、开会的人多，平均每天流动人口在千人以上，加之农民较富裕，购买力强，所以商业服务业营业额也较高。

我们对这四个风景旅游小城镇作上述各方面的分析比较，是试图说明即使相同性质的小城镇，也还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重点，不同的基础，在建设上也要因镇而异，不能搞"一刀切"。

二、风景旅游镇建设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感到，在风景旅游镇的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下面五个关系问题。

(一)正确处理风景镇建设与工业建设的关系

解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强调了变消费城镇为生产城镇，这对恢复和发展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忽视了不同类型小城镇的性质，不是从小城镇原有的各自的特点出发，来进行改造和建设，城镇的发展方向、重点不明确。对这四个小城镇的建设，没有把它们作为文化古镇、风景旅游镇来对待，让它们以独特的风貌给人以美的享受，发挥它们特有的多种价值作用。相反，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中，有意无意地破坏着各种风景资源。不可否认，目前这四个镇上所办的不同数量、不同规模的工厂，为繁荣当地经济，增加国家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确实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另一方面，它们确也侵占了或破坏了无法再生产出来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风貌。突出表现有四点：

1．破坏景观。在工业建设中，选址建厂总是放在镇边路口，

对工厂来说，交通是便捷了，但风景镇的景观，往往被破坏了。如坐汽车进入光福，首先见到的是纺机厂等几家工厂的烟囱矗立、浓烟滚滚，这和古塔高耸、小桥流水的古镇面貌很不协调。再如同里，下车后进入镇区的第一幢建筑便是一家油厂，散发着阵阵油脂的怪味。过路人觉得不是味道，游人更觉煞风景。

2. 占用古建筑、古庙、花园等景点建厂，直接影响和破坏了景区建设。东山镇的启园（又名席家花园），堪与无锡蠡园媲美，"启园春晓"，是东山景区的著名景点。但七十年代初，被吴县太湖仪表元件厂占用，几经交涉，不肯搬迁。该镇著名的雕刻大楼，现改作县招待所，大量游客不得其门而入，常常乘兴而去，碰壁而归。再如同里传说为《珍珠塔》里陈御史家的陈家牌楼宅邸，也为一家电机厂所占用，房屋还进行了改建，已难再恢复旧貌。

3. 工厂布局不合理，集镇职能混乱。由于过去没有城镇建设规划，办厂往往是利用民宅和小块空地兴建或扩建的，厂区小，建筑密度高，道路窄，无发展余地，既影响交通，又影响市容和妨碍景观。同时，开工时的机器喧闹声，对四周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带来了干扰。

4. 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如角直的化工厂、屠宰场，都设在镇中心，污水直接向河内排放，加上河道狭窄，宣泄不畅，污染了河水。

发展工业与建设风景旅游小城镇，如能统筹规划，合理安排，这些矛盾照例是可以避免的。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从抓规划入手。要依据太湖风景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制订出各个镇的总体建设规划，在工业调整中，逐步予以解决。当前首先要做到：一是侵占景点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设法搬迁。要懂得有些珍贵的景观、文物、古迹，是无价之宝，一旦毁损，便再也无法复原和替代。二是逐步解决有关工厂的污染和噪音等问题。今后在这类城镇办厂，应当着重发展农副产品加工、轻工纺

织、手工艺品、花卉园艺等等，使之与风景旅游镇的建设相适应。

（二）正确处理风景旅游镇的景点建设与农村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关系

当前在这个问题上突出的矛盾是，有的镇在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景点，其建设得不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有的生产队搞副业，破坏了景点面貌及地形的完整。如数百年来即以“邓尉探梅”出名的光福“香雪海”，过去号称“十里梅香”，现在梅香已无十里，梅树面积下降，数量减少，从建设景区要求出发，应该多种梅树，否则，“香雪海”将名不副实。但在当地农民的经济收益中，梅子已降到第五位，其次序为：一、工业；二、观赏苗木；三、盆花；四、桂花；五、梅子。农民种梅积极性不高。自1983年起，梅子收购价调高了，有的队才开始重视种植梅树，但要恢复到过去的盛况，还将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再如坐落在东山镇旁太湖中的三山，景色秀丽，优于鼋头渚的三山。农民却在这里开山取石，把山搞得象座火山，有关方面指出后，这种不顾子孙后代“挖肉补疮”的蠢事仍未完全停止。坐落在光福镇中心的塔山，也已规划为景点，但附近农民仍去挖山坡上的黄泥，卖给煤球厂，作为一项副业收入，破坏了山貌山形的完整。

农村经济的发展，应该同景点建设和风景资源的开发保护协调起来。景区景点建设，如果得不到当地居民群众的支持，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建设不好的。怎样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1．进行思想教育，宣传建设风景区的重要意义，让群众充分认识建设风景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作用，自觉地与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协作，把景点保护好，建设好。

2．实行法制和加强管理。对恣意侵占和破坏景区景点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处理。国家已公布的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条例》和《规定》等等，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要坚决执行。经相应的人大会议通过并批准的景区景点规划，也具有法律性质，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要遵守执行。同时，对一个景区内的景点要由有关部门实行统一管理。

3. 统筹安排，区别对待，辅以必要的经济手段。影响景点建设的副业生产要坚决制止；对景观影响不大的限期逐步过渡。对某些副业产品，如梅子等，通过价格政策鼓励农民种植，安排挖山取土的生产队或个人从事其他副业生产，尽可能使划入景点的居民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有所改善，使景区建设与发展农副业生产结合起来。

(三)正确处理保存古镇古物与建设新生活的关系

构成风景旅游镇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自然风景与文物古迹，即通常所说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历史形成的东西，依靠它们本身的景观，来发挥美学的、科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教育的种种价值和作用，毁坏了便无法再生产，其价值和作用，也就丧失了。目前，角直和同里，特别是同里，水乡古镇的风貌破坏不大。这两个镇都提出“六不准”，即：不准填河，不准拆桥，不准盖红瓦红砖房屋，不准建高层(二层以上)建筑，不准办有污染的工厂，不准汽车进镇。这对保护有价值的文物和古建筑、保持古镇的水乡特色，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也带来了保护与建设新生活的矛盾。突出的有三点：(1)保护古桥，但影响群众使用自行车和用手推车搬运笨重东西，带来生活上的不便；(2)古建筑内部通风和采光条件不好，有的住户要求改善；有的古建筑已属危险房屋，亟须大修大补以至拆除；(3)有的建筑系群众私人产业，由于子女结婚，添丁加口，需翻建扩大。

我们认为，对文化古镇、旅游城镇的保护与建设的关系上，首先是要保护。如果景观原物被毁，其作用便成泡影。保的目的，还在于发挥其特有的作用。但群众要求改善交通、居住等条件的意见，凡是合乎情理的，也应当尽可能满足。如何处理这保与建的关系呢？当务之急首先要组织专家学者对文物古迹、古桥、古

建筑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作出科学的评价，区分重点和一般，分级保护。对重点保护的无论是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要有保护细则，并落实保护措施，必要时由国家出钱维护和整修。对保护价值不大的建筑物，如确实需要，应当准许所有者、居住者翻修或重建，但对建筑外形式样、高低、大小、色调等要有明确要求，要服从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必须与水乡古镇风貌相协调和谐。至于交通问题，可考虑在适当地段建筑现代式样的便桥，以方便手推车和自行车的通过。商业部门也可以根据水乡特点，用小船组织送货上门服务，用多种方法方便群众。

（四）正确处理镇区建设与景区建设的关系

这四个小城镇分两种情况。角直与同里，镇区即景区，并逐步向外延发展，建设重点就在镇区，维护并整修好镇区的河流、街道、古桥、古树、古建筑、其他古迹等，就搞好了景区建设的重点。东山与光福，其城镇则是周围景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景区范围较大。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有一个城镇建设与景区建设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问题。旅游城镇应当是景区的依托或中心。因此，应当十分重视景区内有关的小城镇的建设。现在看来，东山和光福，相当一部分建筑已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红砖红瓦或平顶的高层建筑，全部恢复古镇旧貌，已较困难。但今后的建筑，应该努力和周围的景观相协调，与旅游城镇的性质相适应。在处理镇区建设与景区建设的关系上，应重点抓这样几条：

1.大量绿化、美化镇容。如同里提倡沿河人家，利用小块空地和围墙等等，种植花木和布置盆花，美化镇容。据粗略估计，全镇已有盆花盆景一万余盆。大量绿化时，还应适当多种些乔木，可使某些突出与镇容不协调的建筑物，掩映在绿树林中。

2．布置镇内景点，并在镇口路旁建设绿化林带。绿化林带的树木要高低差落多姿，通过这种绿化系统的引进，水乡河道的贯

申，使镇区与镇外景点有机结合起来。如光福假使能在镇郊进一步绿化，并适当拓宽与建设上淹河与下淹河的景点，就能使镇区与"香雪海"、"司徒庙"等密切联系起来，构成完整优美的画面。

3. 镇区还要建设提供旅游者憩息的场所和食、住、行的条件，使镇区真正成为景区的依托点。

(五)正确处理镇区景点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小城镇的特点是工农结合，城乡结合。风景旅游镇当然也不例外。风景旅游镇因为有来自四面八方、国内国外的各种游客，因此，这类小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坏，影响深远，关系特别重大。

关于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胡耀邦同志曾指出，要把小城镇打扮得漂亮一些，可以养鱼，种荷花、牡丹……。城镇要搞娱乐中心，文化中心，尤其是科技中心。这花不了多少钱，可以搞点义务劳动。又说：在政治上，要来它一个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些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要想出些有效的办法来。风景旅游镇，就要按照这一指示，做建设精神文明的先行者。

目前，这四个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等方面，总的说还是比较好的。当前突出的矛盾是由于小城镇那种城乡结合部的特点和位置，农村里某些不文明的思想作风，渗透到镇上。住镇插花农户中一部分人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和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直接影响到风景旅游镇的景点建设、市政建设和市容面貌。但是，也有搞得好的地方，光福是多年的卫生先进镇，他们提出的讲卫生口号，比较切实可行。如"早起十分钟，搞好卫生再上工"。同里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打扫卫生，效果较好。

风景旅游镇的精神文明建设要取得成效，关键是在胡耀邦同志所说的，要"扎扎实实地进行"，要有"有效的办法"。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制定乡规民约，规定若干解决精神文明建设中主要矛盾

的项目，并通过加强检查督促，教育镇上的插花农户和其他群众贯彻执行。但这项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贵在经常。一阵风刮过就算，是永远也建设不起精神文明来的。

三、对加快风景旅游镇建设的设想

随着对外旅游事业的发展，也随着国内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旅游人数也在与日俱增，必须相适应的是要加快风景旅游镇的建设。但在国家不可能用大量投资来建设风景旅游区的情况下，如何加快这些小城镇的景区景点建设呢？比较现实的和科学的做法是：

（一）首先是抓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价值较高的重要景点建设，充分发挥本镇特有的优势。例如，角直目前能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是保圣寺。光福主要是香雪海和司徒庙的“清、奇、古、怪”四株古柏，东山除太湖风光、紫金庵外，还有镇上的雕刻大楼和启园。同里除目前正在整修的退思园外，主要是水乡古镇的特色。在目前风景区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先抓好这些重要的景点建设，有的进一步加以整修，有的扩大景点范围，有的可以逐年进行建设，并与附近景点配套，未开放的争取及早开放。总之，努力使著名景点做到名实相副。这是建设好景点和风景旅游镇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没有重点，不用重点来保一般，企图齐头并进，全面开花，是办不好的。

（二）抓花钱不多就能搞好的景点建设，先易后难，逐步形成完整的景区，吸引游客逗留更长的时间。同时，要挖掘本地特有的风景资源。目前这四个镇除东山外，共同的问题是不能吸引游客逗留较长的时间。如保圣寺和司徒庙，人们往往只花十几分钟或半小时，浏览一遍，便登车而去。就是东山，多数游客也是当天来去，很少过夜的。但光福司徒庙附近的石崚和石壁两个景点，

均保存完好，只要稍加整修，便能开放。较困难的是要修一条长800米的环山公路。由于涉及景区与行政区的不统一，即使有钱，也无法动工。这两个景点如开放后，便能吸引游客在光福吃饭、休息，对繁荣当地经济是有好处的。东山的一些景点配套后，如能再开辟水上至西山的游览线，就可组织东山二日游，使游客在东山住宿过夜。同里和角直，今后也可利用水乡的优势，开辟去淀山湖上海市建设的"大观园"游览线。

至于对风景资源的挖掘，同里和角直，应以人文景观为主，要组织力量进行普查和编写历史资料等，为逐步开放作准备。东山、光福以布置和建设自然景观为主。

(三)抓看、食、息、住、行、讲等旅游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

看：是指搞好景点建设，使人看到和具体感受到祖国的河山壮丽、文化历史悠久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等等。

食：是要让中外旅游者品尝到具有本地风味、特色而又价廉物美的菜肴及其他各种食品。而这几个镇，都具备这一条件和优势，如东山的鱼虾莼菜，光福的果品蜜饯，角直的蜜汁萝卜，同里的卤汁豆腐干等，都能给人以隽永的回味。

息：是在景点适当的地方，要有让旅游者休息的场所。

住：是要有适合旅游者不同身分、不同要求的高、中、低三档的住宿条件。

行：即在景区范围内要有大小配套的道路网和车辆、船只等设备，为旅游者提供方便。

讲：即培养导游人员，使旅游者不仅从自然景观的欣赏中得到美的享受，还从导游对各种人文景观的介绍中学到历史、地理、民情风俗、掌故传说等各种知识，增长见闻，开拓眼界。

这中间，景点建设与其他建设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当然，前者是基础，但如无后者，好景也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目前，东山的上述设施已初具规模，但继续前进中仍有许多困难。如本乡集资所筑的一条长14公里的环山公路，为旅游多开辟了五个景点，而没有为交通部门所验收。因修路用去的投资、砍去的果树等损失不算和无法补偿外，现在东山乡每年为维修这条公路要用去一万余元。培养了四个导游，添置了一辆旅游车，由于有关部门不配给汽油，只好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导游人员只得想法到外地来东山旅游的专车上去讲解，颇得人家好评。

除上述三点外，要加快风景旅游小城镇的建设，还必须提高有关领导的认识和解决体制问题。

认识上的问题主要有二点。

一是将工业收入与旅游收入作比较，认为后者目前收入微小，花本钱去建设景区、景点是"得不偿失"。这种片面认识产生的原因是：第一，不认识保留并建设好几个文化古镇、风景旅游集镇是有长远意义和十分有价值的事。它们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不是用眼前简单的经济收入能算清的。第二，不懂得风景旅游镇的作用，不只是给人们游乐的。这类小城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既是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天然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博物馆，又是人们优良的健身活动场所。第三，忽视了旅游者在食、住、行、购买土特产等消费在旅游小城镇的钱。随着旅游事业的扩大，这类小城镇在工、商收入上的结构将会逐步起变化。只要经营得法，这种"无烟工厂"也能创造经济财富。

二是认为国家不大量投资，旅游镇便无法进行建设。国家对风景旅游镇的建设，要进行必要的投资，但不可能是大量的，主要的是要依靠集体投资的办法来解决。对建设小城镇的资金问题，中央领导曾指出说："一是要节约，二是要一步一步来，三是要动员本镇居民自己动手，不能事事依靠财政支出。这一点，所有城镇都要十分注意。"这同样适合风景旅游镇的建设。当然，在资金问题上，还可多开辟一些渠道，除国家投资外，可以采取群众集

资，有关部门、单位投资，引进外资等方法来解决。在建设步骤上要循序渐进，先重点，后一般，在保护古镇风貌的基础上建设。

关于体制的问题，当前主要要解决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面对景区内各景点的建设，应实行统一的领导。如光福景区的石嵝石壁，作为景区规划由光福乡负责，但行政区划属太湖乡（原属光福乡，1978年才划给太湖乡），而景点房屋又由吴县文管会管理，周围山岭、树木、毛竹则由吴县林场管辖，修房铺路则又由吴县基建局承担，形成“五分天下”。从“石嵝精舍”下山的一条道路，修到半山，山下大队便不让再修。角直规划的景点“莲灯渔火”，却坐落在昆山县南港乡的范围内，因为该镇有一条街属昆山县。体制上的不统一，在块块之间、条块之间产生许多矛盾，一些事情互相扯皮，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不管，有利的事情都想伸手，无利的事情则向外推。我们认为，这四个镇的风景区都是围绕全国四大旅游名城之一的苏州展开的。在市管县的新体制下，客观上完全有条件实行统一领导，问题是要解决市、县之间、条块之间、块块之间的利益均沾问题。为便于统一领导，某些景区与政区能统一的地方应尽可能统一。如太湖乡的潭东大队（即石嵝、石壁所在大队）原属光福，仍可划归光福，以利景点建设。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

松陵镇与大、中城市经济联系初探

徐大伟　蒙　晨　邹农俭

在大、中城市周围的小城镇，如何利用大、中城市的有利条件，来加快自己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吴江县松陵镇在这方面迈出了自己的步子。

松陵镇位于吴江县的东北部，北距苏州市16公里，南距嘉兴市60公里，东距上海市100公里，西北距无锡市85公里。松陵镇的这一地理位置，使它与苏州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三国吴赤乌年间（公元238～251年），松陵作为保卫姑苏的一个军事要塞而建立。到公元909年，松陵镇已是吴江县的县城，属苏州府。自开拓江南大运河后，松陵镇又成了姑苏的一个延伸的旅游点，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但在解放前，松陵镇与苏州市的联系主要是在军事、政治及园林文化方面，经济方面很少联系。

现在，松陵镇是吴江县政府所在地，它不仅是吴江全县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全县经济建设的指挥中心。七十年代起，镇上陆续兴建了一批工厂企业，在松陵镇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与大、中城市，特别是与苏州市的经济联系也大大发展起来。本文着重探讨这种经济以及科学、文化和教育方面的联系。

一、建立经济联系的客观必然性

松陵镇与苏州市的经济联系，是伴随着松陵镇工业的发展而

发展的，工厂数目的增长与经济联系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请看下表：

年　份	工厂数目	与城市挂钩总数	与苏州市挂钩数
1969	8	3	2
1974	23	11	10
1980	34	23	22
1982	43	32	31

上表说明，在1969年前，松陵镇的工业发展很缓慢，当时仅8个作坊性质的初级工厂，主要是些为本镇居民生活和县直机关行政服务的小农具业、木业、竹业、印刷业、粮食粗加工业等，就地产销，因而很少与城市挂钩。1970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松陵镇的工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到1982年，已发展到43个工厂。除原有行业外，增加了机械、化工、纺织、建筑、电子、服装、轻工、制鞋等行业。这些新增的工厂，除个别外，原料来源地和产品市场大部分都在外县和外省。因此，这个时期与城市挂钩的工厂数大大增加了。到1982年，全镇工厂与大中城市挂钩的已有32个，其中与苏州市挂钩的达31个。这种现象说明，松陵镇和大中城市经济联系的发展与本镇的工厂数目成正比例增长。

这种与大、中城市的经济联系，既是工业发展的要求，是生产社会化的结果；也是松陵镇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现象，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

松陵镇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大批工厂，是在那十年动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大、中城市的工厂停工停产，大批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把原料、市场和能 源（主要是电力）让了出

来；另一方面，又把技术和生产协作关系带了下来，从而使松陵镇的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松陵镇的工业基础薄弱，大部分工厂的企业素质较差，到1978年，全镇工业人均固定资产额仅为1,344元；设备落后，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也比较低。所以，当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结束，大、中城市的工厂恢复正常生产后，松陵镇工业原来赖以发展的条件便逐渐丧失了。尤其在能源紧张的情况下，镇上工厂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因此，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与大、中城市的工厂挂钩，从大厂获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除此以外，就业的压力，逼着人们非想办法不可。松陵镇工厂的创办，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与就业压力有关。这些年来，镇上陆续办了43个工厂，安置了6,270名劳动力，但就业仍没有完全解决。松陵镇的在册人口中，目前还有204名待业人员。镇郊的湖滨乡，有24,000名劳动力，据该乡乡长介绍，在不影响粮食产量和保证多种经营能够较大发展的前提下，尚有4,000多名劳动力剩余。1982年，全乡外出做小工的人达2,000多名。所以，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是松陵镇的一大任务。

松陵镇与大、中城市经济联系的加强，不仅是它本身的需要。从大、中城市这头看，它们也迫切需要与小城镇的工业加强经济联系。城市工业的发展，目前一般都遇到地皮、厂房、劳动力紧张和设备需要更新等问题，向外延扩大再生产已达饱和程度，向内涵扩大再生产则遇到许多困难。如苏州市苏纶纺织厂，是一个有87年历史的老厂，也是一个拥有2,703.6万元固定资产和7,132名职工的大厂。该厂资金足，技术力量雄厚，有70%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了进一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这个厂打算把两个车间的设备更新换代，但由于土地和厂房的限制，至少要停产两年。苏州电扇厂生产的“长城”牌电扇，是热销货，但由于劳动力和设备不足，产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然而，大、中城市工

厂所缺乏的这些条件，在小城镇却可以或者容易解决。大、中城市的工厂与小城镇的工厂挂上钩，就能较好地解决它们存在的困难，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向前发展。

正是因为双方都有这样的客观需要，才使大、中城市与小城镇的经济联系有了基础。对于松陵镇来说，它与苏州市发生经济联系，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松陵镇距苏州市仅16公里，陆路有柏油公路，水运有京杭大运河，交通十分便利。松陵至苏州，公共汽车只需30分钟，每天来往客车140辆；1982年，旅客流量为74万人次，水运每天航班14次，旅客流量为8.4万人次。这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对于业务往来、信息传递、节省能耗、提高效率，都是十分有利的。

从人际联系上看，松陵镇与苏州市的关系更为密切。五十年代初，松陵镇迁居苏州市的居民有100多户。据1983年底统计，家住松陵，人在苏州工作的有194户，228人；另外，还有家住苏州、人在松陵工作的101人，其中工业系统职工有78人，商业系统职工有5人，教育系统职工有18人。此外，在十年动乱期间，从苏州市下放到松陵镇郊湖滨乡的干部和知青有近200人，这些人大部分现已回苏州，但同当地仍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至于在苏州市有亲戚朋友的人就更多了。这种密切的人际关系，是促成和实现经济联系的重要媒介。

综上所述，在松陵镇和苏州市之间，既存在着双方发生经济联系的社会需要，又存在着实现这种联系的多种优越条件，所以，在松陵镇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与苏州市建立起多种形式的联系，就是很自然的了。

二、经济联系的形式与效益

松陵镇与苏州市的经济联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前。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松陵镇的大多数工厂都是通过苏州市的商业系统这个中介，来同苏州市和其他城市的工厂发生联系的；或者是通过苏州市商业系统来销售部分产品和购买部分原料，如松陵镇上的胶木电器厂、化工厂、服装厂、丝织厂、印铁制罐厂等8个工厂，在这个时期都通过苏州市五金化工交电公司与苏州市的有关工厂挂上了钩；有的工厂(如化工厂)还根据苏州市五化交公司提供的信息，生产该公司收购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苏州市商业系统的市场信息和情报比较灵通有关，而松陵镇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83年3月。由于实行了搞活经济的政策，城、镇、乡之间的生产渠道、流通渠道和信息渠道增多了，不少工厂也开始从单纯的生产型转向经营型。所以，这一时期不仅松陵镇与苏州市建立经济联系的工厂增多，而且多数工厂已不再需要通过苏州市商业系统，而直接与市内的有关工厂挂钩。如这个时期创办起来的湖滨乡沙发厂、丝织厂、服装厂、印刷厂、线材厂等，都是凭着下放干部或知青的关系，直接与苏州市的塑料三厂、塑料八厂、苏州电扇厂等发生联系的。

第三阶段是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以后，拆掉了行政上的篱笆，加上市、县、镇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和提倡，松陵镇与苏州市的经济联系开始从“民间”走向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从非正式走向了正式。大多数厂的关系趋向稳定，又有6个工厂与苏州市有关厂建立起新的经济关系，其中还出现了吴江红光布厂与苏纶纺织厂联营，吴江化工厂与苏州染料厂联营以及由国家、省、县三方合资经营的振华毛纺厂这样更高级的经济联系形式。

从上面几个发展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松陵镇与苏州市经济联系的发展，固然主要取决于它们自身的需要，同时也受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制约。当政策和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形势时，就

会抑制这种经济联系的发展；当政策和体制符合经济发展形势时，就会促进这种经济联系的发展，就会出现更新、更高级的联系形式。

如今松陵镇与苏州市的经济联系有哪几种形式呢？

1。半成品来料加工。苏州市的工厂把半成品送到松陵镇的工厂加工，松陵镇的工厂收取加工费。采用这种形式，承担加工任务的工厂并不需要很多的设备和流动资金，只要有劳动力就行。工厂的劳动力不够，还可以扩散到家庭去做，如刺绣厂、丝织厂、服装厂及湖滨电表厂，都有部分产品或全部产品采取这种形式。

采用这种形式，有的关系较为稳定，有的较为松散。能否成为稳定的、经常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松陵镇的工厂能否按质按量地完成加工任务。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在市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松陵镇工厂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大多数较松散的关系趋向稳定；有的工厂，如湖滨电表厂，已能加工电扇的定转子这一类难度较大的半成品。但总的说来，这种经济联系只是一种简易的形式。

2。产品包销或产销合作。由苏州市有关方面和工厂提供部分原料，松陵镇生产的最终产品，由苏州方面包销全部或大部分。如印铁制罐厂，由苏州造漆厂按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应部分铁皮等原料，生产铁皮盒子。1981年生产19万只，其中16万只由苏州造漆厂收购。再如松陵木器厂，在市管县后，分别由苏州家具公司和苏州市钟厂供给一部分木料，按照这两个单位的图纸和工艺要求，生产家具和钟壳，产品全部由这两个单位收购或包销。目前，松陵镇有近半数的工厂采取这种形式，其中有七个县属集体工厂是靠这种经济联系形式而“起死回生”。这种形式的好处是，生产的全过程在本厂进行，原料的来源和产品的市场基本不用自己担心，因而比较保险。这是比第一种较为高级的经济联系。

3。技术服务。由苏州市的工厂和有关方面派人来帮助解决

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如镇上粮机厂生产的爆花机，销路很好，但是该机到了北方，关键部位往往变形，粮机厂一直找不出原因，后来请苏州市科技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来"会诊"，分析出主要是机器不适应北方的气候，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新型材料厂长期生产的石墨垫圈，质量不稳定，后来也得到了苏州市科技服务中心的援助，派了四名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帮助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难题，稳定了产品质量。这是在工厂基本解决了产供销后的一种补充联系形式，但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质量是产品的生命，不解决质量问题，产品原有的销路会丧失，生产也将成问题，要保证质量，就需要大中城市的技术支援。

4．科研单位的中间试验基地。苏州市化工研究所研制了一种叫感光尼龙的新产品，因种种原因，在市里找不到适合于中间试验和小批量生产的工厂，而湖滨化工厂则基本上具备生产这项科研成果的能力和条件，于是两家形成了科研、生产的协作关系。在利益的分配上，湖滨化工厂拿大头，苏州市化工研究所拿小头。这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又是极有前途的经济联系形式。

5．全面联营。这是双方根据互利的原则，互相为对方提供条件，互相利用对方的优势，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联系。这里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产供销协作联营，如吴江红光布厂，与苏州市苏纶纺织厂的联营，是由红光布厂用一部分厂房和设备来接受苏纶厂的部分中低档产品，让苏纶厂腾出手来搞高精尖产品；而苏纶厂则从技术上、经营管理上、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上，帮助红光布厂提高经济效益，并通过本厂的销售渠道去帮助红光布厂推销产品。二是专业化协作联营，如吴江化工厂和苏州染料厂，原来都生产同一种产品，但用不同的商标出售，在市场上相互竞争。由于原料都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如今根据国家关于调整的方针，由化工部和江苏省主管局出面，组织两厂进行专业化协作联营，按

统一的质量标准和统一的商标，生产和销售同一产品。这两种联营的形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更高一级的程度。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松陵镇与苏州市经济联系的概貌，我们将上述五种形式和采用这五种形式的工厂数目，列表如下：

形　式	半成品来料加工	产品包销或产销合作	技术服务	中间试验基地	全面联营
数　目	6	14	7	2	2

应当说明的是，实际上这五种形式与工厂数目是有交叉的，有一些工厂同时兼有两种或三种形式。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联系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联系的形式也发展了，一些工厂在保留原有形式的同时，又与另外的工厂建立新的经济联系形式，或者是工厂里的一些车间与这个厂建立这种经济联系，另一些车间又与那个厂建立另一种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是松陵的工厂，还是苏州的工厂，在进行经济联系的过程中，都认识到，要使双方得益，技术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大厂都尽量从技术上帮助小厂，小厂也认真地向大厂学习技术。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83年，苏州派各种技术人员到松陵镇工厂解决技术上、经营管理上问题的共有465人次；松陵派出工人到苏州工厂去学习和培训的共1,550人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协作关系的发展，经济联系的形式在趋于稳定的同时又有了新的进展。

采取何种经济联系形式，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包括地理环境、人际关系、行业条件、产品条件、资金条件以及苏州市工厂的需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这多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镇上工厂的生产能力。我们对采用不同经济联系形式的工厂的人均固定资产占有金额，统计如下：

挂钩形式	半成品来料加工	产品包销或产销合作	技术服务	中间试验基地	全面联营
人均拥有固定资产额	898元	3,342元	4,751元	1,546元	3,501元

上面的统计，我们已剔除了由于经济联系形式的交叉所带来的重复计算。可以看到，第一种形式的工厂的人均固定资产额只有898元，说明设备比较差，一般不具备全过程生产最终产品的能力，只能采取这种更多地依靠劳动者的手工技巧的半成品来料加工形式。而采用产品包销、技术服务、全面联营这三种形式的工厂的人均固定资产额都要比它高三倍以上，采用中间试验基地形式的虽然是个例外，但也比它高一倍。马克思说得好，"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① 在促成松陵镇与苏州市实现经济联系的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往往起很大作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偶然性在起作用，其实后面都受着必然性的支配。因为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联系形式，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主要为工厂的生产能力所决定。如湖滨塑料厂，原来曾与上海塑料制品厂进行产销合作，派了一些工人到上海去培训，后来发现上海的设备先进、技术要求高，镇上的工人很难在短期内掌握，即使学会了，也因本厂设备太差，仍旧用不上。后来又找到苏州市塑料八厂，该厂的设备与湖滨塑料厂的差别不太悬殊，经过培训，工人能掌握技术，回来也能用得上，这样，才与苏州市塑料八厂建立和巩固了半成品来料加工的经济联系。

实行全面联营这样的经济联系，虽然有许多优点，但并不是每个工厂都具备这种条件的。然而，即使是设备差的工厂，只要能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寻求与自己的生产能力相适应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363页。

济联系形式，也肯定会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上面说过的刺绣厂、丝织厂、制鞋厂等，虽然设备简陋，但工人心灵手巧，实行半成品来料加工的经济联系，正好发挥了她们的长处。1982年，这六个工厂每百元固定资产都分别创产值543元和利润23元。特别是制鞋厂，一年获利30万元。当然，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技术构成的提高，它会去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程度的经济联系形式。如红光布厂，1975年时，固定资产额为42.08万元，与苏州、上海等地的工厂进行加工协作、产销协作，到1982年，全厂固定资产额增长了5倍，达240.88万元，便开始与苏州苏纶纺织厂协商搞全面联营了。这说明，松陵镇的工厂如何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选择和确定自己与大工业相适合的经济联系形式，来促进自己的发展，确实大有文章可做。

松陵镇与苏州市的多种经济联系，推动了松陵镇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松陵镇的工业发展非常缓慢，到1970年，工业产值仅为643.81万元，利润只有30.15万元。这个时期，与苏州市挂钩的工厂也只有两家。从1970年到1982年的13年中，工业发展很快，产值从643.81万元上升到4,522.2万元，增长6倍，利润从30.15万元上升到327.45万元，增长近10倍。这个时期与苏州市的经济联系全面发展，到1982年，挂钩的工厂已达31个。这表明，与苏州市经济联系的大发展，带来了松陵镇工业的大发展。

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些典型工厂的发展情况，可更清楚地看到，有无这种经济联系是大不一样的。松陵镇的工厂大致可分为三类：

1．建厂很早，但长期与城市没有任何经济联系，所以没有大的起色。这可以松陵木器厂为代表，它是从解放初个体手工业作坊发展到木业合作社，再发展到木器厂的，建厂历史最长。但由于长期闭关自守，产供销只限于本镇、本县，近三十年生产没有什么

发展，产值、产量下降，还经常亏本，1982年，产值只有24.4万元，利润不到1万元。

2．建厂也很早，但长期发展缓慢，甚至生存不下去，但一旦与苏州市挂上钩后，就起死回生，发展很快。吴江石油配件厂，从1958年建厂到1970年的12年时间，最高的年产值只有23.3万元；1970年取得苏州市五化交公司支持，产品由轴壳改为套筒扳手；1972年，又通过苏州市526厂和石油部直属单位挂钩生产石油配件，原料和产品销路均有保证。到1978年，仅8年时间，产值就从23万元猛增到443.6万元；1983年实行市管县以后，生产任务更足，连1984年的生产任务现在都已落实。

3．从一建厂就和大、中城市挂钩，有的发展速度很快，有的虽有起伏，但总的来看是稳定的。湖滨沙发厂，1980年建厂，开始与上海压轴钢厂进行半成品加工协作，当年产值17万元。1981年，通过苏州市塑料公司与苏州市塑料三厂、八厂挂上了钩，进行产销合作，转产沙发，这年产值为33万元，利润4.5万元；1982年产值为76万元，利润5.3万元。再如湖滨万向节厂，1974年靠苏州市汽配公司和苏州市跃进厂供给原料，扶持上马，生产汽车零件万向节，到1979年，产值达83万元，利润达25万元。1980年以后，由于国家进行产品调价及汽油供应紧张等原因，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要量减少，使这个厂的产值和利润下降，1982年亏本3万元；1983年，苏州跃进厂派出15名工程师到该厂帮助设计新品种，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万向节的品种从一个车型增加到十个车型，当年就扭亏为盈，利润达6万元。目前生产和销售形势都很好，根据顾客订货情况看，1984年利润能超过2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联系的形式不同，经济效益也不同。往往是联系程度较高、较全面的形式所带来的效益比较简易的形式要高。如红光布厂，原来与苏州、上海的一些工厂搞产销合作，1983年5月1日起与苏纶纺织厂实行全面联营，到10月份，仅5

个月时间，产值已完成1.47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1.3%，平均每百米利润由联营前的4.48元增加到4.79元，提高6.92%，日台产值由96.64元提高到176.96元，提高83.11%。联营后的效果是显著的。事实证明，松陵镇与苏州市建立多种经济联系大有可为，大有益处。

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教育和文化方面的联系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出现，必然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70年以前，松陵镇与苏州市在教育、文化上虽然有所联系，但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不多。1970年以后，随着松陵镇与苏州市经济联系的加强，它们之间在科学、教育和文化上的联系也大大发展起来。如今，松陵镇的各类职业学校都与苏州市有密切关系，设在松陵镇上的卫生学校、艺术学校等，是苏州市办的市属学校。1982年成立的松陵小城镇建设研究会所属的企业管理协会、科技协会、成年人教育协会等12个协会，与苏州市企协、科协、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企业培训中心、市成人教育协会、苏州大学、苏州丝绸工学院以及市园林管理部门、市体育协会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科学、教育和文化上的联系，已成为松陵镇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成为促进松陵镇与苏州市经济联系的一项重要保证。松陵镇职工业余学校的恢复和发展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1978年下半年，职工业余学校恢复。随着松陵镇工业的兴起和与苏州市经济联系的加强，对工人队伍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松陵镇在培养人才方面，除依靠挂钩的苏州工厂短期培训部分工人外，还大力发展职工的业余教学活动。

紧紧地依靠苏州市的知识力量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是这个学校的一大特点。松陵职工业余学校恢复以来，自始

至终得到了苏州市的智力支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师资上进行支援。该校先后从苏州大学、苏州市职工大学、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市教师进修学院、苏州市电子研究所等单位请来包括3名副教授、14名讲师在内的36名教师，分别担任20门课的教学任务。这些老师在松陵镇职工业余学校任课时间最长的三年，最短的半年，多数都在一年左右。由于教师的相对稳定，教学质量得到了保证。

第二，提供实验场所。教学实验是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步骤。松陵职工业余学校学生的一些简单实验课，是在本镇的中学和工厂里做的；而一些复杂的实验课，则需要到苏州市十五中学、苏州市丝绸工学院、教师进修学院、苏州大学等单位去做。1981年暑假，电大工科班的22名同学到苏州大学（当时为江苏师院）物理系的实验大楼住了7天，在该校有关教师的指导下，分别做了电子、光学、原子等十个不同内容的实验，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第一届电大工科班的学生在三年半的学习时间里，平均每人做了65个实验，超过了江苏省电视大学教务处规定的实验次数，提高了教育质量，使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由第一学期全县的末一名，一跃到最后一学期的全县第一名。

第三，指导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后阶段，是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关键一环。1983年，该校电大工科班学生的毕业设计，全部是本镇工厂生产中提出的课题，为了指导好这些毕业设计，除了原来的任课老师外，苏州大学等单位还派了三位副教授、三位讲师和三位工程师来指导毕业设计和主持毕业答辩。在苏州市老师的支持和指导下，同学们所做的7个毕业设计的成果已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如在电器厂设计制成的高压染色机，可以使工厂直接避免损失万余元，受到江苏省有关方面的奖励。

在苏州市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松陵镇职工业余学校所设

置的专业，从满足生产的迫切需要开始，逐步向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发展。该校的专业设置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办文化补习班。有两个班，一为初中预备班，补习小学文化程度，属于扫盲性质；然后进入第二个班，即初中文化补习班。

第二阶段是办工科专业班。先是办一些生产上急需的、实用性很强的中专和中技班，如电工、机械、电子、工业会计、商业会计、经济统计、企业管理等。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然后从中遴选一部分学生，再招收部分高考落选生，办起电视大学工科班，着重培养科研技术人才。

第三阶段是办一些适用范围更广的中专班，如书法、美术、摄影、幼托、烹调、服装裁剪、文艺创作、音乐舞蹈等。这些专业一方面能适应不同的爱好者，另一方面能直接、间接为生产服务。如书法、美术、摄影等可配合工厂的宣传活动，做广告；幼托、烹调、服装裁剪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艺创作、音乐舞蹈活跃了工厂的业余文化生活。

第四阶段是举办具有广泛社会需要的专业班。如通讯报道、写作基础知识、日语、英语、世界语的培训班和电大文科班等，这些专业虽然不是直接与生产有关，但学生毕业后大部分是回工厂去的，他们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既为进一步学习深造创造了条件，又能为工厂的各种社会活动服务。

如今，这个学校吸引了镇上的广大的青年职工。有的学生同时上几个不同专业的课程，有的学完一个专业再学另一个专业。到1983年底，该校已从恢复时的2个班发展到38个班，入学巩固人数为9,477人，结业和毕业人数为5,589人，占全镇35岁以下青年职工总数的88%。业余学校为生产服务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从该校电大和中专、中技班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工厂的技术骨干，已有76人参加了各种技术革新攻关小组。1981年以来，这些毕业生

共取得技术革新成果123项，其中有9项为生产多创造财富240万元。有一位毕业生为电器厂研制成功一种交流接触器，用于检验配套电器箱的质量，两年来，依靠这项成果，清退不合格的来货和对一些废旧物资进行利用，共节约资金8万元，占全厂一年流动资金的三分之一。还有一位学生为吴江开关厂攻破了该厂的主要产品——有载调压分级开关触头压力测试仪中一个关键部位的技术难关，结束了该厂在这个问题上多年被打零分的局面，在苏州市组织的产品鉴定会上受到好评，被认为已达到了从日本进口的同类产品的水平。

从职工业余学校这个侧面，我们确实能看到这种科学、教育和文化上的联系，已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成为推动松陵镇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松陵镇与苏州市进一步发展经济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意义，将会越来越显示出来。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从陶都丁蜀镇的现状看小城镇的建设

伍施彦

一、丁蜀镇的地位和功能

丁蜀镇是宜兴县最大的县属镇，又是丁蜀区和周墅乡党政机关的所在地。该镇位于宜兴县城南15公里，镇区面积4.6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29平方公里。据1982年年末统计，全镇在册人口4.6万人，实际常住人口约7万人，流动人口每天在1.6万人左右。全镇企事业单位102个，职工3万多人，其中工交企业51个，职工2.6万人。1982年，全镇工业总产值11,730万元，上交利润和工商税2,374万元，分别占全县的19%和26.2%。

丁蜀镇是一个具有显著特色的城镇，其地位和功能主要是：

1. 陶瓷生产的中心

丁蜀镇素有“陶都”之称，以盛产陶瓷而闻名于国内外。这里的陶瓷生产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在丁蜀镇附近先后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夹沙红陶、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秦汉时期的釉陶、三国两晋时期的青瓷器、隋唐时期的彩釉。据记载，至宋代，这里已有“大小龙窑五十余座”，并制出了风格独特、做工精细的紫砂陶。苏东坡曾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紫砂东坡提梁壶”，由此而得名。明清以来，镇周围的蠡墅、潜洛、常安、新安一带，家家做坯，户户捶泥，尤以制紫砂茶壶著称。后来，由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和简单机器炼泥、制釉的推广，

陶瓷工业得到新的发展。1929年全镇有龙窑63座，1936年达到76座。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丁蜀镇的陶瓷工业曾一度萧条衰落。但一家一户的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一直没有停止。据统计，解放前夕，在丁山、蜀山、汤渡一带，尚有龙窑46座，工人近4千人，生产缸、坛、盆、罐、砂锅等日用粗陶和紫砂陶器，年产值200多万元。

解放以来，丁蜀镇的陶瓷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全镇有陶瓷企业26个（全民18个，大集体8个），职工1.8万人，固定资产原值6,400多万元。1982年，生产各种陶瓷7,036万件，其中日用陶器4,975万件，占全省总产量的96.6%，居全国首位；完成产值7,640万元，实现利润1,638万元，上交国家税金828万元。在全国六大陶瓷产区中，丁蜀镇的陶瓷产值仅次于江西省陶瓷公司和山东省陶瓷公司，居全国第三位，利润仅次于江西省陶瓷公司，居全国第二位；百元产值利润为21.25元，积累率为32.29%，经济效益最好。除18个陶瓷生产单位外，还有专门勘探资源的地质队、开采和加工陶土的原料总厂。江苏省陶瓷研究所和陶瓷工业学校也设在该镇。生产上除特种产品还保持手工操作外，已逐步实现了炼泥、成型机械化，窑炉隧道化，运输车轮化，改变了过去"脚踏泥、手做坯、肩挑柴"的落后面貌。产品除了传统的缸、坛、盆、砂锅和紫砂工艺陶、均釉陶、青瓷外，又新发展了精陶、彩陶和美术陶，服务对象已经扩大到化工、机电、冶炼、卫生、纺织、造纸、食品、建筑、模具、航天等10多个行业。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紫砂高档茶具和10吨陶瓷耐酸真空泵分别荣获国家金质和银质奖，均陶、一号大缸、精陶化装土茶餐具、耐酸耐温砖、陶瓷真空泵、青瓷丝网印花咖啡具、均釉陶台、泥龙头等15个（件、套）产品，分别被评为部、省优质产品。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市场，内销遍及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各个省市，出口远销世界各大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2年出口陶瓷产品485万件，占全省陶瓷出口

量的三分之二。工艺陶瓷的换汇率居全国同行业的首位，一件40厘米高的均陶花盆价格相当于出口44只"上海牌"手表，一件均釉贴花金鱼缸，可以换取2.5吨钢材。产品还先后在日本、加拿大、法国、刚果、阿尔及利亚、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埃及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览，博得国际人士的好评。特别是被誉为"五朵金花"的紫砂、青瓷、精陶、美彩陶和均陶，更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产品供不应求。丁蜀镇已经成了一个产品门类齐全、服务领域广阔、前后方比较配套的综合性的陶瓷工业基地，在全省和整个上海经济区以及在全国都有一定的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上有较大的竞争能力和较高的声誉。可以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陶代钢的广泛应用，丁蜀镇的陶瓷工业必将得到新的发展。

2. 旅游服务的中心

丁蜀镇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该镇位于太湖之滨，气候温和宜人，四周山青水秀，风景优美。境内蜀山、青龙山、龟山三山相依，画溪河、蠡河两水相环，古往今来，吸引着无数游客。镇东北的蜀山，古称"独山"。相传北宋苏东坡曾寓居山下，因见其山峰屹立，水环其麓，颇似故乡蜀地风景，赞云"此山似蜀"，"独山"故改名为"蜀山"，相沿至今。著名的宜兴阳羡风景区的善卷洞、张公洞、灵谷洞和玉女潭，蜀山南麓苏东坡讲学的遗址"东坡书院"和"似蜀堂"，镇南约3公里处的凌潭村古窑址，灵谷洞附近新发现的慕蠡洞，以及相传范蠡偕西施弃官隐居的遗址"蠡墅"、"西施洞"等等，都以其独特的风姿或动人的传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闻名中外的宜兴陶瓷，对纷沓而来的游客更具诱人的魅力。"宜兴陶瓷陈列馆"，灰墙碧瓦，古色古香，珍藏的历代陶瓷、各式样品，琳琅满目。紫砂、青瓷、均陶、美陶、化工陶等工厂都已对外开放。"洞天世界"和陶都风光，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善卷、张公两洞，每年接待游客126万人次，灵谷洞每天接待游客数千人。这些人游览"三洞"之后，一般都要到丁蜀镇欣赏陶

瓷艺术，购买陶瓷产品。据测定，丁蜀镇每天过往的游客、旅客达1.6万人，全镇各陶瓷商店和工厂小卖部每天零售陶瓷2万多件。1982年，该镇接待外宾199批，5,141人次，还接待了75个国家和地区的98个驻华使节和夫人的来访。丁蜀镇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开发。镇西南连绵起伏的丛山中，数万亩竹海、松林、茶园，郁郁葱葱，千姿百态，蔚为壮观。这里山峰叠翠，夏荫蔽日，鸟语花香，幽静宜投，是理想的避暑胜地。20多个还待开发的溶洞，更是神幻莫测、光怪陆离的谜宫。镇东不远，太湖万顷碧波，沿岸滩地浅平，可作天然游泳场地或水上运动场所；拱山嘴，奇峰突起，三面濒水，迎浪劈波，涛涌声鸣，气势非凡，是理想的疗养休息之处。因此，随着陶瓷工业的发展和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丁蜀镇将以其特有的优势，日益显示出其旅游服务中心的功能，这是苏南其它城镇所无法比拟的。

3．区域性经济活动的中心

丁蜀镇地处宁杭公路东侧和太湖西岸，历来与无锡、常州等中心城市联系密切，是宜兴南部、江、浙、皖三省交界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纽带，是周围山区和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商品贸易中心。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城乡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丁蜀镇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活动中心的功能日益明显，具体表现在：

（1）它是一个区域性的水陆交通枢纽。

丁蜀镇内河网密布，公路纵横，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水上交通有画溪河、蠡河、分洪河和新外河，可直达无锡、常州、苏州、上海。全镇有船队41个，驳船616只，总吨位13,000吨，年吞吐量160万吨。陆上运输更为便利，宁杭公路接通宜兴、广德、常州、无锡、杭州、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交通客车每天134班，客运量达2,240人次；外地游览专车驶入镇中心最高日达量87辆，5,220人次，过路机动车日平均超过2,000辆。

（2）它是煤炭和建材工业的基地。

镇附近已在开采的有川埠、任墅两个煤矿；正在筹建、即将投产的白泥场煤矿，是目前苏南最大的一对矿井，年设计能力为30万吨。目前，这三个矿已探明的储量为 3,200万吨，以年产 45 万吨计算，约可开采70年。该镇周围矿产资源极为丰富，除陶土、煤炭资源外，还有大量的石灰石，是生产水泥和石灰的优质原料。目前，该镇有水泥厂 5 个，年产水泥13万吨，近期将可形成年产40万吨的能力。有年产石灰 3 万吨的石灰厂。年产墙地涂 料 450 吨的涂料厂，还生产各种建设用石子约20万吨。

（3）它是丁蜀周围山区林特产的集散中心。

与丁蜀镇经济关系密切的丁蜀区和宜兴林场，共有山林25万亩，其中杉木2.8万亩，松树 4 万亩，毛竹6.2万亩，茶叶 1.6 万亩；现有木材积蓄量 7 万立方米，毛竹870万支，年砍伐量 50 万支，年产茶叶超过一万担。此外还有油茶、板栗、竹笋等土特产。沿湖洼区还盛产百合、芋头、生姜、芦苇等经济作物。位于这个区域中心的丁蜀镇，则是这些林特产的集散中心。

二、丁蜀镇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丁蜀镇的经济建设，虽然已经和正在取得比较迅速的发展，三个中心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作用，但丁蜀镇发展的速度和目前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里的陶瓷工业，有声誉，也有优势，但技术还比较落后，机器设备也比较陈旧，生产规模偏小，产品质量尚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产量也远远不能满足城乡市场的需要。许多优质产品，市场上看不见，买不到。丁蜀的陶瓷畅销世界，但去年外贸创汇仅210万美元，只有江西景德镇的7%，湖南澄陵的16%。这里的旅游资源尚未全部查明，已经查明的还有许多没有开发。现有的旅游设施很不配套，许多游客反映，游览"三洞"是"挤煞、渴煞、饿煞、累煞"。对买不到称心的

陶瓷产品也大有意见。作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丁蜀镇对周围农村经济的扶持帮带也很不够。上述情况，存在已久，但由于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变，因而矛盾日趋尖锐，有的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束缚着丁蜀镇的进一步发展。

1．城乡分割，各自为政。丁蜀镇的经济地位与功能，是以周围广大农村为基础的，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周围农村为丁蜀镇的建设、陶瓷工业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劳动力和农副产品；丁蜀镇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周围农村的繁荣。城乡经济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1958年，确定了现在的行政区划和经济体制。二十多年来，这种人为的城乡分割，带来了明显的弊端：

（1）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浪费严重。丁蜀镇镇区范围狭小，陶土资源则分布在镇周围的周墅、川埠、湖汊、伏东、茗岭等乡和宜兴林场广大山区。全镇年用陶土35万吨，1982年，陶瓷公司仅开采14万吨，其余都是周围各乡的社队开采提供的，还有少量的是农民个体开采的。这种状况，如能统一规划，加强管理，并无不可。但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城乡开采力量无人统一协调，形成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2）市镇建设和经济建设无法统一规划。丁蜀镇镇区与四周农村犬牙交错，相互混杂。由于体制的关系，丁蜀镇的市镇建设布局拉不开，也无法落实统一的市政建设规划。经济建设也是城乡各有打算，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由于青龙山石灰石的质量好，结果城乡一齐布点，一下子办了四个水泥厂。原来镇上只有两个小影剧院，群众反映看电影难，大家看到有钱可赚，就争建新的电影院，周墅乡建了一个，陶瓷公司又建一个，县文化局还想再建一个。

（3）阻碍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城乡劳动力不能统

筹安排使用。陶瓷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传统的工艺美术陶瓷，大部分靠手工操作。陶瓷要发展，单靠在厂职工远远不够，招收城镇户口的职工，又缺乏劳动力来源。紫砂厂在职职工只有1,000人，厂外为该厂做坯的农民却有2,000多人。陶瓷工业产前产后的服务，例如运输、包装、保管、加工草绳、纸箱等等，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人去做。丁蜀镇本身缺乏劳动力，而周围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苦于找不到出路，镇内工厂又无权到农村招工。其次，陶瓷公司和社队工业相互关系不协调，没有合理分工。丁蜀镇周围有山有水，资源丰富，又有传统的陶瓷工艺，社队工业的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现状并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是双方关系比较紧张，镇上工业不大愿意扶持社队工业，社队工业也不大愿意为镇上工业进行初加工。例如紫砂产品，驰名中外，十分畅销。现在陶瓷公司与周墅乡各有一个紫砂厂，由于双方各有打算，相互制约，无法扬长避短，合理分工，结果反使矛盾激化，限制了双方的发展。

2. 条块扯皮，多头领导。丁蜀镇上，现有区、镇、乡三套行政领导机构，驻有省、市、县、区、镇、乡、队多种单位，大家各有归属，镇上无法行使权力，不仅影响到城镇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管理，而且还影响了各自工作的开展。具体表现为“三个脱节”：

(1)教育、生产、科研脱节，阻碍了陶瓷工业的发展。丁蜀镇现有江苏省陶瓷工业学校和江苏省陶瓷研究所各一个。“文革”前，陶瓷公司是省公司，陶瓷学校校长和陶瓷研究所所长都由陶瓷公司经理兼任，三者密切配合，关系协调，对陶瓷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品种开发起了积极作用。现在陶瓷公司已下放给宜兴县管，而校、所仍是省建制，客观上造成了教育、生产、科研的三脱离，学校、研究所有力无处使，工厂需要技术得不到及时支持。这种人为的脱节，对陶瓷工业的发展，对陶瓷工业的技术进步，以及丁蜀镇的市政建设，已经造成和正在造成莫大的损失。

三、从丁蜀镇看小城镇建设

上述分析说明，丁蜀镇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一个与大、中城市有密切联系的、以广大农村为基础的、面向国内外市场的陶瓷生产、旅游服务和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已经初具规模，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资金、辖区小等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左"的思想的影响，丁蜀镇的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这种复杂的现象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研究和探讨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如何进行小城镇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无锡市农村，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小城镇星罗棋布。以行政归属来分，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市属的，如马山镇；一种是县属的，如江阴县的澄江镇、青阳镇，无锡县的洛社镇，宜兴县的宜城镇、丁蜀镇、和桥镇、张渚镇、周铁镇等等；还有一种是乡属镇。在县属镇中，又可分为县城与非县城两类。丁蜀镇就属于非县城的县属镇。当然，就其规模与经济功能来说，丁蜀镇非其它同类型的小城镇所能类比，但是它的建设和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对同类型的小城镇来说，同样是必须解决的。

那么，丁蜀镇建设和发展的实践，到底能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1．加快小城镇的建设，首先必须解决各级领导的认识问题。与丁蜀镇一样，各类小城镇一般都已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正确，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有了迅速的提高，蓬勃发展的社队工业，

为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资金、物资和人才；乡乡通公路的结果，进一步沟通了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各方面的联系；商品流通、集市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科学、卫生、体育、教育等等，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都是小城镇发展的内在动力。日益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农村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进一步沟通城乡各方面联系的桥梁。它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科学化的程度，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缩小城乡差别，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实践证明并且还会继续证明，以崭新面貌出现在江南大地上的小城镇，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如何科学地建设小城镇并发挥其作用，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各级领导认识是很不足的，甚至到目前，有些人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多年来，他们对小城镇建设很少过问，排不上议事日程，使之处于自发和自流的状态，而现行的体制和某些政策也不适应小城镇建设的需要。多数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迟缓，问题较多，少数甚至萎缩衰落，就是这种认识不足的必然结果。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因此搞好小城镇建设，有许多事情要做，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加强党的领导尤为重要。各级领导一定要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小城镇的地位和功能，做到思想上重视，措施上落实，切实抓紧抓好。

2. 加快小城镇建设，还必须妥善地解决体制问题。上面我们列举的丁蜀镇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四个突出矛盾，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除了认识问题外，焦点和关键就是体制问题。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目前，丁蜀镇存在的一些矛盾，归结起来，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因此，丁蜀镇现有体制，如不

下决心进行改革，由此而产生的其它矛盾，一个也无法解决，它的优势和作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应该看到，下决心解决丁蜀镇的体制问题，为它创造发展的外部条件，不仅是丁蜀镇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可以对其他小城镇的建设起示范作用。这是一项重大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早改早主动，不改就被动。我们现在不少乡（公社）所属的小城镇，为什么建设得比较好呢？就是由于它们不存在城乡分割的矛盾，或者即使有也比较容易解决和协调，因而其发展速度就比较快，建设的综合社会效益也比较理想。

解决非县城的县属镇的体制问题，比较复杂，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例如丁蜀镇，根据它的特殊地位和经济功能，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为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呢？就要按照丁蜀镇的客观实际，改革现存的县属镇的体制。可以设想，丁蜀镇的体制改革后，起码可以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丁蜀镇经济、科技、文化的纽带作用，带动周围农村和山区的开发，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二是有利于统一规划、科学开采、合理使用陶土资源，提高陶瓷工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三是有利于依靠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研、教育、生产结合的作用，加速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扩大出口量；四是有利于进一步开发利用风景资源，发展旅游服务事业；五是有利于城镇建设的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这样，振兴“陶都”，大有希望。

对于其它非县城的县属镇来说，解决体制问题，有的可以在政社分设过程中，实行镇乡合一，有的可以扩大它们的辖区范围和自主权，以利于统一规划，加快建设。

3．加快小城镇建设，妥善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当务之急。缺乏资金，是当前小城镇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目前国家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指望国家进行大量投资是不现实的。因此，开辟资金来源渠道，从总体上说，立足点应放在自力

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自己努力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增加收入来解决。

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与解决体制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丁蜀镇体制改革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为了让其享有县一级财权，其它非县城的县属镇，当然不可能都享受县一级财政待遇，但是也应该放宽政策，给予一定的财权，为其加快建设速度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它类型小城镇的建设，也存在一个资金问题，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对于乡属的集镇来说，也有一个资金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社办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困难更大。建设小城镇一定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社办厂上交乡的利润中，有多少应该用于小城镇建设，必须有个明确的规定。有了这个规定，就可以逐年办一些事业，保证其建设速度与整个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至于大起大落。

4. 加快小城镇建设，进行科学规划，也很重要。什么样的规划才算科学？看来有两条是必备的，一是制订的规划，必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优势；二是规划必须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丁蜀镇的发展历史，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长期以来，丁蜀镇的建设强调发展陶瓷工业，这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陶瓷是丁蜀镇的特点，也是丁蜀镇的优势，突出了这点，丁蜀镇的建设也相应比其它小城镇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第二，由于没有全面地顾及丁蜀镇的其它两个经济功能，特别是旅游服务中心的功能，因而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就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地的优势。例如，商业服务业就根本不能适应中外游客的需要；陶瓷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严重污染，也不利于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丁蜀镇的实践说明，一个小城镇的规划，包括社队工业的发展，都必须从该地的实际出发，首先要搞清楚该城镇的优势和功能，而不能脱离实际，盲目乱搞。

实行市管县后，宜兴已划归无锡市管辖，宜兴小城镇的建设也就要无锡市来统一规划和领导。而目前，无锡市一些小城镇建设，有一个倾向值得重视，就是热衷于搞一些超标准的楼堂馆所，而不是量力而行地搞一些乡镇建设方面急需解决而又是人民群众要求办的事情。有些地方花了上百万元搞富丽堂皇的大会堂、影剧院，结果项目完成了，社队的资金也用空了，而建成的大会堂利用率不高，营业所得不够维修，折旧费和管理费还要另找门路。另外，土地的浪费也比较严重，一些单位根本不办手续，不经批准，只是私下与社队商量，就占用大批良田；社队办厂用地更是大手大脚，一围就是几十亩；居民和农民造房，浪费土地的现象也较普遍。出现上述现象，虽有管理方面的原因，但与规划关系也很密切。有的是没有规划；有的是虽有规划却并不认真实施；有的因领导人员的变更，规划也随之变更；有的是规划脱离实际，与八十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这些，都必须认真研究，制订措施，加以解决。

一九八三年十月

从莘塔乡属镇的兴起
探讨小城镇建设的合力

甄为民　邹农俭

小城镇是城乡的结合部，工农的结合体，它可分若干层次。这里探讨的是江苏省1,765个乡属镇中的一个——吴江县莘塔镇，它属于比较低的层次，研究它的特点，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对于同一层次的小城镇建设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莘塔镇中兴的几个特点

我们研究了莘塔镇的兴衰和发展，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旧莘塔历史久，发展慢；新莘塔起步晚，速度快。

莘塔旧称孙塔，相传三国时孙权有妃子葬于此而得名。清代改名莘塔。原为渔村，因接近淀山湖，有河可通航船，逐步发展成小集镇。几百年间，曾几经兴衰。民国初《吴江乡土志》描述莘塔"营业殊发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该镇衰败。解放后，集镇曾一度出现生机，十年内乱时又萧条冷落下去。总之，截至1975年，莘塔镇建设步子缓慢，时起时落，即使是最"发达"时，其规模也是很小的。据镇上老人回忆，解放前的三、四十年间，镇上几乎没有盖过什么房子。解放后也只盖了一座旅馆和一幢民房。新的乡镇建设是从1975年开始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速度更快，前后经过七、八年时间，一个新型的、工商文教都相当发达的小城镇就已形成。1982年与1975年相比，镇区

建筑面积增加了55,052平方米，增长2.2倍；常住人口从3,150人增加到4,638人；社办厂从4个增加到16个，工业总产值从73.09万元增加到703.52万元；利润增加了51.75万元，增长18倍；商业营业额从219.75万元增加到442.49万元；教育、文化设施除原有的中、小学外，又新增了影剧院、成人教育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

2．依托老镇，建设新镇，既保持江南水乡特色，又增添了现代化的建筑设施。为保持江南水乡特色，他们在建设中，把河道组合到镇区中来，利用南传港、大头港两河流经镇区，疏浚了新市河，贴水建房，就水成市，形成新街区和新建筑群。莘塔老镇，沿河两岸平行摆布，旧街仅3米多宽，在原有基础上翻建很难形成新的集镇体系。旧镇沿河而立，占地很少，为此，对旧镇着重改造和提高利用率。现在，新街老街并存，各自发挥其职能。新老街之间有街道相通，并建成为商业区，既沟通新老街之间的联系，又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新街北端的主导风向下侧，利用后门傍河、前门通公路运输方便的条件，作为社队工业区。为了和老镇媲美，和周围渔村农舍相协调，新镇的房屋一般为二至四层，不搞高层建筑，并注意了建筑美，几乎每幢楼房各有不同的样子，建筑的造型、格式竟有十五、六种。楼房朝西处普遍用水泥预制品制成各种图案的窗棂和栏杆，既美观又实用，夏天遮烈日，冬天挡寒风。新镇还建设了自来水厂、农贸市场、贸易货栈，修筑了东西长156米、南北长640米的十字街，铺设了长850米、宽12米的沥青路一条。新的街道颇有现代化气派。

3．合理利用原有条件，不搞大拆大迁。莘塔旧镇建筑密度大，已没有发展余地。他们在建设中充分利用老街近水的条件，考虑到原有木结构房屋，虽较陈旧，但还很结实，只要加以维修，改善内部的通风采光条件，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居民住宅。于是，他们成片保留了清朝建的十几处跨街楼，把它改为居民住宅，

给居民创造一种安静平稳的生活环境。由于近河，浣洗和运输很方便。居民区也保留一部分商店，以方便居民和从河道撑船来的农民买卖。这样，既避免了老镇拆迁旧房所产生的矛盾，又确保新镇建设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原有的街道进行了拓宽兴建，新街区是利用一片乱坟堆和部分农田建成的。新建的通衢大道，既可通上海、苏州、吴江等大中城市和县城，又通向本乡广大农村。

4. 自力更生，人民城镇人民建。莘塔镇的建设坚持自己规划，自己设计，自己投资，自己施工的原则。小城镇的建设资金，单靠国家是包不下来的，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为小城镇提供建设资金。镇上先后办起了16个乡镇企业，镇办厂历年积累利润725.3万元，上交给乡财政331.1万元，乡从中提取258.1万元用于集镇建设，占集镇建设总投资的72%以上。公路、桥梁和中、小学校的部分基建资金，以及自来水厂、街道、影剧院等设施的全部基建资金，都是从这笔收入中开支的。其次，如自来水管道、人行道、河道、驳岸等公用设施，采用由受益单位集资联建的办法。另外，还组织银行、邮局、供销社等单位，按集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投资自建，这就初步解决了资金困难的问题。在当时严重缺乏建筑材料、施工人员的情况下，他们还先后于1975年至1977年办起了建筑站、砖瓦厂、水泥制品厂。这三个单位的建成，对莘塔镇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镇上的大部分建筑都采用本乡建筑站设计的图纸，批准后由本乡建筑队施工。建筑队还能承包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十层以下的楼房建筑工程。通过劳动力外出搞建筑，既培训了人才，又积累了经验，回来自己动手建家园。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必要的外力支援，特别是利用上海的支援，在莘塔显得更为突出。这里举一个例子，1976年创办砖瓦厂时，资金十分困难，他们就采取预收订货款的办法，向上海市青浦县的几个乡筹集砖瓦款50多万元，建成了一座日产8万块砖的砖瓦厂，不仅解决了本乡建设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到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友邻

县内。目前，该厂已有职工152人，其中150人是农民工，为农村解决了部分的剩余劳动力。据1982年的统计，该厂年总产值为73.72万元，利润为9.78万元，已有固定资金36.94万元，他们除早已偿还了预收货款外，并以积累的资金扩大再生产，还赚了钱来支援本乡的农副工各业的发展和集镇公用事业的建设。

二. 利用合力是加快乡镇建设的成功之路

人们不禁要问，莘塔为什么过去发展那么慢，现在发展这么快，它的成功之路在哪里？显然，这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的。如前所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莘塔镇建设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还有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的因素。例如，上海市的有力支援和大城市工业的扩散，是得地利；充分挖掘莘塔本乡本土的人力、智力、财力资源等多方面的内在潜力，是得人和。在诸种因素中，不单单是哪一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在起综合的作用，多种动力在起着合力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借用“合力”一词，来说明小城镇建设中的一种综合的力量。它带有同心合力、几股力量合成一股力量的意思。这和力学上的“合力”一词的定义有某些相似之处。

莘塔乡镇的建设主要是利用了这样三个方面的力：

第一种力是上海这个中心城市对乡镇建设的支援协作。

莘塔和上海市接壤，公路从乡镇到上海市郊区的青浦县境内不到10公里，历史上就和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贫穷的乡村，特别是旧时代兵匪作乱的年月里，多少人跑到上海去找饭吃。解放以后，城乡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周围农村的支援协作；而周围农村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上海市的支援。现在，上海生产力水平很高，经济上、技术上有很多优势，但人

口和土地已达到饱和状态，再要发展，除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外，很需要向外扩散。莘塔的经济建设，就充分利用了上海工业扩散这个有利条件。他们争取上海的支援协作，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1. 请老工人还乡。把上海退休下来的本乡老工人请回来协助办厂。本乡东诸村解放前受土匪滋扰，很多人到上海吃“灯泡饭”。1975年，莘塔灯泡厂创办不久，公社党委请来了解放前从本乡出去到上海灯泡三厂工作的一些老师傅，负责技术指导，使这个厂由生产民用灯泡发展到做节日彩灯、矿灯、仪器灯、各种指示灯等80多个品种，其中的节日彩灯远销到港澳和东南亚各地。在国内市场上这个厂的一些产品也供不应求。现在年产值已超过100多万元。吴江客车厂，也是由上海人提供信息，帮助筹划建成的。最多时，从上海请来九十多位老师傅，给他们一人配备三、四个徒弟，让他们手把手教技术，又请他们负责质量管理和技术更新，主管汽车的改型业务，改装出客货两用双排车、活鱼运输车、医疗救护车、电视录像车等新产品。1982年，在无锡召开的一次订货会上，各地要求的订货数量大大超过其生产能力。这个厂改装的X光体检车，在中国汽车公司召开的全国改装汽车展销会上，得到内部设计奖。现在，该厂已经和县经委联营。

2. 接受上海工业产品的扩散任务，为上海的厂子搞加工装配。如镇上的吴江电梯厂和上海长城电梯厂建立了协作关系。他们派出八个装修队到全国各地替长城电梯厂装配电梯，从中学到了技术，培养了骨干力量。他们还和上海电梯厂分工，生产上海厂不生产的半自动、自动货梯、客梯、非规格化的电梯。上海厂受厂房、劳动力等条件的限制，也很愿意支援、协助这家电梯厂“拾遗补缺”。

3. 派人到上海学习新技术，获取新信息，发展新产品。如吴江莘塔化工厂的前身是一个做纽扣的小厂，一位厂长兼搞外

勤，他通过上海吴泾化工厂的熟人介绍，和燎原化工厂建立了协作关系，生产当时国内市场上紧俏产品乙二胺。但是，等到生产正常了，好景不长，紧俏产品却变成了滞销品，造成产品积压，工厂亏本。领导眼看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已决定将这个厂关门，正在这个时候，这位厂长又从上海学来了六羟树脂的新工艺，试产成功以后，大量供应南通一家做树脂领的衬衫厂做硬领用，年产值高达140万元。该厂只有二、三十个工人，连厂长、支部书记都是亦工亦农人员，可他们每人每年为集体创造近三万元财富。这个厂为试制新产品，从上海吴泾化工厂、上海树脂厂等厂聘请了专门技术人员来厂指导，或派人去上海登门请教。他们还和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订有合约，准备接受他们的新设计，试制新产品。

4．把建筑上的劳务输出和引进先进设计相结合。他们派建筑队伍到上海承担建筑施工任务，同时把上海设计的比较适合农村的图纸带回本镇，加以修改，为本镇所用。莘塔影剧院就是根据上海天山影剧院的图纸，略加修改后建成的。影剧院大厅内加了窗子，既可以开会，又可以上课。地下室建成为茶室和各种文娱游乐场所。

5．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集镇市场。一方面从上海采购工业品，供应本地市场，很受群众欢迎。原来本乡70%的购买力流向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现在已大致上改为“倒三七”。同时，把本乡的农、副、水产品直接运到上海，使上海市民能吃到新鲜的鱼虾等时鲜货。

6．以邻为友，互通有无。上海市青浦县与莘塔接壤，有多年的协作关系。如莘塔农具厂扩建为油泵阀门工具厂时，就从青浦县金泽借来三台车床和刨床、钻床，有些原料、材料也是从金泽等乡求援来的。莘塔办厂挣到利润后，作价还款，一分不少。反之，对方需要的砖瓦、砂石、水泥以及农副水产品，莘塔也是尽量给予支持。金泽乡挖鱼池，莘塔动员劳力去干，互通有无，等价交换，

这六种形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通过集镇这一纽带，反映出了新旧城乡关系的本质区别。旧社会，城乡对立，城市剥削农村；新社会，城乡互相支持，协调发展。

由此可见，发挥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对于小城镇建设是十分有益的，它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上海这个中心城市的支援和协作，莘塔乡镇的建设不可能这样快。从广义上说，这也是城市的知识和技术下乡，对农村的一种智力支援。当然，这种城乡之间的协作，不仅利在农村，许多事实说明，对城市的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种力是莘塔全乡农村为乡镇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智力、物力和财力。

马克思说过："在一个国家里，剩余劳动首先必须在农业中出现，然后才有可能在从农业取得原料的那些工业部门中出现"①。莘塔乡的情况正是这样。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农村正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特别是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上的自主权，积极性大为提高。一般一个不太强的劳动力也可以承担四、五亩土地的农业劳动。由于地少人多，这里大约有40%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投入工业、副业和商业服务业，搞多种经营。

莘塔乡镇建设特别是新建扩建的社办工业使用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很可观。据对莘塔15个乡镇厂的统计，共有职工1,577人，其中有亦工亦农人员1,395人，占职工总数的88.5%；按照这个比例，去年他们创造的工业产品的产值达622万元，创造利润近40万元。这些务工社员历年来共为乡镇工业积累了近300万元的固定资金。前面说过，莘塔乡镇的建设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乡镇厂的利润，实际上，这些资金的绝大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62页。

部分出自全乡众多的务工社员。如客车厂共有职工220人，其中务工社员为171人，1982年一年他们共为集体创造纯利润2.87万元。可以设想，没有莘塔全乡提供众多的劳动力，没有这些务工社员创造的大量财富，莘塔镇的建设便无从谈起。务工社员每月所得收入大约四、五十元，一年可得500元左右，这也大大提高了农民要求办好工业，把多余劳动力投入乡镇建设的积极性。最近，莘塔乡正在新办一座伟业印刷厂，为上海几家印刷厂印制各种书籍，已于1984年1月投产。

为建设乡镇，莘塔全乡不仅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挑选出各种能工巧匠和有文化的青年到镇上来工作。我们所接触的乡经联会的干部和各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数十人，几乎全部是从农村来的“五匠”，特别是木匠，和有创业精神的基层干部。现任乡工业公司副经理的陆金希就是一个木匠出身的能工巧匠，许多工厂都是他和他的徒弟设计的。他们设计的文化中心很有风格，已经县计委批准，正在施工。他的两个徒弟一个调到县城建局工作，一个考上镇江农机学院，毕业后仍回到本乡建筑社。最近又送了两名有培养前途的厂长和技术骨干，请大专院校代培，搞智力投资，使全乡的建筑水平赶上四化的要求。

第三种力是充分调动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挖掘内在的潜力。

1974年，莘塔乡由于闹派性、农业经营单一等原因，社员欠国家债务达110万元，成了吴江有名的穷乡。莘塔的情况，引起了中共吴江县委的严重关注，县委下决心调整领导班子，迅速派去了几名分管党、政、经济工作的“明白人”，明确交给他们三项任务：把农业搞上去；把工业搞上去；把亏损降下来。新班子上任三把火，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订出三条奋斗目标，动员群众共同努力：五年内农业要达到全县中上游水平；工业要赶上先进社队；人民生活要达到全县中等水平（五年后检查已基本上实

现)。他们还决定把办好乡镇企业作为治穷致富的突破口，发动干部、群众、技术人员讨论三个问题：要不要办工业？能不能办工业？怎么办好工业？经过大讨论，一致认为：资金、技术、劳动力是三件宝，而人才更是宝中之宝，特别是能打开产供销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是最缺最缺的。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有才能、有事业心的好同志都要大胆启用，以调动本乡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发动大家排出在上海、苏州、吴江和邻乡的本地能人或对本乡建设有用的人才二百多人，先后发出了近千封信。凡是已接近退休或可以调来的，就邀请他们回家乡来参加建设；凡是不能来的，也请他们为莘塔的农、工、副业及集镇建设出主意想办法或再荐能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请来九十多位老工人、老技术人员，他们为乡镇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有一位姓陈的木匠，是造船能手，流落他乡，一身手艺无用武之地，请回来当了造船厂的厂长，他造的船非常平稳，远销江浙两省农村。还有一个信息救活一个亏本企业的故事也是耐人寻味的。农具厂是由手工业联社演变过来的，生产的农具供本乡使用，年年亏本。在这次挖掘人才等社会资源的活动中，本厂一位工人写信给他在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哥哥，请他为家乡建设出力，这位干部把国外某铆头公司正大量需要的一种手铆钳的信息，转告给家乡父老，经过艰苦的劳动，在农具厂基础上扩建成阀门工具厂，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手铆钳和扩孔器两个产品，远销到一些欧洲国家。后来他们又在《人民日报》上登广告，价格比别处便宜三分之二，又招来大批订货。去年这个农具厂兼阀门厂创造了163.8万元的产值，利润30.35万元，上缴给国家的所得税6万多元。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过“城乡的融合”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达到城乡融合，充分发挥城、乡、镇的合力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合力和融合的最终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庄严宣布的：“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

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①

三、合力，搞活了莘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盘棋

如前所述，充分发挥城市、农村和集镇本身三方面的作用，加强小城镇建设，对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有着重要作用。显然这是一幅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宏伟远景。那末，它的近期效果又怎样呢？在莘塔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它带来的深刻变化。简单地说是：合力带来活力，搞活了莘塔全乡经济社会一盘棋。

1．社办工业是莘塔镇中兴的动力。可以说，没有莘塔乡的乡镇企业，就没有今天的莘塔镇。这七、八年内，建设莘塔新镇，大约共用去400万元，除了100万元是供销社、银行、粮站、乡政府等各种企事业、行政机关向上级申请拨款外，其余近300万元来自乡镇企业的利润。

2．工业建设也有力地支援了农业。这里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社办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加上务工社员的转队工资，参加社员的分配。从工业利润中，全乡平均每人每年得益88元，莘塔全乡农民从透支110万元到今天已有100多万元的存款，不能不说明这是乡镇企业的巨大作用。即使对人多劳力少的困难户，乡里有余钱帮他们盖房子，安排工作，使他们很快达到了中等生活水平。第二种形式是发各种奖金。如积肥奖、计划生育奖，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计划生育事业。第三种形式是用于农业技术改革的新措施。如奖励农民推广水稻良种、大养长毛兔，促进农副业生产。

最近三年，农业虽连年受灾，但人心稳定，很显然，这是由于有乡镇企业作为后盾的缘故。1982年，农副工三业总收入中，农业的比重只占33%，而工业比重占了54%，副业占13%，人民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0页。

活基本上达到“旱涝保收”。

3. 集镇建设促进了商业兴旺。乡镇的重大职能之一是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莘塔镇现有商业网点41处，已有多渠道的商业体制出现。1982年与1975年相比，集体商业营业额增长1.8倍，利润增长3.88倍，纳税增长1.47倍。供销社平均每人每年增加营业额34,579元，合作商店每个职工增加营业额6,362元。商业上的变化，体现了集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的变化。商业的兴旺又反过来要求集镇更快的发展。

4. 集镇建设，促进了工业建设和交通运输业同步发展。莘塔已和县交通局共同投资新筑了从莘塔镇到芦墟镇长5公里的公路，已交县营运。它与交通干线通上海市区的青平公路相接，又与平望这个全县交通枢纽相通，每天有九班客车来往。轮船也从过去的一天一班增加到五班。1982年货运量比1978年增加了一倍多，客运量增加了四倍多。从1981年起，从镇筑起通往各村的乡道，到1983年底，全乡20个行政村已全部筑通。别看一条乡道，其意义实在很大，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过去莘塔乡农民在本地很难吃到棒冰，现在，个体商贩用自行车把这类冷饮送到各村各户。社办厂的务工社员既能骑自行车上下班，也能起早带晚在家里种责任田，做到亦工亦农两不误，有利于实现“离土不离乡”。

5. 集镇建设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小学校舍新建在小桥流水之旁，医院在原址翻建，新建的影剧院拥有一千多座位，并附有茶室、娱乐室、图书室、花房，兼有文化中心、成人教育中心的职能。全镇已开办了六个中专性质的培训班，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企业的技术水平。乡镇的清洁卫生工作，有专业的环保站负责打扫和管理，居民们实行门前“三包”制度；他们还用环卫费购买树苗，1982年种树2,000多棵，绿化乡镇。我们漫步莘塔乡镇街头，看到这个水乡小镇显得那么整洁、安静、舒适。我们搞了次抽样调查，按户口簿每五个集镇人

口抽一人，95%的人正面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们对本地的集镇建设，对工农商文教卫各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人是满意或很满意的。也有人对今后乡镇更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和积极的建议。

我们认为，抓住重点，运用合力，带动活力，莘塔乡镇的建设会做得更好，为城乡融合、工农联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作出新贡献。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纽带作用

——江都县宜陵镇调查

吴　镕　吴德富　钱国耿

要了解中国社会，不可不了解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要了解今日的中国，也不可不了解大中城市的状况。而居于这二者之间数以万计的小城镇，既是农村社会的缩影，又带有城市的某些特点，它是联结城乡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这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过去我们对小城镇的状况知之甚少，最近我们选择江苏省江都县宜陵镇进行了调查，希望从中了解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小城镇的发展趋势，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联结城乡和巩固工农联盟的纽带作用。

一、宜陵镇的盛衰史

宜陵镇位于江苏扬(州)泰(州)公路的中段。年工业产值超过3,000万元，居苏北地区乡村集镇之冠，与苏南一些发达的小城镇相媲美；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超过2,000万元，大大高于同类集镇的水平。这个集镇的年财政收入突破400万元，超过某些县的全县水平。有些产品闻名全省，如蜂乳产量占全省第二，可锻铸铁、球墨铸铁、MS80型柔软剂、560树脂等产品驰名省内外。全镇已经

成为周围50多平方公里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

宜陵历史悠久，在《后汉书·郡国志》中已有记载。到唐宋时，宜陵已经形成为人烟稠密的商埠。当时，镇上的货栈、书院、寺庙甚多，曾是经济富庶、文化昌明的好地方。在日寇蹂躏的年代，遭受破坏，经济凋零，几成废墟。抗战胜利后，宜陵的经济文化事业迟迟没有复苏，商店大部关闭歇业。

解放后，宜陵镇得到了新生，很快又恢复了兴旺景象。当时镇上有杂货店、茶食店、百货店、五洋店等日用工业品商店40家，粮行、鱼行、油坊、肉铺等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商店91家，饭店、理发店、浴室、旅社等饮食服务商店53家，染坊、鞋铺、修旧等服务性行业的商店37家，共计221家店铺。另外，还有八、九十户小商小贩。这些稠密的商业网点，吸引了方圆七、八十平方公里范围的农民赶集。镇上从早到晚，人来客往，熙熙攘攘。然而，当时全镇没有一家工厂企业，仍然是一座商业消费型的集镇。

五十年代的粮食统购统销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稳定了市场物价，巩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是，客观上也影响了宜陵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全镇最大的商行——29家粮行，全部关了门，为南北乡农民交换粮食服务的饮食业、服务业陆续停业。特别是后来经济建设上“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人为地合并商业网点，商品流通实行单一成分、单一形式、单一渠道。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经营失去了应有的弹力，整个集镇经济没有活力。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也是宜陵镇经济文化发展的转折点。带头振兴集镇经济的是工业和建筑业。它们以23%的年递增率迅猛发展，1982年全镇工业产值达3,159万元，占全乡经济构成比重的62%，改变了农村的单一经济结构，并取代商业成了全镇经济的第一支柱。集市贸易的开放，又为集镇经济的繁荣增添了活力。集镇个体商贩和出售农副产品

的日平均摊位约300个，平均上市4,000多人；集市贸易成交额也年年上升，1982年达144万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精神文明建设也紧紧地跟上。集镇上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业余文艺宣传、计划生育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幼托工作等等，都走在全县的前列。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民风、镇风、村风基本上恢复了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宜陵镇已经初步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明昌盛的新兴的农村集镇。

二、经济文化的中心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宜陵镇在周围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已起到举足轻重的中心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开辟了城镇劳力的就业门路，使群众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社会治安得到改善。粉碎"四人帮"以前的一二十年间，镇上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固定职业，他们收入无着落，生活不安宁，常常无事生非，吵架闹事。随着集镇经济的发展，居民进了厂或店，现在全镇已没有一个闲散待业人员。全镇人均月收入达29元，赶上了一般中小城市的水平，比全国高水平的常州市低8元，但集镇上生活费用低，其实惠程度不亚于常州市人均37元的水平。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男女老幼衣着整齐，住宅条件大有改善。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充实和丰富精神生活。镇上共1,000多户居民，有电视机的有270多户，占总户数的23%。1982年人均看电影40场次，大大超过全省27次的平均水平。人们生活的改善，促进了乡镇邻里间的团结，民事纠纷减少，刑事案件极少发生。

2. 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成为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新型农民。宜陵全乡农业人口33,000余人，耕地28,000余亩，农村每人平均只有8分地，整、半劳力15,000多个，约有40%即6,000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是剩余的。目前在乡镇办

工商业和建筑业从事亦工(商)亦农的劳动力有4,371人，占全乡总劳力的29%，占剩余劳力的73%。这证明乡镇办工商业的发展是适应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的。搞好小城镇建设，继续大力发展乡镇办工商业，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到镇上，这是今后农村经济发展和形成城乡新格局的一种必然趋势。

3．提供了大量的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和技术设备，促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在价格与价值背离、工农产品剪刀差不可能短期内缩小的情况下，只有从当地自我补偿中寻找出路。发展镇办工商业，从其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支援农业，尤其是支援生产，实行“以工补农”，是一个重要途径。粉碎“四人帮”六年来，集镇工商业提供了55万元资金支援农业，相当于国家同期对农业投资的4.9倍。全镇农业产值1982年达369万元，比1976年上升46%，年递增率达6.5%。

4．提高了农民的分配水平，调动了务农劳力的积极性。宜陵地少人多，农业以种植粮食为主。近几年国家为了鼓励种植粮食，已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但由于粮食与多种经营收入的比价差距较大，农民种粮主要是尽义务、作贡献。即使是特大丰收的1982年，单靠粮食作物的收入，全镇农村人口人均收入也只有60多元；而通过工资收入和“以工补农”，1982年全镇农村人口从工商业及其副业中，却得到了400多万元收入，人均达120多元，超过农业收入一倍多。加上家庭副业和其它外来收入，人均收入已近300元。收入增加后，务农劳力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的基础更加巩固。

5．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准备了条件。镇办工业的出现，冲破了狭义农业和单一经济的束缚，把种植业、养殖业同农副产品加工业结合了起来，实行了农工商综合经营，逐步改变着历史形成的全部农产品、特别是属于原材料的经济作物运到城市加工，再把加工后的产品运回农村销售的

情况。宜陵的蜂乳厂，不仅把本镇农村的养蜂户联合起来，而且还吸引了四周几个乡的养蜂户，就地加工蜂乳，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这样做，节省了原料和产品在城乡之间的往返运输费用，提高了经济效益，很有发展前途。从宜陵镇工商业的兴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村要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建运综合经营，必然要以小城镇为依托。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多数农副产品商品率不可能象有些国家那样高。各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都单独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我们没有条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向生产的深度进军。小城镇就可以起到联合的纽带作用。随着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发展，以小城镇作为多种多样农副产品加工基地的条件，就更加成熟，这就为将来消灭城乡和工农差别，创造了有利条件。

6. 拓宽了工农产品的销路，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小城镇是城乡物资交流的桥梁和流通枢纽，大量的城市工业品要通过小城镇源源不断地供应广大农村；农村的粮、棉、油、猪和其它副业产品也要通过集镇运往大城市。工业品要畅通销售渠道，最主要的是改善农村集镇商业。宜陵镇经过商业体制的改革，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条渠道畅通。各种成分和渠道各显其能，互相竞争，取长补短，协调发展，给市场带来了活力。1982年，各种渠道销售自行车3,000辆、电视机39架、手表1,293块、缝纫机258台、收录机791台、化纤布66,800米，分别比上年增长200%、34%、190%、65%、50%和12%。全年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48.5%。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了消费品的广阔市场在农村。只要认真地进行流通体制的改革，把农村集镇的商业搞活，消费品的积压就会缓和，工业生产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7. 丰富了农村的精神生活，成为当地科教文卫事业的指导中心和活动中心。宜陵镇拥有文化站、图书室、新华书店、广播站、影剧院、少年之家等文化设施；有中心小学、完全中学、文化补

习班、业余技工学校等教育设施；有镇卫生院、区中心医院、中西药房等卫生设施；有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工业科学技术情报室、科学画廊、科研讲座等科学普及推广设施。这些科教文卫设施，不仅是精神文明活动的重要阵地，而且成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场所。不论什么宣传文化活动，总是在镇上先开展，然后在农村推广。如幼儿教育、“五讲四美三热爱”、计划生育宣传活动、爱国卫生活动等都采取了集镇带农村的方法，让这些有益社会、有益人民的活动在农村也广泛展开，用共产主义思想，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培育一代新型的农民。

三、几点启示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中心。加快小城镇建设，是改变农村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加强对小城镇的研究，总结小城镇的历史经验，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也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通过宜陵调查，得到了发展小城镇的几条启示：

1.小城镇是在一定的经济区划内，随着生产力特别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它有自己的形成规律和疏密恰当的格局。

三大改造以前，宜陵镇的繁荣是利用依旁通扬运河和扬秦公路，位于“买不尽的东南，卖不尽的西北”旱水谷物交易处的优势，招来远路客商和周围农民跑街赶集，形成了消费性的小商品经济的活动中心。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宜陵镇旧貌换新颜，出现了大批镇办工业，疏通了商品流通渠道，集镇乡村的经济活动越搞越活，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正在出现。现在宜陵镇已经成为生产消费结合、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兴集镇。

宜陵镇的发展充分说明，小城镇形成和发展，是由生产力发

展的水平所决定的。江苏南部，35.9平方公里就有一个集镇；北部，特别是徐淮地区，却要69.8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集镇。这个布局决非出于偶然，完全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历史上，南部地区商品率较高，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就需要有一个商品集散地；而北部地区曾经是自给还不足的落后地区，商品率极低，范围小了就形不成商品交换的汇集点。目前，徐淮地区的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正在不断提高，原有的小城镇已难以承担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农民生活的供给任务，规模特大的乡正在逐步划小，新的小集镇正在逐步形成。

当然，也有过人为地建立行政中心并使它逐步变为经济中心的情况。但是这类行政中心的设置，必须要有科学的预测和某些经济活动的突起为基础。无锡县港下乡在六十年代把乡的机关从规模较大、地处边缘的陈市镇迁到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适中的港下小镇。由于七十年代社队工业的蓬勃发展，400多人的港下小镇很快发展为4,000多人的工商繁荣、科学文化发达的小城镇。反之，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随心所欲地划分行政区划，设立新的乡，而乡政府所在地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很难吸引周围地区的农民，小集镇就很难在短期内兴建起来。宜陵镇附近的一个乡政府所在地集镇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但由于历史习惯的影响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缓慢，至今还象农村的庄子，起不到全乡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因此新设行政中心，兴建小集镇，必须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必须要经过科学的预测，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决不能盲目草率，主观臆断。

2. 发展集镇经济，一定要因地制宜，立足农村，促使集镇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宜陵镇经济的主体是镇办工业。它的发展之所以迅速，是贯彻了因地制宜，立足农村，为农服务的方针。蜂乳厂兴办于1970年，当时宜陵镇周围有 20 多户养蜂户，有蜂 300 多箱。他们派

人去无锡市学技术，上马试制蜂乳产品。由于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质量有保证，蜂乳厂越办越兴旺，现已形成了现代化生产流水线，批量大幅度增长，产值从三中全会以前的95万元，提高到1982年的906万元。玛钢厂生产的可锻铸铁产量已达到1,400吨，除南京、无锡、苏州三家大厂以外，跃居全省第四位，质量达到先进水平。集镇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村队办企业的发展，他们采用零部件扩散、初级产品下放等办法，把社队办企业紧密地联结起来。玛钢厂把扣件产品的螺杆，脱壳给郭云大队队办厂生产。蜂乳厂以大帮小，把安倍瓶、大小包装箱、小铝饭盒等副产品全部下放给运河等25个大队办企业去干。这些小厂紧密地围绕在蜂乳厂周围，年产值达110万元。

除此以外，社办工业的经营利润，以职工工资总额的10%返还生产队，用大量资金扶持农业实现现代化，从而调动了务农劳动力的积极性，增强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基础更加扎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宜陵镇粮食产量年年上升，从1978年的2,750万斤，发展到1982年的2,743万斤，油菜籽从1978年的234,000斤发展到1982年的 594,500 斤；人均口粮从460斤增加到500多斤。从事集镇工业、商业劳务的农村劳动力，因粮食过了关，更加安心本职工作，全力扑在生产上。农业的稳定，反过来又促进了集镇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实践证明，贯彻"因地制宜，立足农村"的方针，是集镇、乡村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但是，苏北有些地区的集镇，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盲目地学习苏州地区兴办乡镇企业的经验，一心要搞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忽视因地制宜，不从自己的条件和特点出发去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采矿业和手工业，结果，资金和劳力耗费了，却收不到应有的效益。农村经济非但没有得到扶持，反而被平调了资金、劳力和耕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3. 活跃集镇经济的一个重要关键是疏通商业渠道，实行多种成分并存，多条渠道畅通的流通体制。

重生产、轻流通，已相沿成习。在目前商品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认真改善商业流通体制，势将造成更大的损失，生产必然难以为继。宜陵镇看清了形势，花了半年多时间，下决心抓了商业体制改革。改革后的效果是明显的，本来难买的买到了，难卖的也卖出去了，生产单位和农民高兴，市镇居民满意，国家也增加了税收。

要搞活经济，在商业流通体制上，必须把“少”和“统”改为“多”和“放”，也就是要在坚持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实行多渠道，建立多网点。宜陵镇上现有国营商业、供销社、合作商业、镇办商业、知青商业、个体商业等多种性质的商业，网点比前几年增加了一倍多。渠道多了，网点多了，竞争的对手就多了。增加了经营的外部压力，带来了企业内部的活力。现在，家家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想方设法多做生意，流通不畅的情况改善了。群众说：“过去是单渠道，好比麦田排水沟，一尺不通，万丈无用，大家急得没办法，现在是条条渠道都畅通，货拣三家不吃亏。”改革刚开始，有人担心，渠道多了，大家吃不饱。实践证明，这些同志低估了农村的购买力，低估了商业职工的积极性。宜陵七、八条渠道的营业额连年大幅度上升，年递增率低的百分之十几，高的达二倍多。

宜陵镇商业体制改革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越来越明显。但是，还有一些人不理解这样的改革，特别是对农民办商业看不入眼。他们反对的根据，就是农商分工是社会的进步，现在，农民搞商业是一种倒退。其实，宜陵商业三分之二以上是经营乡镇企业所需的材料和产品，外地产的消费品不到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二”，是农村搞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改变农村经济结构，农民必然要昂首阔步地走进流通领域。农工商

联合经营的采购和运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流通渠道狭窄和堵塞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环节过多的状况，从而减少了支出和费用，增加了农民收入。另外的"三分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供销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有益无害。农民办的商业之所以能存在，能发展，就是因为市场能容纳，群众有需要。适应市场和群众需要的事物，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4.建立新型的农村集镇，必须注意文化科学事业的相应发展，

宜陵镇在抓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努力创办文化教育事业。他们在选拔干部、职工定级、招收新工人时，都注意文化水平的考核。学文化，学科学，蔚然成风。1982年经新华书店销售的科技书籍5,400册，经邮局订阅的科技报刊2,900份，分别比四年前增长4.5倍和3倍。为了满足群众学科学、学技术的需要，1982年镇上办了农副工商技术训练班24个，科学讲座30次，文化补习班15个，并选送了30多人到南京、扬州等地培训，有的还到大学去当旁听生。他们还利用文艺活动的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动，充实了业余文化生活，增添了集镇和乡村的活力，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目前尚有不少的农村集镇只重视物质文明的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教育事业与广大群众的需要很不适应。一些集镇无书店、无阅览室、无剧场、无文化活动场所；不进行科普教育，不抓技术培训，不重视中小学教育，文盲甚多，科盲普遍，文化生活枯燥，镇风、村风不良，吵架闹事不断，妨碍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生产发展。

5．发展农村经济文化中心必须解决规划、体制等问题：

（1）规划问题。宜陵镇与大多数小集镇一样，存在着缺乏规划，盲目发展的弊病。各单位自行其是，建房"见缝插针"，布局比较零乱，耕地减少严重。全镇现有的铺地面积已比解放初期扩大

了三倍。究其原因，主要是镇上头头多，规划难统一。宜陵镇上，行政单位有区公所、镇政府；事业单位有中学、小学、邮电局、税务所、银行、镇卫生院、区中心医院；企业单位有国营工厂、县属工厂、镇办厂、供销社、国营商店、粮管所等。这些单位往往只顾自己发展，不顾统一规划；只顾自己建筑内部设施，不顾建筑以外的配套设施。因此，小城镇建设，一定要制订远近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各具特色的规划。规划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就具有法律效力。为了制止滥占耕地的情况，除了提高土地征用费外，还必须严格审批手续。为做好市镇建设工作，规模较大的集镇(人口在4,000人以上)，应该配备专职市镇建设委员，以利于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2) 体制问题。江苏有小城镇1,897座，但单独建制的只有132座，其余都作为乡政府所在地。一些近万人的镇也属乡领导，镇上没有自主权。原来的宜陵乡集镇常住人口7,000多人，同样是属乡政府管辖，这样的体制，很难充分发挥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实行政社分设体制改革中，大丰县新丰公社认为，以前单独把镇划出去，成为县属镇，与乡村分离，不能适应城镇、乡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形势。如果还是把城镇归乡领导，小城镇自主权得不到尊重，城镇工作先走一步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作用也不可能发挥。他们吸取了市管县的经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试行以镇管村的新体制，建立新丰镇，把集镇和乡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浑成一体。宜陵乡也仿行镇管村的新体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撤消宜陵乡建制，设立宜陵镇，以便充分发挥它的经济、文化的中心作用，带动周围农村更快地发展，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是好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

——吴江县四个行政村的调查

张 雨 林

关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一般有这样两个概念：一是随着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一部分原来从事种植业的劳动者转而从事林、牧、渔业等多种经营；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转移到非农业的产业部门和其他部门，如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等。前者是农业内部分工的深化；后者则是农业和其他各业分工的发展，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世界上各发达国家在实现其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的产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的过程。但是，转移的形式及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却是截然不同、或者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早期，农民是破产进城，成为城市工人或城市贫民；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则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从与公有的农业生产资料相结合转向与公有的工业生产资料相结合。关于这个转移的过程如何发生？它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以及它对于我国社会结构和城乡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这次，我们在江苏省吴江县进行了这项研究。当我们在那里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行一般考察时，便发现这种转移是分成几个部分进行的：一部分就在当地实现转移，主要是转移到村的

工商业点上；一部分转移到距家很近的乡属镇或是县属镇；一小部分转移到相距较远的城镇或小城市；个别的转移到大、中城市。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将它称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

为了具体分析这种分层转移的情况，我们在一般考察的基础上，又对这个县的震泽乡外倚村作了重点解剖，并与震泽乡的另外三个条件不同的村作了对比。

一、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形势

吴江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富饶的太湖之滨，东与上海郊区县毗邻，南与浙江的杭嘉湖地区接壤。这个县的震泽乡(公社)处在县的西南部，靠近浙江。乡的境内有震泽镇(县属镇)，是吴江县西南片的工商业中心，又是乡政府和公社管理机构的所在地。由震泽镇西行十八华里，是浙江省湖州市所辖的南浔镇。这次我们重点解剖的外倚村(农业社)，就处在这两镇之间。村子北濒頔塘河。这是一条贯穿江浙两省、流经震泽、南浔两镇的河道。河流北岸，有一条与河平行的公路——上海至湖州公路。从外倚村通往两镇，坐机动船约需 1 小时，骑自行车约需40分钟。村中有一个工、商业集中的“点”，村(农业社)办的工业和供销社的“下伸店”设在这个“点”上。我们选择外倚村作为解剖的重点，是因为上述条件有利于探索农业劳动力向村的工商业“点”和附近市镇转移的情况。三个对比村，一是紧靠震泽镇的南浦浜村；一是距震泽镇五华里，村子沿公路的众安桥村；一是距震泽镇五华里，不通公路的梅家浜村。和这几个村进行对比，便于探讨不同的区位和交通条件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外倚村现有322户，1,321人。全村耕地面积 2,056.7 亩，人均1.56 亩。耕地中的水田面积 1,619.8 亩，人均 1.23 亩；旱地436.9亩，人均 0.33 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数量在全国居于中

等水平，但生产的其他条件则远比全国大多数地方优越。这里处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区，温湿多雨，土地肥沃，有较多的水面和良好的水利条件，宜于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又距大城市较近，便于兴办乡村工业。

过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农民的手脚被束缚在单一的集体耕作和粮食生产上，多种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形式和多种生产项目受到限制。七十年代虽兴办了社队工业，但其他方面限制得更死了，因而总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以后，情况才有了改观。近年来，落实了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1982年底开始实行"包干到户")，放宽了对农村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初步改善了商品流通渠道，人们逐步放开手脚，广开门路，发展商品生产，使这里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粮食生产继续有所增长的同时，农业内部的多种经营有了很大发展。1982年和1978年比较，粮食年产量增长13.3%，蚕茧年产量则增长86%，将近翻了一番。养殖业中的家畜家禽生产(主要是鸡、鸭、兔)也发展很快。(2)农业社办的工业继续有所发展，不仅工厂数目增加（原有旧桶整修厂、饲料加工厂、蔬菜加工厂等三个厂，现在增加了防水建筑材料厂，共为四个厂)，而且厂的规模扩大，产品的种类增多。不久前与上海郊区厂挂钩，在上海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试制新型建筑材料"浮化沥清"的中间产品成功，为工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1982年和1978年比较，工业产值增长2.25倍，利润增长96%。(3)手工业者从简单的外出作工、向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发展为在集体同意下进行自主经营，产品自产自销（向生产队交纳一定数量的公共积累)。一些铁、木、竹匠还带了学徒，办起了手工业作坊，有的产品远销上海，生意相当兴隆。(4)随着农业多种经营、工业、手工业、建筑业的发展，农村运输业应运而兴。人们在载重

10—15吨的水泥船上安装12马力的柴油机(当地称为“挂机”)，为工厂、企业和盖新房的农户运输钢材、水泥、木料、石灰、黄沙等建筑材料和其他笨重物品。这样的“挂机”船，全大队在1982年有10多条，1983年上半年增加到22条，其中11条是向集体承包的，11条是自营的。

有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之后，全村1982年集体农副工业总产值达929,000元，比1978年增长82%，人均703元。其中，种植业占37%，林、牧、副、渔业(包括运输业)占27%，工业占35%，其他约占1%。社员人均净收入387.56元，其中来自集体的257.56元，占66%，来自家庭副业(包括自营手工业和运输业)的130元，占34%。农副业产品的商品率，按生产队出售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计算，为61%。农村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个对比村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外倚村大致相同，只是有的(梅家浜村)还没有办起村（农业社）的工业。有的(众安桥村)工业比外倚村更多，有的(南浦浜村)距震泽镇很近，有更多的劳动力到镇上找寻出路。以上就是我们在本文中探讨的劳动力分层转移的经济基础。

二、新的劳动力结构

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外倚村综合经营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状况已如上述，那么，它拥有的劳动力和农户的社会分工是怎样的呢？

先看它的劳动力结构。

在对劳动力进行调查统计时，我们没有采用统计工作中常用的折合成标准劳力的计算方法，而是按照自然劳力计算的。因为有些生产活动并不是男劳力一定强于女劳力，全劳力一定强于半劳力。例如养蚕，女劳力是主力；插秧，小姑娘比身强力壮的男

子汉还要快。农民习惯于把男、女、全、半劳力搭配起来进行生产，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就应该尽量切合这个实际情况。此外，在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以后，农户把种田、植桑养蚕和饲养家畜家禽等家庭副业结合在一起经营，劳力之间的分工分业无法截然划分，因而我们也只能把从事这些生产活动的劳力放在一起计算，称之为一般务农。只把重点从事养鸭、养鸡等多种经营的劳动力与一般务农的劳力分开统计。干部是管理人员，多数也直接参加农工等业的生产劳动，本来也可以归入各行各业，但是为了说明管理也是一种社会分工，因此也单独列项统计。按照上述计算的方法，这个村劳动力分工分业的情况如下表：

自然劳动力合计	农业		工业	手工业	运输业	教师	医生	干部（包括乡、公社村、社及企业）	其他
	一般务农	重点从事饲养畜禽渔等							
798	471	1	191	24	42	9	3	46	11（注）
100%	59.1%		32.2%			1.5%		5.8%	1.4%

注：“其他”中包括9个由公社组织到东太湖办农场的，2个外流的。

三个比较村的劳动力结构和外倚村大体一样，只是各业劳力所占比例不同。距镇五华里、不通公路、没有村办工业的梅家浜村，务农劳力占到总劳力的66.38%，从事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的只占26.7%；紧贴市镇的南浦浜村，务农劳力占47.4%，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劳力占45%，大体上是各占一半；而距镇五华里、沿公路、村办工业办得最好的众安桥村，务农劳力只占31.79%，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劳力占到61.46%，把梅家浜村的上述比例倒过来了。此外，三个比较村都有少数人从事商业，而外倚村

没有从事商业的劳力，是个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以上所说的各业劳力的比例，只能为我们提供当前农村劳力结构的概貌，还不能说明它的全部情况。进一步剖析这一过程，可以看到，这里现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其他各业转移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农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中，只有少数人完全脱离了农业，其余绝大多数还在兼业务农。我们重点解剖的外倚村，完全离农劳力的只有37人，占列入其他行业劳力总数的12.3%。其余87.7%的劳力，约有20～30%的劳动时间兼业务农。对比梅家浜村，由于本身没有工业，务工劳力每天都要到公社或镇上去上班，兼业务农的时间就要少一点。而村办工业最好的众安桥村情况则相反，他们在厂做工的人数很多，但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五、六个小时务工，其余40～50%的劳动时间用于务农。（2）转移到其他行业的劳动力的素质与留在农业上的劳动力素质是不平衡的。这从下页表中的对比中可以看得出来。

分析表上可以看出，大多数男性精壮劳力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力已经转向其他行业。例如，25岁以下的男性劳力，全村共101人，已经转移的75人，达74.3%；35岁以下的男性劳力，全村共247人，已经转移的164人，达66.4%；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力共199人，已经转移的124人，达62.3%。留在农业第一线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精壮劳力，主要是农机、农技和管水人员，以及因家务等原因不能转向其他行业的妇女。如第六生产队有四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精壮劳力留在农业第一线，其中一名是大队的看水员，一名是拖拉机手，还有一名有小孩拖累的妇女，另有一名待嫁的女青年。这就是说，相当多的年轻有文化的劳力已经转向其他行业。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没有完全转移，而是还在兼业务农。这种情况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将在文章的后面几部分中加以论述。

外倚村各业劳力性别、

劳动力分工种类	合计	其中：		年					
		男	女	16—25			26—35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农业	478	195	283	104	26	78	166	57	109
	100%	40.8%	59.2%	21.8%	5.4%	16.3%	34.7%	11.9%	22.8%
工业	187	141	46	65	48	17	63	38	25
	100%	75.4%	24.6%	34.8%	25.7%	9.1%	33.7%	20.3%	13.4%
手工业	23	23	0	10	10	0	7	7	0
	100%	100%	0	43.5%	43.5%	0	30.4%	30.4%	0
运输业	41	41	0	9	9	0	22	22	0
	100%	100%	0	22%	22%	0	53.7%	53.7%	0
教员和医务工作者	13	9	4	4	2	2	2	1	1
	100%	69.2%	30.8%	30.8%	15.4%	15.4%	15.4%	7.7%	7.7%
干部	49	47	2	6	6	0	22	21	1
	100%	95.9%	4.1%	12.2%	12.2%	0	44.9%	42.9%	2%
合计	791	456	335	198	101	97	282	146	136

年龄、文化结构表

年龄组									文化程度			
36—45			46—55			56—65			文盲半文盲（即略识些字）	小学	初中	高中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83	29	54	86	47	39	39	36	3	343	60	65	10
17.4%	6.1%	11.3%	18%	9.8%	8.2%	8.1%	7.5%	0.6%	71.8%	12.6%	13.6%	2%
23	20	3	31	30	1	5	5	0	78	34	60	15
12.3%	10.7%	1.6%	16.6%	16%	0.5%	2.7%	2.7%	0	41.7%	18.2%	32%	8%
3	3	0	1	1	0	2	2	0	7	11	5	0
13%	13%	0	4.3%	4.3%	0	8.7%	8.7%	0	30.4%	47.8%	21.7%	0
4	4	0	5	5	0	1	1	0	22	7	11	1
9.8%	9.8%	0	12.2%	12.2%	0	2.4%	2.4%	0	53.7%	17%	26.8%	2.4%
7	6	1	0	0	0	0	0	0	0	1	8	4
53.8%	46.2%	7.7%	0	0	0	0	0	0	0	7.7%	61.5%	30.8%
12	11	1	8	8	0	1	1	0	18	11	14	6
24.5%	22.4%	2%	16.3%	16.3%	0	2%	2%	0	36.7%	22.5%	28.6%	12.2%
132	73	59	131	91	40	48	45	3	468	124	163	36

三、农户分工分业的发展

现在再来看看农户分工分业的情况是怎样的？

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国的农村经济出现了两个经营层次：一是集体的统一经营，一是社员家庭的分散经营。与此相适应，劳动力的分工和协作也必然有两个层次：一是集体统一安排的劳动力的分工协作，例如，谁当拖拉机手，谁负责管水，谁到工业企业作工，原则上要由集体决定；另一是以社员家庭为单位的分工协作，例如各类专业户、兼业户等。家庭既是生产经营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和生活单位。家庭的经营状况，在现阶段，既是衡量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又对分工的发展起制约作用，因此要单独作为一个问题加以研究。外倚村农户家庭经营状况可用下表表示：

外倚村农户经营状况统计表

总户数	农户		农工（或其他）兼业户								只种口粮田的②非农户				离农户③	无劳力户
	一般农户	专业户①	农工兼业户	农业兼业手工户	农业兼业运输户	工业兼业手户	农业工业运输业兼业户	农业手工业运输业兼业户	农业户中有人从事医教工作	其他	工业户	手工业户	小商	教师	离农户	无劳力户
322	96	6	127	14	24	8	8	—	9	—	11	1	1	—	5	12
100%	31.7%		59%								4%				1.6%	3.7%

注：①按照吴江县政府规定，凡是上缴粮超过5,000斤的，称为粮食专业户，其实，这些户只能称为“粮食重点户”或“粮食大户”。

②“只种口粮田的非农业户”，指劳动力已转向其他行业，但由于国家宏观粮食状况的限制，他们不吃商品粮，自种口粮田。

③“离农户”指连口粮田也不种的户。他们也划进了口粮田，但已委托亲友代种，由亲友帮助他们解决口粮问题，或者在市场上购买议价粮吃。

三个对比村农户经营状况的分类与外倚村大体相同，但各类户的比例有些差别。详见下表：

村　名	总户数	农　户	农工(或其他)兼业户	只种口粮田的非农户	离农户	无劳力户
傅家浜（没有办工业）	174	87	77	6	2	2
	100%	50%	44.3%	3.4%	1.15%	1.15%
南浦浜（贴镇）	265	29	172	28	21	15
	100%	10.94%	64.91%	10.56%	7.92%	5.66%
众安桥（村办工业最好）	221	33	154	22	5	7
	100%	14.9%	69.7%	10.3%	2.3%	3.2%

从上两表可以看出，农工(或其他)兼业户所占比例甚大。村办工业越多，离镇越近，兼业户的比例也越大。本文上一节已用事实说明，在我们调查的地区，即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已有相当多的劳力工农兼业。本节所列举的事实又进一步说明，半数左右的农户已不是纯农户，而是农工兼业户。和上节所说的离农劳力一样，离农户已开始出现，但为数不多。大量农村劳力和农户以兼业的形式向非农业的产业部门或其他部门转移，少数以专业的形式转移。这种情况已使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点，已经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怎样形成的？

四、农工(或其他)兼业劳力和兼业户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前景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农工（或其他）兼业劳力和兼业户呢？至少有以下原因：

第一、生产本身的要求。农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季节性。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①，并认为这是农业和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② 历史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曾经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石。这种经济形式在我们所调查的地区一度相当发达。一位在当地工作多年的老丝绸工作者项志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蚕农加工土丝，“咿呀之声，传遍村舍，终年不辍。一家老小都能参与操作，既不废农务，又能兼顾家务，……能泽近乡，年加工干经二百万关担，农民加工收益可达一百余万银元”。二、三十年代，由于日本“人造丝”的倾销，和国内资本主义机器纺织业的兴起，严重打击了农村的土丝土织，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正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③ 在我国，是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重压压断了。现在，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十多年之后，在农村集体经济和公有制的城市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之后，一方面，农民完全有能力联合起来办乡镇工业，另一方面，公有制的城市工业在自己向高精尖发展的同时，又需要向农村扩散中间产品。从宏观上看，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可以在国家计划的调节下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农村需要城市的设备和技术，城市也需要利用农村的条件发展自己。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农业和工业在新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是很自然的事情。以我们调查的这个地区为例，这里一年当中有七个月为农忙季节（生产两季稻谷，养四季蚕），其中三个月为大忙季节。大忙期

---

①《资本论》第2卷，第269页。

②同上。

③《资本论》第1卷，第551～552页。

闲，农村劳力紧张，而在农闲季节，一般每个农户只需留一个半劳力在家就足以应付了。实行工农兼业的劳力，农忙时在家多务农，农闲时基本上全力务工。而工业，如外倚的乳化沥青中间产品，众安桥的缝纫机架粗加工，南浦浜的染料中间体等，又都是城市工业所需要的。这样的农工结合，对于充分发挥城乡潜力，特别是充分发挥农村的劳动潜力，用于发展生产的确是很有好处的。

第二，从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来考虑，农工兼业也是合理的。农业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后，集体经济仍然是主体。要使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必须调动全体社员的积极性。目前，务工社员的收入一般比务农社员的收入要高，作为集体经济的组织者，就得注意在集体内部调剂社员的劳动，尽可能使一般农户都有人务工，这样也可以使仍然留在农业上的劳力安心务农。当然，调剂收入还有别的办法，例如用工业利润支援农业，按农户交粮多少进行分配等等；国家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还可以用价格杠杆进行调剂。但是，即使做到了务工、务农社员收益的大体平衡，由于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条件不同，农业生产是露天作业，农忙季节特别紧张，务农社员的辛苦程度远远大于务工的社员，而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此，集体仍然要尽可能地调剂社员的劳动种类，照顾到一般农户都有人务工。这次我们所调查的四个村的情况便都是如此。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目前乡村工业还不够稳定，农业生产更难免遇到自然灾害，两者结合，是农村经济稳定增长的好办法。上述种种，是工农兼业劳力、农工兼业户大量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从农户家庭的角度来看，农工兼业也有其必然性。家庭既是经济生活的单位，又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单位；既有经济上的生产和消费的职能，又有抚育儿女和赡养老人的职能。家庭结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

的，其中就包涵了同样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抚育和赡养的形式。但这种形式一经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反过来对经济生活发生影响。现在，我们重点调查的外倚村的社员家庭结构如下表：

外倚村社员家庭人口构成表

总户数	一口之家	二口之家	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	五口之家	六口之家	七口之家	八口之家	九口之家	十口之家	十一口之家
327	26	29	43	83	76	46	18	4	1	0	1
100%	30%			62.7%				7.3%			

注：这是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户数，比现在多5户，家庭结构分析依据人口普查时的情况。

我们将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称为“核心家庭”，将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以及直系老人、未婚弟妹组成的家庭称为“扩大的核心家庭”，将两对同辈夫妻在一起生活的家庭称为“联合家庭”，将没有一对夫妻的家庭称为“不完整家庭”，以此划分外倚村的社员家庭结构，如下表：

外倚村社员家庭结构表

总户数	核心家庭	扩大的核心家庭	联合家庭	不完整家庭
327	99	171	4	53
100%	30.3%	52.3%	1.2%	16.2%

为了说明抚育和赡养的情况，我们将男55岁、女50岁以上称作“老”（因为他们已需要有子女同住，以分担一些重体力劳动和

家务），将15岁以下称作“小”（因为15岁以下一般够学龄条件的仍为在校学生，需要有人照料，满16岁才可算为劳力），外倚村的社员家庭抚育和赡养情况如下：

外倚村社员家庭抚育和赡养情况表

总户数	有老有小家庭	有老无小家庭	有小无老家庭	无老无小家庭	只有老人家庭
327	136	59	71	41	20
100%	41.6%	18%	21.7%	12.5%	6.1%

从上列三表可以看出，农村家庭的主要形式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扩大的核心家庭”，一般有4—6口人。这样的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力，就不可能全部转到其他行业，一般需要留人照料老人和儿童。我国农民在长时期中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农民家庭凡稍有劳动能力的，都要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老人喂猪养鸡，儿童放学回家还要割几篮猪、羊草。青壮劳力和老、小搭配起来从事农副业生产，操持家务，组织家庭生活，仍然是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形式。特别在当前乡村工业多数还不够稳定的情况下，农田、蚕桑和家庭副业的综合经营，尽管收入不是很高，但对大多数农户来说，仍然是他们生活的立足之点。他们只能在安排好家庭的农副业综合经营和家务活动之后，利用多余的劳力转向其他行业。这也是大部分农户不能以全部劳力转向其他行业，而只能实行农工兼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提倡劳力的专业化，农户的专业化。但是，社会化是一个整体。生产的专业化必须有产前、产后服务以及生活服务的社会化与之配合。这就要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实现，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就调查地区而言，只能首先致力于农业内部分

工的专业化，看来可能发展较快的是专业的饲养(鸡、鸭、鱼等)户，并随着土地经营的适当集中，逐步发展一些粮食重点户。至于农业剩余劳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在现阶段，只能是多数不同程度地兼业，少数专业。以后，随着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生产力水平和经营水平的提高，专业的会逐步增加。在公社(乡)以上的企业，专业会增加得快一些。但即使到那时，只要上述三个原因中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劳力农工兼业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认为是合理的。

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和城乡结合部的分层建设

明确了大量农工(或其他)兼业少量专业的必然性，再来探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形式，就是比较容易的事了。

我们以个别访问和召开座谈会的方式搜集干部、社员意见，概括为以下几点。这几点意见符合实际情况，也正是他们实际在做的。

（1）集体应该首先保证有足够的数量和一定素质的劳力务农。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一定不能削弱。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农业现代化要靠他们来干，在处理这部分劳力时，要十分慎重，要农工兼顾，安排好农业这一头，转移的应该是农业多余的。对于多余的劳力，要以农户为单位，尽量使多数户都有人从事工业或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有少数人口少劳力少的户才有条件考虑全家转移。

（2）一般说来，一家有四、五、六口人并有老小的家庭，需要有一个男劳力和一个女劳力在家从事农田、蚕桑以及饲养家畜家禽等项生产，同时照料老人和子女。如果将这两个劳力中的一个转移到其他行业去，则只能转移到离家很近的地方。例如，转

够到村的工商"点"上，每天早出晚归，或至少在每年七个月的农忙季节早出晚归，使之能够参加一定时间的农桑劳动、家庭副业生产和种种家务劳动。

（3）在安排好农户经营的农桑饲养等业生产和家务劳动，并把上述早出晚归的因素考虑在内以后，还有劳力剩余，才能将这些剩余劳力转移到稍远的市镇上去，从事工商服务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多数也要在大忙期间回家突击几段时间，因此也不能离得很远。

（4）只有在大忙期间也不需要从事农田等项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根据需要转移到更远的地方。

（5）极少数人口很少的农户，如只有一个劳力，或是只有一对青壮年夫妇，而又都能从事农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工作的，才能全家离农。

现在，农业劳动力一般都是按照上述规律转移到农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

经过逐户摸底，外倚村的劳力分层转移的情况见下页表：

分析表中所列数字，可以看出：在当前生产条件下，在农村专业务农的劳力占到总劳力数的62.16%，其中，女多于男，在家务农的女劳力占女劳力总数的83.6%，而男劳力则只占男劳力总数的46.5%。如果把当前剩余劳力和少数户缺劳力这两个因素平衡计算，则目前实际需要专业务农的劳力只占劳力总数的53.5%，其中，男的仅占男劳力总数的 38%，女的却占女劳力总数的77%。这就是说，如果按是否专业务农这个标准计算，目前外倚村有占劳力总数的46.5%的农业剩余劳力。其中，男的剩余劳力占男劳力总数的62%，女的剩余劳力占女劳力总数的23%。农业剩余劳动力，目前还没有全部转向农业以外的其他各业，还可以继续转移一些。

表中明显地述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层次：第一层是在当地转移。外倚村在当地转移的劳力占到转移劳力总数 的 50%；

户数	人口	劳动力			当前劳力分布												当前剩余劳力									缺劳力							
		合计	男	女	专业务农			农兼其他或其他兼农									离农			合计	可兼业务农							可离农			合计	缺务农力			缺兼业劳力		
					合计	男	女	合计	在本大队转移			转到附近市镇									小计	只能在本大队转移			可转到附近市镇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322	1321	793	462	336	496	215	281	265	151	125	26	114	91	23	37	31	6	85	76	69	39	30	7	5	2	9	6	3	16	6	1	5	10	4	6

注：① 表中"专业务农"，指在家从事农田、蚕桑和饲养家畜、家禽等家庭副业生产；

② "农兼其他或其他兼农"，指的是不完全脱离农业而又从事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生产经营活动，有的以农为主，称为"农兼其他"，有的以其他行业为主，称"其他兼农"；

③ "当前剩余劳力"指现在可继续转移出去的劳力；"缺劳力"指有的户已感到劳力缺乏，"剩余劳力"或大"缺劳力"才是真正的剩余劳力。

第二层转移到附近市镇，这部分占转移劳力总数的37.7%；第三层是转移到远处城镇，占转移劳力总数的12.3%。这里说的第三层转移的具体情况，是为上海市郊周浦镇国营周浦涂料厂作为农民工吸收的劳力。其中，一部分人留在周浦厂址做工，一部分人作为厂的施工队，随厂里的技术人员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施工，实际上是以农民工这种形式向远方临时性地输出劳力。

向各层次转移的劳动力的素质有着一定的差别。在低层次中，即转移到县属镇以下的，如果只统计少数人，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统计的人数多一些，从整体上看，差别就显示出来了。以下是外倚、众安桥、南浦浜、梅家浜四个村在本村转移（主要是转移到村的工商业点）和转移到震泽镇（包括公社企业。因公社企业就在镇上）的劳力素质的比较：

转移层次	总数	年龄组			
		—25岁	26—35岁	36—45岁	46—55岁
转移到村的工商业"点"	441	133	143	90	63
	%	30.15%	32.43%	20.4%	14.31%
转移到震泽镇	360	171	108	38	30
	%	47.5%	30%	10.56%	8.33%

	文化程度			
56—65岁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12	246	75	99	21
2.72%	55.78%	17%	22.44%	4.76%
13	78	97	147	38
3.61%	21.67%	26.94%	40.83%	10.56%

上列数字明显地告诉我们，转移到震泽镇的比在本村就地转移的，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文化程度的差别比年龄的差别更大。

高层次的转移，即转移到大中城市的，在我们调查的四个村中，除了极少数大学或中专毕业和参军转业后分配到城里工作的以外，只有外倚村参加上海郊区周浦涂料厂施工队的十个人。这十个人全部是年轻的初中毕业生。这说明，转移到高层次的劳力素质比转移到低层次的高出很多。

劳动力的分层转移与劳动者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转移的层次高一级，务工的程度就更大一些，参加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就更少一些。例如在外倚村的企业工作的，每天工作 7 小时，农忙期间务农时间 4 小时；在众安桥村企业工作的，每天只工作5—6小时，农忙期间有一半时间务农；而到公社企业和震泽镇企业工作的，每天要上 8 个小时班，农忙时务农时间只有 2—3 小时；到远方市镇的，则完全脱离了农业，专业从事工商或其他工作。从这个序列中，可以看出务工劳力向专业化发展的一种形式。低层次虽然也有少数专业务工的，但只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数目很少。与此相适应的是，每个层次的工业生产力的水平也是不同的。据震泽乡 1983 年 9 月份统计，社办厂人均拥有固定资产 1,931 元，村（农业社）办工厂则只有592.90元。众安桥村的两个翻砂厂和外倚村的旧桶整修厂，设备很少，人们可以随时放下工具去务农，而社办的纺织厂的工人就必须连续操作，一班接着一班。这就是说，劳动者与不同水平的工业生产资料结合，随之带来了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就是沿着这个阶梯逐步地和越来越多地变成工人的。

社会主义劳动的本质特征是联合劳动，而劳动的联合有着很多的层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主要是劳动力的不同层次的联合。（用“主要的”这个限制词，是为了表明仍有各种非主要

的经济形式。）村（农业社）办的工业和商业，是村的范围内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办的集体工业，和为工农业及人民生活服务的供销事业；公社办的工业和商业，则是公社范围内的劳动者的联合。至于象震泽镇这样的市镇，它已经拥有一批国营的工商企业事业单位，劳动者参加这些单位的工作，就是参加了全社会的联合。

农业剩余劳动力分层转移到不同的地点，从事不同层次的联合劳动，兴办不同规模和影响到不同范围的工商等各项事业，自然形成不同层次的工商业中心。这就是人们说的不同层次的小集镇。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这里说的不同层次的小集镇，可以分为以下几级：第一级是村的工商业网点；第二级是影响若干个村的工商业中心，可以叫村镇；第三级是乡（公社）范围的中心，可以叫乡镇。这三级的工商业从所有制关系上说，主要是各自不同范围的集体所有制。再上一级，即第四级，到了现行体制中所说的县属建制镇。这里有了地方国营的企业，有了较高级的服务行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成了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且和大中城市发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一级，可以叫做城镇。我们的城市和农村，就是通过上述不同层次的小城镇联系起来的。以农村为基础，通过不同层次的小城镇和大中城市联系起来，这应是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是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特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县属镇的“农民工”

——吴江县的调查

张雨林

我们在江苏省吴江县进行县属镇的研究中，大量接触了这样一种类型的劳动者，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保留着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身分，由生产队供给口粮(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改为划给“口粮田”)，被接纳到附近的县属镇中做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常年工。生产队提取他们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公共积累。人们称他们为“农民工”。

按照现行体制，县属镇属于“城”的最低层次。过去，只是在生产任务紧张时从农村雇用一些临时工或季节工，一般不从农村接收常年性的劳动力。可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上面说的那种农民工越来越多，多数年复一年地在一个企业里工作，根本不是什么“临时工”，连县劳动局的统计年报，也把他们算在职工总数之内，只是加以注明“来自农村”。据吴江县劳动局1982年年底统计，全县全民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年末职工总数67,266人，其中农民工10,123人，农民工占职工总数的15%。这就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多的农民工进入县属镇，是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对小城镇和农村建设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

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是从分析吴江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势

入手的。

吴江是江苏省苏州市所辖的一个县。它西滨太湖，北靠苏州，东与上海郊区的青浦县接壤，南临富饶的杭嘉湖地带，是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境内湖荡密布，河港纵横，宜粮宜桑宜渔宜牧；又因靠近大城市，便于城乡结合发展工业。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县的农副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据县统计局资料：198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5,500万元，比1978年增长82.6%，人均1,589元；其中工业产值(不包括大队企业)66,996万元，比1978年增长70.4%，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8%。社员人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241.85元，家庭副业净收入92.48元，合计334.3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70元高23.8%。

这个县有七个县属镇，大体均匀地分布在全县境内，起着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作用。县属全民、集体企业和国营商业绝大部分办在这几个镇上。近年来，随着全县农副工业的发展，这些镇日益繁荣。1982年，七个镇的工业总产值达50,56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5.5%，比1978年增长52.4%，为解放初期(1952年)的10倍以上；七个镇的社会商品零售额12,316.31万元，占全县商品零售额的60%，为1952年的两倍多。这些镇的工业的有机构成都还不高，生产这样大的发展，当然要增加劳动力。而七个镇的城镇在册人口总数1982年比1952年还减少了81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1982年比1952年还降低了5.7%① 。县镇

①县镇人口没有增长，与历史上多次下放城镇人口有关，在江苏省带有普遍性。吴江县历年城镇人口如下表：

年　　份	1952	1957	1965	1975	1978	1982
城镇人口	92,217	79,051	68,581	63,532	65,210	81,405
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	16.3%	14.8%	11.7%	9.2%	9.4%	11.2%

的劳力充分就业以后仍不能满足县镇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农村却又有大量的剩余劳力，需要找寻出路，于是，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县属镇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镇是农村的中心，腹容广大农村。镇的发展主要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镇自身的发展固然起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此，它在发展中依靠来自农村的力量，接纳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兴办为农村服务的各项事业，是很自然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看，吴江县的县属镇接纳了一批农民工，确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一件好事。

（二）

笼统地分析吴江全县的情况，还不足以弄清农民工的问题，因此，我们又对七个县属镇之一的震泽镇作了系统的解剖。

震泽镇在历史上长期起着县西南片商品集散地的作用，现在，工业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工商业市镇。1982年，全镇工业总产值5,506.85万元，比1978年 增 长81.6%，比1970年增长 4.2 倍。值得注意的是，震泽镇并没有在经济成倍增长的同时，相应地增加城镇户口，而是在安排城镇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同时，大量吸收了农民工。紧贴着镇的行政区划又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它们的劳动力几乎全部是与“农民工”类似的以工为主兼业务农人员，它们的产值和劳动力尚未计算在镇的产值和职工总数之内。这样一来，镇就有了两个概念：一是行政的概念，在人的方面就是在册户口，震泽镇在1982年人口普查时有在册户口18,226人；二是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共同体，也就是社区在人的方面应包括城镇在册户口、进镇农民工、贴镇社队企业职工、中学住校学生和旅馆经常容留的流动人口。按照后一个概念，震泽镇的人口为13,017人，与在册人口的差额为 4,791 人，为在册户口居民的

58.2%。这就是说，镇的社区人口有了很大增长，只是由于我们限制城镇户口，而发生了户口结构的变化。限制城镇户口，对于大中城市来说，有多方面的考虑，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对于小城镇来说，则主要是从不增加商品粮的考虑出发的。

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如下：

据1983年3月份我们和镇劳动服务公司一起按单位逐一调查统计，震泽镇的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县属和镇属集体所有制工业、商业、服务行业以及党政机关)共5,621人。其中，有城镇户口的职工4,474人，占职工总数的79.6%；农民工1,147人，占20.4%。农民工又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土地工”，即企事业单位征用附近农村的土地时，农村社队人均土地减少，益发感受到减少土地后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而由征用土地单位安排一定数量的农民到企事业单位工作，他们仍然保持农村户口，吃农村粮。这类农民工共118人，占农民工总数的10.28%。第二类是计划内临时工。因企业不能正式从农村招工，于是批准企业使用“临时工”。可是，“临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他们长期在接收单位工作。这类农民工共643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6.06%。第三类是“费用工”。这类农民工的工资不计入工资总额，由企业直接在生产费用中支出。他们进镇做工也不必经过县劳动部门批准，共有235人，占农民工总数的20.49%。第四类是“外包内作工”，即企业向农村大队包工，付给大队包工费，由大队向农民工支付工资。农民工仍来厂内操作，生产管理由厂里负责，与其他类型的农民工无异。这类农民工共151人，占农民工总数的13.16%。以上情况说明，县和县以下的企业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自己立了一些名目，来达到增加工人的目的。这是农民工名目众多、方式各异的真实原因。

现在，在震泽镇，农民工已经遍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除银行系统以外，各行各业都有农民工。银行系统以“条条”为主，

当地没有接收劳动力的机动权，他们所需的人员，在城镇招工中又能优先得到满足，因而他们不必雇用农民工。但即以银行系统而论，农业银行领导的信用社，正在恢复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今后，设在镇上的公社信用社也将使用农村户口人员。到那时，银行系统没有农民工的现状也会有所改变。现在，震泽镇的农民工在各行各业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全民所有制工厂有农民工429人，占职工总数的30.5%；

集体所有制工厂有农民工501人，占职工总数的20.5%；

交通邮电部门有农民工20人，占职工总数的12.4%；

基建环保公用事业单位有农民工119人，占职工总数的34.4%；

商业外贸单位有农民工77人，占职工总数的7.7%；

镇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有农民工1人，占职工总数的2%。

此外，还有个体工商业户，他们也雇请了属农村户口的帮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需要劳动力多的大厂和正在发展中的厂，农民工所占的比例都超过了全镇20.5%这个平均数。如国营震丰缫丝厂，农民工占职工总数的33.3%；国营吴江酒厂，农民工占职工总数的42.3%；集体所有制的东风化工厂，农民工占职工总数的26.2%。而镇社联办的吴江毛染厂，农民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竟达到71.4%。该厂其所以使用"联办"的名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便于多用农民工。

进镇的农民工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1983年6月底到7月初，依靠各行业的管理部门，对全镇农民工进行了逐人的调查统计①，情况如下：

---

①1983年6月底到7月初统计的农民工数字，比3月份的统计数字又增加248人，总数达到1,395人。除70名季节性的黄酒工，因为不是黄酒生产季节，不在镇上，无法调查以外，调查对象为1,325人。

1. 性别比例：男573人，女752人。女工多于男工。这是震泽镇缫丝和纺织工业比较发达，需要女工较多的缘故。

2. 年龄结构：

年龄	~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60~	不详
人数	429	206	225	153	87	62	46	33	32	33	20
%	32.9	15.8	17.2	11.7	6.7	4.8	3.5	2.5	2.5	2.5	—
	65.9			23.1			11				

注：百分比均按已知年龄人数计算，"不详"人数未计在内。以下各项统计均如此。

从上表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农民工是青壮年劳力。按当地婚龄一般是男25岁，女23岁的标准估算，约有将近半数的人是未婚男女青年。

3. 文化水平①：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半文盲	不详
人数	106	490	517	170	42
%	8.3	38.2	40.3	13.2	
与城镇户口职工比%	-19	-9.2	+10.8	+13.2	
与农村劳力比%	+2.5	+20.6	+29.7	-52.8	

①农村劳力的文化程度，系根据我们对离镇八里的震泽乡外倚村的调查。

由上表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比有城镇户口的职工低，却比农村劳动力高出很多。

（四）进厂时间：

进厂年份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不详
人数	1	0	2	5	10	23	55	69	33	58	105	206	225	226	298	9
%	3.1						16.3				80.5					

农民工的进厂时间反映他们的实际工龄。从表中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实际上已成了企业的老工人。

前面说过，农民工是被当作临时工接收的。“临时工”这个概念，本来指的是那些临时雇请的作杂工和辅助工的劳动者。可是现在的这批农民工中，作杂工和辅助工的虽然也有，但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是正式顶岗位的操作工，其中有一批人已经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据统计：震丰缫丝厂、吴江酒厂、东风化工厂、吴江橡胶厂、震华丝织厂等九个较为重要的工厂的757名农民工中，杂工只有38人，加上炊事员、花农等其他不在车间操作的，总共只有65人，仅占农民工总数的8.6%，91.4%的农民工都是操作工。震丰缫丝厂的263名农民工中，有233名立缫工、11名复摇工。按“文化大革命”前的规定，合格的立缫工应是五级工，复摇工应是四级工，是仅次于车、钳、刨工和维修工的技术工人。现有的农民工中，有些仍然是临时性的，企业生产情况好的时候，请他们来，生产发生波动的时候，又让他们回到农村去。

（三）

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已如上述，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农民工这个

问题呢？还需要我们放宽眼界作一些研究。

第一、看看农民工这种劳动形式对城镇建设的影响。县属镇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除前文已述的劳力问题外，还有建设资金的问题，占用农村土地的问题。适当采用农民工这种劳动形式对解决这些问题都有好处。据我们对震泽镇1,050名农民工的调查：住在农村、到镇上班、早出晚归的有599名，占农民工总数的57%；其余或者家在镇上、本人是农村户口（被称为“半家户”），或者住在企业的集体宿舍，节假日回农村。这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上不用在镇上建设生活区，而对其余的人，在生活区的建设方面也可以大为节省。这就大大节约了城镇建设的资金和土地，有利于加快城镇建设的步伐。

第二、对农村的影响。为了研究农民工这种劳动形式对于农村的影响，需要对他们所属乡和住地作一个详细的了解。具体情况见下表：

农民工所属乡统计表

来源	莱镇蔬菜大队	震泽乡	八都乡	青云乡	铜罗乡	庙港乡	南麻乡	梅堰乡	七都乡	桃源乡	本县其他乡	外县	不详
距离	镇内	毗镇	毗镇	13里	17里	18里	19里	22里	24里	24里			
人数	90	807	121	65	23	111	19	26	10	7	20	19	7
%	77.2												
	97												

注：铜罗、南麻两乡距镇较近，因为乡属集镇比较发达，因此进镇农民工较少。庙港乡来镇农民工远远超出其他距离相等的乡，是因为与镇定了外包内作合同。

住在农村家庭的农民工住在地距工作单位远近统计表

（据427人统计）

距离	1里以内	2里	3里	4里	5里	6里	7里	8里	9里	10里	11里	12里	合计
人数	158	44	88	28	22	45	14	5	3	9	0	11	427

从以上表格中可以看出，震泽镇的农民工来自附近农村，而靠镇最近的震泽乡进镇工作的农民工最多。震泽乡共有18,791个劳力，进镇农民工多达807人，占全乡劳力总数4.3%。以农民工一年人均收入500元（工资加奖金）计算，全社农民工每年有40万元带回农村。这两项数字充分说明了农民工这种劳动形式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户收入和积累农村建设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是带季节性的。而农民工由于离家不远，其中半数以上的人每天早出晚归，平时可以帮助家里干点重活，农忙期间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些农业劳动。据我们在离镇八里（隔着一条大河）的震泽乡外倚大队了解，农忙期间，在镇上工作的农民工每天还可以参加两个半小时的农业劳动，加上在企业上班八小时，一天劳动十个半小时，这在我国当前农村中是正常的劳动情况。农业大忙时候，农民工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还更多一些。我们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工早晨上班时挑一担猪食顺路送到饲料加工厂，晚上下班时又把粉碎好的饲料挑回家。大忙期间，许多人早晨在田间劳动一小时再去上班，下班后骑着自行车直奔田间，劳动一段时间以后再和家人一起回家吃晚饭。这对农副业生产和社员家庭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外倚大队在镇社办工厂工作的女青年张勤华，过继给伯伯做女儿，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如果她不是早出晚归，而是远走高飞，她伯伯年老就会因无人照料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按照公社规定，农民工不承包“责任田”，只划给“口粮田”，而住在镇上的农民工的“口粮田”

又由亲戚耕种，相互协商，订出供给口粮的办法。这对农村耕地从分散到适当集中也是有利的。农民工几乎每天把城镇的技术、文化和信息带回农村，以工厂工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农村，这对改变农村技术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联系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农民工这种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在"四化"进程中，县属镇以及各种类型的小城市必定要有很大的发展。这中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粮食生产的水平对于城市发展的制约。我们不应该等待粮食宽裕之后再来建设小城镇，而是应该积极建设小城镇，利用小城镇的城乡结合部的地位，密切城乡的联系，搞好农业产前产后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加速包括粮食在内的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当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还不允许大量增加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之前，在县属镇以及农村集镇，适当使用吃农村粮的劳动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以后，在粮食更加宽裕和国家其他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随时根据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把一部分吃农村粮的劳动力转为吃商品粮。这样，我们就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

第四、在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农民工这种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农民不会象资本主义早期那样，在贫困破产失去土地之后涌向城市，而必然是从与公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相结合，逐步地转向与公有的工业生产资料相结合。这个"逐步转向"的过程就是从农民变为工人的过程。在农民工的劳动和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变化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不是城乡的对立，而是城乡的结合，并且应该朝着恩格斯所说的"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的远景前进。这种融合，应该也可能从最接近农村的镇和小城市开始。农民工以工为主，住在农村，不完全脱离农业劳动，有利于工业劳动者身体和精神健康，有利于农村接

受城市的影响，也有利于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这很可能是一种符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一种形式。即使在前述粮食的限制解除之后，适当保持农民工这种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对于建立我国新型的城乡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八三年九月

震泽镇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变化与更新

王　颖

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是居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还与文化娱乐等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考察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变化与更新，不只是为了说明它自身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还在于揭示小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变化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变化的基本情况

解放以来，震泽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变化，就总的趋势而言是上升的，尤其是近几年，上升的幅度很大。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增加。根据我们所作的家计抽样调查，112户居民（占全镇总户数的4％）在1950年仅有电熨斗1个，台钟2座。而到1983年5月为止，这112户居民已经拥有手表261块，自行车23辆，缝纫机91台，电风扇92台，收音机97台，电视机58台，录音机17台，洗衣机2台，照相机3架，电唱机5台，电熨斗49个，台钟49座，电表79个，水表70个。就家具而言，无论数量和样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对28户家庭作调查，1970年仅拥有大衣柜6只，双人床29张，写字台6张，五斗橱18只，木靠椅16把，床头柜4只，被橱9只，方桌19张；而到1983年这28户居民的家具已经增加到大衣柜20只，双人床32张（其中新添置床3张、更换旧床6张），写字台15张，五斗橱27

只，木靠椅32把，床头柜15只，被橱18只，方桌27张；此外还新增加单人沙发11对，三人沙发3对，食品柜8只。家具流行式样也经历了如下变化：

大衣柜：祖传大衣柜→自制老式大衣柜→苏式大衣柜→沪式大衣柜→捷式大衣柜。

床：老式墙门床→苏式雕花床→沪式板床→捷式沙发垫、棕棚冬夏两用床。

坐椅：方凳→木靠椅→单人沙发→藤椅→三人沙发→电镀折叠椅。

上述抽样调查材料基本上反映了震泽镇居民耐用消费品在数量、品种、式样方面的巨大变化。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个变化过程，我们按照物品变化的时间顺序列出如下表格（见下页表1、表2）。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到，高级耐用消费品的引进和家具式样的更新，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这个顺序不仅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且还反映了生活变化的趋势。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高级耐用消费品的引进，和任何一种家具样式的更新，都必须符合当地的客观条件，必须为当地人认可，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实用价值；否则，它就不可能在那个地区存在下去、普及开来。例如，在大城市比较普及的洗衣机，在震泽却寥寥无几。因为镇上的人们几千年来已经养成了在河里洗衣服的习惯，一下子很难改变；此外全镇还有4％的人家没有自来水，没有使用洗衣机的条件。

但是，一件耐用消费品的实用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从不实用到实用，并不是它本身变了，而是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变了。人们的需要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小城镇，随着工业的发展，劳动方式的改变，引起了人们活动方式的变化。严格的八小时工作制，增强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人们的活

1983年震泽镇112户家计调查中关于14种高级耐用消费品历年拥有量的变化情况：

表1：

年度	1950	1952	1956	1958	1960	1963	1970	1976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台钟（座）	2	2	2	2	3	5	8	15	20	24	34	39	45	47
电熨斗（个）	1	1	1	1	1	1	2	4	7	14	26	35	42	43
缝纫机（台）		1	2	2	2	2	12	47	58	64	71	78	88	90
手表（块）			2	2	4	12	47	111	133	150	194	212	224	228
电度表（个）				1	1	3	10	25	35	42	49	56	68	70
收音机（台）						1	10	29	44	59	71	82	92	96
自行车（辆）							1	1	1	2	3	8	14	20
电风扇（台）								1	4	12	34	62	81	85
电视机（台）									3	11	26	41	53	57
电唱机（台）									1	1	1	2	3	3
录音机（台）										1	3	11	17	17
水表（个）											5	17	52	63
照相机（架）												1	3	3
洗衣机（台）													1	2

1983年震泽镇124户婚姻基本情况调查

表2：　　中有关家具部分历年变化情况的统计：

年　　度	1950	1960	1968	1969	1974	1975	1977	1978	1979	1981	1982	1983
老式大衣柜(只)	7	8	9	9	9	9	9	9	9	9	9	9
苏式大衣柜(只)			1	1	4	10	16	20	27	33	34	34
沪式大衣柜(只)					1	4	8	14	24	56	63	63
捷式大衣柜(只)											1	1
老式墙门床(张)	14	21	31	32	35	38	38	39	40	41	41	41
苏式雕花床(张)				1	13	20	25	28	33	42	44	44
沪式板床(张)							1	4	11	36	39	40
捷式弹簧床(张)											1	1
方　　凳(只)	44	44	76	80	136	152	160	172	204	280	280	288
木靠椅(只)	16	16	16	20	28	40	52	68	104	196	208	208
单人沙发(对)						1	3	6	14	58	67	67
藤　　椅(对)								3	8	25	26	27
三人沙发(只)									1	5	10	10
电镀折叠椅(只)										4	24	24

注：苏式家具为苏州式样的家具，其特点是造型比老式的简练，但仍保留一些简单的雕花。沪式家具为上海式样的家具，其特点是以板式结构代替框架式结构。捷式家具为捷克式样的家具，其特点是板式结构更加突出，外表没有凸出部分，把手均为凹进式。

动开始以小时、以分、以秒来计算了。这样手表就成为生活必需品，就有了它的实用价值。工业发展以后，震泽镇就业人口增加了，收入水平提高了，于是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就提了出来。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录音机、电风扇、自行车等等，就挤进了家庭生活，逐渐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

工业的发展，家用工业品的不断丰富，使人们关于耐用消费品概念的含义也变了。例如，老辈人讲家具耐用是指要能几代人使用，因而他们对现时流行的一些耐用消费品很不满意，总抱怨不能经久耐用。而年轻人却不然，他们喜欢赶时髦，因而希望自己拥有最时兴的家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追上时代的潮流”。他们既不愿意接受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式家具，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过的家具同样不会传给后代。因此，他们在打制家具时，不再选用沉重坚实的红木，而是选用普通木料。有的甚至从上海买回被老人们斥为“轻薄货”的成套家具。在震泽，家具的情况是这样；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情况更是如此。现代年轻人的耐用观念，不仅不是能供几代人使用，而且也不是自己使用一辈子。

家具的变化，除了材料变化外，还有式样的变化。

表2中三种主要家具样式的变化顺序为：老式→苏式→沪式。这个顺序与当地人评价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的顺序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由低到高的顺序是乡下人→街上人(镇上人)→城里人(如苏州人)→上海人。上海人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地位最高，上海的产品也最好。因此他们的眼睛向东看，目标是向上海学习。但是，学习也总要有一个过程。在震泽工业不发展的解放初期，和工业生产刚刚开始发展的七十年代早期，居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镇上各项事业都很落后，与上海的差距相当大。人们在经济上没有向上海人学的基础，在生活环境上没有向上海人学习的条件，在心理上也不敢把自己与上海人比，认为那是高攀。所以，

这时期的家具是以苏州式样为主。因为此时的震泽镇与苏州市更接近一些。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震泽工业发展起来了，震泽的工业产品打入了上海。震泽人也开始经常往来于震泽与上海之间，使得震泽镇与上海市的差距开始在缩小。这些反映在耐用消费品的变化上，就是沪式家具的流行和各种家用电器的引进。震泽居民的生活已开始向着城市生活方向发展。

二、家庭耐用消费品中家具部分的更新

家具是家庭耐用消费品的一部分。家具的更新就是旧家具被新家具所代替。因此，物质实体上的替换是家具更新的基本含义。但是家具物质实体形态上的更新，一般是与家具外形样式的更新一起发生的，就是说所谓家具的更新，通常总是物质实体和外形样式更新的统一。二者分离开来发生变化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在解放以后从未占过主导地位。

家具的更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社会的角度，即从居民家庭总体的角度；二是从单个家庭的角度。单个家庭家具的更新与整个社会范围的家具更新虽有联系，但不是同一概念。二者在更新途径和周期上都有差别。我们这里所说的家具更新是就家庭总体，即震泽镇居民家庭总体而言的，而不是就单个家庭而言。

抽样调查表明，震泽镇解放三十多年来，家具更新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不仅家具传代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而且传统的一代人一代物的状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就总的情况来看，那种通过举办结婚喜庆，大量购置家具的风俗习惯仍未根本改变。居民新置家具主要是在举办婚事时，而不是在这之后。婚后更换家具的情况尽管逐渐多起来，但在总的更新中所占比例仍然不大。据调查，在124户居民拥有的几种主要家具总数中，婚前购置和婚后购

置的数量分别如下：

表3：

名称 / 数目	大衣柜（只）	床（张）	方凳（只）	木靠椅（把）	藤椅（对）	单人沙发（对）	三人沙发（张）	电镀折叠椅（把）
婚前购置	78	116	260	164	16	43	6	6
婚后购置	29	13	28	44	11	24	4	0
总　数	107	129	288	208	27	67	10	6

所谓婚前购置，是指用来结婚安家使用的，婚后短期内购置的，也属于这种性质。只有那些结婚以后间隔一定时间添置的家具我们才把它算做再次更新。因此，根据上面的材料，应当说家具的更新主要是通过婚姻实现的。

前面说过，消费品的更新通常总是物质实体和外形样式同时更新。但是，年代越往前，家具更新时样式的变化就越小；年代越往后，则样式的变化就越大。从样式的变化来看，最先购置新鲜时髦样式家具的也是在婚前，人们力求为新婚喜庆增添新气象。

那么，为什么大件家具的更新主要是通过婚姻完成的呢？

震泽流行的做法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类似，结婚时一般要把必需的大件家具备齐。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结婚意味着一个新家庭的成立，而一个新家庭的出现必然要求购置一些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基本家具。这些物品以父母为主的老家庭一般很少有多余的。因此，大多数新家庭只得现买新做。其次，中国人历来重视婚姻大事，而且还有新人新婚新物，一切追求“新”的讲究。只要财力允许，一定要用新的而不用旧的。既然现买新做，当然样式是越新鲜越时髦越好。第三，虽然对于结婚的当事

人来说，一下子购置许多大件新家具并非易事，但是传统习惯要求父母承担一定义务，做父母的如果不这样做，脸面也不好看。第四，最根本的原因是这种更新要有经济上的保证，目前震泽镇居民家具更新的情况正是与现阶段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

为什么婚后购置家具的不多呢？

首先，结婚时已置办了整套家具，使用年限不算太长，还能继续使用若干年。生活宽裕有点积蓄，首先购置的是那些新出现的高级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录音机等等，而不会先去更新老式家具。其次，老一些的家庭，虽然家具破旧种类不多，理应添置，但老家庭一般总有大一点的儿女，得为儿女婚姻积蓄。如果没有儿女，也得攒钱防老。此外，老年人还有些想法，他们中有些人对食用消费品比对家具更为重视一些，有的宁愿给儿孙们买点吃的东西，也舍不得为自己更换家具。总之老年家庭大部分也不愿意花钱去更新家具。当然，归根结蒂，还是人们的收入水平不高。

上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家具更新主要通过婚姻完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当然，这两方面的原因是互相联系交织在一起的。但是总的来讲，上面的分析仅限于目前的基本状况而言。事实上，家具更新的途径和周期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婚后更新家具，虽然目前在总更新数量中仍占少数，但是这种现象是在不断增长着的。震泽镇124户调查告诉我们：1973～1977年，婚后五年以上家庭，平均每年购置大衣柜1.2只，而1978～1982年平均每年购置4.6只。其他如床、沙发、写字台等家具的购买情况，也有类似变化。这表明家具更新的途径、更新的速度都在变化，而更新的周期已经开始短于一代人的时间，并且还会缩短。

三、高级耐用消费品的引进与普及

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情况与家具不同，它的大部分品种是解放

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期在小镇上出现的。有的刚刚普及，有的还没有普及，因此就整个震泽镇来说，还不存在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更新问题。所以，我们这里只讲它的引进和普及过程。

家具的更新一般总是始于结婚用品，而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最早出现则不然，它往往出现在一个与外界联系广泛，较轻负担的家庭里。例如在我们调查的112户中，最早购买手表的两人，一位是现任的梅诗场小学副校长；一位是震泽房管所的退休保管员。前者是1956年在北京花了 151 元买的瑞士产英纳格手表。后者是1956年在吴江县百货公司买的日本产手表。这两位购买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外界的联系较广。副校长的近亲在北京、南京、无锡、镇江等大中城市；而保管员自己就曾多次到过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和浙江省的一些地方。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购买手表时年纪轻，还没有孩子，没有家庭负担，经济条件比较好。

再如表 1 中电视机的最早购买者，王远明、潘兴官、张震生三人，也有几个共同点：(1) 与外界联系多。王远明本人是西藏军区陆军医院的离休干部，他的儿子在苏州丝绸工学院读书；潘兴官是酒厂的外勤人员；张震生多次到过北京、上海、苏州等地。(2) 家庭平均收入高，负担轻。王远明一家五口，月收入256元，人均收入水平51.2元。王远明本人离休工资102元，这在本镇来说是很高的了。潘兴官一家三口，两个人挣工资，只抚养一个上幼儿园的女儿，他家月收入106.8元，人均收入35.16元，张震生一家四口，两人挣工资，月收入169.5元，人均收入42.38元。也属本镇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另外，在这三个家庭里均没有需要赡养的老人。(3) 文化水平高。王远明家二个人大专肄业，一个人中专毕业，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潘兴官夫妇家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张震生家二个大学毕业，一个初中毕业，一个小学的学生。正是上述这些共同点，使这些家庭有条件首先

购买电视机。

高级耐用消费品的第一次出现为什么与新式家具的出现不同？为什么它不出现在结婚用品中呢？因为高级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一般都比较贵，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人们是不肯轻易把它引入家庭生活中来的。所以，它的早期出现一般是在与外界联系较多而家庭负担少的家庭里。

虽然高级耐用消费品的第一次出现不是始于结婚用品，但是它的普及却与结婚用品有着密切的联系。1983年震泽镇124户婚姻基本情况调查中关于五种耐用消费品购买情况请看下表：

表4：

	电风扇（台）	电视机（台）	缝纫机（台）	收音机（台）	录音机（台）
总拥有量	110	73	68	53	21
其中：结婚时购置	33	25	39	30	8
其中：1970年后结婚，婚后购置	52	33	15	8	12
结婚时购置的数量占总购置总数的百分比	30%	34%	57%	56%	38%
1970年后结婚，婚后购置占总数的百分比	47%	45%	22%	15%	57%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引进时间较早的缝纫机、收音机是新婚家庭在结婚时购置的，其数量在总拥有量中占到50%以上。引进时间晚的电风扇、电视机和录音机，年轻人家庭婚后购置量很大，在总拥有量中所占比重达到50%左右。因此，我们认为，高级耐

用消费品引进以后的最先普及是在已婚的年轻家庭里。因为年轻人家庭，孩子年龄小，家庭负担不重，他们有能力在这段时间内为自己添置一些高级耐用消费品。另一方面，这些家庭的夫妇年纪轻，接受新事物快，同未婚青年具有同样的特点。但是，他们比未婚青年有条件也有权力决定购置高级耐用消费品。这些原因促使年轻家庭成为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最早普及对象。

但是，随着引进时间的延长，购买某种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新婚家庭也逐渐多起来。一旦某种高级耐用消费品在结婚用品中得到广普及，也就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意味着它在全镇获得了较大范围的普及。

因此我们认为，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有两个重要途径：一个是年轻人家庭婚后添置用品，一个是新婚家庭在结婚时购买用品。

四、家庭耐用消费品更新的经济基础

1970年以前，震泽镇工业不发达，就业人口少，被抚养人口多，人均收入水平低。1970年以后，震泽工业有了很大发展，震丰缫丝厂恢复了，轻纺工业上马了，一些手工业作坊也改为机械化生产的工厂。随着工业的发展，就业人口的增多，生活也逐渐好转。1983年震泽镇124户婚姻情况调查中，有关20户1970年以前结婚的家庭的人口及收入情况请看表5：

表5：

	总人口（人）	就业人口（人）	被抚养人口（人）	基本工资收入（元）	人均收入（元）
1970年	81	39	42	1,240.40	15.35
1983年	86	60	26	2,844.33	33.07

从表中我们看到，1970年到1983年，这20户中就业人口增加了21个，占1983年就业人口总数的35%。基本工资收入增加了1603.93元，其中因就业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收入为761.6元，占基本工资增长部分的47.5%。可见，现时震泽镇居民收入提高的原因，除原就业者工资收入增长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业人口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居民购买耐用消费品奠定了经济基础。震泽饭店的钱师傅一家，解放初期只有他一个人参加工作，后来家中陆续添了四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以后，两个女儿先后出嫁，他们什么也送不起。但是现在，他的老伴，小儿子和三女儿都参加了工作，全家四口人挣钱四口人吃饭。每月总收入达184.5元，人均收入46.1元。他家里除1974年买的缝纫机外，1978年以后又陆续添置了手表3块，自行车1辆，电视机1台，还为刚满20岁的小儿子准备了将来结婚用的家具。事实告诉我们，工业的发展，就业人口的增多，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震泽镇家庭耐用消费品变化与更新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耐用消费品的更新就无法实现。

五、家庭耐用消费品变化的外界条件

家庭耐用消费品引入和普及的外界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物品输入的条件，一是信息传递的条件。这两类条件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例如物品的输入本身就是信息的输入。决定这两类条件的因素许多也是共同的，例如交通的发展就会同时改善这两种条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对于外界条件可从以下几个不同方面来考察：

（1）从经济地理位置来看：震泽镇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周围有上海、苏州、杭州等许多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因此，有关耐用消费品的各种信息便能迅速地传入镇内，这就是震泽人为什

么受上海、苏州影响很大的原因。由于离大城市近，所以他们的许多耐用消费品就购于大城市。根据对112个家庭的调查，手表的41.5%（90块）是从上海购买的；缝纫机的31.8%（28架），电视机的20.3%（12台）也是从上海购买的。这个调查还表明，耐用消费品购物地点从数量总体来看，排列顺序如下：震泽、上海、苏州、杭州、县内各镇，最远的购物地点是广州、天津、北京、沈阳。

(2) 以交通发展程度来看：目前，震泽镇每日有直达长途汽车开往上海，只需三个多小时。此外，还有与其他城镇相通的公共汽车，以及班船等等。这无疑会促进信息和物品的输入。

(3) 以亲友联系来看：112户中，在上海有亲戚关系的26户，占总户数的23%；在苏州有亲属的14户，占总户数的12.5%。此外在浙江、安徽等其他16个省、市、自治区有亲属的55户，占总户数的49.1%。这些亲友都是有来往的。他们传来各种信息，实际上成为镇上人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参谋。

(4) 以经济业务往来情况看：工业的发展密切了小城镇与大城市的经济联系。解放初期，震泽镇与上海市的联系多限于商业往来和亲属往来，现在则又增加了工业上的经济往来。这种往来包括看样订货、推销产品、采购原料、更新设备、技术交流和参观学习等等。频繁的经济往来，使大城市耐用消费品变化的信息传递渠道增多了，速度加快了。

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大体上了解震泽镇耐用消费品变化的外界条件。在这样比较优越的条件下，震泽镇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发展将会更顺利，更迅速。

六、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每一件旧有家具的更新与改革，每一件新的耐用消费品的引进与普及，都会引起原有生活方式的某种改变。

手表和台钟的引进与普及，首先加强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使人们生活的节奏明显加快。他们不仅要遵守劳动时间，还要熟悉商业服务业的服务时间；不仅要遵守电影院放映时间和电视节目播放时间，还要服从乘车乘船的启程时间。总之，生活在小城镇这样的环境里，手表的引进和普及，自然有利于人们更严格地遵守时间，从而达到自由地支配时间。

缝纫机、电熨斗的出现和普及，缩短了人们家务劳动的时间，减轻了家务劳动的强度。而自行车的出现，又进一步缩短了人们上下班的往返时间，相应地延长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时间，从而改变了小城镇居民闲暇时间的结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以往无休无止的家务劳动和贫乏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感到不满，开始追求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而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正是满足了这一需要。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电唱机、照相机等的引进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与外界的联系更广泛，信息传递更迅速。随着上述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小城镇居民的文化修养提高了，艺术欣赏的范围扩大了，年轻人的旅游兴趣越来越浓，老年人锻炼身体，种花养草的兴致越来越高。小城镇居民业余生活的构成变化了，人们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内容。

震泽镇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变化方向，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实际发展中，都在向大城市学习，向大城市靠近。而震泽镇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方向，也就是工业化城市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现有经济水平，以及小城镇人民的传统观念等等因素的限制，目前震泽镇居民在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与上海、苏州的居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样，生活方式上的差距也还很大，但是这两方面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据调查分析，震泽镇居民今后一年内购买的高级耐用消费品，将主要集中在自行车、电视机、录音机等物品上；也有准备购买

照相机、电冰箱的，显然目前这些人还是少数。但是我们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越是引进晚的物品，普及的速度就越快。例如：电视机从1978年的3台到1983年的57台，仅仅用了五年时间；而台钟从1950年的2座到1983年的47座，用了三十二年时间；录音机从1978年～1983年的四年时间里，由1台增长到17台，而缝纫机从1952年～1956年的四年时间里从1台增长到2台。可以预料，现在小镇里购买数量还很少的物品，用不了多少年定会普及。震泽镇居民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将会逐渐赶上大城市的水平。

当然，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即使小城镇与大城市同样水平，也不能说生活方式完全一样了。生活方式的变化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传统的价值观念、周围的环境等等。但是，只要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与大城市水平一样，就一定会逐渐影响和改变其他因素，逐渐消除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差别。

一九八三年九月

智力开发促进了福山乡镇的建设

甄为民　唐仲勋　沈　汉

智力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人们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总和。开发智力，已日益被福山乡的人民认识到是勤劳致富的必由之路，是搞好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他们五、六年来连续增产，也是今后搞好科学攻关、经济起飞的金钥匙。为此，他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今后还将更有意识地进行智力投资和智力开发。对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作描述性的介绍并给以初步总结，对于促进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可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农村经济起飞，集镇建设增辉

福山乡位于常熟市的北部，滨临长江，是长江三角洲上一块粮棉夹种区。因境内有一座复釜山(后称福山)而得名。福山镇是福山乡属镇，是常熟市最古老的集镇，约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是吴淞口以西的江防要地之一，也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渔盐集散地，各类商店曾多达240余家。近百年来，港口失修，逐渐淤塞，渔盐业大都转口到本市的浒浦、太仓县的浏河等地，以致商业逐渐萧条。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有力地促进了农副工业的发展，福山镇面貌随之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型

文明集镇。

福山乡以及它的中心福山镇的建设，有以下五个特点：

1.农副业的发展，使集镇建设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福山乡耕地41,724亩，1982年底全乡人口41,973人，平均每人不到一亩地。他们就在这不到一亩耕地上做文章。从1976年起，连续八年取得稻麦双高产，是全市第一个超"双纲"的先进单位。1983年粮食总产3,864万斤，平均单产1,730斤。福山的"三麦"产量在常熟市是数一数二的高产乡。农业站稳步，副业广开门，全乡有编织、花边、养猪、养鸡、养蚕、种磨菇等多种副业。1982年农业总产值708万元，副业收入234万元，全乡每人从集体分配到222.3元。

2.乡镇企业从无到有，飞速发展，成了全乡和集镇四化建设的重要支柱。福山乡原来工业基础很差，1963年全乡社队工业产值只有18.3万元，利润1.66万元。1978年以前，只有农具厂、化肥厂等几个小厂，工业产值虽有增长，但从来没有超过1,000万元。三中全会以来，工业产值、利润连年大幅度增长，1983年工业产值已突破5,000万元，利润达820万元。近六年数字如下：

年　度	工业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1978	1,149	230
1979	1,508	332
1980	2,500	517
1981	3,292	525
1982	4,040	699
1983	5,300	820

现有乡办企业24个、村办企业131个，拥有化工、机械、建材、轻纺、服装等十多个行业，1982年工业产值已占全乡农副工三业总产值的81.1%，农副业的产值只占18.9%。

3.农副工业的兴旺，大大促进了商业、服务业的繁荣。现在福山镇上有国营、供销、合作等商业服务业网点62个，职工367人。

1982年，商品零售额为1,559.8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为22.75万元。

4.改善了福山的交通条件，集镇面貌欣欣向荣。几年来，乡政府利用社办工业上交利润的65%，计198万元，兴办了各项建设事业。首先是通公路。福山过去只有水路与外界相通，到常熟市18公里，需航行三个半小时；1981年开始，常福公路通车，单程40分钟就可到达常熟。现在福山和常熟市每天往返公共汽车26次，另有直达苏州的公共汽车二班。1982年全年旅客流量23万人次；全乡有汽车17辆，拖拉机126台，机动船162条，年平均货物运输量11万吨。五年来，在福山镇上，拓宽和新建了长360米、宽12米的水泥路面的中心大街，街两侧耸立起一幢幢商业服务大楼，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常福公路两边，高大的厂房首尾相接，前通公路，后傍市河，形成了兴旺发达的工业区。新架设的常熟至福山的高压输电线，使全镇大放光明，社队工业用电有了可靠的保证。新建的自来水厂，解决了居民们的用水问题。翻修和新建了部分居民用房，实际丈量证明，人均住房面积达13平方米，居住条件也有较大的改善。

5.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镇上有完全中学一所，教职工61人，设有十九个班级，学生1,008人，其中高中生144人；完全小学一所，教职工32人，十二个班级，学生665人，附设幼儿班两个。全乡有初级中学三所，学生618人；小学二十一所，附设幼儿班二十一个，有教职工229人，学生4,676人。学龄儿童总数为2,879人，已入学2,875人，入学率达99.99%。

近几年，镇上新建了一座有1,500个座位的影剧院，开设了富有水乡特色的文化茶室，开辟了小公园，开办了老干部活动室——“协园”。镇上有二家书场，以及图书、阅览、科技、康乐等活动室，建成了文化中心，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镇上新办了一座社会福利院，全乡64名“五保户”，有34名搬了

进去，愉快地安度晚年。乡政府又在镇上办起了211人的福利工厂，使伤残人员得以自食其力。

镇上有卫生院一所，60张床位，全乡各村都设有保健站，有初级医务人员45人。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山乡工农业生产比翼双飞，为福山小镇带来了蓬勃生机，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全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常熟市北部以轻化工业为特色的新型文明集镇。

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智不前”

福山镇是依靠什么力量迅速发展起来的呢？他们的经验有三条：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智不前。这三条是互相促进，互为前提的，缺一不可。

“无农不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发展工业，搞好小城镇建设，首先要发展农业。福山乡办工业的原始资金就是靠农副业积累的，工业劳动力的91%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社办工业的初创阶段，技术水平较低，资金匮乏，市场信息不灵，生产时起时落，成为“开关厂”，时开时关。在农业生产还有困难的情况下社员的生活也就不能稳定，社队无力偿还国家的贷款，当然谈不到花大力气去办工业了。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年来，福山乡认真落实和完善了生产责任制，积极推行了科学种田，使农业得以持续高产稳产。如1982年粮食总产就比1981年增长了13.1%，皮棉亩产增长了11.2%，副业产值增长了37.4%，社员生活稳定，集体有了积累，这样才为工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无工不富”。苏南地区原有农业的生产条件较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粮食征购基数也比较大。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单

位面积产量已经达到一定的高水平，再要继续大幅度增加，不仅很困难，由于成本太大，经济上也是很不合算的。以福山制冷剂厂副厂长朱坤元为例，他一家五口人，包了三亩责任田，收粮食2,760斤，得366元，收油菜籽100斤，得25元，收棉花110斤，得170元，共561元；除去农本250元，全家光靠农业，只有300元收入。加上一个人搞刺绣副业，每年可增收600元，农副二业只能使全家平均每人每年收入180元。而他和儿子两人务工，每月工资加奖金，共得130元，则可使全家收入增加一倍，平均每人每年收入增加到400元以上。可见，单靠农业很难致富，只有办工业，才能较快地富裕起来。正如群众所说："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富起来，小城镇面貌改"。因此，福山乡坚持走农副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几年来，由于社队工业的发展：

1．对国家的贡献大了。1978年，社队工业上交给国家的工商所得税为74万元；1983年达到500万元。1984年实行八级累进税制后，估计可望超过800万元。

2．集体的家底壮大了。全乡三级固定资产原值为1,626万元，其中乡办企业占54.42%，大队办占33.70%，生产队办占11.88%。1983年预计为2,000万元，比1978年将近翻了两番；流动资金1978年是倒挂106万元，1983年实有约600万元。工厂的自由资金1978年是44万元，1983年上升到约220万元。

3．农民的收入增加了。1982年全乡人均收入375元，全乡储蓄额325万元，有60%的农民翻建了新房。在这几年的集体分配中，工业收入的比重不断加大。1982年在每人从集体分配到的222.3元中，来自工业的收入占45%，这还不包括从乡镇企业中抽出资金来搞各项支援农业的投资和奖励基金。

事实证明乡镇企业的突飞猛进，决不是"挖了国家墙脚，穷了集体，富了个人"。而是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实际利益。

"无智不前"。办农业，办工业的实践，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智力开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里有许多"无智不前，有智则飞"的事例。

福山靠长江边上有三千亩沙质土，由于地温偏低，种前季稻不发棵，乡长和乡党委书记都是农业技术干部，有一定的科学种田知识，经过实地考察，带领群众对冷沙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福山为粮棉夹种地区，提高棉花产量的潜力很大，1983年，他们对棉田实行科学管理，一环套一环地掌握生产季节，除虫灭病，抗灾夺丰收，亩产皮棉高达145斤，比1982年增长了51%。为了利用周围的七座小山丘，他们向浙江茶科所学习，发展密植茶园，试行茶籽营养钵冬播育苗取得成功。试验茶园达到一年种、二年采，三年亩产超百斤。三年共种茶135亩，1982年是第三年，就采收到15,000斤，制干茶37.58担，总产值12.5万元。福山茶质量优异，市场供不应求。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他们尝到了靠科学技术的甜头。

"工业靠产品，产品靠翻新，翻新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培养"，这就是他们在办工业的实践中得出的深刻体会和成功经验。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它要求老产品要不断更新，力争优质低耗，物美价廉；同时，还要经常发展新产品，投放市场。用群众的话说，就叫"吃一、夹二、看三"。象喷嘴厂依靠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和制造了F型燃油喷嘴，不久又改进为RF型的燃油喷嘴，进而又发展为QRF型全热风的燃油喷嘴。人造革制品厂领导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联合攻关，最后由两个化验员找到了窍门，掌握了科学配方，使产品质地柔软、重量轻，形同真皮，质量达到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得以站稳脚跟，将产品挤进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并远销海外。连肖桥镇的一个村办印铁制罐厂，也花了大价钱买来了数控线电极切割机床和数字程序控制台，配上三个高中生掌握先进技术，生产各种模具，不

少大中型工厂都要到这里加工订货，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乡镇企业的产品能够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计划销售的比例不大，大部分要靠市场调节，要靠企业按社会需要自己去打开局面。因此，必须掌握市场信息，搞好经营管理，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优势。羊毛衫厂三个厂长轮流到华南、华北、西南、西北各方去做国内市场调查，不断更新产品，做到款式新颖，适销对路。同时加强企业管理，重视技术培养，使生产稳步上升。

三、多形式、多层次的智力开发

福山乡的领导，从亲身的实践中，认识到智力对于发展生产的重大作用，因此能千方百计地去进行智力开发。那么他们是怎样进行智力开发的呢？主要是从挖掘智力、引进智力、培养智力等三个层次进行的。

第一个层次：挖掘下放工人的技术力量，利用退休师傅的"余热"来建设和发展企业。

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大、中城市精简职工，下放农村。福山乡的群众要办工业，就把这些下放工人当作"宝中之宝"，请他们到乡镇工厂当领导，以他们为技术骨干，使生产有了发展。例如，风动工具厂原是大队办的一个铁木滑车小厂，生产一些为本乡农业生产服务的中小型农具，养活几十个工人都很困难。乡领导从上海回来的下放工人中找人才，原为上海彭浦机械厂的工人时祖男，是做索具配件的。乡里聘请他当厂长。这个厂党支部书记钱永根，是上海摩托车厂下放回来的，他们互相配合，再通过他们带徒弟，培养了一批熟练工人。这个厂生产的船用装卸索具和吊货的导向滑车，经我国船舶检验局鉴定符合国家标准，供全国各地港口和远洋近海及内河轮船使用，并得到港澳客商的好评。红木雕刻厂厂长杨仁元，原是苏州雕刻厂的下放工人，有一手红木

雕刻的技巧，回到福山办这个厂，把流散在邻乡的六个上海下放工人同行请来，和上海外贸公司挂钩，由加工修理到定货、包销到联营，逐步把厂子发展了起来，现在该厂有职工300多人，其中220人为熟练工人。这个厂生产的工艺品通过外贸公司远销美国、日本、香港和马来西亚。杨仁元创作的工艺美术品，在广交会上深受顾客欢迎。

此外，不少工厂利用退休工人的"余热"发展生产。例如人造革厂，原由几十个工人采用落后的工艺生产低档的单一品种，款式陈旧，销路不畅，生产难以维持。1979年，厂党支部书记王云根通过他叔叔的关系，由上海一位工程师帮助设计，并聘请对口的上海退休工人来厂工作，改革了技术装备，由布泡革涂刮机更新为针泡革钢带机，从根本上改变了配方，试制仿牛皮、麂皮、厚绒质感的产品，质量高，比重轻，畅销天津、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经常供不应求。上海第一和第十百货公司为这个社办小厂的产品曾经设立过专业性橱窗。

这些下放工人和退休工人有实践经验，为乡镇工厂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二个层次：积极引进科技人员和先进技术，促进生产更大发展。这里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请进技术人才。在六十年代，上海有不少工厂和技术人员内迁"三线"，由于许多条件限制，不少单位人才积压，有的科技人员无事可干，他们一时回不了上海，愿意到苏南农村集镇上来发挥自己的专长。制冷剂厂从四川引进科技人员就是这种情况。制冷剂厂主要是生产氟利昂（F142，F11，F12）和发泡剂。F142用于轧钢车间降温，F11用于大型宾馆集中空调，F12用于电冰箱和冷冻库，发泡剂用于油田生产，这些产品技术要求很高，只有不断改革技术，才能站稳脚跟。为了提高技术水平，这个厂曾引进五名上海工人，请上海技术人员来厂讲课，每年搞二至三次

职工培训，但是在生产上碰到疑难问题时，还不得不老远跑到四川去请教晨光化工研究院的工程师，往来很不方便。这个厂早已盼望引进工程技术人员，恰好厂长参加全国会议，碰到晨光化工研究院二分厂的工程师钱松源。他是浙江人，毕业于浙江化工学院，从事氟利昂生产二十多年，在原单位技术人员多、事情少，能量发挥不出来，经福山制冷剂厂一再争取，钱松源全家终于迁来常熟，钱本人调到常熟市工业局，经常在福山制冷剂厂工作。他来了两个月，就为这个厂制定了五年规划草案。银行同意贷款，关键在于人才。他配合厂领导积极想办法，准备再引进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来发展这个厂子。

第二种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人造革厂1983年从日本引进先进设备磨绒机，通过省外贸的有关公司签订合同。申请外汇98,000美元。日本已派技术员来厂试车成功，即可正式投产。他们经常跑塑料情报所、轻工业部情报所、华东化工学院，请他们提供资料，以便掌握国内外先进技术。随着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他们更加渴望人才，急需招聘塑料加工专业的工程师，苦于找不到对象。

第三个层次：是培养技术人才，进行智力投资。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请大专院校代培，或自己办短训班，以提高职工的素质。这也有几种办法：

一种是送出去培养。据福山乡统计，1983年全乡派出去培训的人员，临时性的40人，参加短训班的60人，参加一年以上技术培训的25人。例如，人造革厂与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化学系签订了技术协议，学院帮工厂培养人才，工厂为学院提供实验基地，该厂已送去化验人员两人，培训三个月。风动工具厂有三十名职工参加常熟市职工大学机械制造和工艺设备专业业余培训，争取单科达到中专水平。红木雕刻厂送出两名职工到常熟工艺美术公司举办的培训班。喷嘴厂先后送职工参加北京钢铁学院和马鞍山钢

医学院举办的专业训练班学习，派人参加化工部在天津举办的培训班，中国机械学会、工业炉学会、热工及热能利用学会举办的工业炉钢热工理论班学习。他们从经济上、时间上等多方面保证职工的进修。制冷剂厂除送出一名职工参加常熟市电大班外，每年还送职工多名到四川轻光化工研究院学习。

另一种办法是自己办短训班。据福山乡统计，1983年乡镇企业职工参加自己厂办的技术班学习的有205人，人造革制品厂自己办了八期短训班，每期十四天，前四期为基础教育，后四期讲高分子塑料加工系列知识，请北京化工学院的教师来厂讲课。他们还办了外语班学习英语，请外面的教师来上课。制冷剂厂还利用上海工程技术人员出差或探亲假时间，专程请他们来讲课，领导与职工一起认真学习。

还有一种办法是与大专院校挂钩，以生产与科研、教学三结合的形式发展新产品，在实践中培养人才。

喷嘴厂承担北京钢铁学院的科研试制任务，工厂提供场地、设备和劳力，组织生产，学院负责全面的技术指导和科学试验。为了共同搞好试制，钢院的老师很乐意为工厂上课培养人才。一个科研项目完成，学院拿成果，工厂出人才，拿产品，双方都受益。这个厂在学院的帮助下，办起了职工学校。第一期由北京钢铁学院六位教师承担数理化、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热工燃料、冶金炉设计等七门课程，二十多名学员半脱产学习两年半，最后有九名学员毕业考试合格。第二期是业余技工学校，结合工种上基础课，如制图、常用数学、机械零件等，学员五十多人，由第一期毕业生讲课。第三期是职工大学，按教学大纲开十一门课，请了马鞍山钢铁学院讲师四名，宝山钢铁学院教师一名，常熟市职工大学机械专业方面的教师一名，担任教学工作。四十多人参加入学考试，正式录取十五名，其余旁听选读，1983年下半年基本课程已经讲完。这几年，该厂自己培养了助理工程师三名，技术员

一名，都是经过考试，由苏州市正式评定职称。他们有才有识，年轻有为，都担任了全厂生产和科技的领导职务。

四、智力开发的受益者和开拓者

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福山乡在工农业生产和集镇建设中，涌现出一些肯学习，有作为的领导骨干，他们十分重视调动人的内在的智力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他们既是智力开发的受益者，也是智力开发的开拓者，开创出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新业绩。

这里，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喷嘴厂的党支部书记蒋才保，今年47岁，早年只读过一年半书，就当学徒学打铁，后来成了福山乡手工联社（后改为农具厂）的锻工。1973年，靠贷款过日子的农具厂派他随几位社、厂领导到上海找生产的新门路。他们经人介绍，向上海机电设计研究院买了一张供冶金、机械等行业工业锅炉上用以节约烧油的喷嘴的图纸。他回来后，就与技术工人一起精心试制，扎扎实实地干了半年，连春节也没有回家与妻儿团聚，终于用土机床试制成功第一台产品，经上海机械锻压厂试用合格，从此这种R K型系列的低压燃油喷嘴成为该厂的主要产品，农具厂也改名为喷嘴厂。

蒋才保同志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继续努力挖掘新的智力资源。他与北京钢铁学院、上海机械设计院等单位挂钩，实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与生产部门三结合，试制新产品。他们从学习中知道日本的喷嘴是R型，苏联的产品是K型，我国的R K型是吸收两家的长处改型设计出来的。不管苏联的也好，日本的也好，当时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喷嘴都不能自动调节油气比例，于是他们在专家、教授的合作指导下，自行设计并制造一种新型的自动调

节油气比例的喷嘴。对关键部位密封不严的问题，正是蒋才保这些能工巧匠开动脑筋，采用特种工艺技巧解决的。经过四年艰苦努力，终于试制成功。上钢二厂使用这种喷嘴，经测定，比过去节约用油20～25%，冶金部特地为该厂装了这种喷嘴的节能炉挂上"节能特等炉"的光荣牌，并发出通知，凡是年耗油在万吨以上的钢厂都要使用这种喷嘴。蒋才保把它取名为F型油压自动比例调节喷嘴，F就是"福山"拼音的第一个字母。1982年，这项发明获得国家颁发的重大科研发明三等奖，为国务院公布的77项重大科研发明奖之一。

蒋才保同志不但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个打铁匠成长为一个制造喷嘴的专家，而且积极支持学院完成科研项目，做到"要人有人，要厂房就盖，要设备就买"，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培养人才，使社办小厂人才辈出，兴旺发达。他现身患鼻癌，仍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很少考虑自己，不愧为江苏省的劳动模范。

喷嘴厂的27岁厂长徐建石和26岁的副厂长刘学虞，都是在党的培养下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熟悉专业的企业管理人才。他们是1973年和1975年先后从福山中学毕业分配来厂当工人的。经过几年第一线各项工种的锻炼，又被选派参加本厂举办的专业技术学校学习，以后又担任科室的领导。1983年经乡党委任命为厂长、副厂长。他俩经过考核，由苏州市正式评定为助理工程师职称。徐建石与马鞍山钢铁学院教师合作设计、研制MFP型可调旋流的煤粉烧嘴，经江苏省冶金厅组织二十六个单位的专家、教授和工程师鉴定合格，认为它的研制成功，对现有燃煤的轧钢加热炉的节约能源有积极意义。现在他正在组织技术人员根据国家的能源政策，力争用煤代油，为冶金锅炉从烧油助燃逐步过渡到烧煤粉助燃创造更光辉的前景。刘学虞与北京钢铁学院教师合作试制平焰烧嘴成功，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他们是智力开发的受益者，因而他们也最关心对职工科学技术的培养和提高。

我们还看到福山乡的党委书记曹明华和乡长熊方义，他们也是智力开发的受益者和开拓者，同样，他们为本乡的工农业生产和农村集镇建设贡献出自己的才智。

他们两人都是高中毕业生，1964年前后分配到福山农业技术推广站搞植物栽培和供销社搞植物保护。原来的老书记发现他们有培养前途，就推荐他们分别到江苏农学院学习水稻栽培一年，苏州市"五七"农大(现改为苏州市农业干部学校)干部培训班学习半年。曹明华在实践中感到培育水稻杂优良种，年年要到海南岛去，既费钱又费时间和精力，就和农科站的同志共同创造了杂优稻F1代种子的快速鉴定法，写成专文在《农业科技通讯》上发表。在三至四月的低温条件下，成功地鉴定了种子质量，解除了杂优F1种子夹杂，雄性不育的疑虑，如期进行播栽，获得了丰收。熊方义同志和农技员合作，研究成功茶籽的营养钵，用尼龙薄膜覆盖育苗，著文在《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一般种茶三、五年亩产难达百斤，用营养钵育苗可以做到当年种、当年产茶，三年后一亩一分地产茶235斤。乡党委老书记离休时关心智力开发，推荐这两位年轻的技术员进了领导班子。他们进了领导班子以后，更加重视科学和智力，不少具备干部四化条件的农技员成了乡和村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重视智力投资，拨款筹建全乡的教育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他们还深深感到，今天的农村并不只是一个农业的活动领域，它包含着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迫切需要重新学习，增长知识和领导经济的能力，以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我们相信，一个乡镇，一个工厂，有懂行的"明白人"当家，重视智力开发，积极培养人才，就一定能够推动生产和各方面工作不断前进，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五、对智力开发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从福山乡开发智力的实践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并逐步加以解决：

1，智力开发要有规划。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城市规划的精神，福山镇已经制定了1983～2000年发展福山集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根据这一规划，要求逐步把福山镇建成为具有特色的新型农村工业集镇。规划对集镇规模、总体布局和近期建设规划以及规划实施意见，都有较明确的要求。其中，对于智力投资，虽然有所体现，但不够明确，还需要有长短期相结合的智力开发和智力投资规划。智力开发的方针，应以自力更生为主，结合两个文明建设的远景，对人才培养提出总的目标和具体措施。各单位也应有自己的智力开发的规划。如制冷剂厂就制订了1984年到1988年生产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人才引进和培养规划草案。

集镇不仅是周围农村的经济中心，而且要建设成为文化中心。福山镇已经建立了文化娱乐中心，近期还要进一步兴办儿童乐园、体育场等。但是光有这些还是很不够的，这个文化中心，应该是大文化的概念，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五位一体，从乡到村的整套网络。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这个乡的党委、乡政府最近决定，把正在兴建的职工业余学校办成为全乡的教育、科技中心，主要对干部和各类技术人员分别进行政治、政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和经营管理教育。现在第一期土建工程已经上马，对经费、师资、课程和培训对象已有一些初步的打算。我们认为还要具体落实，并健全从乡到村、到各生产队的科技、教育和文化网络，对各级各类人才要进行有计划的培养。

2，对人才流动，要有相应的政策，并允许适当放宽。

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商品经济日益增长，农村、特别是作为城乡纽带的小城镇迫切需要引进各类科技文教人才。福山乡经济起飞、集镇增辉，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智力开发，目前最感缺乏的也就是智力和人才。他们过去有三怕：怕政策多变，怕自办工厂没有资金，怕办起工厂产、供、销没有保证。现在这些顾虑已为实践经验逐步消除，政策合实际顺人心，事在人为，资金和产供销等问题都可解决。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人才难得，例如人造革厂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竞争能力，这个厂根据国家规定早已实行八级累进税，1982年利润为132.33万元，仍占全乡乡镇企业获利的首位。但就在前些时候，已经盛情请来的几位上海退休老师傅都被上海工业部门以发挥老工人的"余热"为借口，统统请回去了，他们厂里没有一个工程师，几位骨干老师傅一下都走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使他们寝食不安，厂领导对人才已经到了"朝思暮想，求贤若渴"的程度。

为了促进农村和小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认为，应该鼓励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员下乡，倡导和组织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的技术协作以至人才和技术的交流。现在有些单位人才积压，学非所用，应该在一定的审批手续下，允许那些专业对口的人才到能够发挥其专长的城镇、乡村中去干出一番事业来。可以调动的允许调动，不能调动的应该允许他们应聘。有关部门对引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应聘来的工程师，在生活上应多给予关怀，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安心为农村集镇作出贡献。为了培养急需的人才，农村集镇应挑选优秀青年，保送到大学和中专，实行定向培养。但是现在有些大学强调学额限制，不愿招收这类学员，我们认为，上海的大专院校应该为上海经济区作出更大贡献，扩大招收小城镇急需代培的人才。本省的有关大学和中专，更应挖掘潜力，多为本省的农村和小城镇广开培养人才之门。

3．基础教育要加强，职工业余教育也要抓紧。

福山乡原来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社员过去是凭力气挣工分，读书不读书一个样，文盲、半文盲相当多。根据1983年2月统计，12～40周岁的青壮年中，尚有文盲1,969人。全乡乡镇企业共有职工4,343人，只有大专毕业生2人，中专生5人，文盲占职工总数的13%。因此，不仅要搞好普通教育和扫盲工作，职工培训的任务也很重，这三者都是智力投资工作，都要在统一规划下，加强领导，认真做好。

目前福山乡师资严重缺乏，肖桥、邓市、铜管山三所初级中学由于师资缺乏，只能办到初中二年级。福山完全中学有四分之一的教师为民办教师，有些课程还开不出来。所以，学生读完初中很不容易，考上高中更加困难，质量也无法保证。提高普通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师资。福山乡既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又缺少培养人才的人才。办好师范教育，加强农村师资队伍的建设，实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事。

列宁在《日记摘录》中说："我国今天城乡的文化联系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带有另一种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农村的，是那些使农村在政治、经济、道德、体质等等方面腐化起来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① 我们领会列宁讲的这种文化联系，虽然直接指的是先进的工人下乡帮助农村建设，但从广义上讲，是包括整个科学技术和智力结构在内的城乡结合和交流。从福山的情况来看，包括智力开发、引进和培养在内的城乡文化联系，已经初步建立，并已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如同连本长篇评弹，现在只是开篇，好戏还在后头哩！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680页。

弥补小城镇教育经费不足的一条途径

——吴江县中小学校办工业

李克世

学校办工厂，是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一条重要途径。

教育经费不足，是发展教育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县以下的中、小学多数分布在小城镇，教育经费不足的状况，尤为突出。吴江县中、小学开办工厂，弥补了教育经费不足，改善了办学条件，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吴江县除了几所重点学校的校舍还能正常使用外，其余中、小学校舍破旧，危险房屋不少。据县文教局统计，全县中、小学有危险房屋11,168平方米，占全县学校建筑面积的4%。全县中、小学教学设备简陋，操场场地狭小，可供师生阅读的图书也很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经费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多数（约占75%）是用于教职工的工资、补助费、奖金等方面，而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很少。试将吴江县1982年教育经费与1957年、1965年教育经费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下页表内只有第①项基建、房屋维修专款和第⑧项经常费可以用以改善办学条件。文化大革命前，小学收了学费，除民办班的学费用以支付民办教师工资外，公办班的学费（有30%的学生免缴），一年有24万元收入，可以直接提留为小学经费。这个数字并没有被统计到（表1）的1957年、1965年度开支之中。所以，就以经费的绝对值来说，1982年并不比文革前多拨款，而是少了

表1，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1982	1957	1965
支出	451.3	103	123.2
其中①基建、维修房屋专款	85.4	2.0	2.4
②教工工资	190.0	84.1	94.7
③补助工资（包括班主任费、节支奖、调工资、工会费）	34		
④教工福利费	1.2	5.0	6
⑤离休人员工资	9.7		
⑥助学金	0.5		
⑦民办教师工资补助	93.7	1.3	13
⑧办公费、教具购置、课桌椅修理（即唯一机动经常费）	26	10.6	7.1

注：以上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50,000～85,000元。而基建费由于房屋长年失修，校舍急待翻新，现在拨款虽然增加，但由于基建材料的价格上涨很多，投资的效益就被大大地降低了。仅举与学校有关的几项开支为例：

	1976年	现在
基建房屋（1平方米）	50～60元	100元 （一幢教学楼10～15万元）
安装电话	600～700元	1,000元
县招待所开会住宿（一夜）	0.6～0.7元	1.5元

再从几个年度的全县行政总支出、教育经费及学生数的对比来看（见下页表2）：

表2：

年　度	在校中、小学学生	教育经费支出	全县财政总支出（全民所有制部分）
1957	44,369（人）	1,030,660(元)	2,905,726（元）
1965	58,207	1,232,442	3,376,152
1982	101,532	4,513,000	19,123,000

（另有幼儿班20,043人）

由此，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1．1965年与1957年相比，教育经费的支出，基本上与学生数增长幅度保持相适应的比例，与全县全民所有制部分的财政支出也基本上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

2．1982年与1957年相比，全县财政总支出增长达6.5倍，而教育经费的支出仅增长4.5倍。如果把上面提到的1957、1965年度的小学经费尚需加进去的24万元计算在内，则增长只有3.6倍。

而且，1982年度教育经费支出之所以增长幅度较大，还包括了补发工资16万元（行政干部的调资，这一年决算未统计在内），以及民办教师的补助工资大幅度增长的因素在内。如果把这些因素都扣除，教育经费的开支则大大下降了，约为1957年的2.2倍。

3．1982年与1957年相比，学生总数（幼儿园人数未计算在内）增长了2.28倍，而教育经费只增长了2.2倍，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但由于上述物价上涨因素，以及教职工补助工资费占去32%，致使学校在财务开支上，仍普遍感到比1966年前紧张。尤其是学校唯一能机动使用的经常费一项，按（表1）195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82年的26万元还没有1957年的34.6万元多，而学生数却为1957年的2.28倍。也就是说1957年每个学生每月平均教育经常费用为0.78元，而1982年则为0.21元（一年按上课10个月计算），实际上人均水平则更为降低了。

教育经常费包括教工办公费、旅差费、教学用书、课本，扣除了这些，能用于课桌的修理、仪器的购置、添置图书的就很少了。难怪绝大多数学校不能在教师办公室放上一份报刊，全校只订一份报刊，要到图书室去看，多数小学没有图书室，只好放在校长室。而规模小的农村小学，更是用一张纸都得经过领导批准。这怎能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又怎能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经费的紧张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仅仅依赖国家拨款不行，坐等社、队出资也不现实。看来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还得立足于自力更生积极办好校办工厂，以补充教育经费之不足。从吴江县的情况看，校办工业的收入确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源。

吴江县自1972年以来先后在全县各中学及公社中心小学兴办了形式多样、生产不同产品的校办工厂。现有丝织、针织、纺织、配件制造、塑料、电器、五金、印刷、服装加工、纸盒制品、皮鞋、炼油、橡胶、粉笔、蚌壳粉、水泥预制等工厂，共74所，近年来还成立了“校办工业公司”，帮助校办厂组织生产和供销。

1980年～1982年三年全县中、小学校办厂产值、利润以及1983年的产值、利润计划见下表：

表3：

年度	中学			小学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利润百分比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利润百分比
1980	166.8	44.9	26.9	162.2	30.4	18.7
1981	284.1	58.0	20.4	215.8	34.3	15.9
1982	241.8	44.6	18.4	169.2	30.4	17.9
合计	692.7	147.5	21.3	547.2	95.1	17.4
1983年计划	230.0	55.0	23.9	220.0	35.0	15.9

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1．勤工俭学活动，在过去主要是组织学生从事支农劳动或办农场，规模大的学校办了一些学生轮流参加劳动的小手工业工厂。自从1979年全国勤工俭学会议提出不仅办农业，也要办工业，要提高经济效益，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以来，近几年普遍办了附属于学校的有脱产的教职员管理，雇有工人的专业工厂。

2．中学校办厂一般比小学校办厂利润要高，效益要好。按全县74所校办工厂统计：

表4：

	合　计	办得好的（占%）	办得一般的（占%）	办得差的（占%）	另：近年来关闭的
中学	36	16(44)	13(36)	7(20)	1
小学	38	14(37)	14(37)	10(26)	2
总计	74	30(40)	27(36)	17(24)	3

总的看，全县校办厂办得较好的占40%，有四分之一的厂办得较差，少数厂如坛丘、七都乡中心小学及桃源中学三个校办厂，因产品不对路，长期滞销，已经关闭。目前仍然亏本的．只有坛丘中学服装厂一家了。

县校办工业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82年初应运而生的。它拥有资金20万元，自办一个文教系统基建材料水泥预制厂和一个印刷厂。各校办厂营业额在5,000元以上的，上缴其营业额的6%，作为无息贷款支援条件差的校办工厂和新办的校办工厂。已经放出的贷款1981年为3.5万元，1982年为2.3万元，帮这些校办厂解决缺少资金的困难。

3．全县11所完全中学（除七个县属镇各一所以外，还有湖滨、八斯、北库、铜罗公社四所）的校办厂，由于学校规模较大，利用废弃的旧校舍为厂房，有了生产基地，原有勤工俭学基础较好，资金较充足，校办厂的规模也较大，办得就比较好，年利润

都在万元以上。其余，各乡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按现行规定都可以办厂。全县26个镇、乡（除去设置完全中学的四个乡）的中学、中心小学，除了上述桃源中学等三校关闭了校办厂以外，都各自办厂，有的校办厂甚至设有下伸的分厂。校办厂最盛时1981年上半年全县共有124所，1981年下半年经过调整，现在还有74所。

4．校办厂利润之所以较高，固然有其经营管理上的原因，但与国家给予优惠待遇，各方面关心照顾有很大关系。按规定，校办厂开始营业第一年免除一切税收，第二年以后只上缴营业额6%的营业税，仍免缴所得税。而对于营业额3万元以上的六个大厂，也只征收营业额10%的能源集资、交通税。在这方面是其他社队工业所不可相比的。

按规定，校办厂在缴纳营业税之后，纯利润的40%用于扩大再生产，50%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有力量的可以兴建校舍、教工宿舍，10%为师生员工福利费。但由于节支奖、非班主任的补贴费等项均在内开支，所以，除40%保证用于扩大再生产外，福利经费往往超过10%，这样能够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钱就不多了。对这个问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根据1982年全县校办厂的决算统计：

全年总产值411万元，纯利润75.2万元；

上缴利润6%，2.2万元；

扩大再生产40%，29.1万元；

其余，为修建校舍20.9万元，添置教学设备2.5万元，师生员工福利费20.3万元。

仅1982年，共计为教育事业提供了43.7万元资金，相当于全县教育系统基建费及经常费拨款111.4万元的39.2%。试想如果没有这一笔经费来源，当前学校状况将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差。再看看几所勤工俭学开展得较好、校办厂成绩较为显著的学校，校办厂在改变学校校舍设备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震泽中学的校办厂是办得较为成功的。自从1972年办厂迄今产值96万元，利润46万元，占产值的48%。这个厂只占用了两个职员编制，雇有六名工人。他们利用大厂废料模压制造各种形状、各种规格的瓶塞，销售到常州、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自从1979年落实了校办厂经费使用政策，已先后利用校办厂的利润新建教工宿舍、办公楼各一幢，改建了电化教室、健身房，修建了资料室、浴室、食堂以及其他小型建筑，建筑面积共达3,144.5平方米，现在正在准备建造新的实验楼。

盛泽中学是规模仅次于震泽中学的完全中学，1974年创办校办厂，为附近农村社、队修理各种电机、器械2,900多台，1980年以来增设丝织厂，为盛泽丝织厂加工纺织白丝绸、华达呢。1982年全年生产华达呢24万米，闪花绸10万米，产值23万元，利润5.6万元。该厂拥有织机20台，为全县最大的校办丝织厂。现在这个校办厂拥有纺织工50人，电器修配工12人，共62人。学校利用校办厂上缴的利润改善校舍条件。他们新建了一幢教学楼，共用经费9.8万元，其中县文教局拨款6.3万元，镇政府资助0.7万元，校办厂自筹2.8万元；建造学生宿舍一幢4万元，校办厂出资2万元；即将竣工的办公楼花费6.4万元，县拨款仅有1.8万元，其余4.6万元都由校办厂承担；即将动工的实验楼一幢及960平方米的教工宿舍，预算需经费11万元，校办厂将担负6万元。综上所述，仅承担大宗基建资金一项就已达13.1万元；除此而外，每年为学校提供1.5万元购置教学仪器、体育设备，而全校教工每月的节支奖、洗理费、非班主任的津贴，均向校办厂提取。

芦墟镇中心小学校办厂是1976年买了50把剪刀组织学生在劳动课糊纸盒兴办起来的。1979年借了县文教局4.6万元，购置了各种纸盒压模机，从1980年到1982年，三年产值共计32.4万元，除已还清文教局借款外，还为学校提供了资金：1982年8,400元，1983年前五个月已缴利润3,500元，预计全年能提供1万元资金，为改

善教工住宿条件，增添教学设备之用。走进校园，除运动场地以外都是水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路旁栽上了树，还为孩子们造了水泥象鼻滑梯，使这个小学充满着生机。

梅堰乡中心小学办了一所炼油厂，生产工业用润滑油。1980年至1982年，产值共达65.9万元，利润10万元。最近新建了整座学校的三层楼校舍45间，没有向国家和公社要一分钱，全由校办厂出资。

总之，校办厂办得好的学校，这几年既有国家拨款，又有校办厂的利润，校舍大多改观，并逐步添置了一些教学设备和图书，使教学条件和教工生活条件有了改善。这说明，开展勤工俭学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促进教育结构、教育制度的改革，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有效措施。

从吴江县校办工厂的实践来看，办好这些工厂，主要依靠专业技术力量。由于生产的连贯性及部分操作不适宜于学生轮流下厂，目前，学生很少参加校办厂劳动。据1982年统计，全县校办厂74所，其中组织学生参加校办厂劳动的有26所；中学生27,907人，共劳动39,875课时，平均每人劳动1.4课时；小学高年级学生27,027人，共劳动94,725课时，平均每人劳动3.5课时。

可见，校办厂要专业化，要提高经济效益，这就与学生参加劳动之间有矛盾。目前校办厂形式，能在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为国分忧，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之不足，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与勤工俭学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原有目的相比，是有一定距离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定程度的“以厂养校”。

今后要妥善解决，既要办好工厂，又要不脱离勤工俭学，学生适当参加劳动的原则，但又只能组织学生参加一些辅助性劳动，这就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来。

除了上述为教育设施的改善、教工的福利事业提供了一定的

资金外，办好校办厂还有以下好处：

可以解决一些教工家属长期分居两地，以及家属是农村户口难于迁入学校所在镇的困难，以及部分子女升不上学的就业问题，同时也吸收了附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据统计，全县校办工厂人员805名，其中编制内的教职员仅有177名，其余为农民工、临时工628名，而其中51%是分居两地的教工家属及没有升上学的本校职工子女。

学校办厂一般规模较小，产品不是大宗批量生产，可以生产一些小型、多样的产品，有的甚至填补了社会产品的空白。如震泽中学生产的瓶塞，从大口瓶塞到"喉症丸"小药瓶瓶塞，共生产过53种规格，客户要什么规格就翻砂制模，生产什么规格，所以，前两年苏州市大小工厂接踵而来参观"取经"的门庭若市。

庙港乡中心小学校办工厂，生产安排很灵活。去年在农村盛行高跟鞋时，赶制了一批女式各种型号的高跟鞋，利润达10,700元。今年女式高跟鞋滞销，了解到新式童装是热门，就赶制了一批童装，很快盈利7,700元。七都中学的辛勤校办厂生产的软木针，全县独此一家，不仅供给县内工厂使用，外地都来订货。如今全县中、小学使用的簿本，基本上能由几所校办印刷厂承印，保证了开学期间簿本的及时供应。

然而，要办好校办工厂困难还是不少的。最为突出的是，因为校办工厂不可能列入国家计划，而只能是作为市场经济的调济部分。所以，供、产、销的矛盾异常突出。乡镇的企业有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协助解决，而全县的校办工厂虽然组织起一个"校办工业公司"，只能起到提供信息、代为挂钩引线的作用。

总之，校办工业搞好了，能为学校、社会创造财富，为改善办学条件和师生福利提供资金，能为国分忧，是一举数得的好事，需要社会的支持。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江苏省小城镇及常住人口的统计分析①

顾纪瑞　朱晓林

认真研究小城镇的布局及其人口分布，对于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小城镇数量众多，星罗棋布在全省各地，分析它们的人口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小城镇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小城镇是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大城市的卫星城、城市郊区的市属镇、县属镇（包括县城）、乡属镇（乡政府驻地集镇）、乡以下的小集镇(村镇)。本文将全省的县属镇（包括县城）和乡属镇进行统计分析。全省13个城市（11个省辖市、2个县级市）郊区的市属镇和乡属镇，因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职能，除盐城市郊区和常熟市郊区的农村集镇（包括市属镇和乡属镇）列入统计外，其余都不包括在内。乡以下的小集镇(村镇)，因资料不完整，未列入统计，仅在分析时略有涉及。

(一)小城镇的数量

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省有建制的县属镇共计113个，以后经过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新增设的县属镇，截止1983年6月30日共计21个，除去已撤销镇建制的盐城镇和已改为市

---

①本文分析的资料来源，县属镇的个数以江苏省民政厅编印的《江苏省行政区划简册》为根据，扣除了赛山镇和盐城镇，并补充了1983年6月30日以前新批准设置的镇；人口数以江苏省及各市县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印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为依据；乡以下的小集镇根据省地名办公室保存的地名卡片。

属镇的窦山镇，现在全省实有县属镇132个。全省64个县(包括两个县级市)，平均每县有2.1个县属镇。没有县属镇的1个县（丹徒县），有1个县属镇的28个县，有2个县属镇的22个县，这两种情况共50个县；有3个镇的6个县，有4个镇的1个县，有5个镇的3个县（南通、如东、灌云），有6个镇的1个县(宜兴)，有7个镇的1个县(吴江)。有13个镇的1个县(江都，其中12个县属镇是新批准设置的)，一个县有5个以上县属镇的目前还是少数。

乡属镇，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共1,838个(不含大中城市郊区的乡属镇)，到1983年6月30日，有21个乡属镇上升为县属镇；另有52个镇同时设置县属镇和乡两个行政单位，统计时只能算一个镇集。因此，目前实有乡属镇1,765个。

全省县属镇和乡属镇两项合计，共有集镇1,897个，平均每县拥有集镇29.7个。小城镇最多的县为武进县，有63个；最少的县为扬中县，仅11个集镇。一个县的小城镇多或少，与该县的面积、总人口数、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有关。

如果与1953年6月30日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数字对比，三十年来每县平均拥有的集镇数没有什么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全省55个县（已扣除划出的松江地区10个县、肖县、砀山和缺少资料的如皋、滨海两县)，有县城38个、县属镇347个、乡属镇1,295个，共有集镇1,680个(原总数为1,920个，已扣除松江、肖县县属镇11个、乡属镇229个)。平均每县30.6个集镇，较目前平均每县29.7个集镇略高一些。

三十年来每县平均的城镇个数虽然都是30个上下，实际上在各县之间变化仍是相当大的。下降比较明显的如：无锡县1953年有小集镇61个，现只有34个，下降44%；常熟、江阴两县1953年时共有小集镇151个，现两县已划分为常熟市和江阴县、沙洲县三个建制单位，共有集镇84个，下降44%；海门县1953年时有小集镇53个，现只有集镇33个，下降38%（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只

是小集镇数，如果包括县属镇，下降幅度还要大一些）。无锡、常熟、江阴、海门一带农村的小集镇，大部分是明清之际形成的，到清代后期辛亥革命前集镇的发展较快。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城市和交通沿线，乡间小集镇一度畸形繁荣。解放初期，这些小集镇仍是当地小范围的经济中心。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行政区划的撤区并乡，许多小乡合并成了大乡，不少集镇只保留了地名，实际上已返回为纯农业生产区域了。相反，在广阔的苏北徐、淮、盐地区，原来集镇个数较少，集镇规模则较大，三十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这些地区新建了不少集镇。

（二）集镇的密度

全省总面积99,989平方公里，除市区外，各县面积之和为97,011平方公里，集镇的平均密度为：51平方公里/1个集镇。密度最大的县是江都县，平均22.6平方公里/1个集镇。密度最小的县是洪泽县，平均138.4平方公里/1个集镇。

分区域考察，就会发现地处长江北岸的南通、扬州苏中一带的人口密度高于苏南。苏中为720人/平方公里，苏南为588.8人/平方公里。这不仅是由于苏南包括了镇宁丘陵地区，人口密度相对低一些，还由于通、扬苏中地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人口密度就高于太湖周围各县，是有历史根源的。在苏中地区总人口密度较高的前提下，集镇的密度也是苏中高于苏南。苏中为35.76平方公里/1个集镇，苏南为42.89平方公里/1个集镇。但是，如果各自加上公社（乡）以下的自然镇，苏中和苏南分别为32.22平方公里/1个集镇和35.91平方公里/1个集镇，这两个地区的集镇密度就相接近了。

现将这三个地区的两项密度列表如下：

表1：　　分地区总人口密度

	总　人　口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
苏北各县	23,500,279	51,173	459.23
苏中各县	15,217,764	21,135	720.03
苏南各县	14,543,832	24,703	588.75

注：苏中各县为扬州市和南通市所属各县，苏北为盐城市、淮阴市、徐州市、连云港市所属各县。

表2：　　分地区集镇密度

	面积(平方公里)	集镇数Ⅰ	集镇密度Ⅰ	集镇数Ⅱ	集镇密度Ⅱ
苏北各县	51,173	732	69.81	733	69.81
苏中各县	21,135	591	35.76	656	32.22
苏南各县	24,703	574	42.89	688	35.91

注：集镇数Ⅰ包括县属镇和乡属镇；集镇数Ⅱ再加上乡以下的小集镇数。

(三)集镇的人口规模

分析集镇的规模，涉及从行政上、经济上、地理上划分集镇的各种标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里仅从集镇常住人口的角度，对集镇的规模进行分析，因为常住人口的多少，是我国现行规定中能否建镇的首要条件。而所谓常住人口，按照人口普查的规定，县属镇和乡属镇都应包括居民户和集体户两项人口。不包括兼务农业的社办企业从业人员，也不包括家住周围农村在集镇读书的中学生，不包括临时的商业服务人员，不包括家住集镇、户口在周围农业生产队的人员，一句话，常住人

口数大大小于实际上在集镇从事工作、生产、学习、服务的人口。但是在居民户和集体户中，只要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人，即使没有正式户口，人口普查时也作了登记。因此常住人口并不全是俗称的"在册"人口。在集体户中，另有少量在周围农村的社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因所占比例很小，又无法剔除，仍使用现有统计资料。

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省有建制的县属镇人口2,827,168人，平均每个县属镇24,800人。新批准设置的21个县属镇，规模较小，共有人口89,362人，平均每个镇4,255人。

全省公社驻地自然镇1,765个，总人口1,285，613人，平均每个镇728人。按照不同规模划分的集镇个数及比例如下：

表3：

人口规模	集镇个数	%
100人以下	20	1.13
100—500	962	54.50
500—1000	474	26.86
1000—1500	156	8.84
1500—2000	61	3.46
2000—2500	31	1.76
2500—5000	45	2.54
5000人以上	16	0.91
合　计	1,765	100.00

人口在500人以下的集镇982个，占55.63%，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集镇规模不大。

如果分地区观察，集镇的平均规模是苏南大于通、扬地区，通、扬地区又大于徐、淮、盐、连地区。500人以上的集镇全省平均占44.37%，在苏南占59.81%，在苏中的通、扬占38.46%，在苏北的徐、淮、盐、连只占37.15%。

表4：

	全省平均比例	苏南各县	苏中各县	苏北各县
100人以下	1.13	0.57	1.83	1.02
100—500	54.50	39.62	59.71	61.83
500—1000	26.86	32.26	23.08	25.69
1000—1500	8.84	13.02	9.34	5.22
1500—2000	3.46	6.23	2.38	2.18
2000—2500	1.76	3.77	0.92	0.87
2500—5000	2.54	3.58	1.46	2.61
5000人以上	0.91	0.98	1.28	0.58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集镇个数	1,765	530	546	689

值得指出的是，在1,765个乡属镇中，现有常住人口超过2,500人以上的，已有61个镇。有的是交通要道，如泰兴的口岸(8,099人)，高邮的界首(3,355人)；有的是历史名镇、游览胜地，如吴县的甪直镇(5,006人)，东山镇（6,230人），光福镇（4,858人)；有的镇附近是工业基地，如丹徒的谏壁镇(2,912人)。这一类大集镇早就具备了成为县属镇的条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得到批准。

(四)小城镇人口的比重

全省小城镇人口4,202,133人，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为7.89%。比重最高的是太仓县，为18.96%；比重最低的是铜山县，为3.79%。总的说来，小城镇人口的比重偏低。

集镇人口占当地总人口10% 以上的县有13个县，占64县的20.31%，这些县是：江浦、六合、宜兴、江阴、常熟、吴江、昆山、太仓、仪征、高邮、洪泽、金湖、盐城；集镇人口占当地总人口6%以下的县有17个县，占总县数的27.87%，这些县是：丹徒、武进、邗江、南通、启东、淮阴、沭阳、灌南、泗洪、涟水、铜山、丰县、沛县、邳县、睢宁、东海、赣榆。

以绝对人口数讲，平均每个县小城镇人口为65,658人。宜兴县小城镇人口最多，为120,123人；扬中县小城镇人口最少，为20,015人。

(五)小城镇人口构成的特点

小城镇常住人口的构成，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性别比例高，二是文化程度高，三是流动人口比例高。

以苏南的吴县为例，吴县地处苏州市周围，虽没有县城，但县属镇和乡属镇较多，共37个；集镇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34%，是中等偏高水平，这个县的集镇人口就具备上述三个特点。

全县总人口的性别比例(女=100)为101.2，37个集镇的人口性别比例为133.3，集镇常住居民中男性比例高，与社办企事业吸收男职工，聘请男性技术人员较多有关。

全县具有大学毕业和肄业文化程度的3,057人，其中集镇2,847人，占93.1%；高中程度51,677人，其中集镇16,901人，占32.7%。可以说，集镇集中了相当比例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全县和集镇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如下：

表5：

	大学毕业	大学肄业或在校	高中	初中	小学	合计
吴县全县	0.35	0.07	7.10	29.45	63.03	100
37个镇	2.75	0.54	19.56	37.82	39.33	100

吴县的户口登记状况表明，全县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的共3,271人，其中在37个集镇的2,251人，占69%，这反映出集镇上罗致了一批从外地招来的技术、管理人才。有常住户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全县8,280人，其中原是37个集镇的有3,029人，占37%。这种既有招聘来工作的又有跑出去从业的现象，是小城镇经济活动生机勃勃的一种反映。

再以苏北的淮阴县为例，全县有1个县属镇，26个乡属镇，集镇人口占全县总人口4.81%，属于比例较低的一种类型。可是，其集镇人口的构成，同样存在上述三个特点。全县平均性别比例为104.1，27个集镇高达163.9。全县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236人，在集镇的998人，占80.74%；高中程度的40,962人，在集镇的6,624人，占16.17%。在集镇的有文化程度的27,544人中，高中程度以上占27.67%，而全县平均只占10.58%。全县常住本地一年，户口在外地的3,025人，其中集镇1,817人，占60.07%。

集镇人口构成的这三个显著特点，是由小城镇在当地所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及小城镇往往是工业基地、商品集散地、交通咽喉的地位和相应的职能所决定的。这种人口构成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保持下去，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构成上的优势，集镇管理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是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六）影响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

常识和经济理论都表明，某一地区小城镇的数量和规模与该

地区的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土地总面积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选取江苏省64个县的小城镇数（包括非公社所在地的自然镇）、总人口、小城镇常住人口、社队企业职工从业人数、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土地面积等六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这几项因素不仅都与小城镇的发展有关，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都是互相影响的。为了考察到底哪些因素对小城镇发展影响较大，哪些因素对小城镇发展影响较小，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计算了上述各因素两两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并将算得的结果（相关系数矩阵）列为下表6。

表6：

i \ j		1	2	3	4	5	6
		小城镇数	总人口	常住小城镇人口	社队企业从业人数	社队企业产值	土地总面积
1	小城镇数		0.6931	0.4181	0.7409	0.5903	0.1516
2	总人口	0.6931		0.6058	0.4734	0.3251	0.4930
3	小城镇常住人口	0.4181	0.6058		0.4651	0.3933	0.1713
4	社队企业从业人数	0.7409	0.4734	0.4651		0.8872	-0.1229
5	社队企业产值	0.5903	0.3251	0.3933	0.8872		-0.2165
6	土地总面积	0.1516	0.4930	0.1713	-0.1229	-0.2165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小城镇人口和小城镇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总人口和社队企业从业人数。因为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小城镇数的多少反映了该地区小城镇分布密度的大小，而小城镇

人口则反映了小城镇的规模，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可以反映某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概况。

另据我们的计算分析，当总人口和社队企业职工人数两者同时变动，总人口增加2.5万人，社队企业职工同时增加3,000人之时，就有增加一个新小城镇的趋势。而从江苏的实际情况看，2.5万人相当于一至二个公社的总人口，这也就是说，当总人口以及社队企业职工人数的增量相当于一至二个公社的规模时，就有新增加一个小城镇的趋势。这个计算结果与现实情况是一致的。今后全省总人口将在严格控制下有所增长，农村社队工业将继续有较大发展。如果到本世纪末江苏总人口控制在7,050万人之内，社办工业从业人员增加一倍达到660万，按照总人口增2.5万人，社办工业从业人员增加3,000人增加一个集镇测算，约需增设新的集镇400～600个。可以想见，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和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小城镇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又是可以计量的。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趋势，因为小城镇的形成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关。当自然地理状况具备形成小城镇的天然条件，则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发展，必然会在某个合适位置上形成居民的聚集和工业的积聚。但当地理条件不具备时，如小城镇密度已很大或因其他情况，即使具备形成小城镇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但这种趋势的存在，也并不能保证新小城镇的实际形成。

一九八三年九月

震泽镇的人口构成

王 晓 义

震泽镇是吴江县西南八个乡的经济中心。它是一个县属镇，也是震泽乡党政机关的驻地。由于震泽乡的企事业单位设在镇的北侧，所以震泽镇也是震泽乡的经济中心。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震泽的人口构成已经起了很大变化。这里，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震泽镇的人口构成的一些特点。

一、哪些人住在镇上

住在镇上的人，可以按照居住的稳定程度，分为长期居住的和短期居住的两类。

(一)长期居住的。按照户口类型，又可分为城镇户口居民和农村户口居民两类。

1. 城镇户口居民。他们的户籍归县公安局震泽派出所管理，公安部门称这一类居民为在册人口。1982年人口普查时，震泽镇有2,785户,8,226人。这个人口数,包括了实际上住在震泽乡范围内的有城镇户籍的178人。他们是一部分已婚的插队知识青年和插队女知识青年的子女。按照政策插队知识青年都可迁回原来的城镇居住,但有一部分已经和震泽乡农民结婚的插队知识青年,不再迁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城镇，只是把户籍就近转到震泽镇上。如果扣除住在乡下的这一部分城镇人口，则实际长期住在镇上的城镇户口居民为8,045人。

2．农村户口居民。长期住在镇上的盛泽乡农民，共有585户，1,610人。他们的户籍由震泽乡人民政府管理。这些农村户口居民，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工农结合户（当地称为半家户）。在一户的人口中，既有城镇户口居民，又有农村户口居民。据1983年6月统计，全镇共有工农结合户374户，1,333人，其中574人属城镇户口，759人属农村户口。

（2）农业户。家中成员全部是农村户口。1983年6月统计，全镇共有农业户72户，256人。

（3）震泽乡渔业大队。139户595人，全部是农村户口。

以上三项合计，全镇共有农村户口居民1,610人，占在镇上长期居住的居民总数的六分之一。

（二）短期居住的。主要是农民工、外地学生和临时流动人口。

1．农民工。随着震泽镇工业的发展，镇上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除极少数不服从分配的待业青年外，已全部就业。在城镇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镇上的工厂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从附近农村雇用了一些农民工。这些农民工都算是临时工。实际上有些临时工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多年，已经成为熟练的工人，但由于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列入编制，所以不算正式职工。1983年6月统计，全镇企事业单位共计雇用了1,395个农民工，其中75%来自本镇蔬菜队以及与镇毗邻的震泽乡、八都乡。

2．外地学生。震泽中学是吴江县的重点中学，该校高中在全县招生，外地学生在校住宿的有773人。

3．临时流动人口。震泽镇有两个旅社和一个招待所，共有246张床位。1982年末统计，平均每天住宿人数为221人。设在镇的乡卫生院有60张床位，经常有来自农村的病员住院。

二、哪些人白天在镇上晚上回农村

白天，从农村来到镇上活动的人，主要是农民工和参加集市贸易的人。

镇上企事业单位的1,395个农民工，除了一小部分人原来就住在镇上的外，绝大多数人家都在农村。粗略估算，约有500个农民工因离家较远，不能每天回家，寄宿在镇上亲友家中或住在工作单位。约有800人白天在镇上做工，晚上回农村住宿。

在镇区北侧的震泽乡的社队企业中做工的社员，也是一种农民工。他们也是白天在镇上做工，晚上回农村住宿。据统计，镇区北侧的社队企业共有务工社员1,995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受行政区划的约束，而是把靠近镇的社队企业的所在地和震泽镇的镇区一起作为一个非农业区来看待。这不仅是由于工业生产上需要互相联系，互相协作，而且在道路、给水排水、能源供应、治理污染等方面需要统筹安排。实际上，一些社队企业的厂区已经突破了原有行政区域的划分，而与震泽镇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社区了。

每天到震泽镇参加集市贸易的农民约有五、六百人，节日可达1,500人左右。仅仅是赶集，还不能说是农民已经在经营商业。但是，来自农村的个体商贩已经有了发展。据1983年6月统计，全镇有个体商贩130人，其中属于农村户口的有83人。

三、镇上居民从事哪些职业

根据1983年3月调查统计，震泽镇居民的职业结构如下表：

就业部门	人　数	占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	其中农民工人数
工　业	3851	68.5	931
交　通	161	2.8	20
商　业	1001	17.8	77
基建、环保	347	6.2	119
财政金融	45	0.8	
文化教育	167	3	
机　关	50	0.9	1
合　计	5622	100	1148

注：本表未包括设在镇上的震泽乡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全镇从业人员总数中，从事工业的职工占68.5%，从事商业的职工占17.8%，这说明现在的震泽镇已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工商并举的小城镇。

解放初期，震泽镇是吴江县西南片的商业中心。1949年，震泽镇从事商业、饮食服务业的人数为1,479人，占当时全镇人口10,150人的14.6%。到1951年，从事商业、饮食服务业的人员达到1,804人，占当时全镇人口的19.4%。后来，经过五十年代中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六十年代将个体商户纳入合作商业组织，商业系统的从业人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到1983年上半年，全镇从事商业的人员只有1,001人，还不到镇上常住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

解放三十多年来，从事工业的人员增加很多。刚解放时，震泽镇只有五家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工厂（一家酒厂、两家米厂、一家印刷厂、一家染厂），职工总共81人。三十多年来，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逐步发展，到1983年上半年，全镇已有各种类型的工厂

25个，职工3,851人，占长期住镇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农村户口的职工，即农民工，占长期住镇人口的14.4%。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工业系统，占这个系统职工总数的24.5%。其次，分布在基建系统，占这个系统职工总数的34%。

文教系统的从业人员较少，只占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3%。但这个系统中文化程度较高的职工较多。全镇职工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共计95人，其中在学校工作的就有43人。

从全镇职工的文化程度来看，初中程度的42.4%，小学程度的占30.8%，高中和中专的只占18.2%。居民文化程度不高的占多数。

综上所述，震泽镇的人口构成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交错居住，生活在一个社区之内，但户籍有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2. 震泽镇是周围农村的经济中心，吸引一部分农民到镇上做工或参加集市贸易，其中在镇上做工的农民，有一小部分常在镇上住宿，大部分是白天在镇上做工，晚上回农村住宿。

3. 震泽镇农民工较多，约占全镇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工业企业中，农民工约占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4. 解放三十多年来，工业职工增加很多，目前全镇工业系统职工总数，占长期住镇人口的40%。而商业职工人数却有减少，现在全镇商业职工总数，还不到长期住镇人口的10%。

一九八三年九月

高淳县村镇布局研究

金其铭　沈国明　董　新　陆玉麒

村庄和集镇，是人们进行生产、交换和生活居息的地方。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村镇共同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研究一个地区内村镇体系的合理结构及其布局，对当前研究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村镇，绝大多数是历史上长期处于自给半自给经济状态下形成的，不能适应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人们对村镇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因此，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纵观全局，规划安排各级各类的村镇和建立合理的村镇体系，乃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以高淳县的村镇布局为例，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村镇现状分析

高淳县位于江苏省西南边境，为南京市辖县，与溧水、溧阳及安徽省郎溪、宣城、当涂等县接壤，面积763平方公里。全县现有自然村镇1,006个，居住着391,600人口，平均每个村镇有389人，但实际上各地相差很大。集镇大者可达数千人，小的仅几百人；村庄则更为悬殊，从独家村直到七、八千人的大村落。各乡的村镇数量，有的十几个，有的一百多个，相差近十倍。在地区分布上，西部平原圩区和东部丘陵岗地的差异是很显著的。这两种类型村镇的人口规模、分布密度及大、中、小村所占的比重都有很大的

不同。

圩区型：聚落呈条带状、大而稀，大村或较大村庄多。

这一类型的村镇大多是沿着圩埂呈长条状延伸，陆续相连。本区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繁发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迫使人们向地势较高的圩埂靠拢，集中居住，共同与水患作斗争，这样，圩内就成了聚落空白地区。由于各种制约聚落形成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本区村镇的大型化。全区居民259,519人，集中在493个自然村镇上，每个村镇平均有526人，比全县的平均规模高出三分之一。全县500人以上的较大村庄有80%分布在本区，千人以上大村分布在本区的更高达86%。而全县100人以下的小村，本区仅占28%。有许多规模较大的村镇，如薛城乡所在地薛城，居民有7,176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5%；而与它相邻的长乐村规模更大，有8,597人，几乎占到全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乡千人以上村镇有5个，占村镇总数的36%。这5个村镇人口总数占全乡人口总数的85%以上。规模大，密度就小，分布亦即稀疏。圩区各乡的村镇分布密度大都在每平方公里1.6个以下，最低的薛城乡仅0.4个。

村镇布局于圩埂，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坡地、劣地、闲散地，不占高产粮田；另一方面，随着乡村经济的繁荣，对外联系日益发达，圩埂上设村有利于交通运输和进行贸易活动。同时，由于圩埂上居民的集中，也有利于设置各种生活服务设施，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布局还可防止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所带来的破坏，符合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但是，居民的过分集中，给生产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远离耕地，加大了耕作半径，带来了不便。

丘陵岗地型：聚落呈团块状、小而密，中小村庄较多。

这一类型地区占全县土地面积的40%，与圩区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各自然村镇平面大多呈团块状，星罗棋布。全区483个自然

村镇，与圩区型相仿，但只居住着112,422人，各村镇平均规模仅233人，不及圩区型的一半。各乡的村镇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个以上。村镇密度最高的定埠乡每平方公里2.9个，高出全县平均密度近一倍。这个乡的村镇平均规模仅169人，其中200人以下的小村有51个之多，占总数的70%，加上200～500人的村庄合占96%。这种分散的布局形式，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起伏零乱、高低不平的地形，既造成了交通的不便，又促成了耕地的分散，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还没有摆脱依赖于自然的状况下，居民点只能散布于自己的耕作区附近。同时，本区较低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人均耕地的增加，和居民点的规模偏小。

居民点布局分散，对农业生产是较为有利的，如耕作半径小，便于经营管理，特别是在目前农业生产有很多过程仍以手工操作为主的情况下，这种布局可节省下地的往返时间，有利于集约经营。但是，这种布局不仅不利于农民就近购取各种生活资料，而且还不利于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各种生活福利设施不可能在小规模村庄设置。同时，这种布局占地很多，在目前耕地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从远景发展来看，分散的村镇对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和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也是不利的。

村庄和集镇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点，集镇人口较多，规模较大，它既是乡村相对集中的工副业生产基地，又是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因此，集镇的活力直接决定于其服务范围的大小，研究集镇的服务范围可为等级划分提供重要依据。

高淳县现有集镇19个，除县城淳溪镇外，其余均无镇的建制，为乡政府所在地的自然集镇。

但是，这些集镇的经济活动区域，有的仅限于本乡，有的是几个乡，而有的涉及到外省外县。制约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位置适中，交通方便之地往往是大集镇所在地，市场较为广阔，可吸引较大范围的农民来进行各种物

资交流和贸易活动。如地处西部圩区中心的淳溪镇，是高淳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其吸引范围跨过了省界，涉及安徽省境内的9个乡15万人口的区域。其次，距离县城的远近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位于东部边境的永宁、定埠两个乡，因远离县城，虽有公路相通，但物资运输费用高，而它们邻近溧阳，实际上属于溧阳的腹地。再次，集镇规模越大，各类设施就越齐全，一些基本的设施，例如商店等更趋于大型化，提供商品的种类也就必然增多。

不同集镇可供选择的商品种类

（1983年4月10日）　　单位：种

名称 \ 商品项目	日常消费品		耐用商品	
	香烟	香皂	手表	钟
淳溪镇（县城）	24	14	27	19
漆　桥（地区中心）	18	14	4	7
沧　溪（乡政府驻地）	20	6	0	14
红　旗（行政村）	7	3	0	0

从上表可以看出，规模大的集镇，商店供应的商品品种多，给人们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同时，规模大，市面繁华，产品销路也好，农民宁愿多走点路到大镇上去挑选合适的商品，同时把农副产品带去出卖，也能卖到较好的价钱。如与薛城毗邻的安徽塘沟镇等地的人，宁肯多走5华里路到薛城镇赶集，而不去塘沟镇，原因就在这里。另外，历史原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东坝镇，其服务范围涉及安徽郎溪县的大部分地区，这固然同东坝规模大有关，但与历史习惯也是分不开的。

集镇在分布密度上存在着地区差异，全县19个集镇，其中12个分布在西部平原圩区，而与西部圩区面积差不多的东部丘陵岗

地区仅有7个集镇。这一地域差异的存在是由这两个地区的地形条件、居民点的分布和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村镇等级系统

村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集镇对于周围的村庄来讲都具有中心的作用。但是，各个集镇中心作用的大小并不相同，集镇与从事农、林、牧、水产等第一产业的村庄不同，虽然它仍保留有第一产业的某些成分，例如集镇居民中部分居民是从事农业或半工半农的；但是集镇在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方面的职能以及在作为文化、行政等方面的职能已很突出，与村庄形成鲜明的对照。集镇的级别愈高，其中心作用愈大，服务范围越广，服务项目也就越多。

今以高淳县各集镇的工业总产值、商业营业额、饮食服务业营业额、各集镇人口规模、缝纫机、手表、钟等三种耐用商品和棉布、卷烟、酒等三种常用消费品的销售量等十项指标为依据，将全县集镇划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级只有淳溪镇一个镇；第二级，有椏溪、漆桥、东坝、固城四个镇；第三级，包括沧溪、薛城、砖墙、韩村、正觉寺、顾陇、定埠等七镇；第四级，包括河城、漕塘、下坝、青山、港口、狮树、古柏等七镇。

淳溪镇是全县唯一的一级集镇，是高淳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淳溪镇在历史上原有一定基础，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割溧水县七乡镇建高淳县时，淳溪镇即作为县城所在。到解放前夕，淳溪镇已有居民2,000多人。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又设在此地，加强了该镇与全县各村镇的联系，各项公用服务设施也得到了优先发展。淳溪镇有四通八达的公路通向

全县各集镇，水路交通也很方便，它紧临固城湖，可以通过官溪河和胥河等与县内外取得经济上的联系，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对淳溪镇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增强了淳溪镇的中心作用。

高淳县四个二级集镇均分布在该县的中部和东部，而西部圩区却没有一个二级集镇。究其原因，主要是西部有全县最大中心淳溪镇的存在，整个西部地区都在它的直接影响之下，不具有形成二级中心的条件。东部地区的东坝、漆桥、椏溪、固城这四个二级集镇均有便利的水陆交通可以利用，且东部地区离一级中心淳溪镇较远，受淳溪镇的影响没有西部圩区那样大，加之各集镇各有所长，故能形成这样四个地区性的二级中心。除固城外，其余三镇均有较大的服务范围。

三、四级集镇各有7个，分散分布于全县各地，它们是一、二级集镇的次级中心，这些集镇的吸引范围都比较小，一般只限于本乡范围之内，但它们的规模、市容、商店数量有很大差别。

集镇是一个区域内经济活动的中心，各级集镇为它影响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服务。从下表可以看出不同集镇的服务业职能及其所反映的服务区的大小。

1982年高淳县各类集镇服务行业营业额

服务行业 / 营业额(元) / 集镇	旅　店	照　相	理　发	浴　池
Ⅰ级淳溪镇	139,461	6,821	28,869	16,527
Ⅱ级东　坝	4,749	1,096	2,608	5,394
Ⅱ级沧　溪	1,275	0	993	4,202
Ⅱ级河　城	325	0	802	80b

各类集镇平均服务面积、半径

集镇名称	各服务行业平均服务半径(KM^2)	服务半径(KM)
Ⅰ级淳溪镇	540.4	13.5
Ⅱ级东　坝	68.5	4.8
Ⅲ级沧　溪	36.9	3.3
Ⅳ级河　城	11.4	1.9

对照集镇服务范围和等级系统，可以看出，高淳县集镇的服务范围和集镇的等级是基本吻合的。等级高的集镇，服务范围也大，等级低的集镇，服务范围就小。

划分村庄等级较为复杂，我们综合考虑了人口、行政地位、商业服务等各方面的因素，将全县943个村庄划分为21个一级村，256个二级村和666个三级村。

一级村实际上具有小型集镇的雏形，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1．原有基础较好。这类村庄如沛桥、庙岗、长乐、南塘等，它们在解放前曾是繁华的集镇，只是后来未成为公社所在地而衰退为农村，但仍保留一些服务设施。如沛桥还保留有一段小街道，有20多个非农业人口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设有合作商店（有糖烟酒、百货、生产资料门市部各一个），豆腐摊5家，小吃铺2家，个体理发店2家，还有茶馆、磨坊和油坊，是几个行政村的服务中心。

2．村庄规模较大，有条件建设一些服务设施。如薛城餐饼圩是5个行政村的集中地，人口达5,000多，村上设有较大的综合商店。

3．远离集镇，为方便人民生活，在位置适中，具有一定规模

的村庄设置商店等服务设施。如漆桥乡的荆塘，永宁乡的尚义村、西舍等均是。

4. 为了不同行政单位相互间的竞争，而大力投资形成中心村庄。如砖墙乡的水碧桥，为了与邻近的安徽省较热闹的水阳镇竞争，故在此设了个供销站，以吸引本地人前来购买货物或出售农产品。再如这个乡北部与狮树乡仅一河之隔的北埂陈村，也是为了与狮树竞争而形成的一级村。

5. 社办工业基地。如薛城乡的孙家村、沧溪乡的下桥村等都是由于靠近县城，电力供应充足，交通方便而形成的社办工业区。前者有砖瓦厂、可锻铸铁厂、制药厂等，后者有塑料厂、化纤厂、苧麻加工厂、预制厂等工业企业。为满足工人生产生活需要，这两个村都相应地配置了一些服务设施。

6. 历史习惯。如沧溪杨家湾，邻近安徽，附近有一节制闸，来往人较多，故农民习惯在此摆摊设点，形成小集市，成为附近村庄的中心，有商店、浴室等设施。

7. 行政机关驻地的迁移。如西陡门就是1978年丹湖公社机关迁此后发展起来的。

至于数量众多的二级村，它们都是行政村管理机构所在地，一般都设有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事业，如小学、文化站、卫生所、双代店等。但有些行政村还没有双代店等商业服务单位，主要原因是：第一，靠近集镇或一级村，没有必要再设置双代店，如靠近东坝镇的东坝、留下、东风等行政村便是。第二，经济实力不足。例如古柏乡至今还有三分之二的行政村无双代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低有一定关系。

数量更多的三级村则是农村从事农业和家庭副业生产活动最基本的居民点，目前大多数还缺乏基本的服务设施。

以上分析了高淳县的村镇系统，虽然分级所采用的指标是多方面的，但着眼点是放在居民点的商业和服务业所起的作用上。而

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工业产值、行政地位等仅作参考，不作为分级依据。实际上，在村镇之间也很难有一条截然划分的界线。许多一级村庄起着补充集镇的作用，有的正逐步形成集市。而设有双代小店的二级村，对于就近供应农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也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从商业、服务业出发，将全县村镇划分为七级是具有连贯性的，等级愈高，数量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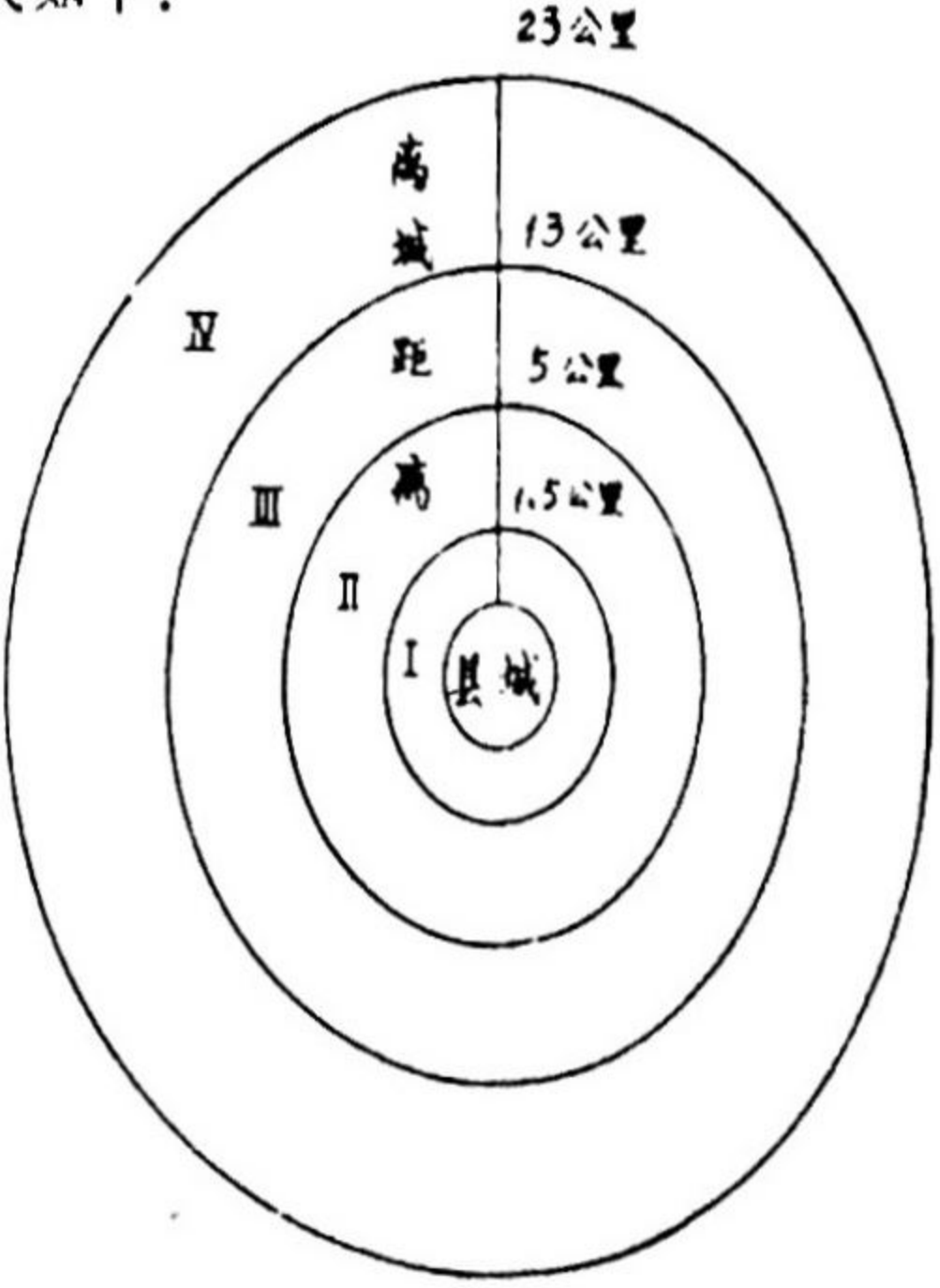
在村镇等级系统中，并不是每一个高一级居民点的周围都具备了比它低的所有级别的居民点。因为一个区域是不同等级的村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构成的镶嵌体系。在一级村或四级集镇的双代店和供销社里所具有的低档商品，在二级镇或一级镇也同样具备，而二级集镇所具有的中高档商品，如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等以及一级镇所具有的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高档商品，则是一级村和三、四级集镇所没有的，或不完全具备的。因此居住在一级镇附近的人们能够购买到所有低档和中高档商品，在一级镇的周围就不存在发展二级镇的条件。在稍远的范围内，也只可能设立一些出售盐、酱油、火柴、邮票等日用品的双代店，其模式如下：

Ⅰ．近郊，仅有三级村，或虽有二级村，但无商业设施。

Ⅱ．出现有双代店的一级村和二级村，无集镇。

Ⅲ．有三级四级集镇及一、二、三级村庄。

Ⅳ．在离城13



公里的范围圈外，出现二级集镇及以下的各级村镇。

在二级集镇周围，也出现性质相似而范围较小的模式。这些等级不同的系统互相联络、互相叠置，这种模式为合理安排村镇体系提供依据。

三、村镇的合理布局

建国以来，高淳县的村镇建设虽取得巨大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缺乏总体规划，包括各级集镇的布点部署、村庄的合适规模及合理布局等。在集镇建设上，仅是初步建设了各个乡政府驻地。实际上，有的乡政府驻地应该加强建设为一级镇，有的只宜建设为服务范围较小的小集镇，有的则没有建设集镇的必要，还有一些乡，面积较大，乡政府驻地又偏于一隅，有必要部署二个集镇。

1．东部应有一个一级集镇。高淳县东西长南北窄，而全县唯一的一级中心淳溪镇偏居西部，这对东部大部分地区来说显然是不方便的。因此，很有必要在东部建立一个一级集散中心。这个中心应建在东坝镇。第一，该镇位于东部地区中央，地理位置适中，水陆交通方便，胥河横贯市区，有公路联接淳溪镇及溧水、安徽郎溪等县。第二，现有基础较好。镇上有工厂、银行、邮电所、供销社、饭店、旅馆、浴室、影剧院等企事业单位，经济、文化、生活服务设施比较齐全。镇上街道已经铺了水泥路面，装上了路灯。第三，历史悠久。东坝在历史上曾是高淳最繁华的地方，在解放前东坝有百余家米行，是周围地区农副产品集散地。第四，现在东坝仍然是东部地区的中心集镇，附近安徽省的一些农民，也习惯到这里来赶集。

2．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减少淳溪镇的负担，西部地区也应有自己的次级中心地，即二级中心。全

县现有的二级集镇都集中在东部，今后应将西部的砖墙、韩村和正觉寺发展为二级中心。这是因为：

砖墙——地处西南部中心，远离淳溪镇而邻近安徽水阳镇，现有基础较好，附近村庄又多，且圩区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集镇四周圩区内河沟密布，可以发挥水运的优势。

正觉寺——位于西部边缘水阳江沿岸，两省三县交界处，地理位置对其发展较为有利，今后应加紧规划建设，扩建街道，扩大商店规模，增加商品种类；同时，还要增设照相馆等服务设施，扩大服务范围，争取赶超安徽雁翅镇。

韩村——虽与淳溪镇有公路相通，但距离13公里，农民要买点什么卖点什么，总是不方便。而且韩村靠近1969年新围垦的团结圩，那里发展潜力较大，需要一个服务职能较强的二级集镇。

3．为方便人民生活，东部地区有必要再增设一些二级中心。在东坝成为一级中心以后，其服务范围将扩及整个东部地区，但是服务半径过大，也会造成浪费，因此迫切需要有次一级的中心与之相配合。原有的二级集镇桠溪、漆桥、固城要继续发挥片中心的作用。这三个集镇基础较好，各种服务设施比较齐全，但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还需进一步的发展。位于漆桥以北1公里处的双牌石，是三条公路干线的交叉点，可利用这一有利的交通条件，在此地重点发展。对于桠溪来讲，偏居东部边境，远离淳溪镇，有双郎公路通过，且有桠溪河与溧阳县取得方便联系，发展条件较为有利，但是，目前应把街道整修好；同时要改善各种服务条件，如建服务大楼、邮政大楼、完善自来水设施等。固城地处高淳——东坝航道要冲，水陆交通方便，附近又有县水泥厂、陶瓷厂、建材厂、花山煤矿等厂矿企业，发展条件较好。定埠今后可发展为二级中心，该镇以河为界分属苏皖两省，胥河航道与双郎公路在此相交，地理位置重要，它的发展还可使服务范围伸及安徽部分地区。

4. 现有集镇数量偏少，今后宜适当增加一些四级集镇。全县现有集镇19个，平均每53个村庄才有一个集镇，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今后应进一步发展小集镇。理由是：

（1）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使农民可用更少的时间走更短的路程，就能买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一般日常生活用品。

（2）增加集镇，可吸收和安排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同时还能起到就近支援农村的作用。因此可以将一些规模较大，现有设施较多，位置适宜，交通方便的一级村建设成为集镇。如永宁尚义村，漆桥荆塘，青山叔村，固城盛前，沧溪杨家湾，丹湖小花，还有团结圩农场和傅家坛林场等。

5. 取消青山集镇，将其降为一级村。青山集镇虽是青山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因它距东坝镇仅2公里，且又是1962年由东坝公社划出北部境域成立青山公社后新形成的，而那里居民去东坝赶集已成了传统习惯。该集镇目前已配置了供销社等十几项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设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可以取消青山集镇，将其降为一级村。青山乡的发展重点可移至北部的叔村。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高淳县比较理想的集镇等级应是：

一级：淳溪镇、东坝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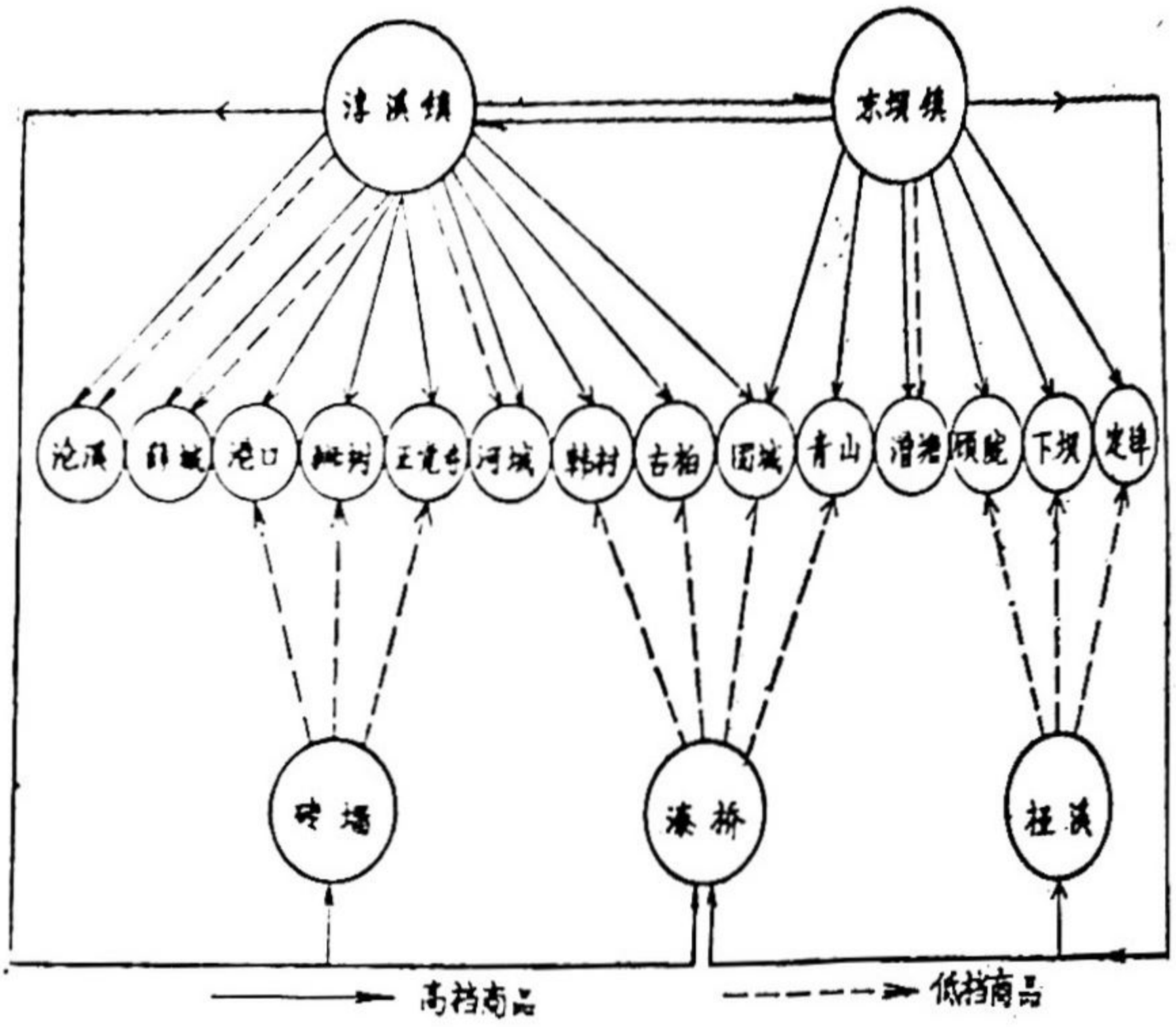
二级：椏溪、漆桥、固城、定埠、砖墙、韩村、正觉寺；

三级：沧溪、薛城、顾陇、漕塘、下坝、古柏、河城、狮树、港口；

四级：尚义村、荆塘、叔村、盛前、杨家湾、小花、团结圩农场、傅家坛林场。

高淳县各级集镇商品合理销售图（见下页）：

6. 需进一步增加一级村的数目及服务设施，使之逐步建设成为有一定规模和服务能力的小型集镇中心。全县现有一级村仅21个，仅占村庄总数的2.2%，为了方便生产和生活，迫切需要增加



一级村的数目。今后一级村的发展对象应是:(1)地理位置适中的二级村;(2)现有服务设施较齐全的二级村;(3)规模较大的村;(4)经济水平较高的村。现有的一级村一般配置有综合商店、豆腐店、理发店、医疗站、文化站、小学等服务设施;今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还应开辟集市贸易场地,并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增设浴室、肉店、饮食等服务行业和小型影剧院等娱乐场所;还应针对高淳县文化落后的特点,开办初级中学,让附近几个行政村的学生就近入学。

7。扩大二级村双代店的规模,改善服务条件,使之逐步建设成为全行政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的中心。同时,可考虑适当增加一些二级村。全县现有的二级村均是行政村或几个行政村的管理机构所在地,因而相应地配置有双代店等服务设施,但是,现有双代店规模太小,商品种类不多,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今后应加以扩大。此外,还要建设好卫生所、图

书室、加工厂、小学等。目前这些设施大多已具备，今后应注意扩大规模和改善服务条件。但是，至今仍有部分行政村还没有双代店等基本的服务设施，今后应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增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打破每个行政村一个服务中心的框框，使一些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三级村逐步发展成为二级村，以达到既能取得经济效益、又能最大限度地方便人民生活的目的。

8．各级村庄应以原地改造为主，适当加以分散和集中。全县现有的村庄，大多是在过去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现状条件较差，不可能满足其发展需要，但从节约资金、少占耕地、尽量减少建设期间对生产的妨碍等要求出发，仍需尽量利用现有设施，采取原地改造的方式。但是，现有村庄的分布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即东部的分散与西部的集中，它们对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西部圩区，村庄大多集中在圩埂上，圩内很少分布，远离耕作区，不便于生产和管理。而东部丘陵地区是分散的布局形式，占用大量土地，又不便于配置各种生活福利设施，还会影响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目前，西部新围垦的圩区如团结圩、永胜圩、西湖滩等还是聚落空白地区，因此，村庄的适当分散有其必要性，同时又有其可能性。因为大村庄人口聚居很多，房屋密密实实，采光通风差，活动场地少，村内道路狭窄、弯曲，要使生活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而又接近耕地，就得迁往新圩区定居。其次，圩埂地皮有限，新建住房用地紧张，也增大了迁往新圩区建设一些百户人家左右的新村的可能性。但目前新圩区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远离服务中心、交通不便、不利于与外部取得联系、以及特大洪水时居住的安全问题，加上人们有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习惯，这些都影响着农民向新圩区的迁移。

东部分散的自然村今后宜适当集中，可选择位置适宜、交通

魏晋以来，北方劳动力大量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利用，经济获得开发。唐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加之这里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多了，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吴郡(苏州)有68,000户人家，到元和5年(公元810年)增至10万余户。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江东地区，唐时用曲辕犁耕田，这种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铁制木制相结合，已同近代的木犁差不多。灌溉技术方面，发明了利用水流自行旋转的筒车，不用人力，昼夜不息。还有风车、翻车、秧马等，都省力而功倍。肥田方面，分别使用不同的肥料，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上已处于全国的重要地位。而太湖地区，田畴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最宜水稻的种植，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水患，唐宋时，多次疏通太湖水道，置闸调节，使水灾之害大大减少。在这一基础上，劳动人民垦辟了大量圩田，扩大种植面积，“耕无废圩，刈无遗垄”①。并且一年能种二熟。浙西路(江苏南部、钱塘江以西地区)成为南宋时主要农业区，时人说：“苏湖熟，天下足”。

宋元以后，太湖地区的可耕地，基本上保持定量，应开发的已开发了，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初开始，统治者多次进行移民运动，移民的原则是从狭乡迁到宽乡，太湖地区一直被认为人稠田少之地，因而移出之民是最多的。洪武3年，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4,000余户到滁州。28年，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②。永乐6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③。土地量的稳定，劳动力的增多，要发展生产，只有靠集约经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的对苏松地区的重赋政策，既表现

① 吴泳《鹤林集》卷39。
② 《明太祖实录》卷243。
③ 《明史》卷6。

出统治者穷凶极恶的搜刮，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地区经济水平高于其他地方的基本事实。“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①。这种南北差别，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多种经营提供了保证，使农业的商品化成为可能。

棉花这种植物，种植容易，成本较低，特别是更适宜于高旱地区。织成的布，坚固又御寒，光洁柔软，确是一种很理想的衣着原料。松江地区在宋末开始种棉花，由于存在高旱、潴溉困难的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往往难于保障，即使有收获，产量也是很低的，“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②。这种土地对耐旱喜土质松的棉花来说，正是最理想不过了。于是，种棉花之利就远过于种植水稻，“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这是清人高晋多次往来于松江、太仓等地考察为何“种花者有十分之七八”③而得出的结论。这样，棉花在松江等地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必须一提的是，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崖州学来了先进的纺织经验，改革了纺织工具，一改过去“无踏车椎弓之制”④的落后状态。这一看来很偶然的因素，然而作用非小。当时的棉花种植，几乎遍于全国，然而唯有松江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棉花种植和棉织品生产中心，成为“衣被天下”的发源地，原因何在？正是只有松江把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结合得最好。例如，先进的轧棉工具，有“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⑤《天工开物》说：“织造尚松江”。福建、广东也种棉，也有先进的技术，但其土对种棉不是十分理想的，改

---

① 《皇朝经世文统编》卷24。
② 《辍耕录》卷24。
③ 《皇清奏议》卷61。
④ 《辍耕录》卷24。
⑤ 《农政全书》卷35。

种其他作物获利更多，因此，没有大面积推广。明末就有广东、福建人到松江买回棉花再织布的现象。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省)分布着广大的棉产区，但纺织技术落后，据记载，北方种棉也经过了多次尝试，由于气候干燥，纺纱经常断裂，难以成纱。"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①。所以，北方的棉花原料，只能源源不断地运向松江，经过这里加工成布，再散发到各地。

位于太湖之东南的苏杭嘉湖地区，是著名的蚕桑产地，这里的丝绸生产誉满国内外，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三大蚕桑基地之一。

为什么明清时代，丝织业在太湖地区十分繁盛，"湖丝遍天下"呢？这是同该地区生产力的水平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就日益分离为更多专业性的特殊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社会分工又使农业本身"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②。蚕桑生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地区繁荣起来的。明人张瀚说："总揽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纡，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③。徐献忠作过统计，"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桑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个，谋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④。茅坤也说，湖州桑田，"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斛，岁之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斛"，最差的土地种桑也同最好的土地种粮差不多⑤。正是有倍利之获的可能和现实，才导致农业经营的转向。

① 《皇清奏议》卷42。
② 《列宁全集》卷3，第18页
③ 《松窗梦语》卷4。
④ 《吴兴掌故》卷13。
⑤ 《乌青文献》卷9。

太湖地区，其田能灌能排，“其土适桑宜蚕”①，一般一年能采几次桑叶。当然，南方的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四川也是很合适种桑的，北方的山东、山西、关中也有部分的植桑区，但太湖地区无疑是一块地大产多的主要区域。加之蚕丝质量的优等，丝织技术的先进。元朝开始，政府在杭州设织染局，明代苏州、杭州也有织染局之设，说明这里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出名的“湖丝”，精细光润，成为国内丝绸之冠，畅销海内外。这就决定了太湖地区的丝织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丝织业在中国很古就存在，秦之前，就有布缕之征。汉代，我国被称为“丝国”，历代政府的户调式、租庸调、两税法都有征绢的内容。由于政府的硬性征发，蚕丝在全国普遍存在。唐中期以后，由于统治者以栽桑多少定户等，确定征税额，出现大砍桑柘的现象，一直延至宋代。砍桑最多，破坏最大的是北方。唐以后，北方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地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气候反常，对桑树的栽培，蚕的饲养越来越不利；而南方砍桑并不厉害，战争又较少，蚕桑一直继承下来，终于在宋元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马可·波罗行记》说，江南如苏州、吴兴、杭州等地产丝之饶，元朝政府赋税收入之大，为向所未闻。

明代开始，苏松杭嘉湖的农民普遍靠家庭副业为生，养蚕织布深入到家家户户，开始突破旧有的自给性而走向市场。需要指出的是，明初政府规定，以银代赋税，一改传统的实物地租，既是对发展着的商品经济的承认，又反过来加速了农村的商品化进程，其发展速度就远非同在原来作为实物上缴下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相比。有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②。嘉定县“其民独托命于木棉”③。这些副业已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重赋

---

① “蚕桑竹枝词”自序。

② 雍正《浙江通志》卷103。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册6苏松。

下的江南农民，“尚懂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①。一旦“是岁木棉枯槁”，便立即会发生“杼柚为空，民皆束手待毙”②。这显然同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作为生活补充已大不相同了。

棉织业和丝织业是太湖地区两大主要行业，其影响也最大，除此之外，如“太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等果品为生。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③。烟草，苏州“向无此种，明季始种植”④。无锡的新安、开化等地种上了席草。湖州“归安诸乡统力农，修蚕绩，极东乡业织，南乡业桑菱、西乡业薪竹、北乡负郭东业蔬靛、荻港业藕、湖跌断头业苇、埭溪业苧、善琏业笔、菱湖业蚕，挽绵为绸尤工”⑤。……

总之，至迟在明代，太湖地区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的范畴，在向商品经济叩门，农村田野不再是一概的粮食作物，而是开始了多层次的经济作物种植。这种情况的变化，必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中之一，即是要求有无数小而全，又方便的农村小市镇来满足它的要求。这样，繁星点点的分布于广大乡村的工商业市镇，便应运而生，走上了社会的舞台，担当起它的历史使命。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市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

二、市镇的形成及其类型

太湖地区的市镇，绝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苏松为例，宋元以前，市镇约有十几个，到了明正德以前，增

1 《农政全书》卷35。
2 冯汝弼《祐山杂记》。
3 崇祯《吴县志》卷10。
4 康熙《苏州府志》卷22。
5 乾隆《湖州府志》卷39。

方志记载，有市镇三十七个，清初到两次战争前，新增大小市镇达一百五十多个。

从市镇的分布看，既有靠近城市的，如：黎里、魏塘、闵行、南翔、塘栖、梵皈、青村港，也有远离城市的，如：盛泽、震泽、南浔、善琏、平望、周庄、庄练塘；既有位于交通要道的：濮院、浒墅、木渎、八斥、乌青、王江泾、唯亭、朱家角、商榻、黄渡等，也有矗立于闭塞的山村小乡的：光福、黎里、菱湖等。

根据大量的资料记载，大体可看到市镇的发展线索。一般地，市镇是从村落发展为市，再上升为镇，"双泾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居）民至三百家"①。明人归有光说，嘉定新泾，"四十年前为野，今乃为市"②。嘉靖时又成为镇。市的工商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上引起封建政府的注意，往往升为镇。例如：吴江的盛泽、梅堰、八斥，明嘉靖时都称为市，到康熙年间，相继上升为镇。

随着江浙地区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深入到农村，市镇之数在逐步增加。如苏州府吴江县，明弘治县志记有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四镇，里市、江南、新杭三市。到嘉靖《吴江县志》，则市增到七，为八斥、双杨、严墓、檀丘、梅堰、盛泽、庞村。康熙时，镇也发展到七个。上海县明代有市镇十八，到清康熙年间，又新增了十七个市镇，合计市镇达到三十五个。

市镇因发展程度和地位不同，大小不一。镇，一般有居民数千家，也有大至万家以上，小至几百家的；市，一般几十家到几百家，也有大至几千家，小至一、二十家的。震泽，平望、黎里、同里、枫泾、王店、王江泾、菱湖、双林、练市、塘头、福山、梅李、河桥等镇，在清初居民都为数千家。嘉兴的新城镇，清初居

---

① 乾隆《震泽县志》卷4。

② 《震川先生文集》卷20。

民达万余家。濮院镇、乌青镇、唯亭镇亦为万家之镇，这是比较大的镇。奉贤县的阮巷镇，清初“居民二百家”。四团镇“居民三百余家”①，这算是比较小的镇。双杨、严墓、檇丘、梅堰、陡门、沈荡、法华桥、西新市为几百家的市。吴江的江南市，“明初几及千家”，黄溪市，“康熙中至二千余家”②，为较大的市。而奉贤的三官堂市，乾隆时“居民二十余家”③，嘉善县的张泾堰，竟是“十家之市”④。镇之范围有大至十几里，小至一里、半里的，乌青镇，“市连广袤十八里”⑤，嘉定县马陆镇，“东西不及一里”⑥，奉贤县的四团镇，“其街四出，南北亘者半里许，东西亘者只数武”⑦。(注，古三尺为武。此仅言其距离之短。引者)。

市镇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为研究方便起见，不妨将其主要的因素略述于下：

1．因手工业发达而形成的市镇。太湖地区相当一部分市镇的兴起，属于此种情况，如菱湖、双林、王江泾、新城等镇，都是因蚕丝业在本地的兴旺发展而形成的。新泾、朱家角、枫泾等镇，则是棉花的种植与加工达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2．座落地点正处于通商孔道而成为镇。松江的商榻，处于苏州与松江之间，来往于两地的商人正好在这里投宿、停歇，于是形成商榻镇。黄渡镇是因临近吴淞江，交通方便而成。很多市镇，往往随通道的变故而兴衰，杭州的塘楼镇，“宋时所无”，因为那时并不处于水运要道，“而今(清乾隆时)为市镇之甲”，原因是“运道

---

① 乾隆《奉贤县志》卷2。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4。
③ 乾隆《奉贤县志》卷2。
④ 嘉庆《嘉兴府志》卷4。
⑤ 乾隆《乌青镇志》卷2。
⑥ 光绪《嘉定县志》卷1。
⑦ 嘉庆《嘉兴府志》卷4。

改称”，遂致“日益繁盛”①。奉贤县的阮巷，曾是街道盘旋，市井栉比，“称为巨镇”，但在清初，“因诸河淤塞，舟楫不通”，而衰落下去②。

3．人口因素。大量人口聚居一地，逐渐形成一个居民点，使相互间调剂有无，进行交易活动成为可能，逐渐形成工商业中心。杭州的横塘市，俗称“小金陵”，就是因居民增加，从而使“土物汇聚”③。松江的张泽镇，也是因人口增加遂发展起来的。另外，由于世家大族聚居一地，逐渐形成“居民稠密”，进而成为市镇，松江的萧塘镇，因“萧姓居此，渐成市集”④。叶谢镇为叶谢两姓世居而得名。

4．政府在军事要地，设置防卫机构，逐渐发展成市镇。松江的亭林、金山卫、张泾堰、青村镇等都处于近海，常常遭海盗侵袭，在政府设巡检司后，工商业也逐渐兴盛起来。

5．某种重要产品的出产地，引起政府注意，常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继而成为市镇。南汇县的新场、航头是海盐产地，政府设盐仓，引来很多商人、居民，而成为镇。

特别突出的是，太湖地区出现了很多专业市镇。

丝织业专业市镇有：盛泽、震泽、濮院、王江泾、菱湖、南浔、唐栖、双林、王店、新丰、陡门、沈荡等。盛泽镇，居民“以绫绸为业”⑤。它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丝织业，“镇之丰欠，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兴盛，尚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弊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减色矣”⑥。嘉兴王店镇，民以织绸最著

---

① 乾隆《杭州府志》卷5。
② 乾隆《奉贤县志》卷2。
③ 乾隆《杭州府志》卷5。
④ 嘉庆《松江府志》卷2。
⑤ 《醒世恒言》卷18。
⑥ 同治《盛湖志》卷3。

名，所织之绸称"王店绸"，闻名远近①。

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安亭、魏塘、硖石、新丰塘、新城、娄塘、鹤王、诸翟、盘龙等，则是从事棉花的交易、加工、棉织品的制造和集散的市镇。"朱家角镇，……商贾凑集，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②。嘉兴"有镇曰新丰塘，……民务农贾，专聚棉花及布，而商来贩之"③。

苏州的檀丘市、庵村市，湖州炉头镇，嘉兴炉镇，为铁业冶铸为主的市镇。"炉头镇，在县治西七里画溪桥，居民业冶，故名"④。

以制陶为主的镇有：余杭县的瓶窑镇，嘉善县的千家窑镇。千家窑镇，"民多业陶"⑤。

苏州的新郭、横塘、嘉兴石门镇以榨油为主。

桐乡县的陈庄镇，"居民以竹器为业"⑥。

湖州的善琏镇，则是制笔中心。

苏州的浒墅关为"草席之市"⑦，"草席之市，席机之匠，惟浒墅有之"⑧。

一些近海市镇，则因鱼盐之利而兴盛。四团镇"多借鱼盐之利，男女并从事于此，其女子壮健者，往往负盐数十里"⑨。

有的市镇虽不以某种产品占统治地位，但商业却极繁盛，成为商业中心，在这里集散着各地的农副业、手工业产品，商人云

---

(1) 嘉庆《嘉兴府志》卷4。
(2) 崇祯《松江府志》卷3。
(3)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66。
(4) 乾隆《湖州府志》卷15。
(5) 嘉庆《嘉兴府志》卷4。
(6) 同上
(7)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81。
(8) 道光《浒墅关志》卷11。
(9) 乾隆《华亭县志》卷2。

集，买卖兴旺。吴江的同里，历来为“商贩骈集”之地，镇之地盘一扩再扩，茭芦丛生的荷花荡，可通舟楫的“濠渠”，都填土架屋①。位于江浙两省、苏嘉湖三府、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七县交界的乌青镇，“烟火万家”，“人稠商贾四集”②。座落于松江、上海、青浦之交的小镇蒲溪，仅一里见方，但“商贾骈集”③。

……

还有一种市镇，完全是靠本地自然产品支撑市面，如吴江的黎里，“不当孔道”，“四方商贾不至”，上市者多为“乡人”，他们各自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换回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④。农产品统治着市场。这类市镇的工商业及其经济地位，就远不如那些专业市镇。

三、市镇的地位和作用

工商业是明清太湖地区市镇的主要内容，考察市镇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拟从商业和手工业两方面入手。

第一，商业活动在市镇中占着重要地位，市镇成为国内外市场的组成部分，它是城市连结农村的纽带，它成为商品交换、先进技术的传播地之一，成为明清时代整个商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镇一经产生，就同商业有了不解之缘，它受经济发展的推动，成为一个商品流通场所，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量商品，在这里完成交换过程。湖州归安的菱湖镇，“居民担负，咸荟萃于

---

① 嘉庆《同里志》卷1。
② 乾隆《乌青镇志》卷1、2。
③ 《蒲溪小志》1961年上海文管委编。
④ 嘉庆《黎里志》凡例，卷2。

此”，又有“绵绸交易之所”，以集四方居民织品① 。双林镇也有专收乡民丝绢的收绢所。

明清时代，太湖地区的市镇，商业相当发达，是全国其他地方的市镇难以比拟的。当时出现于北方的大量市镇，称定期市，南方广东、广西等地的墟，数量很多，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少见到天天开市、赶墟的。而太湖地区的市镇，天天开市的不乏其数。震泽的县市，贸易“无虚日”②，吴江黎里也是每日“乡人咸集”③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规定一定的日期，四方之民汇集一起，进行商品交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增加集会的日期，而最发达的形式便是日日市。

牙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它的职能是“评估物价”④ 。明清时代的城市中，牙行存在极为普遍，少数镇如震泽乌青、航头等也有牙行活动的记载。特别是盛泽镇，明代牙行竟有千百余家。如果商品经济偶然出现，或并不发达，如此之多的牙行存在就没有必要了。

“商品经济出现时，国内市场就出现了”⑤ 。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新的否定因素，必须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是在市场上实现的，因此，流通过程是商品实现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流通范围越大，表示商品经济的程度越高。市镇在形成之初，它的商业活动，只是限于本地区小范围、短距离的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必然突破这种藩篱，而与国内外市场相联结。分析市镇上活动着大量商人集团，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商业在市镇中

(1) 光绪《菱湖镇志》卷9。
(2) 乾隆《震泽县志》卷4。
(3) 嘉庆《黎里志》卷2。
(4) 《续通考》卷25。
(5) 《列宁全集》卷3，第47页。

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二)市镇的交换完全超出了本地区的范围，纳入了国民经济的流通渠道。菱湖镇有江宁商人前来买丝，丝织业中心的盛泽镇，有徽州、山西、山东、宁波、绍兴等大商帮，双林镇有徽州、江宁、镇江、宁波、绍兴等商帮，濮院镇也有宁波、绍兴商帮。他们握有巨量资本，操纵着市镇经济，收购当地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或加工后出卖，或直接转卖各地，大量的是远途贩运，松江“衣被天下”，“湖丝遍天下”，正是通过商人实现的。苏州周庄镇的棉纱，“捆载至浙江硖石镇以售”①。乾隆年间，四川米运到双林镇出售。

少数市镇即使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存在着海外贸易。小小市镇竟同国外市场联系了起来。“崇祯癸未(1643年)，唯亭钱裕 鞠 合伙入海贸易，共一百二十人”②。双林镇，清初有徐巨锺者，“屡携巨资，行贾海外，智计过人，靡不奇中”，“十数年积资至巨万”③。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④。嘉庆《嘉兴府志》卷4记，平湖县的乍浦镇，“番舶凑集，居民成市”。当然，在封建政府长期的海禁政策下，尽管商品经济的发达，迫切需要打破国界的限制，然而，要想广泛地开展海外交流，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些记载可看出，市镇上少量的海外贸易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市镇分布于农村，成为当地农村自然产品的集散地。市镇出现后，就同附近农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工商业程度较低的市镇，还是工商业专业市镇，都存在着大批农村自然产品的交易活动，成为当地人民生活中越来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常熟璜泾镇，“货物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地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

---

① 光绪《周庄镇志》卷1。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20。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20。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37。

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① 杭州的蔡家桥，"居民五十余家"，"入市者咸可厌(按，厌通餍，满足)所求焉"。屠家桥"日用所需不缺"②。蒲溪镇，居民和附近乡民都织布，"易钱米以资日用"③。当地农民通过这个市场，互相调剂余缺，便于向更利于自己的专业方面发展，工商业者更是从这里吸取自己的生活需要，从而推动它去发展手工业、商业。

市镇作为农村的商业点，它起着农村同大城市间的中介作用，农村的原料可通过市镇运向城市，城市的很多商品又通过市镇输入广大的农村。因此，市镇同城市共同组成了一个经济网状组织，这一作用在城市与农村相隔较远的情况下，意义更大。

传统的农村封闭、隔绝，即使有城市的存在，也是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而出现。随着商品经济出现于城市，随着一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兴起，人口、商品、信息、先进的技术等等的流动就不再是偶然的或小规模的了，别看这种流动，尽管在表面上农民同市镇的关系仅仅是"上市"、"赶集"罢了，然而其社会性是异常深刻的。流动，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先进技术很快普及，尤其是使人们眼界大开，相互间建立起联系，从而打破农村的闭塞状况，使农民的封建束缚有所减轻。市镇上的流动，虽然大量的表现为近镇地区的短距离交流，然而其量之多，范围之广，是靠少数大城市难以完成的。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农民同大城市的直接联系不是很多的，除了近城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一年之中很少上大城市，大量的交流、交易活动集中在市镇上。

第二，市镇是商品的生产基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镇上出现。市民运动、雇佣工人的罢工运动也随之而来。很多市镇拥有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以市镇为中心，形成一个

① 道光《璜泾志稿》卷7。
② 乾隆《奉贤县志》卷2。
③ 《蒲溪小志》1961年上海文管委编。

连同附近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基地。王江泾，居民“多织绸，收缣纻之利”①。濮院镇，乾隆时“日出万绸”，“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米”②。由于手工业分工的发达，镇上的手工业者，按行业分布于不同的地段，如苏州唯亭镇，织夏布毛毯的集中在镇东霖雨桥附近，纺生纱的聚于蔡顾巷。市镇成了商品生产基地，势必集中着大量的手工业生产者。乌青镇有各种手工业者，苏州的檀丘市，“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③。

大量资料说明，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若干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不需要很高技艺”的行业中出现④。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既已成为附近农村工商业的中心，随着市镇工商业的发展，它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点之一。因此，我认为，市镇应该成为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发生不可忽视的地区。震泽，在“明熙、宣间，邑民始渐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⑤。乌青镇，万历时有“中人之家，贷钱开油饼坊”，开始雇佣工人⑥。嘉兴石门镇的记载更明确，万历时该镇已有二十家大油坊，以榨油生利，全镇油工有八百人，油工雇本镇人已经不够了，于是“辄募旁邑人为佣”，光绪《嘉兴府志》载“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榨油原料油菅亦主要靠“商人从北路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菅来此”⑦，靠本地原料远不能满足了。很明显，这不是与农业结合的一般性市场的榨油业了。盛泽镇施复夫

---

① 嘉庆《嘉兴府志》卷4。
② 民国《濮院志》卷1。
③ 乾隆《震泽县志》卷4。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第62页。
⑤ 乾隆《震泽县志》卷25。
⑥ 乾隆《乌青镇志》卷12。
⑦ 道光《石门县志》卷24。
康熙《嘉兴府志》卷15。
光绪《嘉兴府志》卷14。

妇从小商品生产者上升为拥有织机三、四十张，资本数千金的作坊主，更为大家熟知。从盛泽镇每年七月十四日夜间，“佣织少年与拽花儿集于夜船，汇夹岸，放桌赌唱山歌，此唱彼和，达旦乃止”①的盛况看，雇佣工人不是少数了。道光《元和唯亭志》卷3记：“织作，在唯亭蔡顾巷，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找’”。这里，工匠“计日受值”，一般都有固定的雇主，又存在劳动力的市场，工匠人身也是自由的。

一些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镇上开设了字号，清人顾公燮于《消夏闲记摘抄》卷中中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这种布号，同牙行的职能是有区别的，它有自己的资本，开始使染坊、踹坊、商贾从属于自己。到清初，更有“里中（枫泾）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踹匠皆江宁人”②。布局则干脆直接经营棉花的加工业了。杭州的唐栖镇，万历时，“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③。这不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绝好例子吗！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棉织业的分工发展在一些镇上进行，染踹从棉加工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行业，并从“踹坊工价钱串，请照苏州之例，每银壹两给钱捌百贰拾文”，“按布匹的长短、大小、阔狭定价”④。得知，踹匠工资用货币发放，且实行计件工资制。

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造成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多数人破产，沦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另一方面是少数人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从而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① 同治《盛湖志》卷3。
② 《枫泾小志》卷10。
③ 光绪《唐栖镇志》卷18。
④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条46。

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市民运动在镇上兴起。在私有制下，由于残酷的剥削、激烈的竞争，迅速造成两极分化，小部分人通过各种手段，发财致富，震泽镇的"居民以农桑为业"，"近于蚕时，贫者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钱偿息百钱，谓之加一钱"①。从蚕到丝，最多不过个把月，而利息率高达百分之十，可见高利贷剥削之重。常熟唐市，明嘉靖时，居民三、四百家，拥资二十余万的有数十家。康熙时，平望镇有翁桂芳、翁芝芳、翁兰芳三兄弟，芝芳"业贾辄至数千金，桂芳、兰芳亦至数十百金"②。而大量居民维持温饱还成问题，这样，市民的阶级划分日趋明确，一遇自然灾害，广大贫民生活更苦，往往同"乡民"一起，矛头对准"富户"。苏州府周庄镇，1804年爆发了贫民向"富家"抢米的运动。吴江的庞村，崇祯十三年，因大水遭饥荒，于是"饥民所在作乱，而吾镇亦哗然，群起逼令殷户减价开粜"③。也有联合起来，反对官府贪赃枉法、不法之徒横行街道的。周庄，"镇西囤园盛姓，多财好勇，康熙壬申(1692年)，谋占邻人房屋，诬陷系狱，贿通邑令，扬言将置之死地，邻母惧，遂缢死，令来镇检验，盛复汇缘贿属，令欲枉法，镇人不平，群起喧哗，争掷以瓦砾，令遁去。"又有王胜者，"膂力过人，无赖棍徒也。康熙辛丑(1721年)三月二十日，奸事败露，镇人群起殴之，毙于清远庵，并焚其尸"④。唐市在"明季甲申(1644年)后，时多调卫兵船过市，必姿索诈而后去，居民苦之，一日船泊墅河，公行肆掠，里人徐昌夫素有胆略，遂故众缚解，当道遣官押遂"⑤。这些资料说明了市民的队伍正在壮大，已经成为一支反封建的重要力量。

---

① 道光《震泽镇志》卷2。
② 道光《平望志》卷7。
③ 顺治《庞村志》。
④ 光绪《周庄镇志》卷7。
⑤ 道光《唐市小志》卷下。

清初苏州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踹匠罢工运动，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是象南翔、枫泾等镇，也在清康熙年间，因字号扣克工价，爆发了“踹匠传单鼓众，停染、歇踹”的罢工运动，迫使官府不得不发布“踹匠工价平色，各字号不得扣克”的告示①。这是我们见到的镇上雇佣工人开始同“雇主”（最初的资本家）作斗争的实例。

作为附近农村经济中心的市镇，因社会分工的加强，使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技术日趋专门化，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提高生产水平，为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创造必须的物质力量。

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一部分人从农村排挤出来，市镇是将众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工商业人口的有利场所，而“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②。属苏州府的严墓市，明初“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③。光福镇，明嘉靖时居民三百余户，到天启初已达千家。市镇人口的增长，一部分是外地人口的流入，而大量的是本地农业人口的移居。

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市镇的形成，大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市镇数量之多，它的势力波及农村每个角落，同农民的关系十分直接，它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大。市镇同农村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市镇以农村为依托；另一方面，市镇一出现，就反过来促进农村的发展，使农村向商品化前进，成为手工业的原料基地，“震泽镇及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绌之利”④。嘉兴府海盐县“比户养蚕为急务”⑤。没有广大的市场，农业的商品化

---

① 光绪《嘉定县志》卷29。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条44。
② 《列宁全集》卷3，第20页。
③ 乾隆《震泽县志》卷4。
④ 乾隆《震泽县志》卷25。
⑤ 嘉庆《嘉兴府志》卷32。

是难以达到的，无怪乎历来为全国产米重要地区的苏松等地，至清初竟要依靠四川、湖广、江西的粮米为生，可见农村的变化之大。这种变化，市镇也起了重要作用。

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市镇大量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并将自己的特色注入到市镇中去。明清太湖地区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市镇，这些市镇的商品经济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作为附近农村工商业集中地的市镇，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农村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只有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大量出现后，才会使广大农村从自然经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由于市镇的封建统治较城市薄弱，因此，它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城市。它一旦成为手工业基地，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先进的技术就会很快产生和传播。总而言之，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市镇，它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于突破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村，它更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市镇，确实有注目的必要，同时也应看到，市镇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纵使经济水平较高的太湖地区，一些市镇手工业发达，商业繁盛，也有一些市镇，工商业还很落后，有的操纵在巨姓大族之手，有的接近于纯自然经济的状况。即使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在各方面仍受着封建政府的种种压制和压榨，它的前进步伐常常遭到扰乱和阻挠。这是为什么市镇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总之，到了明清时代，一些地区的市镇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经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特别是太湖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就全国而言，这类市镇的数量还很少，不足于动摇整个封建统治的根基。

后　记

《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现在与读者见面了。在结束本书的编辑工作时，我们感到有些情况有必要向读者作简要的说明。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是我国“六五”计划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承担这个任务的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费孝通同志担任学术指导。本书的出版，就是经费孝通同志一九八三年九月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建议，并在他的指导下编印成册的。

收入本书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共二十五篇。费孝通同志的《小城镇，大问题》，既是本书的序言，又是全书的总纲。这篇文章“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为使读者先睹，在本书排印的同时，作者应约于《瞭望》、《江海学刊》等报刊摘要发表或全文刊载了此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付印前，作者对原稿又作了最后的修改，并在内容上作了补充和订正。《小城镇，再探索》可说是该文的续篇，也一并收入本书。其他二十三篇，或对一个小城镇进行全面剖析，或就小城镇建设中一个方面的问题作深入探索，独立成章，各具特点，就不一一介绍了。在编排上，内容接近的编排在一起，以照顾到全书的系统性。

还要说明的是，文章的作者，除了参加课题组的同志外，还有省、市政策研究部门的同志，从事小城镇工作的同志，以及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者。他们提供的论文，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这是我们要深致谢意的。

我们对江苏省小城镇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本书只是它的开篇。作为课题组来说，我们提供的文章，多系资料性的，也是比较粗糙的。当然，任何研究都有个发展、深入的过程。因此，我们衷心希望一切关心小城镇建设的同志，积极参加和支持这一研究，多提宝贵意见。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集比第一集的论文作者一定会增多，水平一定会有所提高。

这本书能较快地与读者见面，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的结果。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吴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城镇办公室、吴江县松陵、盛泽、震泽、平望、同里、莘塔等镇（乡）党委对课题组在调查、提供资料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新华社江苏分社方爱玲、高梅及同志为本书提供了照片；南京大学地理系周庆生同志为我们绘制了吴江县小城镇分布图，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王淮冰同志主编，吴大声、居福田同志承担了具体编辑工作。

《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

一九八四年元月